

群书治要十讲

刘余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群书治要十讲 / 刘余莉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 6
ISBN978-7-5126-2840-3

I. ①群… II. ①刘… III. ①政书—中国—唐代②《
群书治要》—研究 IV. ① D69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6888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网 址: www.tjpres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2840-3/D. 419

定 价: 35.00 元

目录

前 言 /001

上 篇 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社会和谐之必由之路

第一讲 道德教育，治本之道

——从《群书治要》看如何反腐倡廉 /004

一、腐败的根源是道德缺失 /005

二、道德缺失引发三个问题 /010

三、全面加强道德教育的途径 /015

四、仁爱的原点是孝道 /030

五、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上行下效 /037

六、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040

第二讲 国家兴衰，由于官德

——从《群书治要》看加强官德修养的必要性 /043

一、盛世与民同乐，衰世残害其民 /045

二、盛世考察历史，衰世自骄自智 /050

三、盛世任用忠贤，衰世听信奸佞 /053

四、盛世乐闻其过，衰世乐闻其誉 /061

五、盛世反求诸己，衰世怪罪别人 /064

六、盛世抑损情欲，衰世纵欲享乐 /065

七、盛世天下为公，衰世天下为私 /070

第三讲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从《群书治要》看文化的本质 /073

一、经典：文以载道 /075

二、文字：智慧符号 /094

三、礼乐：点滴教化 /104

四、艺术：寓教于美 /109

第四讲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 /114

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114

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128

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144

第五讲 孝悌为本，上施下效

——从《群书治要》看传统道德教育的经验 /156

一、教育目标：长善救失 /157

二、教育次序：先做人，后知识 /158

- 三、德育内容：五伦、五常、四维、八德 /173
- 四、因果教育，内容丰富 /179
- 五、德育路径：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 /185
- 六、德育保障：完善的制度和法律 /198
- 七、成败关键：上行下效 /201
- 八、德育心法：反求诸己 /202

下 篇 爱民而安，好士而荣：安危荣辱的两大关键

第六讲 民贵君轻，富而后教

——《群书治要》中的民本思想 /208

- 一、贵民重民 /208
- 二、爱民恤民 /222
- 三、富民利民 /230
- 四、恕民教民 /237

第七讲 任贤使能，纳谏远佞

——《群书治要》中的用人之道 /247

- 一、用人之道，事关重大 /247
- 二、用人原则：任贤远佞 /265

第八讲 八观六验，三参九虑

——《群书治要》中的观人之道 /286

一、观人八法 /287

二、其他观人法 /310

第九讲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群书治要》中的得人之道 /319

一、贤能之士，何世无之 /320

二、得人七方，吸引贤才 /322

第十讲 德不称位，能不称官

——《群书治要》中的用人大忌 /349

一、用贤而疑，人主大患 /350

二、求全责备，失贤之道 /356

三、能不当官，任非其才 /358

四、德不当位，功不当禄 /362

五、偏听偏信，受人蒙蔽 /369

六、妒贤畏能，功灭国危 /370

七、已树而择，所树非贤 /373

八、事繁职乱，禄薄吏贪 /374

附录 古镜今鉴

——《群书治要》的当代价值 /378

一、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 /379

二、领导者成败的关键在道德修养 /390

三、领导者道德修养的内容（一）：修身 /395

四、领导者道德修养的内容（二）：爱民 /417

五、领导者道德修养的内容（三）：用人 /426

前 言

《群书治要》是唐贞观初年，魏征及虞世南等臣奉命编辑的治世要典。该书应太宗理政之需，务求古圣先贤之道统与历代君王兴衰之根由，凡经史子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悉皆采摭其中，存简朴之意，去浮诞之说，彰明治体，以道导术，欲令见本知末，简而易从。

换言之，《群书治要》相当于一部既能救弊于一时，又能成法于万世的施政实用手册。不仅在唐代帮助太宗创下了“贞观之治”，也在后来东渡日本的千余年中，受到了天皇的尊崇，为其成就承和、贞观两代盛世贡献巨大。对欲寻求身心和谐、家国安定、世界太平的有识之士而言，的为一部难得的“次经之书”。鉴于此，2001年2月25日，党和国家老一辈卓越领导人习仲勋同志为《群书治要考译》题词：“古镜今鉴”。

中共中央党校刘余莉教授深知此书对于解决当今社会弊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全人类带来永续和平的重要意义，遂在百忙之余，认真研读宝典，涵泳经书章句。《群书治要十讲》，是刘教授对《群书治要》的十篇精要讲解，也是在已出版的《品读群书治要》的基础上，再加丰富完善而成。《群书治要》全书采辑经典六十六种，合五十余万言，虽然纲举目张，善道有统，但读者初阅此书，仍不免畏其浩繁，而有难窥堂奥之憾。刘教授此番讲解，便是以利俗浅文揭橥大纲，学术、人生融贯一体，理事双谈，古今会说，可助读者迅速把握《群书治要》的主旨精髓和当代价值。

刘教授在讲记中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建立在中华传统“圣贤教育”基础上的“圣贤政治”，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好人而设计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以及现今的知识技能传授，而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以净化人心、长善救失，培养圣贤君子为核心要务。因此，忽视了圣贤教育的制度改革，不仅无法挽救因为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反而还会产生“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弊端；忽视了圣贤教育的文化建设，不仅无从实现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反而还会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后患。

全书立足于当代社会、人心之重大问题，在条分缕析地讲解《群书治要》义理的同时，也引导人们深入反思社会腐败的根源及其对治、加强官德修养之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传统文化与圣贤教育的本质蕴涵和学习方法、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实际含义，以及领导者务须注意的用人、观人、得人之道等等。内容丰赡，言辞恳切。观其文，想见其为人，作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淑世救民的真诚心和敏锐的洞识力溢于言表。

文化是民族之灵魂，教育是文化之生机。习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相信《群书治要》这部中华先哲留给后人的治世宝典，定能有助于国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中国重现盛世之治、为世界实现大同理想提供智慧源泉！



上篇

修身为本，教学为先：
社会和谐之必由之路

第一讲 道德教育，治本之道

——从《群书治要》看如何反腐倡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为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哪些借鉴和启示呢？

中国传统的优秀典籍浩如烟海，在众多的典籍之中，从哪一本书可以了解到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经验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群书治要》。《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派遣魏征、褚亮、萧德言、虞世南等大臣从唐朝以前的经、史、子中，将治国平天下的施政精华汇集而成的一部书。这部书是从一万多部的古籍之中精选出六十六部，又从这六十六部之中将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精髓提炼出来，汇集而成。虽然该书只有五十万字，但是读了这部书，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方法就全都了解了，确实是用功少而收效大。

2001年，我国老一辈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习老（习仲勋同志）为《群书治要考译》题写了四个字：“古镜今鉴”。意思是，古代这些典籍中的治国理念和方法，能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群书治要》这部书为今天的反腐倡廉能够提供哪些思路。

一、腐败的根源是道德缺失

要反腐败，就要知道腐败是怎么产生的。腐败的产生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一定的公共权力；第二，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为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领导者的腐朽观念和私欲的膨胀。这三者缺一都构不成腐败。有人认为有公共权力的存在就有腐败，其实这种看法是不足取的。就像一把刀子，一定是用来杀人的吗？刀子也可以切菜、可以砍柴等等，关键在于谁来用、怎样用。

古人考察事情的发展是通过“因——缘——果”的方式进行研究。腐败是结果，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领导的私欲膨胀和腐朽观念的存在。那么缘呢？缘就是条件。腐败的条件就是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有因、有缘，才有腐败结果的产生。这是中国古人分析事物产生、发展和结果的方法。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私欲膨胀和腐朽的观念是

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因，而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外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只是它产生的条件。所以，要根除腐败，就要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去除私欲，消除腐朽观念。

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家腐败现象似乎没有中国严重，所以只要把西方的某些制度搬过来，腐败现象不就得以解决了吗？

其实，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法制建设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西方的历史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它的政治制度维护的是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等道德理念的教育是靠教会来完成的。所以西方社会的治理靠的是两手：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而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某些制度搬过来，腐败问题就会得以解决，结果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

什么叫“异体移植”呢？就是这个制度在西方可以适用得很好，但是一挪到中国，它就变得水土不服。比如我们将西方的民主选举运用到我们的村干部选举之中，就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徇私舞弊的现象。当然这一方面和法制的健全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公民的道德素质不够也是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谁给村民的钱多，村民就去选谁；谁投其所好，他高兴、喜欢谁，他就去投谁的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不够，他们参加选举，选出来的人就不是合适的人。

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国出现了“能人现象”。什么是“能人”呢？就是这个单位眼看就要倒闭了，换了一个一把手，结果就扭亏为盈了，就带着这个单位走上和谐发展的道路。人们认为这个人很有能力，把他称为“能人”。其实，当我们反观这一现

象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因为他所采取的制度不是想方设法地损公肥私，把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他想到的是员工的利益、单位的长远发展，这样的人才可能扭亏为盈。

孔老夫子说了一句话，至今也不会觉得落后，这句话就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领导者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他能够奉公守法，不以权谋私，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都不会对企业、单位、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而如果领导者是以权谋私的人，无论是怎样的制度，他都会想方设法地去钻法律的空子。

很多人向西方特别是向美国学习管理，但是我们看一看安然公司破产的案例。安然公司在2000年的时候在“世界五百强”企业排名中是第七位，它的年营业额高达一千亿美元。这样一个实力非常雄厚的企业，为什么说破产就破产了呢？西方国家都是聘请CEO来管理企业，CEO又称“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很有能力，仅仅给工资他是不来服务的，还要让他占有公司的股份。企业经营效益很好的时候，公司的股票就不断地增长，CEO的收益就会不断地提升。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制度：CEO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那么他就会尽心尽力地为企业付出。但是市场有起有伏，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他很努力，有的时候企业营业额也不会总是增长。营业额没有增长的时候，股票就不能增长了，CEO的收益就会受到影响。个人利益受到影响了，怎么办呢？企业没有创收，他就制造收益，于是他就联系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来制造假账。为什么这个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心甘情愿地为他制造假账呢？因为安然公司是以每周一百万美元的代价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它制造假账。在巨大的诱惑之下，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就答应了。由于制造假账，安然公司的营业额攀升了，股票不断地上涨。

二十九个高管成员都知道这是制造假账的结果，当股票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一起把他们所拥有的一百七十三万股的股票全都抛出去。因为股票的抛售，他们赚了十一亿美元。这十一亿美元二十九个人分，每个人赚得的当然是很多。但是这个事情很快就暴露了，首席执行官被判入狱，要服有期徒刑一百六十五年。另一位董事会的高级成员用他所赚的钱买了辆高级的豪华轿车，结果在高级轿车里开枪自杀了。

安然公司的破产被称为美国经济界的“九一一”事件。这并不是因为安然公司制造假账的数额最为巨大，而是在此之后，美国开始对各大跨国公司制造假账的情形进行调查。不调查不要紧，一调查吓了一大跳，各大跨国企业几乎都有制造巨额假账的经历。比如说，世通集团在一年零一个季度里伪造了三十八亿美元的盈余，而另一家著名的国际公司在五年里伪造了六十亿美元的盈余。这些公司制造的假账，在2011年给美国政府造成了两千亿美元的损失。所以为什么金融危机会在美国爆发呢？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它的原因就是人的贪欲、人的不诚信。所以它的解决也不是靠一两个制度可以挽回的。

安然公司破产以后，美国的商学院的管理理念就开始有了变化。他们以前所奉行的理念叫做“TQM”，即“全面的质量管理”，认为企业只要把产品的质量关把好，就可以在企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安然公司的破产让他们认识到，企业的高管有一两个人道德败坏，就可以使“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毁于一旦。所以他们的理念从“TQM”变成了“TEM”，也就是从“全面的质量管理”变成了“全面的伦理道德的管理”。这一个转变可以说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西方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因泰尔写了两本书，《追寻美德》

与《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麦因泰尔和罗尔斯齐名，他是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而闻名的学者。在《追寻美德》一书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法律、规则是谁来制定的呢？是人来制定的。那么这个法律、规则在推行的时候，是谁来推行的呢？也是人来推行的。所以他认为，伦理学的任务不是去设计正义的规则和制度，而是要回归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把培养人的美德作为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他的这两本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样的观点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人的著作中就有反映了。《群书治要·孙卿子》（即《荀子》）中就有这样的话：“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认为，法不能够独立存在，有了正人君子、圣贤人，它能够发挥作用，没有圣贤君子，没有正义美德的人，它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法律、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而圣贤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群书治要·傅子》上用一句话就把制度和人之间的关系说明白了。他说，明智的君主一定会顺着好的制度，才会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的结果。但是，“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实行，必须要有好的人来推行这个制度。

上述论述没有否认制度的重要作用，但不认为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夏、商、周三代的时候，都曾经出现过天下大治的局面。周朝“成康之治”的时候，监狱四十年没有犯人，天下确实达到了大治。虽然这些治国的方法都记载在典籍中，但他们的后代子孙没有按照这些制度去治理天下，这是夏、商、周败亡的重要原因。

二、道德缺失引发三个问题

忽视了人的道德教育，有三个问题不可解决。

（一）难以防患于未然

中国人强调以礼治国。礼相对于法而言，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可以防患于未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礼和法的区别了。《群书治要·鹖冠子》记载，扁鹊的两个哥哥也是神医。他的大哥医术最高明，在病隐伏未发的时候就可以对治，所以病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病，因而他的名声只有病人家里的人知道。他的二哥医术其次，在病人的病有小小的征兆时就给以对症医治，所以他的名声在病人的邻里相传。扁鹊的医术最差，但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诸侯国。他是等人已经病入膏肓了，不得不采取一些大的手段，比如把他的血脉切开、进行针灸，再给他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三下五除二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回来。尽管大家看了，都说扁鹊真是妙手回春，能够起死复生，但假如做到防患于未然，那么病人就不会病入膏肓了。所以说扁鹊自认为在他们兄弟之中自己的医术最差。

古人说，“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法律可以把犯罪的人处以刑罚、关进监狱，把 CEO 判处一百六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可是一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却毁于一旦，无可挽救了。然而，礼仪的教化、伦理道德的教育却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让消极结果根本不会发生。

（二）会导致人“免而无耻”

孔老夫子在《论语》上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来引导人们，触犯了就给他们以刑法的处罚，这个时候，人们会因为惧怕处罚不去做坏事。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当他想方设法地能够免于法律的制裁时，仍然会做坏事，并认为这是自己聪明智慧的表现。

现代西方社会，很多年轻人不再相信宗教了，宗教道德教化失灵了，而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安排的，结果出现了大量的“反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的不道德的行为，比如说邻里纠纷、青少年倚强凌弱，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等等。孩子年纪很小，达不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这些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对社会和谐造成了危害。这些现象是靠法律的健全、监督机制的完善没有办法解决的。

《盐铁论》上有这样一句话：“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一句话就把法律的局限性指出来了。法律能够把犯罪的人判处刑罚，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的廉洁之心，也能够把犯罪的人杀掉，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的仁爱之心。

《淮南子》说得更加具体。它说，“无法不可以为治也”。如果你没有法制，没有监督机制，没有这些规则，那肯定就没有办法治理国家。“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如果一个人没有礼义廉耻，他就没有办法去推行这个法律、制度和规则。“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法律确实能够把不孝的人处死，但是不能够培养出像孔子、曾子那样有高尚德行的人。法律也能够把偷盗的人判处刑罚的处分，但不

能够使人培养出像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节操。孔老夫子培养的徒弟三千多人，每一个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做社会大众的表率。这是靠什么呢？靠的是教育，是教育成就的。

（三）会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我们的法令条款、规章制度，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具体。比如，食品安全出了问题，就有《食品安全法》；酒后驾车的人多了，就有酒后驾车的处罚条例。只要有什么问题出现，就有一个什么法规，所以法律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严密。但是社会因此安定和谐了吗？恰恰相反，违法乱纪的人却越来越多。食品安全处罚的相关条例出台以后，旧的食品安全问题好像没有因此得以遏制，结果更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又出现了。西方也是，它的法律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具体、更加健全，监控的手段技术也越来越发达。但是怎么样呢？几乎每一天都能听到有盗窃案、抢劫案、校园枪击案等发生。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忽视了人心的治理。

所以《袁子正书》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你不能制止人们作奸犯科的心，人的良心都泯灭了，为了一点点的金钱，可以不顾别人的生命安全，而仅仅以刀锯刑罚的处分给他判处死刑，即使你每一天都在外面执行死刑，也不能制止人们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反观我们现在，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强，反腐的决心也是越来越强，惩治的贪官的位置却越来越高，贪污的数额却越来越巨大。什么原因？我们是在枝节上做文章、制度上做文章，而人的心还是贪欲膨胀。不能制止人们作奸犯科的心，你再怎么重的刑罚也没用。

《汉书》记载，如果你重视法令的严苛而不重视人心的治理，

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法律条文刚一颁布，命令刚一下达，奸诈的行为、欺诈的行为就不断出现。人们想方设法地逃避法律的制裁、逃避制度的惩罚，结果就像以汤止沸、以薪救火，只会使事态越来越严重。

假如重视道德的建设、道德的教育、人心的治理，而制度不是很完善，能不能够制止作奸犯科的事发生呢？《史记》记载，汉朝兴起之后，把秦朝的严刑峻法都破除，力求宽宥；把那些过分雕琢的东西都废除，力求质朴。当时的法网疏忽得都可以把吞舟之鱼给漏掉。但是怎么样呢？“吏治蒸蒸，不至于奸。”官员的道德素质是蒸蒸日上，没有人作奸犯科，黎民百姓被治理得很好，生活非常安定。

由此观之，“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现在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法律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是一方面，但是人心坏了是更重要的方面，也是根本原因。

《汉书》记载：“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让使用严刑峻法的官吏来治理国家，还盼望使道德教化普盖四海，是很难达到的。“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古代的圣王都是以道德教育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在国家设立太学，教导于国都，在乡镇设立庠序（“庠序”就是乡镇的学校），来教化于乡间。“教化以明”，就是人人都懂得“五伦”、“八德”的道理。“五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都明白做人的道理，社会的好风气就形成了。

《史记》记载了历史上曾出现的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西门

豹在治理邲县的时候，法律特别的严苛，百姓被吓得战战兢兢，没有人敢触犯法律，所以他的治理达到了百姓“不敢欺”的境界。子产在治理郑国的时候，把法律监督机制设置得很严密、很合理，百姓想欺骗他都做不到，所以子产的治理做到了百姓“不能欺”。但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在治理单父的时候，他把仁义忠恕全都贯穿在管理之中，“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达到了百姓“不忍欺”的境界。我们反对腐败，不仅要追求“不敢欺”、“不能欺”的境界，更要追求“不忍欺”、“不愿欺”的境界。

《春秋左氏传》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国家之所以兴盛，是把人民（也包括官员）看作受伤的病人来加以体恤、加以关爱。如果人民犯错，一定要像对待自己的儿女犯错一样，想方设法地去挽救他、帮助他。这是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国家为什么灭亡呢？就是把人民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可以随意地践踏，这是一个国家的祸患之所在。

所以，严刑峻法，它确实对反腐败很有效果，但是治标不治本，仅仅让人们不敢去腐败，而不是从心底不愿意去腐败。如何能让人们从心底不愿意去腐败呢？那就要治理人心。中国古人是靠教育来达到治理人心的效果。《论语》云：“不教而杀谓之虐。”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没有教导他做人的道理，没有培养起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意识，还把他的欲望都引导出来，结果他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去贪污腐败，因为贪污腐败，把他处以刑罚。这叫什么？这个叫虐政！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就是因为只有严刑峻法，而没有道德的教育。所以道德的教育是首要的。

三、全面加强道德教育的途径

加强道德教育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某一个单位、某一个人、某一个环节的作用，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就必须全面加强道德教育。

（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

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很重视道德教育了，还是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实际上，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我们想一想，有谁真正像重视经济建设那样来重视道德教育呢？在“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提出之后，很多地方邀请我们去讲荣辱观教育。结果我们去了之后，发现一个普遍规律。什么规律呢？这个地方的一把手，也就是党委书记，都因为有更重要的会议而不能参加。这样一个普遍现象让我们认识到，现在，在不是百分之百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领导者的心目当中，道德教育是软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引进一个外资、吸引一个项目是更实际的，所以没有真正重视道德教育。

中国古人对道德教育，是从建国理念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的。《礼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领导一个国家的百姓，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教育是最重要的。

但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确。明确了这个目的，我们党校教学内容的设计就应该更有针对性。古人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地增长，使他的过失得以挽救。如果这些干部集中到党校，花了

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学了一段时间，善良增长了，过失挽救了，说明教育起到了效果。如果上了一段学之后，不仅善良没有增长，还学会了很多更加不好的作风，说明教育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古代的皇帝要想学习，会请一位经学的博士。“经”，在古代有六经，后来到五经，后来到七经，唐朝明经科考九经，后来有十三经。他会找一个专门研究经典的，比如说研究《易经》的人，给他讲一讲《易经》，他带着全体的文武百官共同学习。再找一个讲《论语》的人，给他讲讲《论语》，等等。他们学什么呢？学的是圣贤经典，所以从上到下的理念高度一致。这样学了一段时间，能够没有效果吗？

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起到了长善救失的效果吗？如果学校教育起到了长善救失的效果，当然是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比小学生好才是正常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吗？小学生学的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到了大学生，能够整理好自己的床铺，考试不作弊，不偷别人的自行车，已经不错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并没有随着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德行越提升。现在的大学被称为高等知识技能的传习所，做人的教育已经不见了。

（二）道德教育要从家庭开始

古代的教育，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家庭教育开始，贯穿了一个人的一生。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怀孕的时候，非常重视胎教，她做到了“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就是眼睛不看不好看的景色，淫词歌舞不去观听，口里讲的话非常温柔，连傲慢的言语都没有，更何况粗鲁骂人的话呢？现在很多的母亲一边抱着孩子喂奶，一边在骂人，一边在说谎，一边在生气，这

些都被儿女看到了、听到了。所以儿女为什么会说谎、骂人、生气？全都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

《论语》上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中国古代家家户户都有祠堂，在祠堂里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春秋祭祀的时候，把全家族的人召集在一起，宣讲祖先的德行。在“文革”的时候，很多人不认识祭祀的教育功能，把它作为“四旧”给破除了。结果现在的人，做事不会想到他的祖宗，能够想到他的父母就已经不错了。很多的孩子，都是结婚的前几天把对方带到家里，让父母看一看，说我们要结婚，给我们准备房子、准备车。如果不是为了这些，他们结婚了父母还不知道呢。而中国古人连祖先的恩德都念念不忘，对于眼前的父母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呢？他不可能一边去祭祀祖先，一边又打爹骂娘，这于情于理都是不符合的。

在春秋祭祀的时候，要宣讲祖先的德行，告诉大家，家族中哪朝哪代出了哪一个有德行的人，他有什么廉洁的作风，我们可以效仿。比如说杨家，杨家有一个“四知堂”。为什么取名为“四知堂”呢？就是纪念他们的祖先杨震。杨震是东汉时候一位廉洁的官员，他赴任东莱太守，路过昌邑县，他曾经举荐的秀才王密当时正任昌邑县令。王密听说自己的恩人路过此地，就趁着夜色，带着十斤黄金，要呈献给杨震。杨震说：“我了解你，可惜你却不了解我。”王密说：“这个东西只是为了感谢您的知遇之恩，现在是晚上，没有人知道。”杨震说：“这件事有天知、有神知、有你知、有我知，这叫‘四知财’，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所以他拒不接受。他的后代子孙为了纪念他的廉洁作风，就把他家的一个房屋取名为“四知堂”。杨家历代子孙从这个堂的匾额下走过的时候，都能知道他们的祖宗不收“四知财”。所以，中国的反腐倡廉教育在家庭中已经开始了。

浙江义乌附近有一个“郑义门”。郑家从宋朝到清代，出了一百七十三位大大小小的官员，没有一个人贪污受贿，都非常的廉洁，家风承传百年、千年不衰。什么原因呢？就是得益于郑家严格的家规。在家规之中，有如何对待邻里乡党、如何尊敬老师、如何做官的规定。他们家的孩子，从小就要学习、读诵、力行家规。

（三）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

古代学校教育的首要内容就是孝敬父母。中国人讲，孝是德行的根本，是仁爱之心的根本。“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都是很好的理想，是道德大厦的第五层、第六层。根基是什么？根基是孝敬父母、尊敬老师。孝亲尊师是道德大厦的基础。如果基础没有奠定，第五层、第六层的建设都是空中楼阁，培育的都是伪君子。

1. 尊师重教才不会吃大亏

在古代，学校教育讲孝敬父母，家长在家里教导孩子要尊敬老师。老师和家长相互配合，学生就很容易受教了。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学生在学校被老师稍微说得重一点就告诉家长，加油添醋地说一顿，家长不满意就去找校长，校长就去找老师。结果是，孩子在学校犯了错，老师不敢说他，因为已经侵犯人权了，孩子的家人就要去告你，谁还会讨那个没趣！孩子犯了错，老师不敢给他纠正，他怎么能不一错再错呢？

古人那里，不仅仅是父母、老师可以指正孩子的过失，凡是和父母平辈的长辈看到他犯错误，也可以给他指正过来。父母的态度是什么呢？父母会带着礼物去感谢人家：“孩子在外面做错事，幸好你及时纠正，他才没有一错再错。”

现在是什么表现呢？带着孩子出去吃饭，一起吃饭的有孩子的舅舅、姑姑、叔叔等，孩子没有学过《弟子规》，不知道吃饭要“长者先，幼者后”，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把这个菜转到自己面前。叔叔看到之后说：“孩子，不可以把桌子乱转，别人都吃不到菜了。”话一出口，孩子的父母一下子脸就拉长，变得很难看。意思是说，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还不会教？用得着你管么？

《大学》上有一句话：“人莫知其子之恶。”一般的人都是因为太喜欢自己的儿女，看不到自己孩子的过恶。别人告诉指正过来，你还非常的不满，谁还愿意讨那个没趣呢？现在的朋友，见面之后就开始互相夸。这个“夸”字，上面一个“大”字，下面是一个“亏”字，就是不当地夸奖，会让他吃大亏。孩子对长辈没有礼貌，已经无礼至极，还说他很活泼，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对是错了，这不是让他吃大亏了吗？

中国古人对老师非常的尊敬。在古代，皇帝在接见群臣的时候都是面南背北，以君臣之礼来接见。但是他在接见老师的时候就必须降阶，以宾主之礼来接见，一个站在东面，一个站在西面，要像客人一样来对待，不是像臣子一样来对待。男子二十岁要行冠礼，就是行成人礼，成人了就不能再称他的名了，要给他一个字，表示对他的尊重。从此以后，亲朋好友、叔叔伯伯都要称他的字。去做官，皇帝也要称他的字。只有他的父母可以一生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可以一生称他的名，意思是，到学校来学习就要放下架子。这样，整个社会才兴起了尊师重教的风气。这个就是礼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2. 重财轻德一定会败亡

《大学》有一句话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德行是根本，财富是枝叶花果。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枝叶花果是外在的显现，

根在德行。越想要很多的财富、名声、地位，就越要培养深厚的德行。有的人在做科长时做得不错，提拔到处长了也还行，再提拔到局长也能胜任，提拔到部长、省长的时候出了问题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地位越高，越需要有深厚的德行才能承载。如果德行没有随着地位的提升变得很厚，还越来越贪婪，怎么能承载这么高的位置呢？

《尚书》有句话提醒世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内兴起迷恋女色之风，在外兴起游猎娱乐之风，喜欢饮酒没有节制，还爱好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刻着花纹，以上这六种情况如果有一种做了，就没有不灭亡的。魏征在《群书治要·尚书》中这句话的注解下加了一个小注，意思是“更何况这六者都做了呢”。

所以古人不是说等这个人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才很惊讶，而是在他当官的时候，从他的所作所为，就能看到他的未来结果如何了。古人看什么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未来呢？凭的就是《易经》上的两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现在，当看到一个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突然银铛入狱，很多人都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其实古人告诉我们，原因很简单，“恶不积，不足以灭身”，那就是积恶所导致的。所以这些道理如果经常学，就不敢去做恶事了。

《大学》有句话讲：“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财货是以不好的、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会怎么样呢？不要担心，不要着急，一定会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

古人还把败散钱财的方式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就是官府。比如钱是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而来，最后东窗事发，银铛入狱，

所有的家产会被没收、被充公。虽然钱赚到手了，还没等享受，又昙花一现地给收回去了，自己还身败名裂，得不偿失。第二是水灾，第三是火灾，这些灾害会把不义之财焚烧掉、剽夺走。所以灾害也不是偶然发生的。第四是盗贼。中国古人有句话，“盗亦有道”。盗贼的道义之一，是劫富济贫。有钱有势的人，没有拿钱去做慈善事业，却一掷千金，花天酒地，盗贼看了都过意不去，就专门偷盗、敲诈、勒索为富不仁的人。第五点防不胜防，就是不肖子孙、败家子，把不义之财给败散掉。为什么现在出了很多的“啃老族”？就是因为他的父母贪了很多不义之财，需要有人给他败散。当然在现代社会，还多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医院，得病，把不义之财给败散掉。

“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规律在古代适用，在今天更明显。如果从小学开始就让人们明白这些道理，让他贪他都不敢贪了。

3. 贪污腐败不划算

唐太宗读完《群书治要》后总结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当君主的很贪心，像秦始皇、商纣王等，都是丧失了他的国家啊。做臣子的贪心，最后是身败名裂，得不偿失。

唐太宗比喻说，一个人不珍惜自己的官位，却去营私舞弊，就像用非常昂贵的珍珠做的子弹去射麻雀。一个人是领导的时候，走到哪里，人家一介绍是什么处长、什么市长、什么书记，别人对你毕恭毕敬，招待得也特别好，家人走到哪里也跟着受尊敬。但是你认为这些都没什么，去贪赃枉法，以权谋私，最后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所有的尊重都没有了，成了为人不齿的阶下囚。家属走到哪里，别人都在背后指着说：你不知道吗？他是谁谁的什么家属，他们家的谁谁谁因为贪污受贿被抓起来了。他都无脸见人了。《弟子规》说：“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自己身上德行有

损伤，父母家人都跟着蒙羞，确实是拿珍珠弹射鸟雀。

《太上感应篇》上有一句话说：“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什么叫“漏脯”啊？就是房屋漏了，雨水滴在肉干上，肉干就有毒，吃了之后就会对人有伤害，甚至把人毒死。“鸩酒”就是毒酒。取不义之财，就像吃了有毒的肉、喝了有毒的酒，来止息自己的饥渴，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招来杀身之祸。

现代人给腐败分子算了一笔账：第一是政治账，自毁前程；第二是经济账，倾家荡产；第三是名誉账，身败名裂；第四是家庭账，妻离子散；第五是亲情账，众叛亲离；第六是自由账，身陷囹圄；第七是健康账，身心交瘁；第八是历史账，遗臭N年。在若干年之后人们提起他，还非常痛恨，确实是遗臭N年，很不划算。

《史记》记载，鲁国的宰相公仪休特别的清廉，不与民争利。有人送给他一些鱼，被他派人给送了回去。这个人就觉得奇怪了，他说：“我知道您爱吃鱼，为什么送了一些鱼，您却不接受，又给我送回来了呢？”公仪休是怎么回答的呢？公仪休的回答很有味道。他说：“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今天才不能接受你的鱼。我爱吃鱼，我是宰相，我也买得起，我自己去买不就好了吗？如果我今天接受了你的鱼，改天因为贪污受贿被抓了起来，当我被抓进监狱的时候，请问还有人再送给我鱼吗？我还能吃得到鱼吗？所以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我才不能接受你的鱼。”

经常读一读这样的历史故事，人就会变得很明智，知道孰重孰轻，不会做出像拿珍珠弹射鸟雀一样的事情来。

《尚书》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面对利益欲望的诱惑，应该是什么态度呢？应该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别人拿着金钱、美色来诱惑你的时候，可不要觉

得很得意，不要觉得我是领导，要什么就有人送什么。其实人家是拿着诱饵，他们是希望诱惑你跳进这个陷阱。如果你一不小心，把这个腿伸进了陷阱，还想后悔，还想翻过身来，还可不可能啊？悔之晚矣，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所以党校教育应该教什么呢？教圣贤经典，教《群书治要》，让领导干部把历史上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好好地学一学，就会有明智的选择。

（四）社会教育是道德教育的扩展

社会教育是指诗词、歌舞、戏剧、小说等等。在古代，这些都秉持了孔老夫子的一个理念，那就是“思无邪”。也就是说，要通过这些来培养起一个人的正知正见，避免引起邪曲不正的想法。

1. 音乐关系社会风气

《吕氏春秋》上说，“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乱世的音乐演奏木质、革质的乐器，声音就像打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演奏铜质、石质的乐器，声音就像霹雳。“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演奏丝竹之类的歌舞音乐，就像大嚷大叫。“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以这种音响来骇动人的心气、摇动人的耳目、动荡人的性情，是可以办到的。以此作为音乐来演奏，绝对不会给人带来快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音乐越是奢侈，人民愈是感到抑郁，国家愈是混乱，君主的地位越是卑微，这也就失去了音乐本来的性质了。

古代的圣贤人制礼作乐，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耳目的欲望，而是为了引导人们培养起正确的好恶，回归到做人的正道上。

《孝经》有一句话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老夫子到了

一个地方，还没有了解这个地方政事办得如何，首先听一听这个地方流行什么样的歌曲，就知道这里的民风如何了。

2. “色”字头上一把刀

有人说，在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那么在一个腐败分子的背后，可能也有一些有问题的女人。女子的德行，对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于腐败问题的解决，都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最近的这些腐败分子，不说百分之百，也是大部分，都是因为在女色上出了问题。中国古人说，“天道祸淫最速”。上天对放纵的人给予灾祸是最迅速的。古代的读书人、做官的人，都是把好色作为一个严重的缺点来重点对治。

唐朝狄仁杰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狄仁杰在年轻的时候，一表人才，英俊潇洒。有一年他进京赶考，留宿在一家旅店。旅店的主人正好是一个刚刚死去了丈夫的少妇，她白天看到狄仁杰玉树临风，一表人才，不免动了爱慕之心。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狄仁杰还在刻苦读书，她就主动去敲门。狄仁杰听到敲门声，起身把门打开，看到一个打扮得非常妩媚的女子。女子很主动地向他说明了来意。狄仁杰先是心里一惊，但是马上镇定下来。他突然想起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一位老人家给他说过的一番话：“你一生主贵，以后一定能够成为达官贵人。但是千万要小心，一定不要败坏在女色的手上。因为这个‘色’字头上一把刀，这一把刀会把你所有的功名利禄都削得平平的，让你一无所有。”狄仁杰问：“一个人年纪轻轻，又遇到女子主动投怀送抱，不动心确实有点难，那怎么样才能面对女色而不心动呢？”老人家就教了他一个办法，他说：“当一个人面对女色而心动的时候，不过是被表面所迷惑。其实一个人好看就好看在外边的一张皮而已。在这张皮的底下，都是些血肉相连，还有一些肮脏的管道，流淌着肮脏的东西。人

就像一个臭皮囊一样。别人送一个皮囊做礼物，皮囊外面雕着花绣着朵，雕制得非常精致，让你一看就爱不释手。但是你把这个封口打开，发现皮囊里装的是血肉啊、屎尿啊这些非常肮脏的东西。这个时候，谁还愿意把她抱在怀里？肯定是迫不及待地一把推开，避之唯恐不及。”狄仁杰在关键的时候想到了老人家的提醒，他就把这个方法也教给了这个女子，他说：“你这样观我，你发现我也没什么可取之处了。”狄仁杰最终成为了一代贤相，名垂青史。

《诗经》的开篇大家都不陌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是很多人却把这句话的意思理解错了，认为什么是窈窕淑女啊？就是身材或者相貌姣好的女子。这样的女子，哪个男人不喜欢呢？很多人还拿着这句话为自己的好色找理由。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贤淑美德的女子，应该成为君子追求的伴侣。从这句话中，我们也体会到古人社会教育的良苦用心。一般的成年人都比较好面子，直接去提醒他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事，说：“妻子年轻的时候你们有情有义，同甘共苦，现在你有了权势，可不能做对不起她的事。”这个人听了可能一下子就翻脸了：“这关你什么事儿啊？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你是不是没事干了呢？”起不到教育的效果，反而把两个人的关系给弄僵了。所以古人就写了一首诗，采取了一个委婉的说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你看一看在河洲上停着的雎鸠鸟吧，雎鸠鸟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一生忠实于自己的配偶，一生都不会改弃自己的伴侣。难道我们做人的，还不如这些雎鸠鸟吗？难道我们做人的，还比不上禽兽吗？

所以古代的读书人，看的是这样的教导，行为稍有偏颇，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自己的良心也过意不去。而现在人们看的一些电影、电视剧，用四个字来概括内容，就是“暴力色情”。这样的电

影、电视剧流行，就会让人觉得自己一生只有一个配偶好不划算，在朋友面前说起来都很没面子。这就叫“积非成是”，错误积累多了大家反而认为是正常的了，把正常的反而认为不正常了。

所以，领导干部的德行是和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不好，希望领导干部德行很高，也是不现实的。

3. 儒、释、道是教育

社会教育由谁来承担呢？中国古代是由儒、释、道三家来承担的。所以说，儒教、道教、佛教的这个“教”是教育，而不是宗教的含义。

可以从寺院的来源来说明这一点。在汉代的时候，皇权和相权区分得很清楚，在皇帝下的一级办事机关称为“寺”，它的最高长官称为“卿”。外交是由皇帝来主管，由鸿胪寺负责。外国的僧人到中国，都是皇帝派人礼请而来，来了之后就住在鸿胪寺。但是鸿胪寺是接待短期来访的客人的，长期住在这儿就显得不合适、不方便了。皇帝就下令，在九寺之外增设一个寺，专门推行佛陀教育，所以就建了白马寺。洛阳白马寺相当于国学编译馆，它负责两个工作，第一是把外文的经典翻译成中文，第二就是要解释经中的意思来指导修学。

很多人说，既然它是教育机构，那为什么到了一个寺院，看到有很多佛像、菩萨像啊？这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佛教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育方式，这种高度艺术化的教学方式可以为中国人所理解。中国古代自古就有祠堂，供奉祖先的牌位。还有孔庙，供奉的是孔老夫子的牌位。看到孔子像，人们就知道要见贤思齐，想到他的教诲。佛像摆在那里，也是起到教化的作用。

比如在一个正规的汉地寺院，第一个建筑物一定是天王殿。天王殿供着四尊天王。东方的叫“持国天王”，意思是要负责尽

职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国家就和谐了。持国天王手里拿一个琵琶，是教导人做事不要过也不要不及。琵琶的弦太紧就断了，太松又弹不出美妙的声音，只有绷得适中，声音才合适。儒家讲“中庸”，佛家讲“中道”，都是让我们做事无过无不及。南方“增长天王”手里拿一把剑，“剑”在佛教里代表智慧，告诉人们要进步，必须要有真实的智慧。所以佛教并不是像现在的电影、电视剧所宣传的，某人生活上遇到了挫折，特别是感情上遇到了挫折，事业上没有发展，最后遁入空门，了此残生。这都是现在人对佛教不理解导致的。

在顺治皇帝以前，一个人想出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要在世间拿到进士的学位，这个进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博士。古代的学位有三个层次，叫秀才、举人、进士。进士都是皇帝亲自殿试，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后边全都叫进士。所以它比现在的博士还更加的难得。你要出家，必须拿到进士，要对儒家的经典非常通达。这还不算，你还要能够讲经说法，能够把佛经给讲出来。这样的人，国家才给你一个度牒，成为正式的出家人。顺治皇帝觉得出家是一件好事，不要给大家这么多的限制，就把这个条件给废除了，结果是好心做了坏事。就像我们考清华，要达到一定的分数线才能进，现在把这个分数线给去除了，谁想去都能去，那么清华就不成其为清华了。这样做的结果，就导致后代僧才的素质一落千丈。所以这件事也受到后代一些祖师的批评。

古语讲，“无事不登三宝殿”。“三宝”就是指佛、法、僧。“三宝殿”代指寺院。古代的寺院丛林都建在交通不便利的地方，要去求见高僧，一般是经过几天的折腾才能见到，并向他求教。因为我们在动处，他们在静处，我们的问题他们看得很清楚，说

两句话给你点拨一下，你就豁然开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古代的时候，那些出家人都是很有德行、很有学问的人。

西方叫“广目天王”，北方叫“多闻天王”，告诉我们要多看多听，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广目天王身上缠着一条龙，或者是一条蛇，代表变化多端，告诉大众，广学多闻的时候，不要被表面所迷惑。广目天王一只手拿着珠子，代表了不变的规律，意思是说，只要掌握了不变的规律，就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为什么经典传到今天还不过时呢？因为它讲的是不变的规律，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一样，自古至今都是如此。多闻天王手里拿一把伞，“伞”代表遮蔽污染的意思，告诉你去广学多闻，不要好的也学、不好的也学。

如果明白其中的含义，在这个寺院的大殿绕一圈，你就已经受到了提醒、受到了教育。现在很多的领导不明白佛教是教育，把它变成了宗教，又把它变成了迷信。一些人到五台山，带了很多的钱去供僧、去布施，回来之后，仍然是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最后被抓起来，还埋怨佛菩萨不灵。

什么是“学佛”？就是要依教奉行，按照佛的教诲去做。佛教最重要的教诲是什么呢？《梵网菩萨戒经》上有两条对出家人的教戒：“不作国贼，不谤国主。”不能做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更不能毁谤国家的各级领导人。《璎珞菩萨戒经》对在家学佛人的教戒是：“不漏国税，不犯国制。”偷税漏税在佛教看来结罪很重。偷一个人的财产，就是和一个人结罪。如果是偷税漏税，则是和整个国家的人结罪，还都还不起。更不能触犯国家的各种法制规章。这才是个真正的佛弟子。

白居易在做杭州太守的时候，有一次向鸟窠禅师请教：“佛教最重要的教诲是什么？”鸟窠禅师告诉他：“诸恶莫作，众善

奉行。”很多人经常在寺院的墙上看到这两句话，但是很多人都熟视无睹，只是去烧香，求升官，求发财，求保佑。假若所有的恶不去做，所有的善都积极地去，还会触犯法律、锒铛入狱吗？

白居易听了这两句话后，也是不以为然。他说：“这句话三岁小孩都知道，我何必走这么远的路来向您请教呢？”鸟巢禅师回了他一句：“八十老翁做不得。”意思是说，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到了八十岁的老翁也不见得能把它落实在生活之中！如果知道这个道理没有去做，那不叫真知。很多人说，我知道道理很好，就是做不到。凡是做不到的人，并不是真正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财富是以不好的方式获得的，就会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如果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让你去贪污受贿你都不敢了。

在深圳，有一位企业家学习传统文化，他说现在这些传统文化的光盘特别受欢迎。他有一个朋友，是做采购的，经常利用权力之便收回扣。后来这个人有了一个孩子，孩子的右胳膊是残疾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之前去做B超检查也没有查出异样，生下来才发现孩子有问题，非常痛苦。这个企业家看了之后，很同情他，就把一套《圣贤教育改变命运》的光盘送给这位朋友。他回家一看，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不幸了，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收回扣了，即使是逢年过节，别人送给他一些礼物表示慰问，都不敢接受了。

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曾出任上海商会的会长，他和清朝末年那些权贵的后代子孙交往很多，耳闻目睹了权贵子孙败落的情形，最后他把案例收集起来，写成《保富法》一书，为世人证明了“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道理。贪财容易，赚钱容易，但是要使财富维系三代以上，那可就难了。后人看了这本书，就会了解

保持富贵的方法了。

《晏子春秋》上有这样一个典故。齐景公看到梁丘据骑着马奔驰而去，就对晏子说：“梁丘据是能够和我意见相同的人，是和我很和谐的人。”晏子说：“梁丘据只是和你保持相同意见的人，并不是和你和谐的人。”齐景公问：“‘同’与‘和’有什么区别呢？”晏子就拿做菜来比喻说：“做菜烹饪的时候要放酸、甜、苦、辣几种不同的味道加以烹饪，最后这个菜烹出来的味道很好吃，这个叫做‘和’。而现在，你说什么好梁丘据就说什么好，你说什么不好他也说什么不好，这就是‘同’。和你保持相同意见的，就像做菜只放一种佐料，那就很单调了。‘同’与‘和’的区别就在这里。”

中国传统文化讲“和而不同”。当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来传教的时候，打开他们的经典一看，他们的核心思想都是仁慈博爱。有一些内容和我们传统文化不相符，那是因为他们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和我们不一样，文化传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欢迎他们来传教。

当这几种教育共同配合的时候，人心才能被教育好，社会才能和谐。信仰的危机其实是真正的危机。我们让人们信什么呢？不能让一个十多亿人民的国家都崇拜金钱，都“金钱至上”，要让人们信点什么，这个问题要解决，解决不好的话，道德也是无法提升。

四、仁爱的原点是孝道

《六韬》中，周文王询问姜太公：“什么是好的治国方法？”

姜太公说：“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慈爱儿女一样，就像兄长慈爱弟弟一样，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家里吃不上，穿不暖，父母宁愿挨饿受冻，也要让儿女先吃，让儿女穿暖。好的领导对待百姓，也应该是这样一种态度。

（一）没有孝心，就不会知恩图报

为什么有的领导对百姓很冷漠呢？《论语》开篇讲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无论是反腐败还是许多社会问题，一般人们的解决方式都是在舍本逐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怎样培养一个人的仁爱之心、慈爱子民之心呢？“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友悌，这才是仁爱之心的根本。一个人对父母都不爱，对有这么大养育之恩的人都不知道去报答，请问还有谁的恩德会让他念念不忘、想着去报答呢？他又怎会推而广之地去慈爱百姓呢？

《孝经》说：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而去爱别的人，是和德行相悖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亲而去尊敬别的人，是和礼的本质相悖离的。比如说，逢年过节了想着要去送礼，我们为谁的礼物最花费心思？是为父母送礼最花费心思，还是为领导、为合作伙伴送礼最花费心思？领导说：“今天有没有时间呀？我们一起去应酬下，晚饭不要回家吃了。”我们往往是兴高采烈，受宠若惊，跟着领导去吃饭了。但是当父母说：“今天你有没有时间？家里缺这少那了，需要到超市里采购一下，陪我去一下吧。”我们反而说：“你跟那些老太太一起去吧，我今天要忙这个忙那个，有很多的事要做，怎么有时间陪你去超市啊。”

你看，我们这是在以什么心与人交往？所以一个人没有孝心，

就没有树立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君子务本”，就是从孝悌培养一个人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假若一个人没有恩义、道义、情义的处事原则，取而代之的，就会以利害之心与人交往：这件事对我有利，有好处，我就会全力以赴。但是这件事由利变成害了，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

现在社会很多问题的发生，都是和人们没有孝心密切相关。比如说，很多的大学生接受了资助，连感恩的信、感谢的话都没有。很多人讨论原因何在。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的人已经不知道报恩父母了。连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还能将陌生人的资助、政府的关怀记在心上并时刻想着报答吗？

（二）中国古代为什么不提人权、环保、心理等问题

林语堂先生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中国人的智慧》，批评中国人的一个现象。他讲，当县官离别卸任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老百姓跪倒在尘埃中，感激涕零。县官不知道这是一种公益，而只认为这是一种思恩。林先生对这个现象进行批判，但是我觉得他批判得很没有道理。为什么这样的感恩戴德的事没有发生在西方？因为西方官员当官的时候没有“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意识，他只是尽自己的本分，不触犯法律而已，对老百姓没有这种感情，百姓自然也不会感恩涕零。中国古人说，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同时具备君、亲、师的职责。就是不仅仅要当领导管理百姓，还要当百姓的亲人，像关爱儿女那样地去关爱他们。这还不够，如果不去教导百姓，他们仍然不知道感恩，仍然会做假账来骗你，所以还要当百姓的老师来教导他们。如果一个好的领导者，同时承担了君、亲、师的责任，还会有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吗？百姓还

需要拿着“人权”去和领导讨价还价吗？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呢？因为没有必要。在一些用传统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企业，年终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员工拿着奖金找他们的老板说：“您给我的奖金是不是太多了？能不能把更多的钱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来弘扬传统文化？”老板给的奖金大大地超出员工的预期，员工觉得给得太多了，在这样的企业，员工还需要拿着“人权”和老板讨价还价吗？

中国在历史上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就像没有提出环境保护，没有提出心理健康、心理失衡的问题一样，因为这些没有必要，因为这些问题从来都没有成为问题。为什么没有出现环境问题？中国自古以来都讲求“天人合一”的理念，从来都把自然看成自己的亲密的伙伴，不认为自然是自己可以控制、征服、改造的对象，衣食住行都是依循自然，所以和自然保持了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都江堰、苏堤、灵渠、赵州桥这些千百年前的建筑物，和当地的环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至今还在惠利着后代的百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国古人很少谈“心理失衡”，可任何一本经典都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即要身心和谐，自己身心都不和谐，做不到宠辱不惊，如何去治国平天下呢？

（三）孝养父母，最重要的是养父母之心、之志

再来看“孝”字，我们不仅仅要赡养父母的身体，还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曾有弟子问孔夫子什么是“孝”，孔老夫子说，现在的所谓“孝子”，认为能赡养父母就尽到了孝道，但是对于养狗养马而言也同样是养，如果仅仅赡养而不尊敬父母的话，怎么能够把养父母和养狗养马区别开来呢？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从

内心表达出对父母的尊敬和感恩之心。孔老夫子的另一个弟子又来问什么是“孝”，孔老夫子回答“色难”，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能可贵的。他说，有事情儿女去代劳，有好吃的让父母先吃，你以为这就是孝了吗？那远远不是孝。

孝养父母，最重要的是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行孝不能等，要趁着父母健在的时候抓紧时间回报父母，不要让“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留在生活之中。我们怎么样对待父母，儿女看在眼里，以后儿女就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不希望儿女怎样对待我们，我们现在也不应该那样对待父母。所以“孝”是仁爱之心的根本。

《孝经》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父母让我们外出去求学、去工作，并不是仅仅希望我们端茶倒水伺候他们，而是希望我们学有所成，为国家、为人民有所贡献。当我们为国尽忠、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就是在尽更高层的孝，因为这是父母所期望的。

在湛江走私案中，很多有关的官员被抓，只有一个官员没有被卷入。记者采访他，他说，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老师，特别好面子。这位官员就想，如果自己东窗事发被抓进了监狱，父亲一定受不了。《弟子规》说：“德有伤，贻亲羞。”自己德行上有损伤，让父母家人都跟着蒙羞。一想到这点，这位官员就不敢去贪财了。

（四）培养孝廉的美德需要制度保障

古人也从制度上帮助人们自愿培养孝的美德。汉代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地方官把地方上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

荐出来，作为官吏的候补，由国家来培养。为了让地方官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举荐出来，不是谁送钱多就把他举荐出来，还有制度加以保证，那就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假使举荐的人才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家一定对举荐的人给予最高的赏赐。如果所举荐的人做出了很多祸国殃民的事，也一定要追究举荐者的责任。如果有人才不举荐、埋没了，一经发现，也会受到国家最高的惩罚。这样的制度实行，就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出任领导位置。

古代不是靠竞争来选拔干部的。其实竞争是选拔不出人才的，起码选拔不出一流的人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历史就知道了，诸葛亮需要刘备三顾茅庐才把他请出来。一流的人才出来做官不是为自己，他没有私心，他看这个领导者非常尊敬自己，希望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所以看他很有诚心，才出来帮他做事。《论语》云：“君子无所争。”真正的君子没有什么时候，也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和别人竞争。什么样的人喜欢竞争啊？自私自利的人。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竞争到这个官位，他才可以拿着官位为自己谋私利。

有人说，现在的腐败和传统文化有关，因为中国人讲“官本位”。“官本位”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孟子》说：“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就是说，天下有三种人是非常受尊敬的，尊敬有爵位的领导者，尊敬上了年纪的人，尊敬有德行的人。古代任命官员讲究“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没有德行的人不授予爵位，没有功劳的人也不授予俸禄。这两个前提一建立，德行越高的人官位越高，受到尊重是自然的。为什么现在“官本位”行不通了呢？因为这两个前提不存在了。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对高薪养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什么官员不能够清廉呢？为政者最重要的事就是使官吏清廉。虽

然选了像许由、伯夷这样廉洁的官员，又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刑罚，有贪必惩，有令必从，实际上却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奸巧的事越来越多，欺诈的事情也越来越大。“知清之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无耻也”。意思是，知道应该让官吏清廉，但是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让官吏清廉，官吏便“免而无耻”，虽然不去做坏事，但是不认为做坏事是令人羞耻的行为。如果做了坏事，能够想方设法地免于法律的制裁，就以此为荣。“日欲其清，而薄其禄，禄薄所以不得成其清”。想让官员清廉不贪污，但是他的俸禄却很微薄，微薄的俸禄不能够使官员清廉。官员的收入太少了，不能够维持有尊严的生活，特别是和别的阶层对比收入差额很大，心里就不满了。一个官员的俸禄很微薄，又掌握着很高的权力，批一个字就是好几百万、上亿的项目，他的心里能平衡吗？古人把这称为“饿犬护肉”、“渴马守水”。这个人已经像很饥饿的犬了，还要让它看护着肥肉，马已经很渴了，还让它看护水源，能不贪污受贿吗？那怎么办呢？“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想让官员清廉，但是没有给他们提高俸禄，那么官员就会欺诈，官场的作风也会很污浊，很多贪污受贿的情形就会出现。

高薪养廉还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官员位置很多，很多人都是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增加他的俸禄，那么人民的负担就更重了，人民就更加地对这个现象不满了。所以高薪养廉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必须“少其吏”，使官员的人数减少。“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精简了官吏，职位减少了，却不知道如何让人竭尽全力地尽好本分，那么事情又变得繁多起来，职位又显得缺少。所以精简机构之外，还得要提高官员的责任感，

让他们能够竭忠尽智，这样高薪养廉才是可行的。

《魏志》也有这样一段话说：“夫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把无事的官位废除，不着急的俸禄减损，奢侈的花销要停止，职务重叠的要合并，职任其事的官员一定有他的应尽的本分，做了事才能给他俸禄。这是自古以来普遍适用的规律，我们今天也可借鉴。如果事情繁多，职责混乱，就会使人浮于事，有的人无事可做，有的人忙得不可开交，结果官员职位很多，俸禄都很微薄，他们对自己的收入就不满，可能就会贪污受贿、与民争利。只有人当于事，俸禄充足，官员腐败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他才会珍惜职位并廉洁奉公，这才会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

五、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上行下效

《说文解字》中一句话就揭示了有效的道德教育途径，就是“上所施，下所效”。“上”，就是家长，就是老师，就是领导者。上面怎么做的，下面跟着怎么效仿。这是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途径。为什么现在腐败屡禁不止？因为当某位领导在说一定要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加以重视的时候，结果没过两天，他就因为贪污腐败被抓了起来。当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时候，人们就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有人经常说：“孩子怎么说也不听。”有的领导也说：“员工怎么说也不听。”这是因为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而没有把它

做出来。

在安徽省庐江县的汤池镇，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学习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刚来的时候，小镇的卫生很差，很多人随手丢垃圾，影响了市容，也影响了交通。这些老师穿上印有“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从我家做起，从我镇做起，从我县做起”的马甲，然后排着队到街上去捡垃圾。捡了一段时间之后，市民再不好意思往地上扔垃圾了。他们说，你看人家都在捡，我们怎好意思再扔呢？还有商家主动提供了垃圾桶，方便过往行人丢垃圾。

当然，教育别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个妇女说：“你们讲传统文化很好，传统文化讲仁爱互助，你看我们家的马桶都很脏了，能不能帮忙擦一擦啊？”没想到，两位老师回到中心，拿了清洁马桶的工具到她家，把她家的厕所打扫得一干二净。邻居知道了，说她这样做太过分了。她自己不好意思地说：“我只不过是说一说，结果没想到人家真的给打扫干净了。”

古人教导人不是靠说，是靠身教，身教胜于言教。要求学生、百姓做到的，老师、领导者要先做到。“身教者从，言教者讼。”如果用言语去教导，就很容易起争讼。别人会说：“你都没做到，有什么资格说我呢？”逆反心理就是这么来的。“身教者从”，你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弟子规》的要求，你不用让孩子去学《弟子规》，他自然受教。所以孔老夫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者的德行像风，一般百姓的德行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会向哪边倒。

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讲的话非常平实，而且多次提到人民。他告诉我们，要把关心人民的利益放在工作的首位，要改变以往的风气，不要净讲空话、大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王书记（王岐山同志）在召开专家会议时，有的专家上来就称“尊敬的王书

记”。他就给打断了，说：“不要来这些客套话。”并且还不让拿着稿子念。

《孟子》上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恶于众也。”有仁德心的人应该在领导者的位置上，没有仁德心的人在高的位置，就是在把他的过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礼记》上讲，下级事奉上级，并不是服从他所命令的，而是服从他所实行的。上级领导喜欢某一个东西，下级一定会有比他更加喜欢的。所以上级领导喜欢什么、厌恶什么，不能够不谨慎。

古代很多英明的领导者喜欢的都是犯颜直谏的人。他们是怎样引导属下直谏的呢？《韩诗外传》记载了一则赵简子的故事。赵简子有一个臣子叫周舍，在他的门外站了三天三夜。赵简子派人去问：“你有什么要求吗？在门外站了三天三夜。”周舍回答：“我别无所求，我只想做一个犯颜直谏的臣子，每一天跟在您的身后，拿着笔墨、竹板把您的过失记录下来。每一天都有记录，每一个月都有汇集，然后看一看每一年有什么效果。”赵简子很高兴，他一下就答应了周舍的请求。从此，他走到哪里，周舍就跟到哪里，老老实实地把他的过失记录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周舍去世了。有一次，赵简子和群臣在洪波台饮酒。在大家饮得高兴的时候，他突然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大家一看，就不敢再饮酒了，纷纷离开座位向他请教：“我们知道自己有过失，可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还请您明示。”赵简子说：“诸位大夫都没有什么过失，我突然想到自己的一个朋友周舍跟我说过的话：一千张羊羔皮都不如一片狐腋有价值，众多臣子的唯唯诺诺都不如一位直士的犯颜谏诤对我有帮助。商纣王的臣子大都唯唯诺诺，结果商朝灭亡了。周武王的臣子都能犯颜直谏，所以周朝兴盛了。自从周舍过世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自己的过失了。我知道自己离

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所以才哀泣啊。”像赵简子这样明智的领导者，他知道任用什么样的臣子真正对自己有帮助。

如果现在某位领导的属下对他说，要跟在他的身后把他的过失一一记录下来，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第一，就是不敢。现在的领导者也许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是光明正大的，还有很多的隐私，被人跟着每天记录，怎么方便呢？第二，现在的领导大都喜欢歌功颂德，突然有一个人说要记录他的过失，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群书治要·吴志（下）》说：“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都喜欢听他的过失，而使国家混乱的君主都喜欢听别人对他的赞誉。喜欢听自己过失的人，他的过失就会一天天地减少，那么福分也就慢慢来到了。喜欢听别人对自己赞誉的人，他的声誉就会一天天地减损，那么灾祸也就慢慢来到了。

所以领导者还要培养能够直谏之人，这样下情才能够上达，才能听到实话。

六、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很多人说：“《弟子规》不是古代童蒙教育的经典吗？”其实《弟子规》是做人的标准，不学习《弟子规》，做人没有规范，就像开车不守交通规则一样。这个做人的规范，如果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说苑》记载了尧帝和禹帝的故事。

尧帝出门时，看到有百姓受饥饿，他说：“这是我让他们挨饿的。”有百姓穿不暖，他说：“这是我让他们受冻的。”有百姓犯罪，他说：“这是我陷他们于犯罪的。”碰到犯人被押往监狱，尧帝走上去问他为什么犯罪。这个人说，因为家太穷了，天气干旱，不得已偷了别人家的粮食，结果被抓起来了。尧帝听了之后，就让人把犯人放了，把自己抓起来。周围的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把国君抓起来呢？尧帝说：“因为我犯了两大过失。第一，作为一国之君，没有德行，所以才感召了上天久旱不雨。第二，作为一国之君，负有教导百姓的责任，但是却没有把这个责任尽到。”这就是所谓“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先要宽恕，然后再教育，教育完之后再犯的人才对其严惩不贷。

禹帝出来视察时，见到犯罪的人，他就下车问犯人为什么犯罪，并且还为此很伤心。左右的人说：“罪人是没有顺着伦理道德的要求去做，所以才犯了罪。您为什么这样哀痛啊？”禹帝说：“尧舜时候的人民，都以尧舜之心为心，而我现在当了国君，百姓却各以他们的私心为心，所以我才感到哀痛。”禹帝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认为自己做得不好。

“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遇到问题，大家相互指责、相互挑剔、相互抱怨，事情永远解决不了，反而吵得天翻地覆。遇到问题，大家反省自己，这件事我错在哪里，我应该怎么做，这样才会天清地宁。

《易经》上有一句话，叫“否极泰来”。“否”与“泰”是《易经》上的两个卦象。泰卦是“坤上乾下”。“乾”代表了天，“坤”代表了地。正确的位置应该是乾在上、坤在下，但是在泰卦之中两个位置是互换的。意思是，他们都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

思考反省自己的不足。这就是“各自责，天清地宁”。而否卦恰恰相反，天在天的位置，地在地的位置。他们各居本位，要求对方、指责对方、挑剔对方：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你却没有做到。这就是“各相责，天翻地覆”。小到夫妻之间的冲突，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之所以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中国古人从小教孩子礼让、谦让、退让，因为这样才能够让出和谐。但是现在的人们从小教孩子什么呢？教孩子竞争。竞争获得不了利益，向上提升就是斗争。斗争还不能满足自己的利益，再向上提升就是战争。战争再向上提升，就是世界末日。所以依靠竞争的方式不能获得光明的前程，只能把人带上穷途末路。中国古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仁爱，仁爱的核心是孝悌。孝悌之心向上提升是互助，那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互助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爱，那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互助互爱向上提升，才是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大同世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的社会是靠仁爱实现的，不是靠竞争实现的。

所以，腐败的根源是人心出了问题。要矫正人心，必须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而伦理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单位、某一个部门能够单独发挥效益、发挥作用的。要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就必须全面加强道德教育。

第二讲 国家兴衰，由于官德

——从《群书治要》看加强官德修养的必要性

2011年10月，全国公务员局通过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大纲提出，要加强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培训。其中特别谈到了，要学习中国古代如何加强官德修养。但是这个号召提出之后，引发了很多讨论。今天我们从《群书治要》的角度，看一看官德修养与国家盛衰的直接关系。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里有这样一段话：“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看了这一段话，大家可能感到有点不知所云。因为中国古代的文章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可是我们现代人文言文的修养比较差，所以看了之后也好像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

学习文言文，需要具备两个重要的心态。第一是恭敬心，要

能够感受到古圣先贤对后世子孙的良苦用心，有了对古圣先贤的这种恭敬心，再来看文言文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契入，能够理解它的意思。第二是要有清净心，你的心很浮躁的时候，看了半天也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当你把心清静下来，一遍一遍地读下去，就会领悟其中的含义。所以我们若以这两种心态去读上面的这段话，就能知道其中的大意。

这段话的意思是：大凡天下得不到治理的原因，通常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的日子已经很久了，社会风气逐渐变坏也没有觉察，政治渐渐衰落也不知革新更改，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逸乐地生活而看不到这些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理朝政，不担忧国家的大事。有的耳朵听不进劝告和教诲，满足于虚伪，忽视真诚。有的是在岔路口徘徊，不知道何去何从。还有的君主所倚重的大臣为了保住禄位而闭口不言，不敢犯颜直谏。有的君主疏远有才能的臣子，废除弃用他们的谏言。所以国家的法纪放纵、松弛于上，有识之士郁伊、担忧于下。这真是可悲呀！

这段话实际上给我们指出了国家之所以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什么原因呢？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他的《咏史》一诗中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意思是，我们观察国家与家族之所以不能够兴盛的原因，是因为奢侈浪费。而国家之所以能够兴盛发达起来的原因，无一例外地是因为勤俭持家。如此简洁的语言，却给我们指出了国家、家族兴衰成败的真理。

在《群书治要》所辑录的古籍中，有很多处都对比了衰世之主和盛世之主的表现。我们把它概括出来，会更加鲜明地看到，官吏的道德和国家的盛衰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

一、盛世与民同乐，衰世残害其民

《群书治要·魏志（下）》上有这样一句话：“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夏朝、殷商和周朝历经了数十世才衰败，而秦朝两世就衰亡了，原因在哪里呢？“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的人民共享幸福。“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秦始皇这个人，独裁专制，压迫百姓，所以一旦倾覆、遇到危难，也没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得出结论：“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那些能够和天下共享安乐的人，人们也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忧虑；那些与天下人共享幸福的人，人们也一定会竭尽全力地拯救他的危难。这就给我们指出了，君主、领导者对于百姓的态度与其基业的兴衰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看了这段话，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古人的治国经验，对现代社会能有什么帮助呢？实际上，这一理念，我们应用到企业管理中也依然能够起到作用。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因为老板拿不出工资，西方的员工都是受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人权观念的影响，他们就罢工、去示威游行，而此时韩国的员工不仅没有上街去示威游行，反而把自己平时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交给了他们的老板。他们说：“老板啊，这几十年来我们之所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能养家糊口，得益于您对我们的关爱。现在企业遇到了金融危机，遇到了困难，我们愿意和您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这些钱您先拿去用，等以后您有钱了、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之后再说。”

我们想一想，为什么韩国的员工能够做出这样感人的举动

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韩国人提起孔老夫子、提起儒家思想，非常的尊敬，非常的感佩！对比而言，尽管我们的先祖从小就沐浴在儒家文化、伦理道德的熏陶之中，从小学的就是四书五经，培养的是仁义礼智信，但是，自“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以后，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使我们一度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批周公”，最后的结果，是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到孔老夫子时很不恭敬。有一位知名的学者，还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应邀到韩国去访问、做演讲，在他演讲的过程中，无意中使用了一个很不恭敬孔老夫子的称谓，结果韩国的这些听众都无一例外地起身表示抗议，甚至退席不听了。

这一现状让我想起了古人的话：“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我们对传统文化没有诚敬心，也就无法从中获得利益。佛教名宿莲池大师年轻的时候很好学，他知道辨融禅师非常的有学问、有道德。于是，他三步一叩首，非常虔诚地到辨融禅师那里去请教。见了面之后，他说：“禅师，怎么样才能够有成就、能够学佛很深入？”辨融禅师说：“年轻人，一定要把名闻利养放下，这些东西害死人。”周围的人听了之后都觉得，莲池大师走了这么远的路，这么虔诚，三步一叩首地来向辨融禅师请教，辨融禅师就给他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这句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奥妙之处，所以都不以为然，当耳旁风过去了。但是，正因为莲池大师心地很恭敬、虔诚，这一句话对他就像当头棒喝，他深深地把这一句话铭记在心中，最后他的成就恰是得自于这一句话。也就是说，莲池大师没有被名闻利养所迷惑，遇到这些东西现前的时候，能够提起警觉。所以确实是“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我们没有诚敬，也获得不了利益。韩国

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以恭敬心将儒家文化运用到企业管理中、运用到伦理道德的教育中，所以他们的企业出现了那样感人的一幕。而莲池大师以恭敬心听了辨融禅师的话，则成为了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八代祖师。

在《春秋左氏传》上有这样一句话：“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国家兴盛的原因，在于把百姓视作自己的伤口，对他们倍加关心、倍加体恤，这是国家的福祉所在；国家灭亡的原因，则在于“以百姓为土芥”，将百姓看得如同泥土和小草一样的微贱，可以随意地去践踏，这是国家招致灾祸的原因。

我们看了这一句话，不要觉得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要做大一个企业，要领导一个单位，怎样才能使这个企业、这个单位兴盛呢？《孟子》上有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治理一个国家，要以百姓作为最重要的，社稷是其次的，最轻的、最后的才是自己。领导者把这句话落实在企业管理中，应该怎么做呢？当企业有了收益、利润之后，首先用来回馈员工。因为什么呢？因为“民为贵”。然后再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因为“社稷次之”。最后才到领导者自己的享受，因为“君为轻”。

我们想一想，领导者把这样的一种态度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员工还能够对他不忠诚吗？领导者若能够视民如伤、爱民如子，下属百姓就会和你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稻盛和夫之所以能够拯救日航，能够创立两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就是因为他把这种儒家式的管理运用到了企业经营之中。

《六韬》上也有一句话：“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治理百姓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如兄长友爱自己的弟弟一样。我们知道父母怎样慈爱自

己的儿女呢？假如家里的东西不够了，父母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这个东西留给儿女吃。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百姓就是这样的心态。

“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见到百姓饥寒交迫，他就会为他们感觉到哀伤；看到百姓很劳苦、很奔波，他会为他们感觉到悲忧。以这样一种态度治理国家，百姓对领导者自然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发自内心地爱戴、尊敬他们。

松下幸之助之所以成为“经营之神”，也正是因为他把这种态度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有一次，松下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有事没有来上班，正好在这个时候企业着火了，烧了大片的厂房，给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松下幸之助知道这件事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并没有立刻去兴师问罪、追究责任，而是马上调查原因：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来上班呢？经过调查才发现，因为这个员工的母亲得了重病，而且已经住进了医院，他是为了照顾自己的母亲，不得已才没有来上班，恰恰不巧，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火灾。松下幸之助了解到这个原因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呢？他马上去买了礼物，亲自来到医院探望员工的母亲，并且安慰员工说：“你的母亲得了重病，而且已经住进了医院，但是这件事我却没有关心到。现在，你就全心全力地把你的母亲照顾好，这件事等你母亲出院之后再说，你不用担心。”结果，员工的母亲很快康复，他又回到了企业。松下幸之助并没有给他严重的责罚，而是给他调离了一个工作，仍然是委以重任。因为松下幸之助知道，这个员工平时做事尽心尽力，很负责任，很认真。这一次他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是因为自己的母亲，因为对自己恩德最重的人得了病、住进了医院。松下幸之助知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道理，所以他只是给那个员工调换了工作，仍然是加以重用，并没有处以太多的责罚。

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自己是这位员工，我们的领导者、我们

的老板能够以这样一颗关爱的心、信任的心、理解的心来对待我们的话，我们将以一颗什么样的心来回馈领导的信任呢？一定是更加竭尽全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让领导者放心。

看了松下幸之助的例子，我们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遇到事情，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是着急、就是发火，不问事情的原因，脾气就上来了。松下幸之助很理智，遇到问题首先去查明原因，然后才给以妥善的处理，这个态度就使属下对他非常的尊敬。

《孟子》上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成自己的手足一样加以关爱，被领导者对于领导的回馈，则是把领导者当成自己的心腹一样加以关爱。相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领导者把被领导者雇佣来了，认为我已经给你出了钱，你给我出力就好了。那么被领导者是怎么回馈他们的领导的呢？他下了班之后在超市碰到了领导者，一低头装没看见就走过去了，把他看成是一般的国人、一般的陌生人，没有太多的亲密。更有甚者，“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领导者把被领导者雇佣来了，连他最起码的生命安全都不能够保证，对他的健康也不照顾，把他的生命视为泥土和草芥一样的微贱、不值钱。结果怎么样呢？属下、员工说起领导者、说起老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态度：“我们那个老板，简直就是个吸血鬼，甚至连吸血鬼都不如。”所以，员工之所以对老板有这样的抵触情绪，有这种矛盾，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领导者没有起到君、亲、师的作用。

在古人看来，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同时具备三个职能。第一，他要当下属的领导。第二，还要当下属的亲人，要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关爱属下。“君仁臣忠”的理念是“中国式管理”的最重

要的特点。松下幸之助与稻盛和夫，其实都是把这种“君仁臣忠”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从而被誉为“经营之神”。第三，还要当下属的老师。如果你仅仅领导了他、关爱了他，而不去教导他，他不明白做人的本分、人生的价值何在，仍然会做一些假账来蒙骗你。怎么办呢？你还要教导他做人的本分，让他明白人生的价值所在。所以现在讲“扶贫”，其实最重要的是精神的扶贫。人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金钱、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匮乏。当然，要教导属下，最重要的就是正己化人，要把自己做好了，才能够感化下属，才能够起到为人师范的作用。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同时担负起君、亲、师的职责。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不忍欺”的管理境界。如果你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你在与不在，员工的表现都是一样的，绝对不会阳奉阴违。

这就是盛世之主和衰世之主的第一个区别。

二、盛世考察历史，衰世自骄自智

《孔子家语》上有这样一句话：“夫明镜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其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意思是说，明亮的镜子是用来察照人的形体的，古代的历史是用来启发今人的。如果君主不重视因循前朝之所以安存的经验、轨迹，又忽视了前朝之所以危亡的教训，这就等同于向后退步行走，却希望追上前人，这不是很糊涂吗？这句话告诉我们，在历史上凡是有成就的领导者，都能够以古鉴今、古为今用。

唐太宗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唐太宗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从军打仗。从军十多年，也没有时间去学习圣贤经典，对于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茫然无知。二十七岁做了皇帝之后，他才知道，创业艰难，守业更加艰难。所以，他就命令魏征、萧德言、褚亮、虞世南等大臣，把唐朝以前治国理政的经验汇集起来，花了很长时间编纂了《群书治要》一书。唐太宗认真地阅读之后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意思是，他看了魏征他们所编纂的《群书治要》，认为广博而切要，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经、史、子中所记载的这些典故、经验、教训和治国的方法，他没有听到过，也没有见到过。这部书使他能够借鉴历史的经验，遇到事情不迷惑，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

所以说，唐太宗为我们做出了一个能够考察学习历史、以古鉴今的榜样。他通过读《群书治要》，知道了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知道了治国理政的源头，从而知道了治理国政应该从哪里入手。由此可知，治国理政的经验全都被归纳在《群书治要》当中了。领导者只要把这一本书读透了，经、史、子中的智慧，治国理政的经验，也就全都了解了。

对于治国理政的经验，《群书治要》将其概括为多个方面。比如说，立国之本是什么？建立一个国家，首先要有立国之本。历代的圣王都是以道、德、仁、义、礼来治国的，为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提出了“五伦”、“八德”的伦理道德教育的纲领。《群书治要》里面也有为官之道。怎样做官才能够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此利益是真正的利益，不是眼前的蝇头小利。还有如何进行官德教育，领导者如何用人识人，如何纳谏，如何教育民众懂孝道，特别是提到如何搞好女德教育，还有如何进行礼乐的

教育，如何用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把司法工作做好，解决人们的上访问题），如何进行国防，如何进行外交，等等。这些问题在《群书治要》里都讲得非常的透彻。

盛世之君是考察历史。那么亡国之君呢？《吕氏春秋》上是这样说的：“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亡国的君主一定是自以为是、非常的骄满自大，一定是自以为聪明而轻视他人。“必轻物”的“物”有自己以外的人——别人、众人的意思。如果一个人自以为是，很骄傲，一定会简慢失礼。他自以为聪明，一定会独断专行。他轻视别人，对人就没有防备，没有防备就会给自己招来祸患。独断专行，就会使自己的位子不安稳。对士人简慢无礼，就会闭塞视听。反过来说，“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如果你不想闭塞视听，一定要礼贤下士。你要想使自己的位子很安稳，一定要得到众人的支持。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招来祸患，一定要防备完善。这三点是君主治国的大道。

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典型。比如说纣王，《史记》记载，纣王的天资很好，而且口才也不错，反应很快。他的才能和体力都超过了一般的人，可以空手和猛兽格斗。他的才智足以拒绝群臣的进谏，给自己的过失、错误找一个借口。他“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向群臣夸耀自己的才能，在天下抬高自己的声威，认为天下的人都不如自己。所以，这样一个自以为是、骄傲无礼的人，最终被推翻了，商朝很快也就灭亡了。同样的道理，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超过了五帝，他自己的地盘比夏、商、周三代的圣王都广阔，认为自己和三代圣王并列在一起是很羞耻的事，所以羞于和三皇五帝相并列。“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他骄傲自满，不愿意向别人请教，有了

过失不悔改，也导致很快就灭亡了。商纣王和秦始皇他们都是从反面给我们证明了，如果一个领导者骄慢无礼、自以为是，就会给自己招来祸患，甚至招致灭亡。

这是盛世之主和衰世之主的第二点区别。

三、盛世任用忠贤，衰世听信奸佞

《群书治要·中论》中有这样一段阐述：“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就是说，使国家灭亡的君主，他的朝中并不是没有可以使国家得到治理的贤臣，他的府中也并不是没有圣贤经典，但还是不免于灭亡，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才能的人不被任用，圣贤的礼法也不被推行。

《傅子》中记载了夏桀和商纣两人的例子。夏桀王整天荒淫无度，喝酒取乐，不务朝政。臣子关龙逢（也叫关龙逢）进谏，站在他的身边不走。夏桀很生气，把关龙逢关了起来，很快就处死了他。因为夏桀任用的都是奸佞之臣，而不用这种可以犯颜直谏的臣子，结果夏朝很快就灭亡了。商纣王也是如此。《史记》记载，商纣王整天喝酒享乐，沉迷于靡靡之音，还喜欢和女子饮酒取乐。他任用的“三公”，一个是鄂侯，一个是九侯，还有一个是西伯昌。九侯有一个女儿长得很美丽，九侯就把她进献给商纣王。但是九侯的女儿不喜欢过度的淫欲，商纣王很生气，就把她给杀死了，还把九侯也杀死，并且做成了肉酱。鄂侯看到这一点，就去劝谏他，言语非常的激烈，用非常严厉的话语来指正他。

结果纣王也很生气，把鄂侯也杀死了，还把他做成了肉干。周文王，就是当时的西伯昌，他听到了这件事，不免叹气。纣王知道了，就把他关在了羑里。后来，西伯昌的几个臣子就给商纣王进献了一些美女、宝马，还有金银珠宝，纣王才将西伯昌放了出来。纣王身边有三个贤臣——微子、比干和箕子。微子三番五次地去进谏纣王，纣王不听，最后微子就逃走了。比干犯颜直谏，纣王很生气，纣王说，听说圣人的心和别人的心不一样，我要看一看比干的心是不是和别人的心不一样。就将比干杀了，而且剖视其心。箕子看到纣王这样荒淫无道，非常害怕，就装作癫狂，沦为了奴隶。但是，商纣王还是不放过他，还是把他关了起来。没有人再敢劝谏，商朝也就很快灭亡了。周武王吊民伐罪，商纣王最后穿着宝玉的衣服投入火中，自杀而亡。这些典故告诉我们，但凡荒淫无道、不愿意听臣子进谏的领导者、君主，下场都不是很好。

关于忠贤之士的选拔标准，在《典语》上有这样一句话：“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意思是，世间的治乱、国家的安危，并不是由其他的原因所导致的。只要任用有才能的、有德行的人为官，那么治理之道就会清明。如果奸诈的、谄媚的官员干预政治，祸乱也就会兴起了。知道了这一点，就要选择那些忠贤之士来做自己的属下，把这些人提拔到领导位置上。

但是，这些忠贤之士并不是能够一目了然就观察出来的。所以在《吕氏春秋》上又有这样一段话：“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使国家灭亡的君主，看起来好像是聪明而富有智慧的。亡国之臣，看起来都是很忠心。这些表相是愚者大为迷惑的，也是为圣人所详加考虑、忧虑的。一个明智的君主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臣子是

忠贤之士，并能够把这样的人选拔出来。

古代的经典给我们提供了方法，教导我们如何辨别忠贤和奸佞。《六韬》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问之以言，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谍，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这段话指的是考察人才的方法：要给他提出问题，看他的言辞是不是有理有据；深究原由，追根穷底地去提问，看看他是不是有应变的能力；还要用间谍来试验他，看他是不是忠诚；有些事明明知道答案，还要故意询问他，看他是不是有所隐瞒，以此察看他的德行如何；给他获取财物、使用财物的机会，看他会不会贪贿、是否廉洁；用美色来考验他，看看他是不是有节操；告诉他事情很困难、不容易做，看看他是不是有勇气承担；还要让他喝醉酒，看他酒后是不是失言、是不是失态。所以，古人考察一个人是非常的认真，方法也非常的具体。官员经过这样的层层考验，才能够委以重任，把他选拔在相应的职位上。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具体的方面去考察一个人可不可以信任。

（一）国之忠臣，必为孝子

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为什么呢？《孝经》上曾讲：“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一个人对他的父母亲，对他有这么大恩德的人，他都不能够去爱，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爱领导、爱人民、爱祖国呢？一个人，他不爱父母亲，说明他一生重要的为人处事的原则没有树立起来，这就是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所以，我们无论是择偶，还

是选择属下、选择朋友，都要看看这个人对他的父母亲如何，是不是发自内心地恭敬和孝养。不尊敬他的父母亲而尊敬别的人，这是和礼的本质相背离的。为什么是相背离的呢？比如说，逢年过节了，我们都要想着去送礼。请问首先想到去给谁送礼呢？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领导，是生意合作伙伴，甚至是我们的老师（因为老师也关系到我们的分数、前程）。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父母！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在与人交往呢？我们是以利害之心与人交往。这个人、这件事对我有利、有好处，我就会对他全力以赴。当这个人、这件事由利变成害的时候，对不起，我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所以，古人看人，首先看他是不是一个孝子。

（二）尊师重道，言传身教

所谓的“圣贤人”，是指他能够把自己所学的、所说的落实在生活中，以言教和身教来教化百姓仁义慈悌的道理。

在《吕氏春秋》上就有这样一句话：“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哪一个做领导的不希望自己的属下对自己很忠心，哪一个做父母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对自己很孝顺呢？哪一个做属下的不希望自己能够得到领导的任用、身居高位，哪一个做儿子的不希望自己的声名显达，能够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呢？但是，“人君人亲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愿”。当君主、当领导的人，当父母的人，得不到孝子忠臣。当儿子、当臣子的人，也得不到自己所希望的高名显禄。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知理义”。那么“不知理义”是什么原因呢？“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在于没有学习圣贤经典。一个人当了领导，就开始骄奢淫逸、以权谋私，升官为了发财，不知道为长远、为子孙考虑，

本来可以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但是却锒铛入狱，自毁前程。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学习历史的经验、圣贤的教诲。

古代圣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所以，我们特别地提出要尊师重道，这对社会的安定和谐非常重要。《孔子家语》中也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有一次，鲁国的国君向孔子来请教。他说：“我听说向东方扩展房屋是不吉祥的事，这件事可不可信呢？”孔老夫子回答说：“我听说世间有五种不吉祥的事，向东扩展房屋并不包括在其中。”

那么有哪五种不祥呢？孔夫子说：“夫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像我们现在人都想损人利己，实际上损人根本不能够利益到自己。实在讲，帮助别人才是帮助自己。你想损人利己，招致了别人的怨恨，结果是给自身招致了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我们放弃了老年人不去照管、不去关爱、不去赡养，而是把所有的关爱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这是不祥。现在很多的父母就是如此。对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有求必应。但是，对于他们的父母，却不理不睬、不闻不问。这个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弃老而取幼”，这会给家族带来不祥。我们考察历史就会发现，凡是能够传承三代以上的家族，那一定是孝悌传家。现在的人为什么富不过三代，甚至是富不过两代、富不过当代呢？原因就是不懂得孝悌传家。“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也”。对贤德的人都弃之不理、不去任用，任用的全是不肖之徒，这是国家的不吉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年老有经验的人不愿意教导年轻人了。并不是年老的人不愿意教，而是“幼者不学”，年轻人自以为是，没有把老人的经验放在心上，不愿意虚心地向他们去请教、去学习。年轻人不好学，不愿意向老年人请教，这是不吉祥的风俗。“圣人伏匿，愚者擅权，

天下不祥也”。有德行的、有才华的圣贤人都隐居起来，不愿意出来做事，反而那些愚钝的、没有智慧的人把持权力，这个是天下的不吉祥。

从这个“五不祥”之中，我们看到，“国之不祥”、“天下不祥”，都是因为没有任何任用贤德的人来教化百姓所导致的。假如没有孔老夫子、孟老夫子这样的圣贤人出现在世间，那会怎么样呢？老百姓不知道“五伦”、“八德”的道理，不知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不知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可能就会出现父杀子、子杀父、兄弟互相争讼、夫妻同床异梦的现象了，社会风气也会日趋日下。这告诉我们，贤德的人是能够言传身教、教导世人的人。

（三）国之将兴，贵在谏臣

在《政要论》上有这样一句话，“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国家要兴盛，可贵的是有可以犯颜直谏的臣子；家族、企业要兴盛，可贵的是有可以犯颜直谏的子女、属下。所以，我们看什么样的人人是忠贤之士？就是可以犯颜直谏的人。

《群书治要·韩子》（即《韩非子》）上告诉我们奸臣是什么样的。奸臣和贤臣、忠臣恰恰是相反的。“凡奸臣者，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是奸诈的臣子都是想要随顺君主心意的人。为什么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宠幸。所以君主认为好的，臣子就跟着赞叹；君主所憎恶的，他也就跟着诋毁。假如身边有了这样的人，一定要小心，他一定是对你有所企图，是想要从你这里获得利益才这样做的。真正无私的人，对集体、单位是无私无求的。一

心想让单位、集体好的人，他往往敢于犯颜直谏，指正你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没有自私自利。所以判断这个人可不可用，我们要看他是不是敢于指正领导者的过失。

唐太宗给我们做出了好的榜样。有一次，太宗问长孙无忌：“魏征每次对我提出建议，我要是不采用，他就不答应，这是为什么呢？”长孙无忌还没有回答，魏征就接过话头说：“陛下，我之所以向您进谏，是因为陛下您做错了。如果我顺从您的意思没有坚持到底，那么就违背了我的初衷，您的错误也不能够改正。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您接受为止。”唐太宗就说：“那你不能够表面上顺从我，在群臣面前不要忤逆我，给我一点面子，然后在私下里劝谏吗？”魏征说道：“当年尧帝曾说过，‘表面上顺从我，但是在背地里却阳奉阴违诋毁我的过失，这不是一个忠臣所应做的事’。所以我还是应该犯颜直谏。”唐太宗听了之后也非常的感佩。魏征一生向唐太宗提了二百多次意见，唐太宗都非常诚恳地接受。这就使得唐朝逐渐兴盛起来，创下了“贞观之治”。所以我们的领导人一定要知道，应该任用什么样的下属。

（四）举贤进能，心无妒忌

《韩诗外传》上记载了一个楚庄王与樊姬的故事。有一次，楚庄王和朝臣商议国事，商议得很久，回来晚了。樊姬还在等候他，就问：“今天大王为什么下朝这么晚呢？”楚庄王就说：“我今天和那些忠贤之士议论朝政议论得很高兴，都忘记了吃饭，也忘记了时间，所以回来晚了。”樊姬就问：“请问大王，您所说的忠贤之士是我们国内的人呢？还是其他诸侯国的人呢？”楚庄王就说：“我所说的忠贤之士就是沈令尹。”樊姬一听楚庄王说的

这个忠贤之士是沈令尹，她禁不住掩口而笑。楚庄王就问其原因。樊姬说：“自从我能够有幸事奉大王，何尝不想得到您的专宠呢？但是我还是到处去寻找那些德才兼备的女子来辅佐您治理后宫。现在这些人，地位和我相同的有十个人，地位超过我的有两个人。而沈令尹当了令尹之后，从来没有给您推荐过贤德的人，也没有罢黜过不贤德的人，您怎能说他是忠贤之士呢？”楚庄王觉得很有道理，第二天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沈令尹。结果沈令尹一听，马上给楚庄王推荐了一个臣子，就是孙叔敖。孙叔敖很有能力，时隔不久就使楚庄王成为一代霸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忠贤之士？他不嫉贤妒能，而且愿意让德才兼备的人出现在自己的集体，这样集体才能越办越好、越来越兴盛。

《孔子家语》中也有一个故事。子贡来问孔子：“今之人臣，孰为贤乎？”现在的臣子，哪一个可以称得上贤明的呢？孔老夫子回答说：“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则贤者矣。”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可以称为贤明的人了。子贡听了就很奇怪。因为当时齐国有管仲做宰相，非常有能力。而郑国有子产，也使郑国非常的兴盛。他就问了：“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他们都不算是贤明的人吗？”孔子怎么回答的呢？他说，赐（“赐”就是子贡的名），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你听说是出力的人算是贤明的人呢？还是能够进荐德才兼备的人是贤明的呢？子贡说：“进贤，贤哉。”意思就是，能够举荐人才的人，那才能够称得上贤明。孔老夫子就说：“对啊！我听说，鲍叔牙推荐了管仲，能够让管仲显达，子皮推荐了子产，能够让子产显达，但是却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能够推荐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人。”

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贤才、贤明的人呢？自己很能做事的人，不算是贤才。真正贤明的人是能够为领导者推荐比他更有能力的人，而且大公无私，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私利，没有担心别人的位置、俸禄超过自己，这样的人才是有公心、为领导考虑的人。

（五）忠贤之士，隐恶扬善

在《体论》上有这样一句话：“君子掩人之恶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君子是掩藏别人的过恶，来长养自己的厚道和善良，而不是把人的过恶大肆去宣扬。就像《弟子规》上说的，“扬人恶，即是恶”。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扬，本身就是一种过恶了。君子看到别人的恶，都给隐藏起来；别人有小小的善，就给予褒扬。小人与君子却恰恰相反，“毁人之善以为功”。他诋毁别人的美德，而且标榜自己。为什么要诋毁别人的美德呢？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更加有能力。所以，古人教我们怎么样分辨忠贤之士，给我们讲得非常具体，也非常有可操作性。

这是我们讲的盛世之主和衰世之主的第三个区别。

四、盛世乐闻其过，衰世乐闻其誉

在《群书治要·吴志（下）》上有这样一句话：“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这句话告诉我们，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都是喜欢听到别人指正他的过失。像我们在《论语》上看到，孔老

夫子的弟子子路“闻过则喜”，听到别人给他指正过失，他就非常的高兴。“禹闻善言则拜”，大禹听到别人给他进谏，指正过失、提建议，他要给人礼拜以表示感谢。现在的人，都没有这种雅量、没有这种心胸了。我们的脸上如果有一个黑点，别人告诉你“你看你脸上有一个东西，赶紧把它擦掉”，你会对他感恩戴德。但是，我们人品上、做事上、态度上、方法上有过失，别人给我们指正过来，希望我们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接受，甚至还有怨气，这就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了。“荒乱之主，乐闻其誉”，是说能够使国家昏乱的国君，都是喜欢听到别人对他的赞誉，喜欢别人赞扬他、为他歌功颂德。“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喜欢听别人指正他过失的人，他的过失一天天地减少，福分也就来到了。相反，“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喜欢听赞誉的人，他的声誉却一天一天地减损，结果灾祸也就来到了。

《孔子家语》上也有这样一句类似的教诲，即“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在通行的《孔子家语》本子上，讲得是“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良药虽然吃起来很苦，但是对病的愈合是有帮助的。忠言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是对你的行为是有帮助的。汤武的臣子都敢于直言不讳，所以汤武就昌盛起来了。商纣王和夏桀王的臣子却多唯唯诺诺，不敢犯颜直谏，结果他们就灭亡了。如果领导、君主没有敢规劝他的属下、臣子，父亲没有敢规劝他的儿女，兄长没有可以规劝他的弟弟，士大夫没有可以规劝他的朋友，而能够没有过失，是从未有过的。

但是，我们习惯于听别人的赞叹，一听别人的赞叹就洋洋得意。我们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一听别人的批评，第一个反应就

是给自己找借口。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跟我说：“你讲课好长时间都没有进步了。为什么呢？你看蔡老师、钟博士，他们讲课每一次都有提升，因为他们讲的都是自己力行的体会，所以讲起来让人感受很深。但是你还总是讲那些课本上的东西，自己也没有切身的体悟。”我听了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我说：“你很久都没有听我讲课了，我每一次的课虽然是同样的内容，但是境界、体悟都不一样。你没有听，怎么就给我做这样的评价？”所以你看，我虽然每一次都给人家讲，要听进别人的规劝，而且要经常交敢于给你提建议的朋友。但是，当人家真心地来向你提建议的时候，却马上找一个理由为自己辩解。

我们学了传统文化，学了《弟子规》，就应该去力行。“闻过喜”，听到别人来指正你的过失，就应该很高兴、很欢喜。有一个学生，他学了这句话，真正地去力行了。有一次，他的老师看到他没有把筷子放好，碗也没有洗干净，就给他指正过来。结果老师话音刚落，他马上就给老师鞠了一个躬，说：“谢谢老师您指正我的过失！”我们看了这样的孩子，确实从心底里很佩服。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仅学了《弟子规》，而且把《弟子规》力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兴国之君，乐闻其过”。

《文子》上也有这样一句话：“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一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一定是厌恶忠臣的犯颜直谏、忠臣的规劝。

这些教诲提醒我们，做领导的要保持明智，一定要喜欢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多听别人的建议。

五、盛世反求诸己，衰世怪罪别人

《春秋左氏传》上记载着这样一句话：“禹汤罪己，其兴也悖（“悖”通“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为什么孔老夫子非常赞叹尧、舜、禹、汤这样的古圣先王？因为他们都是能够遇到事情反省自己而不责怪别人的人。

比如，尧帝有一次在大街上走，看到两个犯人被押往监狱，当时尧帝就很惶恐。为什么呢？他觉得是自己没有治理好，才有犯罪的人。他就问他们：“你们两个为什么被抓起来？犯了什么样的过失？”这两个人就说：“因为上天久旱不雨，不得已，我们偷了别人家的东西，被发现抓了起来。”尧帝听了这样的回答，他马上对身边押解犯人的狱卒说：“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把我抓起来。”周围的人都非常的惊讶，都说：“怎么能够把国君抓起来呢？”尧帝就非常诚恳地说：“因为我犯了两大过失。第一，我作为一国之君，没有德行，所以才感召了上天久旱不雨，这是我的第一大过失。第二，我作为一国之君，应该承担起君、亲、师的责任，但是我却没有把这个责任尽到，让他们犯了罪，这都是我没有把他们教好，这是我的第二大过失。”

汤王效法尧帝这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做法。在《后汉书》上记载着，当遇到了大旱天气的时候，成汤以六事来自责。哪六件事呢？“政不节耶？使人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是我的政事不合法度了吗？是我使用民力太急遽了吗？是不是我的宫室建造得太奢华了？还是女宠干预朝政太猖獗了？是收贿赂太多了吗？还是能够进献谗言的人太猖狂了呢？你看，他遇到了这种不如意，遇到了旱灾，马上反省自己

的政事是不是有这些过失。

正是因为尧、舜、禹、汤他们都有这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所以才能够把天下治理好。同样，我们一个团队、一个公司、一个集体，领导者遇到了问题，也要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来反省自己：我哪一个地方做得不够尽心尽力、不负责任，给下属做了一个不良的示范呢？下属都没有过失，下属的过失都在领导的身上。所以领导者是否能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对于一个集体的昌盛是至关重要的。

《淮南子》上记载着，衰世之主是恰恰相反。比如，夏桀不关心朝政，放荡没有节制，结果商汤王起兵把他关在了焦门这个地方。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夏桀还不反省自己，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后悔自己没有夏台把商汤杀掉。商纣王也是如此。商纣王也是不理朝政，一天到晚饮酒作乐，不理百姓的疾苦，还制造了炮烙之刑。最后，周武王把他困在了宣室。他不反省自己的过失，而是后悔自己没有姜里这个地方把周文王杀掉。这些人遇到了问题，遇到了灾难，已经走到了绝境、濒临灭亡的时候，还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过失，还是在怨天尤人。

是反求诸己还是怪罪别人，这是盛世之主和衰世之主的又一重要区别。

六、盛世抑损情欲，衰世纵欲享乐

《群书治要·晋书（上）》记载：“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

无一不是因为抑制自己七情五欲的享受。夏、商、周三代最后之所以衰落乃至灭亡，无一例外的是因为太放肆自己的情欲，过分地奢华、过分地浪费所导致的。

在《政要论》上有这样一段论述更加精辟：“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尧舜之居，土阶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宫室而菲饮食。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也就是说，凡是修身、治国的人，关键点都是在于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所以经传（此处指《礼记》）上有一句话说：“欲不可纵，傲不可长，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考察历史会发现，凡是有家有国的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昌盛，没有不是凭借于节俭的。他失去天下，也没有不是因为过分奢侈浪费所导致的。节俭的人，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奢侈浪费的人，一味地放纵自己的情欲。放纵自己情欲的人就危险了，节制自己欲望的人就可以平安了。尧、舜所居住的地方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着粗布所编织的衣服，冬日也是只穿着鹿皮制成的大衣，他们的衣服都是很粗陋的。禹也是同样，他的宫室非常简朴，饮食非常微薄。这几位帝王并非生来情之不好，而是他们最大程度地做到了节俭。恰是因为节俭，能够使天下太平。

中国古人讲“欲是深渊”。一个人的欲望一旦打开，就没有边际。所以古人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从哪里做起呢？《大学》上说，要从“格物”来做起。“格物”就是格除自己的物欲，使你面对财色、名利都如如不动，这才叫有定力，才能够明智。“格物”之后才能够“致知”，你的智慧才能够显明。“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你才能把心放正，你才能够去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想修身，想通过学习传

统文化来提升自己的境界，从哪里做起呢？应该从格除物欲做起。我们吃、穿、住、行都要力求俭朴，不要拿钱来奢侈浪费。

西方人童年的时候是天堂，要什么父母给满足什么。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孩子平时所喜爱的玩具、所喜欢的吃的，应有尽有，一应俱全。但是，古人告诉我们：“从俭入奢易，从奢返俭难。”一个人以前生活很俭朴，让他过上奢侈浪费的生活，很容易。但是，一旦他奢侈浪费已经习惯了，大手大脚已经自然了，再让他过上俭朴的生活，那就很难了。那么，从小父母就满足他各种各样的欲望——吃喝的欲望、玩具的欲望，还有穿戴的欲望，等等。结果一旦欲望之门打开，自己都控制不了了。为了满足这种不断膨胀的欲望，中年是战场，中年就要去和别人竞争，因为不竞争好像获得不了自己的最大利益。为了和别人竞争，每天工作压力很大，因为他喜欢提前消费，工资还没有拿到，就已经买了车子、买了房子，为了还这些债，每一天要拼命地工作。中国人不喜欢借债，因为借债过日子压力很大，日子过起来也没有味道，不如自己在欲望上有所节制。到老年的时候，由于西方人没有这种“孝悌忠信”的教育，儿女也不知道孝养老人，只知道为了自己欲望的满足而奔波、工作，很劳碌，也没有时间去看望父母，所以老人都被送进了养老院。很多人一提起西方的养老制度还很羡慕，“你看西方国家养老自己也不用愁”。确实，他们的养老院物质条件非常的好，冰箱、电视应有尽有，而且也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但是，老年人情感上的需要很少有人能关心到。因为儿女都是为了工作忙碌，只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偶尔给他们寄上一张贺卡。他们拿到这个贺卡，见人就说，逢人就讲，说我这个儿女还没有忘了我。老人就这样过着整天和电视为伍、坐吃等死的生活。而外国人看到中国人三世同堂，一家老少生活在一起，其实是非常的向往、

非常的羡慕。但是我们却放弃了这样良好的生活方式，要向西方学习那种“童年是天堂，中年是战场，老年是坟墓”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从小教导孩子要勤俭持家。所以，曾国藩虽然做到了四省总督，家庭非常的富裕，但是他仍然要求孩子，自己的家事自己做，而且告诉他们要勤俭持家，不能够放纵自己的欲望。人在童年的时候应该积福、惜福。一个人一生的福分是有限的，不能年轻的时候都糟蹋光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少年得志大不幸”。少年的时候就非常的有钱有势，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福分，还大手大脚地放纵奢侈，很快就把自己的福分给消掉了。所以中国古人与西方恰恰相反，我们从小教导孩子勤俭持家。我们去参观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看了之后非常感慨！为什么？因为这些家虽然非常的富裕，但是无一例外地都是用《论语》来教导子孙。甚至他们家的亭子上，写的都是《论语》上的教诲。他们能够富贵超过三代，都是因为勤俭持家、孝悌传家。所以我们即使现在生活条件很好、很富裕，也不能够随意地浪费，要懂得惜福、懂得积福。中年的时候，用自己的所学所能来贡献社会，回馈国家，服务人民。当一个人心中有这样一种观念的时候，他即使承担很重的工作，也不会感受到压力。因为他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对于社会的和谐，乃至千秋万世所做的贡献，看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没有压力。由于中国人把儿孙教导得很好，到老的时候，儿女围绕膝前，享受着天伦之乐。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人生轨迹，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尚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帝禹的孙子，也就是启的儿子太康，他身居帝位，但是不务朝政，非常喜欢游乐、打猎，放纵自己的情欲没有节制，百姓对他都非常的怨恨，而他还不知道反省。他到洛水之南去打猎，打了百余天都不回京都。这时，

有穷国的国王后羿趁着国民怨声载道，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候着他们的母亲随从打猎，在洛水和黄河的交界河湾之处被拦住后，几个弟弟就埋怨太康不理朝政导致了现在的困境。他们五个人分别作了一首诗来劝诫太康。

第一个弟弟就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廩乎若朽索之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弗敬？”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个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够战胜我。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该在尚未显露时就有所谋划。我面临亿万民众，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匹马拉的马车。作为民众的君主，怎么能够不谨慎呢？

第二个弟弟也说了：“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他说，在我们老祖宗大禹那里有教训，在内兴起迷恋女色之风，在外又兴起游猎的风气，喜欢饮酒没有节制，又迷恋歌舞，住着又高又大而且墙上雕绘着图饰的屋宇，有上述情况之一，则没有不灭亡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更何况这六者都有呢？

第三个弟弟就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他说，只因为有了尧帝，才占有了冀州这块地方。如果丢弃了尧帝的治国之道，扰乱了尧帝的法纪纲常，就会招致灭亡。

第四个弟弟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荒堕厥绪，覆宗绝祀！”他说，我们十分圣明的祖先是众多诸侯国的君王，他有治国的法典和规则，把这些都遗留给子孙，但是我们现在却荒废了前代人所留下来的事业，覆灭了祖宗，断绝了祭祀！

第五个弟弟又说：“乌乎曷归？予怀之悲。万世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他说，

唉，我们将何以回归呀！我的内心怀着深深的悲伤。普天之下的人们都怨恨我们，我们还将依靠谁呢？我的内心充满了哀伤，脸上蒙着深深的羞愧。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品德，虽然后悔，难道还能追回吗？

你看，古代的这些君主，一旦骄奢淫逸，还有旁边的人，还有贤明的弟弟，来劝告他。我们现在的一些人，也过得骄奢淫逸，不仅没有人劝告，大家还赞叹他、称颂他，还对他溜须拍马。这就助长了他的不良作风，导致他不以骄奢淫逸为耻，反而以骄奢淫逸为荣了。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七、盛世天下为公，衰世天下为私

在《淮南子》上有这样一句话：“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意思是说，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基业，遵守着明堂的政教制度，能够明察前代兴亡的轨迹，能够看得清成败的变化，不符合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行，从来不随便出口说话，行为举止不随意作为，能够“择善而从”。从这里可以看到，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可以作为后世的师表。

那么，为什么在成康之后，想使国家兴盛发达的人很多，但是国家却兴盛不了呢？《汉书》用一句话给我们指出了原因：“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自从周成王、周康

王以来，几乎也有上千年了。想使国家大治的人很多，但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够复兴。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君主都舍弃了古圣先王治国的常道，而一任自己的私心来行事，结果奢侈盛行，仁义也被废弃了。这告诉我们，领导者是由于舍弃了古圣先王治国的常道，放纵自己的私欲，导致了太平不能够复兴。

在《商君子》上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意思是，乱世的君臣都是洋洋自得地想着要怎么样专有一国的利益，想方设法地去选择哪一个官位更重要、哪一个官位更方便谋取私利，这是国家之所以危亡的重要原因。古人的话很简洁，一句话就把国家之所以兴盛、危亡的原因指出来了。

《孔子家语》上也有一个典故。鲁哀公来向孔子请教说：“大礼何如？”“大礼”是怎么样的呢？“子之言礼，何其尊也？”为什么您一谈到礼，就这样的尊崇它呢？孔老夫子就说了：“丘闻之，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孔子讲：我听说，人们之所以能够正常的生活，礼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鬼神。如果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位置。如果没有礼，就没有办法来辨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远近亲疏的交往。“是故君子此为之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宫室，节其服御，车不雕玕，器不雕镂，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与万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礼也如此。”因此，古代治国理政的人对礼特别地加以尊重，并以他们自己所能够做到的来教导百姓。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所住的房屋很简陋，他们的服饰也非常的简朴。车子上没有特别的雕饰，所使用的器具也不是精雕细刻的。

饮食不讲究美味，他的心里也没有特别的贪求，和天下的百姓共享利益。古代圣明的君王就是这样来行礼的。

哀公听了之后，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那为什么今天的国君不能够这样去做呢？为什么不能够去行礼了呢？孔老夫子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孔子回答说：“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众，以伐有道。”今天的君主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其贪心，使百姓抱怨朝政，并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不是依据正常的法度，而是任意地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来诛杀百姓。“夫昔之用民也由前，今之用民也由后，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从前的君王治理和役用百姓，都是按照前述的方法去做，而今天的君主、官吏役用和治理百姓，都是按照后一种做法去做，这就是今天的君主、今天的官吏不能够修明礼教的原因了。

为什么政教不修，礼仪不能够复兴？就是因为当君王的、为官的不能够率先垂范，他们已经习惯于骄奢淫逸的生活了，把升官作为发财求利的手段，没有想到做领导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天下谋福利。所以，古之盛世君王，他能够崇尚道义、崇尚道德仁义礼，以天下为公，而衰世之主违背道义，以天下为私，无非是升官发财、以权谋私。

我们从以上的对比，对官德修养与国家盛衰之间的密切联系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我们学习历史，总结出这些历史的经验，可以以古鉴今，能够为我们现代的领导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个借鉴。

第三讲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从《群书治要》看文化的本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提出，要重视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为什么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后，到了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呢？如果联系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一看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我们对这个文件就不难理解了。

《论语》上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孔老夫子到卫国去考察，他的弟子冉有给他驾车。孔老夫子对冉有说：“这个地方的人口已经很稠密了。”冉有就问：“人口已经很稠密了，还应该做什么呢？”孔老夫子就说了两个字，“富之”，要使人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使人们富裕了，还应该做什么呢？”孔老夫子又说了两个字，“教之”。也就是说，在孔老夫子看来，我们只要把“富之”、“教

之”这四个字做好了，那么社会和谐就能够达到了。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仅仅重视了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温总理在2011年4月份《讲真话，察实情》的讲话中这样提到：“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这就说明，社会中的道德问题已经引起了温总理的关注，也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关注。所以，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又有这样一句话：“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

那么，通过文化建设，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以及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的问题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文化的本质上来理解。

“文化”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在古代汉语中是由两个词来构成的。这个“文”，就是指文字、文章、礼乐制度、鼓乐、曲调等等。而“化”，就是人受教而变化。在《说文解字》上，把“化”解释为“教行”。人们接受了道业，变化气质，改过迁善，在各方面起了若干的变革，这种变革就称为“化”。“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的气质，使人达到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目的。所

以说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通过文化建设可以提升人的素质，变化人的气质。因此，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一、经典：文以载道

《群书治要》这部书，是唐太宗授命魏征、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大臣把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的精华，特别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概括总结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奠定唐太宗“贞观之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古人的文章不是像现代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那样分类的，而是以经、史、子、集来分类。经、史、子、集中的内容都是在讲道谈德，起到的是给人们以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以，中国古人说“文以载道”。

（一）“经”为常道

首先看一看“经”。“经者，常也”，它记载的是恒常不变的道理。比如说，《易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代的圣贤人上观天象，观察到了四时的变化，下观人文，也就是社会的人伦关系，以此来教化天下的百姓，让人们知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

很多人自以为是地说：“学习圣贤经典，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凡是写在经典之中的，那是没有糟粕可言的。很可惜的是，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很多人拿自己的眼光去衡量

古圣先贤的智慧，一句“是糟粕”就把它删除了。不同的是，有一些学习传统文化的人，特别是学中医的人，就非常感叹地说：“在中华经典之中，那些最精华的东西恰恰被一些人误以为是糟粕给删除了！”并且，现代心理学、现代科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些东西才是最精华、最宝贵的东西。

1. 一阴一阳之谓道

我们举一个例子。《周易》中有这样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是玄虚的，它是古圣先贤观察了自然界的规律而总结出来的规律。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从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它们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用这个道理来观察人世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比如说，人心的一忧一喜，人世的一治一乱，也都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古圣先贤常用太极图来表示天道变化的规律。太极图，半边是阴的，半边是阳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之中还有一个界限，如果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衡，就会引起变化。这就叫“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也就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上面讲的是观察天地自然的规律得出的道理。《易经》上教导人要谦虚、谨慎，也是通过观察“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得出的教训。《易经》一共有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六爻，六爻的爻辞有凶有吉。在所有的六十四卦之中，只有一卦是六爻皆吉的，这一卦就是谦卦。谦卦的卦象是“地山谦”。平时高山都是在平地之上的，但是在谦卦之中，高山宁愿居于平地之下。看了这个卦，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他才华横溢、有权有势，就像一座高山一样，但是他不居功自傲，谦逊而尊人。事情做好了，功劳却推给了长辈，推给了同事，推给了下属，说：“我没有做什么，

这都是领导的支持、同事的付出、下属的努力。”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就都不是某一个人聪明智慧的结果，它必须是众缘和合而成，需要多方人士的努力。他的谦虚推让也是符合道理的。又因为这个人很谦虚，即使他很有功劳、很有业绩，也不会招人嫉妒、招人障碍。

《尚书》也有类似的教诲，如“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骄满给自己招来损失，谦虚让自己受益，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规律。为什么“满招损”呢？因为一个人一旦骄满了，认为自己比别人都强了，就会自以为是，而不再会有好学的品质，他的人生就很难进步了。《尚书》上还有一句话：“天道福善祸淫。”天道自然的规律都是给善良的人带来福分，而给过分的人带来灾祸。“淫”就是骄奢淫逸的“淫”，它是指对一切事情的过分与放纵，当然也有“骄满”的含义在其中。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任何事做得过分了，都会导向危险的境地。

正是因为古圣先贤对“天道”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孝经》中又给了我们这样的教导：“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一个人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不骄慢，那么即使身居高位，也不会有被颠覆的危险；一个人虽然很有钱，但是处处中规中矩，还很节俭、很勤奋，这样的人即使很有钱，也不会因为过分浪费而出现入不敷出的结果。一个人身处高位而没有被颠覆的危险，就可以长久地守住高贵的位置；一个人虽然很富裕但是没有过度浪费，这样就可以长久地保持富贵的地位，过上富裕的日子。

这几段话给现代人很深的启发。现在的人一旦有钱有势了，可能就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穿衣服要讲名牌，坐车子也要宝马、奔驰，买一个手提包也都是非常昂贵的品牌，这都是为了满

足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当我们读了《孝经》、读了《易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以前的骄奢淫逸、吃喝玩乐都是不符合道的，就会变得很节俭，变得很谨慎，逐渐把我们的行为气质都给变化了，这就是读圣贤书的好处。

2. “五伦”关系通古今

古圣先贤不仅仅观察了自然界的规律，也观察了社会的人伦关系保持和谐所必须遵守的人伦大道，这就是孟子给我们概括的“五伦”学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很多人就问：《群书治要》所记载的都是几千年前的事了，辑录的都是唐朝以前的经典，对于解决我们现在社会和谐的问题还能够有帮助吗？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经济基础变了，道德是不是也应该有所改变？

我们看一下这“五伦”关系。在古代，有父子之间的关系，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有夫妻之间的关系，有长幼、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有朋友（就是平等的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就有所改变了吗？在古代的时候，父母慈爱儿女，儿女对父母也有一种自然的亲情，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在现在有所改变吗？

那么，怎样使亲情顺着“亲”的方向发展，一生不加以改变呢？圣人观察后才发现，只有父母慈爱教导儿女、儿女孝敬父母，父母儿女间的亲情才能维系一生，才不至于出现“一个儿子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机场捅了他母亲很多刀”这样的情景。这样的不幸，是由于失教造成的。我们的圣贤教诲已经中断了三四代，很少有人知道父子有亲、父慈子孝！传统经典的东西不讲了，反而还向西方学习平等、自由、民主，儿女不把父母亲叫爸爸妈妈了，

都叫名字了。这种所谓的平等，是抽象的平等，这个不可取。

所以，“五伦”关系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也依然是如此。“道”是恒常不变的，至今仍然适用。

3. 儒为社会所急需

什么是“儒”呢？汉代的扬雄给“儒”下了一个定义，他说：“通天地人者曰儒。”其实儒家的人并不是像孔乙己那样的迂腐，他们对天地自然的规律、对社会人伦关系的规律通达无碍，了解得很清楚、很透彻，这样的人才被称为“儒”。这个“儒”字，写法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需”字，告诉我们：学儒的人是人之所需，是我们社会所急需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批林批孔”，把儒家打倒了，“五伦”关系不仅仅是没有人讲了，而且是被彻彻底底地颠覆了。儿女可以去批斗父母，学生可以去揪斗老师，夫妻也被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同床异梦，五种伦理关系被颠覆了。结果是什么呢？人就像是生活在地狱之中。而且它的遗毒一直留到今天。经历过最亲近的人、最值得信任的人都可以把我们送上批斗台，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值得信任呢？所以人与人之间相处就不能够完全地推心置腹了。所以，没有儒家了，没有人把这个“五伦”关系讲解出来，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混乱了，甚至人活得就不像人了。

《周礼·天官》上也对“儒”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四曰儒，以道得民。”“儒”是什么呢？“以道得民”，他给大家讲的是“道”，所以深得民心，受到人们欢欣喜悦的接受和拥护。这也就告诉我们，道德教育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那样，逼迫着人们勉强地硬着头皮去参加的，它应该是深入人心、受到人们欢欣喜悦地拥护的，应该是深得民心的。

最近一段时间，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兴起了举办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的现象。传统文化论坛就是以讲“五伦”关系为核心，教导人如何去孝敬父母、教育儿女，如何夫妻相处、兄弟和睦的。大的论坛往往都是采取网上自愿报名的形式，会场只能容纳一千人左右。但是每一次网上自愿报名，想参加论坛的人都超过了上万人。像上次周口的传统文化论坛，有一位参会的听众就是从美国坐了飞机到北京，从北京坐了飞机到郑州，又从郑州坐了汽车来到了周口的。他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聆听这四天的论坛。每一天的论坛都安排得紧紧的，从上午到下午、到晚上，课排得满满的。但是四天之后，人数并没有减少。不是像其他一些论坛，拿了一个纪念品，登记了一下名字，人就走了，人数到最后是越开越少。这个论坛开到第四天的时候，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听众恋恋不舍，意犹未尽。看了这样的论坛，就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做“以道得民”。

试问，天下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孝敬父母呢？哪一对夫妻不希望和谐相处、白头偕老呢？儒家给人讲的，恰恰就是大家所希望的、所期求的道理，所以它深得民心。

4. 学儒要身体力行

朱柏庐的《劝言》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如果你读《论语》，在没有读《论语》的时候是此等人，读了《论语》之后还是此等人，那就是不曾读《论语》。”就是说，古圣先贤的经典是教人读书识义理的，并不是为后世中举人、中进士而设置的，他的目的是教千万世的人做好人，乃至于成圣成贤。所以，怎么读书才能有利益呢？我们读一本书，便要反之于自身：我能够这样做吗？做一件事就要合之于书，考虑古人是如何做的。这才是真正的读书。孔老夫子就感叹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

人读书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读书志在圣贤”，这是“为己之学”。现在的读书人却是“为人之学”。什么叫“为人之学”呢？读《论语》、读《诗经》为的是在和朋友、同学聊天的时候，能够引经据典，孔老夫子怎么说、孟老夫子怎么说，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读书。

我们一定要把“学儒”和“儒学”相区别。“学儒”就是《中庸》上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后面还有一个“笃行之”，说明学贵力行。能说不能行，不是真学问。什么是“儒学”呢？所谓的“儒学”，就是有前面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却没有后面的“笃行”，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不能够真正地使儒家文化发扬光大。

《论语》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什么意思呢？学习儒家文化的人，学习“道”的人，才能够把“道”弘扬光大。怎么弘扬光大呢？不仅要能讲、能说，还要能行，在身体力行当中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大家看到，学习传统文化的人都是身心和谐，非常的幸福，每一天笑呵呵的，人家就愿意跟着学习。

所以，什么叫“修行”啊？修行就是每一天乐呵呵的，没有生气的、不满意的坏情绪。当你乐的时候，烦恼就没有了。而当你不高兴的时候，脸上就有烦恼相了。其实修行就是修这颗心，时时刻刻保持欢喜的状态。这就是告诉我们，学贵在“知行合一”，这样才能把传统文化弘扬光大。

（二）“史”明兴衰

2011年的秋季，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

做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题目就是《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这个讲话中，他说：“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学习历史，就要学习和吸取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1. 逸乐亡身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上有一段话，讲了国家之所以衰落的原因：“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意思是，大凡国家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之世已久，风气日渐变坏也不觉察，政治逐渐腐败也不变革，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逸乐而看不到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考虑国家大事；有的不听忠言劝告，满足虚伪，忽视真诚；有的在岔路口徘徊，不知何去何从；有的是其倚重的臣子，为了保住俸禄，不敢直言进谏；有的是其疏远的臣子，因地位低微，谏言被弃之不用。于是，国法松弛于上，有识之士忧忡于下。真是可悲啊！

我们看了这一段话后有什么感受呢？国家之所以由盛转衰，就是因为领导者、官员的道德出现了问题，逸乐而看不到危机。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咏史》诗中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国家、家族之所以成就、兴盛起来，无一例

外的都是因为勤俭持家。后来为什么又都衰落下去了呢？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过分的奢侈、过分的浪费所导致的。我们回想一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本人和国民党？不就是因为共产党人率先垂范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吗？“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才获得了胜利。唐太宗读了《群书治要》之后，看到了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总结了这样一句话：“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当君主的人贪心一定会丧失他的国家，做臣子的贪心一定会导致身败名裂。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反复地叮咛、说明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在《春秋左氏传》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规律，它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国家的兴盛，都是因为把百姓视为自己的伤口而细心呵护、关爱，这是国家的福祉所在；国家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把百姓看成如泥土、小草一样的微贱而随意践踏，因而招致灾祸。我们读了这样的教诲就知道，领导者言行不能够不谨慎。为什么呢？因为关系到国家的盛衰，还有民风的善恶。

2. 君仁臣忠

《史记》记载，历史上出现过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第一种，就是“不能欺”。子产在治理郑国的时候，他的法律监督机制非常的严密，老百姓想欺骗他都做不到，这个就叫“不能欺”。西门豹在治邺的时候，他的法律非常的严苛，只要你触犯了法律，就给你严厉的惩罚，以致把老百姓吓得不敢去做违法乱纪的事，他做到了“不敢欺”。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在治理单父的时候，他把孔子的“仁爱”思想、“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完完全全地运用到他的治理之中，结果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都不忍心欺骗

他们的长官，所以他做到了“不忍欺”。究竟哪一个层次是最高的管理层次呢？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都知道，当然“不忍欺”是最高的层次。

但是现在的企业管理、政府的管理都在追求哪一个层次呢？我们都是向“不能欺”、“不敢欺”去努力，而没有向那一个最高的层次去努力。我们一个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家，对自己的管理经验、治国方法没有信心，反而要去向一个只有两百年历史的国家（美国）去学管理，这不是让人感到很可悲的一件事吗？

比如说，我们学习企业管理，在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和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企业之间，请问应该向谁去学管理呢？任何一个开明的企业家都会向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去学管理。因为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企业，虽然有它的成功之处，但毕竟没有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更经得起风吹雨打。

但是，自“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以后，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达到了顶端，也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结果导致的是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没有信心，而要去其他国家学管理，这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吗？所以，在金融危机来了之后，很多的企业家就说：“我们以前做企业都是向雷曼兄弟去学习，看他们怎么做，现在他们都垮掉了，请问我们应该向谁去学习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开明的企业家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文化，创下了“中国式管理”的最佳案例。当这些案例普遍地出现在大江南北的时候，才让我们生起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北京有一位胡小林董事长，他学习了传统文化之后，严格地按照《弟子规》来管理企业，不符合《弟子规》的事情就不做。结果，

他的生意不仅没有减损，反而是年年攀升。他把企业对外的售后服务部改了名字，对外称“售后服务部”，对内就称“舍得部”。因为他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大舍大得，小舍小得。”怎么搞好公共关系呢？就是先要“舍”。他把人事行政部也给改变了名称，叫“送爱心部”。人事行政部的责任就是要找到那些需要帮助的、有家庭困难的员工，给他们以及时的帮助和关爱。

像这样的企业家、这样的老板，他能够起到君、亲、师的职责。他不仅仅领导员工，而且关爱员工，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地关爱员工，给他们以人生的指导和教诲，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所以，员工都不忍心欺骗，他在与不在，企业的经营状况是一样的，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在日本，松下幸之助之所以被称为“经营之神”，就是因为他把“君仁臣忠”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中。稻盛和夫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拯救了日航并且创立了两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也是因为把儒家的文化运用到了企业管理当中。

3. 美德为本

在历史上还有很多的经验。《汉书》上就告诉我们，只是重视法令的严密而不重视人道德的教育，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说：“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意思是说，法令制定出来奸诈就生起来了，命令一下来欺诈的行为也就出现了，就像扬汤止沸、以薪救火一样，不仅对事情没有帮助，反而还使它愈演愈坏。这就说明，其实对于社会的和谐来说，道德教育相对于制度建设而言才是更根本的。

当代西方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因泰尔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叫《追寻美德》，另一本书叫《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他

对当代西方过分地重视制度的设计、正义规则的设计而忽视了个体美德培养的倾向做出了批判。他说：“再正义的制度、正义的规则，也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正义的规则设计出来了，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把它推行得好。”

社会之所以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一方面和法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不合理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和人们自私自利的心密切相关。

4. 闻过兴国

《群书治要·吴志（下）》中记载，能使国家兴盛的君主与能够使国家混乱的君主有什么不同呢？“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意思是说，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领导，都是喜欢听到别人指正他的过失；能够使国家混乱的君主，都是喜欢听到别人对他的赞扬。喜欢听过失的人，他的过失一天天地减损，福也就来到了；喜欢听别人赞誉的人，他的声誉一天天地减损，而祸也就来到了。

古人读了历史，是这样学的，也是这样做的。《韩诗外传》上记载着赵简子的故事。赵简子是晋国的正卿，有个臣下周舍在他的门外站了三天三夜，赵简子就派人去问他是不是有事相求。周舍就说：“我别无所求，只想做个敢犯颜进谏的臣子，拿着笔墨跟在您的身后，每一天都将您的过失记录下来，然后每月汇集一起，每年看看它有什么效验。”赵简子答应了周舍的请求。从此以后，赵简子走到哪里周舍就跟到哪里，很认真地拿着笔墨对他的每一个过失都加以记录。但是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周舍过世了。有一天，赵简子和群臣在洪波台饮酒，当他和群臣饮得正

高兴的时候，突然就趴在桌子上痛哭了起来。臣子们看到赵简子失声痛哭，都很惶恐，纷纷地离开自己的坐席来向他请教。臣子们说：“我们知道自己有过失，但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失，还请您明示！”赵简子就说：“诸位大夫都没有过失。我只是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叫周舍，他给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一千张的羊羔皮都不如一片狐腋贵重，众人的唯唯诺诺都不如一人的犯颜直谏对我有帮助。周武王的臣子犯颜直谏，周朝就兴盛起来了。商纣王的臣子唯唯诺诺，商朝就灭亡了。自从周舍过世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自己的过失了，我知道离自己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你看，这个领导者是多么的明智！他知道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臣子对自己是真正有帮助的。这个典故告诉我们，读历史不仅可以看到国家的兴衰成败，还能指导我们如何选择下属、选择朋友。

（三）“子”以论治

“子”指的是诸子百家的言论。诸子百家包括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等，他们的言论里边很多的内容也都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比如说，《群书治要·老子》上就有这样一句教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告诫我们，要戒除自己的贪心，要知足常乐。

《群书治要·韩子》（即《韩非子》）告诉我们，怎么样明辨身边的这些臣子是君子还是小人。古人知道，亲近君子国家就兴盛，亲近小人国家会灭亡。那么怎样来分辨身边的臣子是君子

还是小人呢？《韩子》上写道：“凡奸臣者，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是奸臣，都要顺着领导者的心思去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取信于领导，而且可能有求于领导，希望从领导那里得到好处。领导者认为什么好，他也会跟着说这个东西好，去赞叹它。如果领导者认为这个东西不好，对它有所憎恶，他也会跟着领导去毁谤它。所以，从这里就知道了忠臣和小人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忠臣是念念为着对方好，虽然话有点逆耳，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傅子》也提到这样的道理。“明主患谏己者众，而无由闻失也，故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诚，虽事不尽是，犹欢然受之。”明智的君主和领导者都是担心谄媚巴结自己的人太多了，没有途径闻听自己的过失，所以“开敢谏之路”，能够让人们犯颜直谏，才有机会听到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言论。如果臣子所说的言论是出于一片忠诚之心，虽然他说的可能与事实有所出入，但是也不要责怪。

唐太宗在位时，有位臣子进谏，说了很多国事的是非得失，批判了一通就出去了。站在太宗身边的臣子就说了：“陛下，刚才那个大臣所说的很多都不符合事实真相，您为什么不制止他、不打断他呢？”唐太宗说：“如果我不听他的话，打断了他，这个事情传了出去，有人会说皇帝不肯听臣子的进谏，就不愿意再向我提意见了。所以虽然他说得不对，我也不能够打断他。”正是因为唐太宗有这样的心胸，所以臣子都敢于犯颜直谏，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尸子》中有一个例子，让我们明白应当重视圣贤人。这个故事比喻得非常好。它说：“假设你们家的房屋着火了，人家赶

来把火给你扑灭，你会对他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对他感恩戴德。可是，那些年老的人、有经验的人早早地提醒你，让你要把墙的缝隙涂好，把烟囱做好，以保证终身没有失火之患，但年轻人听了如同耳旁风，没当一回事就过去了，不知道感恩戴德。假如你被关进了监狱，有一个人到监狱里把你救了出来，使你免于牢狱之灾，你会怎么样啊？你们家族三代的人都会对他感恩戴德，因为你出来之后可以孝敬父母、照顾妻子、教育儿女。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圣贤人教给人们仁义慈悌的道理，让人终身都没有牢狱之灾，但是人们却不知道感恩戴德！”

圣贤人隐匿了起来，并不是他们不愿意来“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有这样的志向，“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都想用自己的所学所能为社会的和谐、天下的太平有所贡献。那为什么他们还要隐匿起来呢？原因就在于国家对他们不重视、不尊敬。刘备去请诸葛亮的时候要三顾茅庐，他有真诚心、恭敬心，诸葛亮才会出来帮助他。因为圣贤人他们出来做官，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我们现在重视的是什么呢？我们重视的是GDP的增长、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仅仅重视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圣贤人讲的仁义慈悌的道理，人们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了道德的底线，这个时候人就不像人了，就是孟子所说的“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以前闻所未闻的事情，在现在的社会全都发生了。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人与禽兽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孟子很早就给我们说过，人和禽兽的区别“几希”。“几希”就是很小一点点。只不过，人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了，而禽兽把它给丧失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人有礼、人有义，他知道用礼义来节制自己不合适的

欲望和行为。如果人不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没有圣贤人出来讲解“五伦”、“八德”的教诲，那么人确实就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

《袁子正书》有一段教诲，它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不能制止人们去作恶的心，即使你每一天以刀锯在外面执行死刑、惩罚犯人，也不能够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淮南子》上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这句话也是在告诉我们，法制监督机制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呢？它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像孔子、曾子那样有德行的、有孝心的人。法律能够对窃贼给以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的廉洁、有志气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言为文章，行为仪表，就是“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间的表率。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教育啊！

所以，对于圣贤人不能够不尊敬，因为他使人们知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道理，引导人们成为有德行的圣贤人。

（四）“集”以示道

“集”的内容大部分是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书信游记等等，其中很多的内容也都是告诉人如何做人，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

比如，我们看《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做到了四省的总督，权倾一时，但是他在位二十多年中，从来没有为自己建造过一所

房屋、买过一亩田地。而且他对军中的僚属宣誓说：“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看了这句话，我们相信曾国藩能够做到不取公家的一文钱挪作私用吗？我们很多人都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为什么曾国藩能够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呢？因为他从小熟读儒家的经典，懂得《易经》重要的教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还有一句话就是：“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如果对这两句话有深刻的体悟，就会知道，财富并不是赚到你手就是你的了。

古人认为，财富为五家所共有。第一，就是官府。假如财富是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而来，最后东窗事发，自己锒铛入狱，所有的家产将被没收、被充公。虽然赚到你手，也是昙花一现，又被人给收回去了，自己还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第二，就是水灾。不久前网上流传着一个案例，某位官员贪了很多的钱，又不便把它存在银行里，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买了一栋别墅，把钱装在了破纸箱里，藏在了别墅之中。他以为这样做就伪饰得天衣无缝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别墅发水，把钱从别墅里冲了出来。被调查时说不清来历，他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情形就曝光了。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就是火灾。不义之财也会被大火给焚烧掉。第四，就是盗贼。中国古人讲“盗亦有道”，盗贼也讲他的道义，他专门偷盗、敲诈、勒索为富不仁的人。第五个比较容易观察，就是不肖子孙，败家子也会把你的家产败散掉。

古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送给他钱他都不敢要，更何况想方设法地去聚敛钱财？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学习传统文化，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了，想方设法地去聚敛钱财。结果怎么样呢？最

后不是贪污受贿走上了断头台，就是被子孙散掉、败坏掉。

古人总结了五点。现代还多了一点，就是医院。很多贪官污吏，贪了很多的钱，也得了一身的病，最后不得不去看医生，花了大把的医疗费，得不偿失，这是不明智的举动。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可以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

在道家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中也这样说：“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它说，取不义之财的人，就像吃了有毒的肉充饥、喝了有毒的酒止息自己的饥渴，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先生所著的《保富法》上也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他耳闻目睹了满清末年的那些权贵的子孙起起落落的情形，最后总结了一本书——《保富法》。他用身边的案例为我们证明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事实。

在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杨震，他在赴任东莱太守的路上，路过了昌邑县。他曾经举荐过一位秀才叫王密，当时正任昌邑县令，王密知道自己的恩人要路过此地，就趁着夜色带着十斤黄金要呈献给杨震。杨震叹了一口气说：“唉，我了解你才把你举荐出来，但可惜的是你却不了解我。”王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以为杨震怕这件事被人知道才不愿意接受的，于是他就说：“这一件事没有人知道，您就放心地接受了吧！”杨震说：“这件事有天知、有神知、有你知、有我知，这是‘四知财’，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所以他拒不接受这“四知财”。杨震一生很廉洁，到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家产留给子孙。他的同僚看了之后就说：“你不留一点财产给你的儿孙吗？”杨震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留给我的儿孙最好的财富就是他们是一个廉洁官员的后代。”

古人说：“遗金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我们辛辛苦苦赚了很多钱，如果孩子是败家子，你把钱留给他，他迟早会败光。假设你的孩子又有德又有能，他会用自己的能力创造财富，你把钱留给他又有什么必要呢？杨震廉洁的作风影响了他的儿子，也影响了他的孙子和曾孙。后来，他的儿子、孙子和曾孙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权倾一时。而且，他家的子孙还能把祖先的家风承传下去，把他们家的房屋取名为“四知堂”。只要杨家的后代子孙从这个匾额下走过，就能够提醒自己：我们的祖先不收“四知财”，我们怎么能够因自己的行为给祖先抹黑呢？所以他们的良好家风代代承传，保持不败。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官员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结果是得不偿失。有人还专门给这些官员算了一笔账：第一是政治账，自毁前程；第二是经济账，倾家荡产；第三是名誉账，身败名裂；第四是家庭账，妻离子散；第五是亲情账，众叛亲离；第六是自由账，身陷囹圄；第七是健康账，心力交瘁；第八是历史账，遗臭N年。

不重视自己的权位，拿着自己的领导位置去贪污受贿，就如同唐太宗所做的比喻——拿着珍珠弹去射鸟雀。珍珠做的子弹非常的昂贵，但却拿着它去射麻雀，这是特别不划算的。这些官员在位的时候不仅仅自己受到尊重，父母、妻子、儿女、家人也都跟着享受荣耀。但是一旦身陷囹圄，被关进监狱了，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付诸东流。

这就是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的圣贤经典、“经史子集”这些文章，都是用来“文以载道”的，是告诉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道理的。那么，我们读了这些圣贤书，就应该志在圣贤、效仿圣贤，也要成为像他们一样有德行的人，变化自己的气质。

二、文字：智慧符号

“以文化人”，这个“文”不仅指文章，也有文字的意思。中国的文字也是智慧的符号，有着教育的内涵。我们举几个例子。

（一）“耻”：闻过心惭，面红耳赤

第一个是“耻”。这个“耻”字，正体字写作一个“耳”加一个“心”字，解释为“辱也，从心、耳声”。看到这个字，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耻”。“耻”是一个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失，心生惭愧，表现在外面就是面红耳赤。所以，“耻”是心有所惭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孟子就说：“耻之于人大矣！”我们修行从哪里修起呢？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就是从培养羞耻心来做起。孟子说，“耻”这个字对一个人太重要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羞耻心，做什么事都无所谓，那么久而久之，他可能什么事都敢做了。如果一个人能够有羞耻心，做了错事他能够惭愧，“知耻近乎勇”，他才能改正自己的过失，进而成圣成贤。

《了凡四训》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这句话说得很好。让我们想一想古代的圣贤人，比如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们和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百世的师表，到今天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的人看到他们的塑像，还非常的佩服、非常的尊敬？他们的后人还非常的愿意向他们学习？但是我自己却是

一身“瓦裂”。“瓦”就是指陶制的器皿，器皿破碎了，结果就是一文不值。过分地放纵于感官的享受、欲望的满足，偷偷做着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就这样一天天地沦落为禽兽而不知不觉，还自以为是，妄自尊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这句话告诉我们，圣贤人和一般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他虽然也有过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他知过能改，“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犯了过失知道惭愧、知道羞耻，进而勇于改过，所以他能够成圣成贤。

没有一个人生来是圣贤人，一个过失都不犯、一点习气都没有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成圣成贤？就是他们有羞耻心，懂得惭愧。人家都早已经成圣成贤了，我们在这儿是一个凡夫，这一点就非常值得惭愧。这个“羞耻”并不仅仅说你犯了某一件过失知道惭愧、知道羞耻，而且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成为圣贤人、成为人人效仿的君子，这是值得我们羞耻的。有了羞耻心，“知耻近乎勇”，你才能够改过自新，才能够在道德上不断地提升。

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羞耻心，那确实是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礼记》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能够学舌，能够学人讲话，但是它不过是飞鸟而已；猩猩有的时候智力也很高，也会学人讲话，但它也不过是禽兽而已。现在的人不懂得用礼来节度自己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虽然能够讲话，但是变成了会讲话的禽兽了。

所以，如果这个“耻”字你学到了，能够听到别人说我们的过失而面红耳赤，并进而改正自己的过失，你的道德学问就会不断地提升，气质也就改变了。

这是“耻”字的含义。

（二）心奴为“怒”，如心为“恕”

再看一看“怒”和“恕”。

“怒”上面是一个“奴隶”的“奴”，下面是一个“心”字。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心变成了奴隶。民国时期著名的民间教育家、女子教育创始人王凤仪老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恨怨恼怒烦，人生五毒丸。吃了半颗就生病，吃了一颗要你的命。”所以，发怒确实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五脏六腑之所以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病症，全都是和恨、怨、恼、怒、烦这五种不良的情绪有关。那怎么办？我们就要转“怒”为“恕”。

“怒”，把“又”字边的棱棱角角磨得圆滑起来，就变成了“恕”。这个“恕”写得也很有味道。“恕”，上面是一个“如”，下面是一个“心”，告诉我们，“如心”才叫“恕”。如谁的心？如对方的存心。你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你才能够转“怒”为“恕”。孔老夫子的弟子来请教他：“有没有一个字我可以终身奉行的？”孔老夫子说：“有，这一个字就是‘恕’。”意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我们不想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如果我们从早到晚，每一言、每一行之前都能够想到这一句话，那我们的人际关系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什么叫“如心”呢？我们真如自性的心就叫“如心”。那么“如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是有一种同体的感受。意思是说，我不仅仅和自己是一体的，和他人是一体的，而且和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这个心才叫“真如之心”。当你有了这种心，才能够生

起同体的感受。什么叫“同体”呢？就是说，你看到别人很悲伤，你也会感觉到很悲伤；你看到别人很快乐，你也能够从心底感受到那种快乐。这就叫“同体”的感受。所以，“同体大悲”，就是说你和万事万物是一体的，他有伤痛你也会感觉到伤痛，这个心才叫“如心”。

现代人的这种同情心，就是和人感同身受的心，却越来越为物欲所蒙蔽，基本上都没有了。我们感受不到身边人的痛苦了。我们看到别人的苦痛，经常是麻木不仁，不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只有“同体”的感受有了，我们才能生起对别人无私无求的帮助之心。古人有这样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间人每一天“朝九晚五”很忙碌，工作很辛苦。那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呢？我们观察一下发现，不是名就是利。如果没有名、没有利，这件事很多人就不去做了。不能否认的是，还有很多人不为名、不为利，也在辛辛苦苦地努力工作，那背后推动的力量又是什么？就是“如心”——这种“悲心”。“同体”的感受能够把人家的痛苦看成自己的痛苦，这样的一种“悲心”才促使他为了大众的利益付出，无私无求，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转“怒”为“恕”了，就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我也经常地引用，也是经常用这一篇文章来提醒自己。为什么经常地引用呢？因为我们自己经常握不住自己快乐的钥匙。这篇文章这样写道：

一个成熟的人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每个人心中都有把快乐的钥匙，但我们却常在不知不觉中把它交给别人掌管。比如一位女士抱怨说：“我活得

很不快乐，因为先生常出差不在家。”她把快乐的钥匙放在先生手里！一位妈妈说：“我的孩子不听话，叫我很生气。”她把钥匙交在孩子手中！还有一个年轻人从文具店走出来说：“那位老板服务态度恶劣，把我给气炸了。”他把钥匙交到了老板的手里！这些人都做了相同的决定，就是让别人来控制他的心情。当我们允许别人掌控我们的情绪时，我们便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对现况无能为力，抱怨与愤怒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开始怪罪他人，并且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我这样痛苦，都是你造成的，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一个成熟的人会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他的情绪稳定，为自己负责，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种享受而不是压力。诸位朋友，你们的快乐的钥匙在哪里呢？是放在了别人的手上吗？那就赶快把它拿回来吧！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它是在提醒我们：要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这句话确实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真正能够握住自己快乐钥匙的人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那就是我们古圣先贤所说的，“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时时都是在定中，没有什么事能够让他焦头烂额、让他火冒三丈而丧失了定力。所以，我们要时时考验自己，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都能够坦然面对，面带微笑，这样才不至于失去了定力。这个就是“恕”。

（三）“爱”：用心感受他人需要

这个“爱”，正体字是一个感受的“受”，中间有一个“心”字。看到这个字，我们就知道，“爱”是用心地感受对方的需要。

“爱”并不是打着爱的名义，说因为我很爱你，所以你就要听我的。这样就是控制人，让人听从我们的欲望。这样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到很有压力，生怕因为我没有听对方的，对方就生气了、不高兴了。正是因为“爱”是用心地感受对方的需要，所以爱的感觉应该是温暖的，爱的言语应该是正直的，爱的心地应该是无私的，爱的行为应该是成全的，而不是拿着“爱”做名义，去控制对方，要求对方应该怎样地为我服务。

《易经》上有两个卦，一个叫泰卦，一个叫否卦。泰卦的卦象是“坤上乾下”。“乾”代表天，“坤”代表地。正确的位置，应该是天在上、地在下。但是在泰卦之中，乾和坤的位置是互换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反省自己的不足。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各自责，天清地宁”，结果就很安泰吉祥了。而否卦恰恰相反。否卦的卦象是乾在上、坤在下。天在天的位置，地在地的位置。他们各居本位，要求对方、指责对方、挑剔对方，指责对方“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你却做不到”，结果就形成我们古人所说的“各相责，天翻地覆”。

所以这两个卦象就告诉了我们，“爱”并不是指责对方、控制对方，而是彼此成全、互相关爱，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如此就会“否极泰来”。

（四）“教”：上行下效，身教胜于言教

再看“教育”的“教”。《说文解字》用一句话，即“上所施，下所效”，就把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给我们揭示了出来。

在古文字中，这个“教”字，左边上面是一个“丩”，下面是一个一模一样的“丩”，再下边是一个“孩子”的“子”。这

个上面的“×”是父母、老师、领导画的，下面一模一样的“×”就是孩子、学生和下属画的。它告诉我们，教育的本质是“身教胜于言教”。“教”字的右边是一只手拿着一根柳条，告诉我们，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是需要长期拿着柳条耳提面命的。所以“身教”加“耐心”，就能够把孩子、学生、下属教导好了。孩子的言行、习气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你不能指望他刚学了《弟子规》，行为立刻就有改善，而是需要长时间熏修，并且自己要给孩子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让他来学习。

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在抱怨说：“我们的孩子就是没有孝心，‘小公主’、‘小皇帝’的脾气很厉害，以自我为中心，谈不上对父母有感恩之心。”这些都是结果。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章——《哪一个是我》。

那个一进门就喊“肚子饿了，饭怎么还没做好”的人是儿女，那个一进门衣服都来不及换就下厨房烧菜的人是父母。

那个一会儿说“粥烫了”、一会儿嫌“菜咸了”的人是儿女，那个哪怕就一点青菜、豆腐也要精心烹饪、力争做出滋味的人是父母。

那个整天抱怨作业多、实在太累的人是儿女，那个累了一整天毫无怨言、洗衣打扫卫生后再陪读的人是父母。

那个动不动就开口要钱、不给就生气的人是儿女，那个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却从不在教育投资上吝啬的人是父母。

那个记不住家人的生日、可一到自己生日就早早召集同学、朋友聚会的人是儿女，那个很少记自己生日却用心为家人准备生日礼物的人是父母。

那个早上赖床还不停抱怨家人叫他的人是儿女，那个深夜入睡、黎明即起准备早点的人是父母。

那个受了一点儿委屈回家苦水倒个不停以求得同情和安抚的人是儿女，那个在外面受了再多气回家后却强作欢笑的人是父母。

那个有牢骚就发、有烦恼就怨把家当做坏情绪“宣泄所”的人是儿女，那个把苦埋在心中生怕让自己不良情绪影响家人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以学业、工作忙为托辞很少往家里打电话问候的人是儿女，那个在电话里嘘寒问暖、总为家人牵肠挂肚的人是父母。

那个一开口就将家里的积蓄“借”走，然后舒舒服服住大房子的人是儿女，那个劳累了一辈子到老还住在破旧小屋里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羡慕人家多么有钱、自己家多么寒酸的人是儿女，那个退了休还不“安分”，起早摸黑挣钱的人是父母。

那个宁愿把大量闲暇时间放在娱乐和朋友聚会、却不愿回家看看的人是儿女，那个只要看到儿女哪怕就一会儿都神清气爽的人是父母。

那个娶了媳妇忘了娘、嫁了老公忘了爹的人是儿女，那个为儿女操了一辈子心、老了还帮儿女带小孩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以自我为中心、从不把家人太当回事的人是儿女，那个从不把自己当回事，却总以子女为荣四处炫耀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喜欢把爱挂在嘴边，却很少付出行动的人是儿女，那个从不把爱说出口，却将爱播撒于生活每一块土壤中的人是父母。

或许，只有等到儿女也成了父母、父母慢慢变老时，我们才会回忆起生活里这些点点滴滴，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爱。

看了这篇文章，很多人就在想，我们既是此文中的父母，又是此文中的儿女。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可是，我们很多人已经养了儿，又何尝知道父母恩了呢？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照顾得是无微不至、有求必应，但是对父母却是不理不睬、不闻不问。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恩德最大、付出最多、最

无私无求、无怨无悔的人是谁？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对谁最冷漠，对谁说话最没有耐心、最不客气、最没有礼貌？也是我们的父母。现在的人确实都活得颠倒了。自然界的禽兽之中，羔羊尚有跪乳之恩，乌鸦尚有反哺之情。很小的时候，小乌鸦不会飞，老乌鸦到处去觅食来喂养这个小乌鸦。等老乌鸦老的时候飞不动了，小乌鸦也会四处去觅食来反哺老乌鸦。乌鸦都有反哺之情，羔羊都有跪乳之恩，那我们作为一个人，不孝敬父母，确实是连禽兽都不如！

“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在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我们做了很多伤天害理、悖德悖理的事，自己还不知不觉，还自以为是、妄自尊大。学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连做人起码的资格都不够！想一想儿女对我们的态度，再想一想我们对父母的态度，其中的原因就一清二楚了。孩子对父母说话的那一个不耐烦，那一种爱答不理，和我们对父母说话的那种不耐烦、爱答不理，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教儿教女先教自己。

父母对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非常的在意。比如，我们偶尔说了一句话，“好久都没有吃什么菜了”，结果下次回家的时候，那道自己喜欢吃的菜就被父母端到了桌子上。父母的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儿女。但是儿女回馈他们的是什么呢？是不耐烦，是厉声厉色。

古人把孝顺父母的人称为“孝子”，而我们现在的“孝子”成了什么？“孝顺儿子”、“孝顺孙子”。有的人说得更好，他说：“有的人哪，有了儿他就成了儿，有了孙儿他就成了孙儿。”这还能把孩子教导好吗？有了儿之后，自己是做父亲、做母亲的。有了孙儿，自己是做爷爷、做奶奶的。但是，我们没有走到做爷爷奶奶、做父母的道上，而是颠倒了位置。结果，孩子就教成了“小

公主”、“小皇帝”。

所以，“诸事不顺因不孝”，所有的事情不顺利，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没有孝心，不知恩报恩导致的。一个人不知恩报恩，他就会以利害的原则和人相处，他所感召的朋友也是“志同道合”的人。《易经》就讲了这样的道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就是说，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所感召的就是和你有同样志趣的人。假如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是以功利心和人相处，你感召的朋友也是同样的人，做事怎么可能顺利？

这个“教”字就是告诉我们，身教胜于言教。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就是把《弟子规》引入到了他们对服刑人员的教导之中，使得服刑人员的行为有了很大改善。为什么有这种效果呢？就是因为他们原来的局长——张发局长，带着他们的民警首先来参加传统文化的学习，教育者先受教育，最后感化了这些服刑人员，使他们的行为有了很多的改善。

“言教者讼，身教者从。”我们用言语去教导他，他就会跟你起争执，说“你都没有做好，有什么资格说我”。这就是孩子之所以有逆反心理的原因。你觉得孩子长到十四五岁了，他的逆反期要到了，结果心想事成，果然孩子就逆反了。其实，孩子逆反是有原因的。小的时候，你告诉他去做什么，但是你自己都没有做到。他不去做，你就打他一顿、骂他一顿。他迫于你身体比他强壮，不得不服从你的教导。但是随着他身体一天天成长，日渐长大，家长都没有做到还让孩子去做，他心里就起逆反了：你都没有做到，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他看到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没有符合《弟子规》的要求，那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去学《弟子规》呢？如果你从早到晚的言行举止记录下来都符合《弟子规》的要求，你不用说一句话，孩子对你就很佩服，就会跟着你去做正确的事了。

所以“教”字就告诉我们，“身教”加“耐心”，就可以把孩子教导好，把学生教导好，把下属也教导好。

三、礼乐：点滴教化

《孝经》上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古人对于礼乐的教化作用非常的看重。

（一）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记》上就有这样一段话：“夫礼者，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是干什么的呢？先王用它来承顺天地自然的规律，来调治人的性情。所以，失去礼的人就会死，得到礼的人就会生。这就是讲“礼”对于我们的人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礼记》上还把“礼”比作水的堤防。如果认为堤防没有用把它废弃，就会导致洪水的泛滥。如果认为旧的礼仪没有用，也会导致社会灾祸的产生。“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斗争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侵袭之败起矣。”意思是说，假若把婚姻的礼给废除了，夫妇相处之道没有了，痛苦就产生了，淫乱邪僻的罪行也就跟着多了起来；乡饮酒之礼废除了，长辈和晚辈的次序就失去了，那么争斗的刑事案件也就越来越多；丧礼和祭礼废

除了，臣下还有子女的恩义就越来越淡薄，背叛死者忘记生者这样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聘觐之礼废除了，君与臣错位了，结果那些臣子背叛、侵袭君位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礼”如此的重要呢？因为“礼”也是在点点滴滴中起到教育的作用。

1. 传统婚礼的意义

古代很重视婚姻之礼。娶亲之前，男方三天不奏乐，女方三日不熄灯。为什么呢？就是在结婚之前抓紧时间教育儿女怎样去为人夫、为人妇，怎样承担起家庭的职责。当然，这并不是所谓的“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其实，在平时父母的言行举止之中都给他们表演出来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妻子了。到了结婚之前的三天，还要抓紧时间集中地进行教导，耳提面命。

在迎娶之日，丈夫要去迎娶妻子之前，首先要祭拜天地。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婚姻大事不仅仅关系到两个人、两个家族的命运，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天下的太平。所以礼节非常的慎重，也表达了要把家庭维持好、把儿女教导好、能够使社会和谐这样的存心。

结婚当天，很不一样的是，儿子要接受父亲的敬酒，而且儿子不用回礼。父亲是代祖宗给儿子敬酒，意思是说，从今以后，祭祀祖先的责任、家庭的德风就要由你来承担了。所以，平时的时候都是儿子给父亲敬酒，而这一天父亲给儿子敬酒。

到了女方的家庭，女方的父母对新郎官非常的尊敬，而且是亲手把自己的女儿交到新郎的手上，意思是说，从此我们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新郎和新娘要跪拜父母，新郎要感恩岳父岳母给自己培养了一个这样贤良的妻子。从岳父岳母的手中接过了新娘，新郎心里这种责任感也就提起来了。婚礼的每一个细节，都提起

一个人的责任感，提起一个人的正念。

新娘要上花轿的时候，要把她的香扇从轿子里扔出去。什么意思呢？因为以前在家的时候是千金小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倍受父母的关爱，天气热了可以拿着扇子扇一扇。但是，今天你为人妻，要成家立业了，就不能再有小姐的习气了，随着这个花扇一扔，把千金小姐的作风也随之给扔出去了。

到了夫家，礼节也很有意义，公公婆婆是站在客人的位置上，而把这个媳妇从主人的位置上迎上来。意思是说，从此之后，我们这个家就交给你了，你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了，家道的兴衰就靠你们来承担了。

新婚夫妇要喝交杯酒，喝交杯酒的时候，是把葫芦瓜切成两半。葫芦瓜的丝是苦的，里面装的酒是甜的。意思就是，从此以后，夫妻两个人就要同甘共苦。而且葫芦瓜是一个整体切成了两半，意思是说，“夫妇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夫妻两个人本是一体，不分彼此，不要互相地计较。礼成之后，葫芦可能还会挂在那儿留作纪念，提醒成家的初心，就是要“同甘共苦，白头偕老”。

所以，婚姻礼节的每一个步骤，全都是提起一个人的责任感、一个人的正知正念。这就是古代婚姻之礼，它会使丈夫有恩义、有情义、有道义，使妻子很有德行。可惜的是，这么好的礼节到现在都没有了。我们看到了古圣先贤的良苦用心，但是我们后人却没有理解、没有承传。我们不仅不愧疚，甚至还在妄加批判祖宗。这就等于坐在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不但不感恩戴德，还拿着斧子拼命地要把大树给砍倒，没有比这更折福的行为了。

2. 读书人的道义

宋代有一个读书人叫刘庭式，他和邻居家的女子订了婚，订婚之后并没有行婚礼，就去上了太学，读了太学又考中了进士。五年

之后，等他回来的时候，邻居家的女子却双目失明了，而且她家也衰落了。但是，刘庭式还是决定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把这个女子迎娶过来。女子的家人就说了：“我们的女儿现在已经双目失明，怎么能够再嫁给您作‘箕帚妾’（就是做正配夫人）呢？”你看，古代的人他念念地想着对方的利益，而不是自私自利。女子家人想到：自己的女儿是一个残废的人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况且对方衣锦还乡，又享有高官厚禄。但刘庭式却坚持说：“我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不能够违背道义、违背良心。”所以，他还是坚持娶了邻家女子过门。这个女子过门之后，为他生育了两个儿子。

后来，刘庭式到高密去担任通守，就是太守的助理、助手，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得了病过世了。刘庭式感到很哀痛，哭得很伤心。当时的太守苏轼看到之后就劝导他：“我听说人是因为喜欢美色才产生情爱，有了情爱才会有哀痛的感受。而你的妻子又不是一个美人，而且还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你有什么哀痛可言？”刘庭式说：“我哀痛的只是我丧失了自己的妻子，并没有想到她的双目是失明的。我所痛苦的，是因为我丧失了和我同甘共苦、筚路蓝缕的妻子。如果说因人有美色才生起情爱，因为情爱才有哀伤，那么你看集市上有风尘女子，每一天都挥着袖子对你献媚，诱惑你，她们每一个人都长得很美，那是不是她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你的妻子呢？”苏轼听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惭愧，也非常的感佩刘庭式的德行。后来刘庭式的两个儿子也都中了进士，非常的显达。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刘庭式讲道义，他的妻子嫁过来之后一定要报答他的这份恩情，一定会非常用心地相夫教子，因此将儿子教育得很好、很成才。

我们看了古圣先贤这样讲道义的故事，确实是非常感动。而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婚姻之

礼的教导，读书人才有这种正气。

（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礼记》上说：“先王之制礼乐，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意思是说，先王制礼作乐的目的，并不是要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培养出正确的好恶观，返回到人道的正路上来。所以，音乐并不是为了娱乐这种单纯的目的，它也起到了教化人心的作用。

《孝经》上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老夫子到了一个地方，还没有问这个地方的政事办得如何，只是听一听此地的音乐，他就能判断出这个地方的民风如何了。《论语》上讲：“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是，礼啊，礼啊，难道就是呈献玉帛这个仪式吗？乐啊，乐啊，难道就是敲钟打鼓吗？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搞文化，文化就是唱歌跳舞吗？自从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以后，要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于是电影、电视就把那些地方的歌舞全都搬上了银幕，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摄影的社团、绘画的兴趣小组，以为仅是这样就是搞文化建设了。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它是道德，它具有培养起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容。

《吕氏春秋》有这样一段话：“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这句话揭示了音乐与风俗的关系。乱世的音乐，演奏木制、革制乐器的声音就像打雷，演奏铜制、石制乐器的声音就像雷霆震怒，演奏丝竹器之类的歌舞

音乐就像大嚷大叫，这样的噪响用来惊骇人们的精神、震动人们的耳目、动摇放荡人们的性情倒是可以办到的，但以此为礼乐绝对不可能给人带来欢乐。所以，音乐越是奢华放纵，民众就越是抑郁，国家就越是混乱，君主的地位就越是卑下，也就失去了音乐的本来面目了。

所以说，音乐歌舞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耳目口腹的欲望，而是要教导人们培养起平和的性情，唤起人们孝悌廉耻的意识。《礼记》记载着关于音乐和政事相通的论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世的音乐安详而愉快，因为它的政治祥和；乱世的音乐哀怨而愤恨，因为它的政治不和谐；亡国的音乐哀痛而愁思，因为属地的百姓过着流离的贫困生活。这就是告诉我们，音乐和政事是相通的。所以古圣先贤看到一个地方流行什么音乐，就能判断出这个地方的风气如何、政事办得如何。

由此可知，礼乐的确能起到调治人的性情、宣讲道德仁义的作用，并不是娱乐至上的。

四、艺术：寓教于美

中国古代的文艺无一不是教育。

（一）建筑

中国古代承担着教育意义的建筑有三种。

第一种建筑是祠堂，它教导人孝道。中国人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谨慎地办理丧事，追奠亡故的先人，民风就归于淳厚了。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的祖先都念念不忘，想着去祭祀的话，对于眼前的父母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啊！他不可能一面去祭祀祖先，一面又打爹骂娘，这是于情于理都不符合的。所以，祭祀祖先培养了一个人深厚的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

在古代的时候，每一个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祠堂，祠堂里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每到祭祀祖先的时候，就是教育的机会。祭祀时，会把全家族的人召集在祠堂里，宣讲祖先的德行：我们家在哪朝哪代出了哪一位有德行的人，他有什么德行后人可以效仿，对国家有什么贡献。这就提起了后代子孙的责任感。因为，你作为他们的后代子孙，言行举止如果不谨慎，会给祖宗的脸上抹黑。所以说，祠堂教导人们孝道。

第二是孔庙，教导人们尊师重道。中国人祭祀孔子由来已久，把孔子的塑像摆在那里供人瞻仰、礼拜。为什么这样做呢？第一，就是见贤思齐。看到孔子像，就想到孔老夫子的教诲。第二，就是要纪念老师，不能够忘本。

第三是城隍庙。城隍庙里供的是十殿阎罗，讲的是因果。它教导我们，做了什么坏事就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过去，每年到二月二的时候要逛庙会，庙会里边有好吃的、好玩的，孩子们爱去逛庙会。逛完了之后，父母就带着孩子去看一看供着十殿阎罗的城隍庙。里面会告诉你，偷盗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邪淫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等等。只要是不符合道德的事，在这里都能看到相应的惩罚。孩子看到之后会印象深刻，他一生就不敢做那些过恶的事情。

所以，这三种建筑物都是承担着伦理道德教育的职责。

（二）雕塑

除此之外，还有雕塑。比如说，寺院里供奉的四尊天王。

东方是持国天王，他教导我们怎样把国家治理好，让社会和谐，教导我们负责尽职。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个工作，每一个人负责尽职地把自己的本分尽到了，这个社会就和谐了。他手里拿着一个琵琶，告诉我们处事要取中道，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这样才能够把人际关系处理好，才能够负责尽职地完成任

务。南方是增长天王，他手上拿着一把剑，代表智慧。“增长”就是要求进步，但是必须有智慧才能求得真正的进步，否则会南辕北辙，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远。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无事不登三宝殿”。意思是说，没有重大的、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不会轻易地跋山涉水到寺院里去求教高僧。“三宝”就是代表了“佛、法、僧”。“三宝殿”代表了佛教的寺院。那为什么“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古人认为，僧人的智慧很高，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跋山涉水地向他请教。这也说明，古代的出家人都是德行、学问很好的人，他可以做社会大众的表率。

在顺治皇帝之前，一个人要想出家那不是容易的事。他在世间的学问要拿到进士，也就是我们的博士学位，才可以出家。大家想一下，出家必须拿到进士的学位，那得对儒家的经典非常通达才可以。不仅如此，他还要能够讲经说法。这样的人国家发给你一个度牒，才成为正式的出家人。后来顺治皇帝要出家，可能又不具备这个资格，或者他觉得出家是一件好事，不要给大家这么多的限制，所以就把这个条件给废除了。结果，他是以好心做

了坏事，后世有很多人确实是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去出家，这使得出家人的素质一落千丈，让人们对于佛教生不起信心了。他的这个举动也受到了后代人的一些批判。

增长天王手里拿着剑，代表了智慧。也就是说，唯有真正的智慧，才能求得学识、德行，还有生活品质的增长。

西方是广目天王，北方是多闻天王。广目天王身上缠着一条龙或者一条蛇，代表了变化多端的事物，告诉你，要去广学多闻，但是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因为社会的现象是与时俱进的、千奇百怪的、变化莫测的，要抓住事物的发展规律。他的一只手拿着珠子，代表了以不变应万变。多闻天王手里拿着一把伞，“伞”代表了遮蔽污染，意思是说，不要好的也学、不好的也学，不懂得遮蔽污染就错了。

所以，这四尊塑像摆在那里不仅仅是供人顶礼膜拜的，而是从他们身上来反省自己，我这一天是不是负责尽职地把本分做好了？是不是在求进步？是不是每一天都在广学多闻？如果我们明白其中的意思，别人一句话不用说，自己在这个大殿走上一圈，就已经受到了教育。

因此说，佛教是教育，它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学，并不是迷信，也不是宗教。可惜的是，从嘉庆皇帝以后，这个教育的本质越来越模糊，最后沦落到了宗教和迷信的境地。比如，有一些领导会带了很多钱去五台山供养，花了很多的钱，供了很多的水果，以为这样做佛菩萨就可以保佑他了，回来之后仍然做着违法乱纪的事、贪污受贿的事，最后被抓了起来，还埋怨说佛菩萨不灵。这并不是佛菩萨不灵，而是你把教育变成了迷信。如果对佛菩萨你供他水果他就保佑你，我没有供水果他就不保佑我，那佛菩萨岂不是连世间的正人君子都不如了吗？世间的正人君子都不会接受别人的贿赂，那我

们以这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些佛菩萨，本身已经是亵渎了，怎么会得到保佑呢？所以说雕塑起到的是教育的作用。

儒家讲“知行合一”，佛家讲“解行相应”，都是告诉我们，要把所学的东西落实在生活当中，这才叫“真学问”。能说不能行，不是真学问。“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那么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要把自己所学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的道德修养不断地提升。这样的话，教育的目的才能达到。

完美的艺术作品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如果文学、歌舞中没有善，那不是最高的、完美的文学艺术作品。诗词、歌舞、戏剧、小说都应该秉持孔老夫子的“思无邪”的理念，不要引起人们邪曲不正的思想，都要以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所谓的“俗文化”，并不是代表内容上的低级趣味，而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以快板、相声、京剧、昆曲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讲我们的道德观，使人看了这个文学艺术作品，看了这个诗词歌舞、戏剧小说之后，能够改变自己的气质。比如，人们听了这首歌，从没有孝心变得有孝心了，从不知道感恩变得懂得感恩了，从对人处处求全责备、很挑剔变得胸怀宽广了，这样，艺术作品的目的才达到了。

所以，只有我们的艺术作品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样的效果，文化的软实力才能够通过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精神修养来为社会和谐作出贡献，以文化强国的目的才能够真正达到，这才是我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所在。

第四讲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也引起了有关人士的重视。人们想方设法地要解决好这些问题，使大家过上一个安定幸福的生活，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搬到中国来，这些问题才能够得以根本解决。但是由于这种观点忽视了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所以搬到中国之后也只是产生了“异体移植”的弊端，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三个问题。

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并不仅仅是靠民主政治来达到的，

其实它也很重视人心的治理、道德的教育。比如说分析社会腐败问题，我们可以从“因——缘——果”的角度来看。腐败是结果，它必须有因缘才能导致这个结果。它的“因”就是领导者的私欲膨胀，有腐朽的观念、腐败的思想。它的“缘”就是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所以，有因、有缘才有腐败结果的产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事情产生发展的一种解释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领导者的私欲膨胀和腐朽的观念、腐败的思想是内因，法制的健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是腐败产生的外因。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还是中国传统的这些解释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理论，都认为内因是事物产生发展的基础，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只是事物产生发展的条件。所以，要根除腐败，必须要根除人们的自私自利观念和产生腐败的这些腐朽的观念。

那么我们看，这一个观点适合于中国，是不是对西方就不适合了呢？西方的民主法制观念及政治思想维护的是程序的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诚实守信、正义的品德是由宗教的教育培养起来的。所以，西方社会得以稳定的两个因素，一是民主法制的制度建设，一是宗教教育。然而，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忽视了西方宗教教育的传统。我们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民主法制搬过来，我们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事实并非如此。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一规律不仅在中国古代适用，在中国的现代也适用。不仅在中国适用，在西方也同样适用。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能人现象”。什么是“能人现象”呢？比如说，这个企业眼看着要倒闭了，换了一个总经理、董事长，企业就扭亏为盈。人们认为这个人很有能力，所以把这

样的人称为“能人”。其实，我们现在反观这一现象的时候，会发现“能人”不仅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首先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用手中的权力去以权谋私，把国有资产化为私有，中饱私囊。所以，“德”是“能”的前提，才可能出现“能人现象”，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认识的。

现代西方有一位美德伦理学家叫麦因泰尔，他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叫《追寻美德》，另一本书叫《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麦因泰尔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是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来批判西方社会过度地重视正义的程序、规则的设计而忽视了个体的美德培养的倾向。在《追寻美德》这本书中他这样说道：“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的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还写道：“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可能发挥作用。”这本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对重视程序的正义、公平正义这些规则的设计者给予了批判，让他们重新反思，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这些规则也不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类似的观点早在几千年前的《荀子》上就有（在《群书治要》中，《荀子》被称为《孙卿子》）。在《荀子》这本书中这样写道：“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意思是说，礼法制度、规则等等不能够独立地存在，有了有美德的人才能够发挥作用，如果失去了君子、圣贤人，这些礼法制度就不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在夏朝的时候，夏禹的礼法制度并没有消失，但是夏禹的子孙并没有世代地按着这个礼法制度去做，没有成为像禹那样有德行的人，夏桀王就荒淫奢侈、不务正业，最后夏朝也灭亡了。荀子接着说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礼法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而君子、圣贤人才

是法律的根源。这些礼法制度、规则都是君子、圣贤制订出来的，君子、圣贤在实施法律的时候能够公平合理，这些礼法制度才能够得以应用。“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所以，有了君子、圣贤人，法律虽然很简单，也足以使国家得到普遍的治理，人们可以普遍地得到恩惠。如果没有了君子、圣贤人，纵然法律的制度设计得很完美，也会导致国家混乱。

在《列子》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楚庄王向詹何请教怎样治国，詹何说：“为什么你知道怎样修身，却不知道如何治国呢？”楚庄王很诚恳地说：“我得以事奉宗庙、祭祀宗庙（这是委婉的说法，意思是得以成为君主），我希望得到好的治国之法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安定，把这个国家守护好。”詹何说：“我没有听说过一个君主修身很好国家却混乱的，也没有听说过君主修身不好而这个国家能够安定的。所以根本的根本在于自身的修养，我不敢用治国这些枝节小事来回答您。”意思是说，君主想把国家治理好，首先自己得是一个有德行的君主，否则的话就不要去谈治国了。楚庄王听了他的回答，就说“善”，你回答得很好。这是告诉我们，有了圣贤、君子、有德行的人，法制即使不是很完善，也不会导致混乱的产生。

所以《荀子》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明智的君主急于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而昏暗的君主急于得到势力。急于得到人才的人，他自身很安逸，国家能够得到治理，他的功绩伟大，声名也可以传播，有美誉。就像我们古代的神王尧、舜、禹、汤，他们都是以得人为最重要的事，所以最后取得的效果就是垂拱而治。急于得到权

势的人，他自身很劳苦，国家也治理不好、很混乱，他的名声也被辱没了。

这段话实际上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麦因泰尔的见地。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并不是不重视制度的建设，而是认为，即使有了好的制度，如果没有有道德的君子、圣贤，也不能够把这个制度实施好。所以，在《傅子》上又有这样一句话：“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会顺着好的法制然后才能够得到大治，使国家安定，所以好的法制确实很重要。但是并不是说，你有了好的法律制度就一定能够自行地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还必须有德才兼备的人把法制实施好。

这就告诉我们，仅仅重视制度的改革，也就是说你仅仅把西方的民主政治搬过来，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人是一个好的人，社会才得以安定。所以中国古人的制度设计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好人、如何把好人选拔到合适的领导位置上来设计的，所以被称为“圣贤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有一位法官叫勒纳德·汉德，他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我总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求助于宪法、法律、法院、法官来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反复地告诫你们，这么做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义在人们的心中死去，宪法、法律、法院、法官谁也救不了他。”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没有了公平正义的道德，那法官也会因为你给我贿赂我就偏向于你，你是权贵我就给你减轻一点刑罚。后果则是，即使这个法制很完善，那么法制的完善、程序的公平也只能成为人们明目张胆地腐败、受贿的保护伞。

现在我们都知道，国家越来越重视程序的公平，但是在下面

的一些官员却说，这些改革并没有让人们更加的廉洁，反而让人们在一个貌似公平的程序之下干着更加腐败的事情。这就是告诉我们，人的问题不解决，即使制度问题解决了，也不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只重视政治制度的改革，忽视了道德教育的制度建设，忽视了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还容易导致以下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无法防范于未然

中国古人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仪道德的教化可以防患于未然，但是法律的制裁是等消极结果已经产生了，才给以事后的补救和惩罚，结果已经无可挽回。

《鹑冠子》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魏文侯向扁鹊请教：“听说你们兄弟三人都是医生，那么你们三个人哪一个人医术最高明呢？”扁鹊回答说：“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病情隐伏未发的时候就可以给以对治，他的名声不出于这个病人之家。我的二哥医术其次，他是在病情刚刚有了一点微小症状的时候就给以对治，他的名声不出于这个病人的巷子。至于我，是在这个人的病势已经很重的时候，我把他的肌肤割开，给他吃上一些有副作用的药，做了很多大手术，最后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大家听了之后就非常的赞叹，说我可以起死复生、妙手回春，所以我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诸侯国。”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了解到，为什么现在西医的影响超过了中医？为什么现在西方管理方式的影响超过了中国的管理方式？中医上有一句话说：“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高明的医生都是防患于未然，按着自然节律、饮食起居教给人养生之道。

古人说，不仅一年有四季，一天也有四季。一天的春是从早晨三点钟开始的，三点钟是立春，春天主生发。意思是说，三点钟春天已经来了，我们就可以起床读书、活动了。五点钟是一天的惊蛰。惊蛰是小动物经过冬眠要恢复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起身锻炼一下身体，比如说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这些古老的养生方式都是内壮法，它强壮的是内在的五脏六腑，而不仅仅是外在的骨骼肌肉。经过锻炼之后，一身血脉畅通，整天精神都很好。六点钟是一天的春分，春天的一半就要过去了，所以最迟也不能超过六点钟起床。否则，你没有赶上春天的生发季节，春天生得不好，夏天长得就不会很茂盛。

古人的这种养生方式一直到民国初年都保持着。特别是在清朝的时候，清朝的皇太子，早晨三四点钟太监就在门外叫他了，说“鸡鸣即起，勤政爱民”，三四点钟就要起床，锻炼身体、读书了。自从民国以后，我们为了向西方学习，和国际接轨，做了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上学、上班、起床的时间越来越靠后了。你说让一个人早晨三点钟起来读书，他觉得是天方夜谭。这叫什么？这就叫“积非成是”，把错误的积累多了，人们认为错误的是正常的，反而把正常的认为是不正常的了。

上午的三点钟到九点钟是春天，九点钟到下午的三点钟是夏天，夏天主生长。下午的三点钟到晚上九点钟是秋天，秋天主收，有收获也有收藏的意思，这个时候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否则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最好的休息时间就是晚上的九点钟到早晨的三点钟。特别是十一点到一点，是一天的子时、一天的寒冬，这个时候你还不睡觉，还很精神，就等于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出现在寒冬腊月。

所以，扁鹊的大哥可能经常给人家讲这些养生之道，按照自

然节律饮食起居，人一生基本上不得病。

在我们的《礼记·月令》（月令就是指每一个月当行之令）中就记载着吃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农作物最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其中告诉我们，要吃当地的、当季的，甚至都是方圆三十里之内的蔬菜、水果、农作物，这才最有利于我们的健康。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而我们现在不学习传统文化，不明了这些养生的道理，花着很昂贵的代价去吃进口的水果、进口的食物，反而对于我们的健康没有益处，因为那个东西是养那一方人的。而且现在转基因食品影响很大，对人的身体有很严重的危害。转基因食品在西方受到排斥，我们却把它当成新的科技来引入，不仅危害土地的种植能力，而且危害人体的健康，甚至危害后代子孙。这都是因为没有学习传统文化所导致的结果。

这是扁鹊的大哥，他讲养生之道。

扁鹊的二哥是在病刚刚有一个微小的症状时就给病人以建议，比如告诉他一些保健的方法，改变他的不良生活习惯。譬如说，我们早晨应该吃得好，中午应该吃得饱，晚上应该吃得少，这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才是有利的。但是我们现在却恰恰相反。因为早晨要去上班，上班的地方又很远，起来之后匆匆忙忙吃了一口饭就走了。中午在单位，可能将就吃份盒饭就过去了。把大量的应酬安排在晚上，最后喝了很多的酒、吃了很多的肉，没过几个小时就去上床睡觉。诸位朋友，我们想象一下，酒肉混在一起，在夏天的常温之下搁上几个小时都会腐烂变味，结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吃到肠胃里就上床睡觉，当我们睡觉的时候肠胃就不活动、不工作了，把这些鱼肉放在三十六度的高温之下，能够不腐烂变味吗？鱼肉在肠胃里变味，毒素就向全身扩散，人的身体怎么好得了呢？第二天早晨起来一打饱嗝，气味都很难闻，这都是原

因的。所以，中国人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高明的治理方法是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禁于已然之后。

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叫安然的能源公司破产了。2001年的时候，安然公司是“世界五百强”的第七位，公司的营业额有上千亿美元。为什么效益这样好、排名世界第七的上市公司说破产就破产了呢？

西方的分配制度，在现在一般人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公司的CEO的收益和整个公司的效益是密切挂钩的，也就是说，公司能够有好的效益，股票不断地上涨，营业额上涨，CEO的工资也随着上涨。但是，当公司没有收益的时候，股票就不能够上涨，股票不能够上涨就会影响CEO的收入。营业额没有上涨，它的股票没有上升，怎么办呢？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不受损失，公司没有营业额就要创造营业额，所以他们就请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制造假账。

很多人说，他们的法制这么健全，这个事务所的人收入也很高，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给他们做假账呢？那是因为安然公司是以每周一百万美元的代价来请这个公司给它做假账。所以人在这么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把持不住，结果就被诱惑了，帮它做假账。在几年的时间里，安然公司做了六亿美元的假账，掩盖了二十九亿美元的负债。最后他们董事会的二十九个成员因为持有一百七十三万股的安然公司的股票，获益十一亿美元。

诸位朋友，十一亿美元让二十九个人分，多不多呀？确实很多，诱惑很大！但是安然公司破产以后，他的CEO被判处有期徒刑长达一百六十五年。而它的一个董事会的成员刚买了一辆豪华轿车，还没等享用，事情就败露了，最后被迫在豪华轿车里开枪自杀。这十一亿美元他们也没有享用！

那么很多人就说，这是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而且美国的公司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利令智昏”。在利益的面前人们失去了道德，昏头昏脑，最后就做出了这样不理智的行为。事情败露之后，安然公司宣布破产，这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毁于一旦。所以，安然公司的破产被誉为美国经济界的“九一一”事件。并不是因为安然公司所做的假账数额最为巨大，而是因为安然公司破产以后，引发了美国政府调查各大跨国企业做假账的情形。结果，不调查不要紧，一调查吓一跳，各大跨国企业都有做巨额假账的经历。比如说，世通公司作为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它在一年零一个季度之内就做了三十八亿美元的假账。而另一家著名的国际企业，在五年之内做了六十亿美元的假账。2002年美国发布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各大企业因为这些假账给美国政府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两千亿美元。

所以，我们就此明白，美国之所以会出现金融危机，绝对不是偶然的。正如温总理讲话中所提到的，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人的道德的危机。金融危机是由于人们的贪欲、人们的不诚信导致的，所以要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出来，也不是有一两个政策就可以解决的。

在安然公司破产以后，有一位美国著名商学院的院长到中国访问。人们向他提问，安然公司破产之后美国的企业经营理念有什么变化吗？他说：“有啊，确实有变化。”以前的企业经营理念叫“TQM”（TotalQualityManagement），即“全面的品质管理”。企业认为只要我的产品过关、质量有保证，就可以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安然公司的破产让他们认识到，只要他们的企业之中有一两个人道德败坏、以权谋私，就可以使这个企业毁于一旦。所以他们的管理，从“TQM”变成了“TEM”

(TotalEthicalManagement)，即“全面的伦理道德的管理”。所以，现在的企业伦理学在西方非常的热门。大家为什么去选这个课呢？很遗憾，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而是为了看一看自己怎么样做才不违犯法律，才能够钻法律的空子，才是法律所允许的。虽然人们有了这个观念的改变，但是自私自利的心没有改变，所以收效也甚微。

安然公司的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虽然法律可以把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人抓进监狱给以制裁，但是一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却无法挽回了。制度的建设对于防患于未然来说，它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二) 免而无耻

如果我们只重视制度的改革而忽视了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就会导致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

“反社会行为”在西方称为“Anti-socialBehavior”。就是这些行为并没有触犯法律，法律也管辖不到，但并不是一个和谐社会所应有的行为。比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等等。这些事情还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那么，这些是可以通过制度的建设解决的吗？

中国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想达到社会和谐、世界和谐，那是治国、平天下的层次。应该从哪里做起呢？每一个家庭、企业、单位的和谐，彼此团结互助，才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可是我们看，诸多的家庭都破裂了，也就是说，社会的很多基本细胞都破碎了，这个社会还能够不出现问题吗？就像我们身体上

有一两个细胞破碎了，可能对整个身体的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诸多的细胞都破碎了，难道对整个身体的健康没有影响吗？家庭的破碎是因为夫妻两个人为了自己的喜好，不顾孩子的教育，说离婚就离婚，可能早晨去领的结婚证，下午就去办离婚手续，这样的不负责任。孩子由于没有人教育，从小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对社会充满了敌意、充满了冷漠。有一位司法部门的领导曾说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青少年犯罪来自于不健全的家庭！这就告诉我们，要想让家庭美满、儿女教育得好，修身是最关键的。这就是《大学》上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如果人的良心都泯灭了，为了自己利益的满足不择手段，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对他有作用呢？所以孔老夫子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用政令制度来引导人们，他触犯了法律，就给他以刑罚的处罚。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人们因为惧怕你的处罚而免于去做坏事，但是人们却没有羞耻心，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地避免法律的制裁，认为自己很有聪明智慧。

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也很难安定。所以《盐铁论》上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的制裁可以处罚人，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有廉洁不贪之心。法律的制裁也能够杀人，但是不能够培养起人的仁爱之心。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小悦悦”现象、老人倒地没有人扶的现象，人们可能认为还是法律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的。这类事件的发生，虽然说明法律监督机制、社会舆论确实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是关键还是因为人没有了羞耻心、没有了仁爱心。

在《淮南子》上也有一段类似的说法：“民无廉耻，不可治

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如果人们没有廉耻之心，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如果我们不修明礼义，人们的廉耻感也树立不起来。“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如果人们都没有了礼义道德，即使有法律，也不能够端正人们的行为。“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如果我们不崇尚道德、崇尚善举，废除那些不好的陋习、风尚，人们就不会向往礼义。所以，“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并不是说制度建设、公平正义不重要，没有法律制度是不可以治理天下的。但是，如果人不知礼义，也不能够把这个法实施到位。“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法律能够把不孝的人给处死。（古代讲：“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在唐朝的时候有明文规定，如果这个人打骂祖父母、对父母违逆，那是要处以极刑的。）虽然你可以把这些不孝的人处以极刑，但是你不能够使人有孔子和曾子那样的品行。法律也可以把盗窃的人处以刑罚，但是却不能够使人培养出像伯夷那样的廉洁正直的品行。“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孔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尊敬长官，说话有文采、有礼貌，言行都是世间的表率，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教育呀！

这一段话就把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有了好的法律，也不可能自动地发挥作用，还需要有礼义道德的人去执行才可以。

《汉书》里也提到，如果你只重视法律的严苛，而忽视了道德的教育，会导致什么情形呢？那就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法令一颁布，奸巧的行为就出现了，命令一下来，欺诈行为也就随之而来，就像

想用热水来浇灭沸腾的水、用柴火来灭火一样，只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于事无补。这就是告诉我们，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也需要重视人道德的培养。

（三）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如果我们只是重视了制度的建设、法律的健全，忽视了人的道德，那就会出现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的情形。比如说，我们的法律健全了，监督机制也完善了，人只要一犯罪，他贪污腐败了，就把他抓起来关进监狱。诸位朋友，请问我们抓得过来吗？即使这些人都被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互相学习、互相探讨，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被放回到社会的时候仍然会危害人群。

有一次在开国际会议的时候，有一位西方的学者，是一位女士，很了不起，她专门研究传统文化。她说，你们不要盲目地向我们西方学习，其实我们西方国家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理想，我们现在还恰恰出现了你们几千年前的老子所描述的情形。什么情形呢？那就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我们的法律条款一天比一天更细致、更具体、更严密，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因此更加和谐安定，相反，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却越来越多。

我们中国古人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的是人的品行的提高。在《袁子正书》上就说道：“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如果你不能制止人民作恶的、作奸犯科的心，只是以刀锯在外部去禁止，就是你每一天在街市上行刑，也不能够把作奸犯科的事

给制止。

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家麦因泰尔在他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这本书中也提到，我们现在过分地强调制度的建设和规则的设计，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请问你讲的这个正义是谁之正义呢？这样就忽视了主体，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以，他强调伦理学的任务不仅仅是设计规则，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美德。他呼唤伦理学要回归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关注人美德的培养。

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社会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理，关键在于人心。如果人丧失了伦理道德，没有了羞耻心，做什么事都无所谓，那么再好的制度对他来说也都是无能为力的。

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一）圣贤教育，导正人心

圣贤教育对于导正人心的作用，古人说得很明确，对此也非常有信心。在《群书治要·汉书》上就有这样一段话：“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也就是说，国家应该设立太学，就是在京都里设置学校，在地方乡镇也要设立给人们以伦理道德教化的学校。大家所听的都是德音雅乐，没有淫词歌舞，彼此之间都是以礼相待，就是以礼来治天下。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比如说，人与人之间见面鞠一个躬，行九十度的标准礼。当这个躬鞠下去的时候，首先折服了一个人的傲慢之心。另外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本来彼此有隔阂、有意见，结果见面之后把这个躬鞠下去了，内心的矛盾也由此化解了。所以，鞠躬有很多的好处。

在汉代和唐朝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到众多的周边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到中国来朝贡，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彬彬有礼，相处得很和乐，他们很羡慕、很向往，回去就向自己的国君禀报，这些国君听了也很佩服，把中国的皇帝尊称为“天可汗”，就是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所以，中国在历史上的强大绝对不只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大，而是礼仪、文化让人们对它很尊敬。

所以，如果我们兴起这种礼让之风，每一个人听的都是德音雅乐，“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国家还治理不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于礼乐的教育信心十足，而且相信只要按照这样的礼乐教化去做，领导者率先来实行，国家一定能够得到治理。

在《汉书》上，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圣明的君主应该承顺天道来治理国家，所以他一定是更加重视道德的教化而对刑罚很省略。但现在却不是这样，现在是“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现在废除了先王的道德教育，仅仅用那些执法之吏来治理人民，人们只要犯法就被抓起来严厉地惩罚，这样还想德风普遍地泽化天下，是很难达到的。

这里提出了天道。我们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好生之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仁爱之心，“仁者爱人”。上天是好生而恶

杀的。所以顺着这种天道来行事，应该首先兴起教化之风。但是现在却废除了德教，那些能够抓黑社会的人、执法之吏被认为很有能耐，而一般的奉公守法的官吏却被认为没有政绩。这样做，还想德风普遍地在天下形成，这是不可能的事。

《列子》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晋国有很多的盗贼，晋侯为这件事而苦恼。恰好他们国家有一个叫郤雍的人，他可以通过观察人的神情来辨别这个人是不是强盗。晋侯听了很高兴，就把他请来让他指认盗贼。郤雍指认了千百个盗贼，没有错过一次。晋侯就非常的喜悦，他说：“我得到了这样一个人，还用那些能够侦破案件的人干什么呢？用这个人就足够把这些盗贼治理好了。”赵文子听了之后就很是担忧地说：“大王啊，你用这一个人来指证盗贼，不但不能够尽除盗贼，反而这个人下场也不会很好，他必死无疑！”晋侯没有当回事。过了不久，这些盗贼就在一起商量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走投无路，都是因为郤雍。”于是，他们聚集起来，偷盗了郤雍的财物，把郤雍杀死了。晋侯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的惊惧，他赶紧把赵文子找来商量，说：“果不其然，郤雍被盗贼害死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能捕获这些盗贼呢？”赵文子说：“周朝有一句谚语：‘能够看得清深渊里的鱼的人是不吉利的，能够洞察隐匿之情的人是有灾殃的。’你现在要想去除这些盗贼，不如举荐那些贤良之人来办理朝政，兴起教化之风。人们都有了廉耻之心，谁还要去做盗贼呢？”晋侯听了他的话，觉得很难得，于是真的就让隋会这个人来兴办教育，结果这群盗贼就纷纷地逃离晋国到秦国去了。

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单单用执法之吏治民，国家是很难治理好的，根本的还是要培养起人的廉耻之心。“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

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所以古代圣王都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事，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镇设立庠序（乡间的学校），都是宣扬伦理道德的教育。教化明确了，道德的风俗形成了，天下曾经出现了没有一个人的牢狱。像历史上的“成康盛世”，周成王的时候，四十年监狱里没有一个犯人，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治理效果。

在《史记》上也阐述了这样的道理。它说，汉朝兴起之后，把秦朝的那些严刑苛法都给去除了。“破觚而为圆”，“觚”就是棱角的意思，去除了严刑苛法而力求婉转。“斫雕而为朴”，把那些繁文缛节都给废除了，力求质朴。“网漏于吞舟之鱼”，法网很疏忽，能够把那些吞舟之鱼都给漏掉。这告诉我们，当时的法制不是很健全，法网是很粗疏的。但是，因为他们兴起了道德的教化，以致“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他们的吏治、官员的道德是蒸蒸日上的，没有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黎民百姓治理得很好，过着和美、安乐的生活。

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的治理在于道德的教化，而不在于法律的严苛。即使法制不健全，只要人们重视道德的教化，国家仍然能够保持和美的风俗。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法制不健全，也没有注重道德的教化，没有把那些好人提拔到领导的位置上，也没有从小培养起人们的伦理道德意识，所以才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论语》上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如果你没有事先给以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他不知道做人的本分，不知道自己做人要孝敬父母，不知道要廉洁奉公，一旦他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进行刑罚的处罚，这叫做“虐政”。

很多人会说，孝敬父母难道还需要人教吗？有一个班教小孩

学《弟子规》，学了一段时间后，就请这些孩子上台来分享学习的体会。有一个孩子说：“我学了《弟子规》之后，才知道为人要孝敬父母。”大家听了这话很感慨：难道你长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要孝敬父母吗？从来没有人教过他，父母也没有给他表演出孝敬父母的样子，他怎么能知道要孝敬父母呢？还有一个孩子说了一句话，更让人感慨，他说：“在没有学习《弟子规》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去谋算父母。”孩子的母亲在下面听了这样的分享，眼泪就“刷刷”地往下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母亲平时说起这个孩子的时候是一脸的骄傲。她说：“我的孩子钢琴是全国的第几名，他的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如果你没有见到这个孩子，只听他母亲的诉说，你会想这个孩子该有多优秀。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在母亲心目中这样优秀的孩子，却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人伤心的话，说每一天都想着如何去谋算父母啊！所以，中国古人说“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没有人教过他，他怎么知道做人的本分呢？

在《汉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导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礼义道德来治理国家，我们积累的就是礼义道德；以刑罚来治理国家，积累起来的就就是刑罚。刑罚积累得多了，人们就会怨声载道、离心离德；礼义积累得多了，人们之间就能够和睦相处、相亲相爱。所以，世世代代的君主使人们向善的愿望是相同的，但是所采取的使人们向善的方法却有所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育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育来引导的，德教和洽的时候，做得很和美的时候，民风就是一团和气，

人们安居乐业。用法令刑罚来驱使，法令过于严苛的时候，民风就出现了哀怨。所以，究竟选择哪一种方法来治理国家，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二）圣贤政治，民不忍欺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伦理道德教育的文化，是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培养起一个人的羞耻之心。这样的政治被称为“圣贤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

那么，“圣贤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六韬》中有这样一句，概括了“圣贤政治”的特征：“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也。”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他的政治公平合理，官吏不苛虐，他所收的赋税有节制，他自己的俸禄却很微薄，不因为自私自利损害了国家的法律。赏赐不加于无功之人，刑罚不施于无罪之人。不因为自己高兴了就给别人以封赏，不因为自己不高兴、发怒了就滥杀无辜。对人们有害的人一定会判处刑罚、给以定罪，能够给国家推荐贤良的人受到封赏。这样，官员之中没有腐败蛀虫之类的人藏身，国家也没有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吃不饱饭的百姓。这就是“圣贤政治”的特征，也是“圣贤政治”所达到的效果。

在《六韬》上对“圣贤政治”的描述很多。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

姓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就像兄长慈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到百姓饥寒就为他们感觉到哀伤，看到百姓劳苦也会为他们感觉到忧悲。

“圣贤政治”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国君真的就是这样做的。邹穆公就做出了这样一个榜样。邹穆公做国君的时候，他自己吃饭不讲究多种多样的美味，自己的衣服穿着也不讲求多姿多彩。他对自己要求很刻薄，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他爱民如子，亲爱这些百姓就像一个慈父一样。因此邹国虽然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但是鲁国和卫国都不敢轻视它，像齐国和楚国这样的大国也不能够威胁它。邹穆公过世的时候，邹国的百姓全都非常的哀伤，即使是邹国四邻的人民，知道邹穆公过世，也全都朝着邹国的方向表达哀思之情，民间连琴瑟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因为他们这么好的一个国君过世了，他们自己都乐不起来，直到一年之后才又重新听到了琴瑟的声音。贾谊对此评论道：“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就是说，能够给人们以仁爱之心的，人们对他回报的也是仁爱；能够给天下人带来福祉的人，那么他也会有福气到来。这告诉我们，在历史上这样的领导者也是很多很多的，他们确实做到了“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实现了“圣贤政治”的理想。

在《史记》上记载着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子产在治理郑国的时候，制度非常严密，人们想欺骗他都做不到，达到了“不能欺”。西门豹在治邺县的时候，法律非常严苛，老百姓被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做欺骗他的事，实现了“不敢欺”。但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在治单父的时候，把孔老夫子所主张的仁爱之心落实在治理之上，最后老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们的长官，达到的是“不忍欺”。诸位朋友，在这三种层次的管理之中，究竟哪一个层次的管理是

最高的呢？我们的管理又在追求哪一个层次呢？

子贱治单父治了三年之后，孔老夫子一个叫巫马期的弟子去暗中察访，看他到底做得怎么样。一天晚上，巫马期来到了单父，看到有一个人在那儿趁着夜色捕鱼，他把鱼捞到了，又把这些鱼放回去了。巫马期看了之后就很奇怪，他问：“为什么你把刚刚捕到的鱼又放回到河里去了呢？”这个捕鱼的人说：“我们的长官子贱不喜欢人们捕捞正在生长的小鱼，而我刚才捞到的恰恰是这些小鱼，所以我又把它给放回去了。”巫马期听了之后非常感慨，回来向孔老夫子报告，他说，子贱治理单父，他的德政已经达到极致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在私下里做事也像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非常小心谨慎，达到了慎独的境界。不知道子贱是怎样达到这一点的？孔老夫子说：“我曾经问过子贱，问他是用什么方法来治理的。他说，他精诚的仁爱之心表现在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上，影响就会在老百姓中产生。我想他一定是把这种理念运用到治理之中了。”所以，他作为长官，有一种精诚的仁爱之心，没有丝毫的虚伪，百姓就被他感化，自然而然地做到了“不忍欺”。

这就是说，在历史上确实也有不同层次的管理，而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最高的层次。《体论》上这样说道：“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意思是说，道德对于治理国家是最重要的，而礼法是其次的。道德和礼法都是引导人们的工具。在远古时期，人们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使人们每一天都向善良的方面转变，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潜移默化的，是最高层次的治理。其次一等的就是使人民交相礼让，即使身处劳苦也没有怨言，这

是次一等的治理。最下一等的，就是用法律来端正，让人们因为喜欢赏赐、获得利益而欢喜去做善，畏惧刑罚而不敢去做违犯法律的事情，这是最低层次的治理。所以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追求的是“圣贤政治”，追求的是最高层次的治理。

我们现在放弃了这样一种好的政治形式，而去追求最低层次的治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做企业的企业家，我们要去学企业管理。在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和一个有二百年历史的企业之间，请问我们选择向谁去学管理呢？我想任何一个明智的企业家都会选择向那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学管理。当然我们不否认，一个有二百年历史的企业一定有它的成功之处，否则连二百年也不能够延续。但是它毕竟没有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更经得起风吹雨打，后者积累了更丰富的管理经验。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国，对自己的文化要有坚定的信心。但是，自“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以后，由于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我们一度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有这样一句话：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一句话不是偶然写上去的，我们确实要做到。那怎么样“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呢？如果我们连自己几千年的文化都看不懂，都不理解，我们又谈何自信，又有什么样的自觉呢？

（三）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别

在中国历史上，人权问题根本不成为问题，没有提出人权思想的必要。“圣贤政治”就是讲“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企业家对老百姓、对员工关爱备至，不仅仅关

心到他们的物质生活，还要提升他们的道德修养，甚至关心到他们的家庭是不是和睦，在这样好的领导之下，我们的人权还有问题吗？

我们去参观过很多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管理的企业，到年终的时候他们也会出现问题。他们出现的问题，不是说你给我的钱太少了、克扣我的工资了。他们出现的问题，反而是员工觉得老板给他们的奖金太多了，说：“你能不能不把这么多的奖金发给我们，我们把钱用于弘扬传统文化，让我们的企业更多地发展。”你想想，在这样的企业中，员工还需要拿着“人权”去和老板讲条件吗？所以，中国历史上看似缺乏的东西，恰恰是因为它有更加高明的东西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再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批评中国人，说中国人不讲究心理问题，没有心理咨询医生，不注重人们的心理健康。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提出心理问题、没有心理咨询这一个职业呢？中国的四书五经都在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叫“修身”呢？就是让你的身心和谐啊！这就是你治家治国的基础。每一个人都按着这个标准去修养身心，谁还会出现心理问题呢？所以，我们看似缺少的东西，其实恰恰是因为它有更深刻的内容，因此没有必要提出这些东西。

而西方人为什么对心理问题这样重视呢？这也是和西方人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获得自我利益的满足，就要和别人竞争，好像不竞争就达不到自己利益的满足。但是，竞争向上提升就变成了斗争，这个阶段，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问题就出现了。那么斗争再向上提升就是战争，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有一方不理智用了原子武器，导致的就是世界末日。所以，依靠竞争的方式获得自我利益

满足的价值观，没有把人带上一个光明的前程，而是把人引向了穷途末路。

而我们怎么样呢？长期以来学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以竞争的方式获得自我利益满足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的社会才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有一个孩子回家来向她的妹妹说：“今天有一个朋友问我一道数学题，虽然我知道这个题怎么做，但是我就是没有告诉他。因为我如果告诉他他就会了，以后他的成绩可能就比我高了。”妹妹听了就笑了，她说：“姐姐，如果换了是我，我就会告诉他。”姐姐一听就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她年纪比妹妹大，但是德行还不如妹妹好。没料到姐姐的惭愧心才刚刚提起，她的妹妹脱口而出说：“我会把错误的答案告诉他。”这就是一个中学生的思想境界！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文人相轻”，这句话实际上也有待商榷。为什么文人相轻啊？“文人”一定是没有力行《弟子规》，而只是学了一些名词术语，把儒家学问当成理论去研究的人。因为《弟子规》上说“见人善，即思齐”，《论语》上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到别人有好的地方要向人学习，要欢喜赞叹。

我们从学习《弟子规》、学习传统文化的老师身上，确实看到了这样一种互相赞叹、互相学习的品格。比如说，2012年的年初，我们在房山开了一个《群书治要》的研讨会，请了一些年轻的老师来分享学习的体会。有一位八零后的老师非常年轻，上去之后，把《群书治要》结合历史，讲得头头是道，讲得非常好。蔡老师听后，他非常欢喜地说：“这个年轻人真难得！有这么好的年轻人，我们《群书治要》的弘扬有希望了。”他那种不由自主表现出来的对人家成绩的欢喜赞叹，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学儒、什么叫

有德行。所以，真正力行了《弟子规》的人，他一定是没有嫉妒之心，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

儒家文化之所以在这个时代没落，就是因为学圣贤书的人没有身体力行圣贤的教诲，让人一看，学儒的人都是伪君子，他们所学的儒学也一定是伪道学，这样才会导致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攻击，才会导致传统文化的没落。

我们今天要学习传统文化，我们想复兴传统文化，从哪里做起呢？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圣贤教诲。“见人善，即思齐”，见到人家有好的地方，向人学习，欢喜赞叹，到处去传扬，见到人家不善的不说，回过头来反省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来告诉我们有哪方面的缺点的，他们都是来教导我们的，不要看人家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问题的话，这些人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所以，人人是老师，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

我们崇尚西方价值观，好像不和人家竞争自己的利益就满足不了，人们学会的是损人利己。其实，损人根本利益不到自己。即使能够利益到自己，也是很短暂的，有如昙花一现。真正来讲，帮助别人才是帮助自己。

西方人正是因为奉行这样一种“竞争”的价值观，所以他们的人生就有很多的压力。西方人，童年是天堂，无忧无虑，要什么父母满足什么。到了中年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就要去和别人竞争。商场如战场，当一个人有竞争观念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事都会很有压力。为什么呢？只要和别人竞争，压力就会自然地产生。到老年的时候，西方人没有中国的孝悌观念，老的时候就被送进养老院，过着坐吃等死、与电视为伍的生活，就像生活在坟墓之中。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之下，人们都是孤零

零的原子性的个体，遇到了问题没有人可以求助。即使在养老院物质生活很好，一应俱全，但是精神非常贫乏，他怎么会没有压力呢？他的心灵感觉到很空虚，才会出现很多的心理问题，需要有心理医生给以咨询。这都是源于他们的价值观。

中国人的价值观恰恰相反，是以“仁爱”为核心的。孔老夫子讲，“仁者爱人”。这个仁爱之心，必须从对父母的孝心和对兄弟的友悌之心这个“根”培养出来。我们把对父母的孝、对兄长的悌推而广之，也就是向上提升，就达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互爱，互相关爱。仅有互爱还不够，当人们有困难的时候要给以帮助，那么互爱向上提升，就是互助，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互助、互爱之心再向上提升，就是大同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

我们发现，老一辈的人对家庭特别地依恋，对于老家都是念念不忘，希望叶落归根。为什么呢？在中国古代，不像我们现在是小家庭，那时全都是大家族。家族之中有很多人，兄弟姐妹之间有贫穷的，也有富贵的。贫穷的人生活在大家族之中，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上不起学、自己老了没有人奉养，家族统一给这个孩子以教育、给老人以奉养。每一个人都为家庭奉献，家庭是每一个人的依靠。“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所以他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大家族很安全。而现在社会的人，除了钱之外谁都不相信了，所以赚了再多的钱仍然没有安全感。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压力很大，心理问题层出不穷，这也是有原因的。

那么，在这样一种价值观之下，中国古人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童年是惜福、积福。孩子要勤俭持家，虽然家庭很富裕，但是一定要让他从事劳动。因为“习劳知感恩”，如果他不从事家庭的劳动，就会对父母的付出生不起感恩之心，反而认为父母给

自己的条件是父母应该创造的。中年，是用自己的所学所能来造福于社会、回馈人民。当一个人有这种观念的时候，即使承担了很多的工作，都不会有压力，反而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能让众多的人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生活的改变。所以他做得很有味道，也很有价值感。到老年的时候，把儿女都教育好了，儿女在身边，享受的是天伦之乐。

中国人都有尊老、敬老的意识。以前的中国人，一家之中谁最受尊敬呢？那就是老人。所以，老人是最享福的。人到老年的时候享福，那才是真正的福分。这样一种好的人生轨迹，人的一生都非常喜悦，活得也不空虚，怎么会有很多的心理问题呢？所以，我们说不要盲目地向西方学习一些看起来先进的东西，实际上禁不起推敲。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了深入的理解，对自己的文化树立起信心，能够恢复优秀的中华传统圣贤教育，这对于解决社会的问题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四）废弃“圣贤政治”的结果

那么，废弃“圣贤政治”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六韬》中做了这样的分析。它说：“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这一段话好像恰恰是对民主政治弊端的写照。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世俗大众所赞誉的人称为贤德的、有智慧的人，把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称为不肖之徒，那会怎么样呢？党羽多的人就被举荐成为领导，不愿结党营私的人就被罢退，那些邪曲不正的

人因为结党营私把真正贤德的人给蒙蔽了，忠臣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罚，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虚有的声誉获得了领导的位置。这样，这个世间的乱象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国家也不免于危亡。

《晏子》上有这样一个故事，给我们很深的启发。晏子奉命到阿城去当地方官，治理了三年，毁谤的声音传到了齐景公的耳朵里。齐景公听了之后非常不满意，就把晏子召回来要罢免他。晏子很有智慧，他说：“君主，我知道自己错了，请再给我三年时间让我重新去治理阿邑，一定会让我的赞誉之声传到您的耳朵里。”于是，他回去又开始治理阿邑，果然三年之后赞誉的声音不绝于耳。齐景公很高兴，要给晏子封赏，但是晏子却推辞不受。齐景公很奇怪，问：“你治理有功，这个封赏应该接受，为什么你却推辞呢？”晏子说：“三年之前我刚刚到阿城的时候，我注意修理小路，注意家家户户的防卫，使得那些邪曲不正的人不得其便。（比如说他想到人家里偷东西，因为注重了这些门户的防卫，这些人就不能够得其便。）所以这些人就很厌恶我。我又提倡节俭，兴起了孝悌的教育，告诉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兄长，而且还惩罚那些苟且懒惰之人。懒惰的人就不高兴，就厌恶我。还有，在判断诉讼的时候，我不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有所偏向，这些权贵、豪强之人就厌恶我。对于身边的人他们有什么要求，合法的我就同意，不合法的我就拒绝，我身边的人也厌恶我。对于那些权贵之人，他到这个地方来考察，我依照礼仪的规定来接待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过分地招待，这些权贵之人就厌恶我。有三种邪佞之人毁谤于外，有两种谗曲不正的人毁谤于内，因此，不到三年，毁谤之声就被您听到了。我重新回去治理阿邑的时候，我改变了做法。不再修整小路，也不加强家家户户的防卫，邪恶的人就很高兴。也不提倡节俭了，对那些懒惰的人也不给以惩罚了，也不

教导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了，那么懒惰苟且的人也就高兴了。我断案的时候，偏向那些豪富、有权势的人，这些豪强、有权势的、有财富的人，他们也就高兴了。在周边的人，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们满足什么，也不管是不是符合法律，身边的人也都高兴了。那些权贵来访的时候，我招待他们大大地超过了礼仪的规定，给他们很高的待遇，结果这些权贵之人也就高兴了。因此不出三年，赞誉之声就跑到您的耳朵里了。其实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是应该给以奖赏的，而三年之后我所做的事是应该给予惩罚的，但是您现在却给予我奖赏，所以这个奖赏我不应该接受、不能接受。”齐景公听到这里，深有所悟，于是便提拔了晏子，委任晏子来主持国政。

这就告诉我们，世俗人所赞誉的人不一定就是有道德的人，世俗人所毁谤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人。所以，孔老夫子说，看一个人要非常小心谨慎，“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如果大家都喜欢他，你要认真地去考察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德，是不是大家都是他的同党。他被提拔了，他的这些同党也同样得到好处，所以他们才会称赞他。如果大家都说他不好，那也可能是这个人他就是不愿意同流合污，别人都是贪污受贿，他自己很清高，特立独行，不愿意和他们结党营私。所以，民主制是有条件的，是要以一定的公民的理性程度和道德素质为前提的。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是哪种政治制度，人的道德素质都是使制度得以很好地实行、发挥效用的根本。

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社会问题这么多，我们要恢复圣贤教育，有哪些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那就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温总理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要把加强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是今天我特别想强调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我们要落实温总理的话，要“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舆论氛围”，应该怎么做呢？

（一）选拔师资

应该培养选拔五十位真正通达中华传统伦理道德并且德行优秀的老师，在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媒体上，日日宣讲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形成舆论的氛围。同时，要配以因果教育，使人不敢作恶。

我们都知道“教育者先受教育”，你仅仅通达中国传统文化，那是不足够的，必须使这些老师德行上有保证，也就是说，他是能够身体力行中华传统美德的人。这样的人去讲，大家才会有收获。季康子曾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把那些无道的人给杀掉来成就那些有道的人，这样的办法怎么样呢？孔老夫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意思是说，你办理政治、治理国家，还怎么用得着杀戮呢？如果你真心地希望国家好，民风自然向善。为什么呢？因为在位者的德行像风一

样，一般百姓的德行像草一样，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想让民风淳朴。如果你希望人心向善，你就应该重视道德教育。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我们怎么没重视啊？我们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道德建设。”实际上，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我们想一想，哪一个领导是像重视经济建设、GDP增长那样来重视道德教育的呢？我们的道德教育没有真正地落在实处，因此才没有效果。《说文解字》上也说，“教”是“上所施，下所效”。所以，我们选拔出来的老师必须要德行优异。

（二）教育内容

中国人讲伦理道德的教育是非常具体的。像“五伦”，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还有“五常”，“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还有“八德”。朱熹的“八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一种“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把两种“八德”给概括一下，也就是我们要天天在电视台宣讲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三）因果教育

现在的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因果教育。因果教育并不是佛教、道教的专利，儒家也非常重视因果教育。比如，《大学》上就有这样的话：“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就是因果教育。意思是说，道德是财富的根本，财富是道德的枝叶花果、外在显现。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之所以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成就，有财富、名声、地位，你去观察会发现，他也一定有一般人不具备的德行。

我在中央党校工作，我们三个不同级别的班，第一个叫县委书记班，第二个叫地厅级班，第三个叫省部级班。我们去这些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触：问题最多、怨气最大的是哪一个班呢？是县委书记的班。而特别和蔼可亲、特别容易接近，你给他做了一点小小的事他都记在心里，下一次见到你还会提起的，是省部级的班。地厅级的班呢？他也知道尊师重道，这个传统的美德还都具备，也都能知道互相赞叹，彼此互相礼让。

所以，我们从这点就确实能看到，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位置，绝不是偶然的。就像我们学植物学的人都知道，植物的枝叶花果能够延伸到哪里，它下边的根必须能够延伸到哪里。当然遗憾的是，因为现在我们缺少了这种教育，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做出了很多让人痛心的事情。《尚书》上说：“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上天它不是恒常地关爱、赐福给某一个人，你作善它就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吉祥、各种各样的福分，作不善就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灾殃。

现在很多人喜欢学《易经》，对它特别感兴趣，但是很多人都是在枝叶上做文章。《易经》上有两句最关键的话，古人也就是凭这两句话来判断一个人的发展前程、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两句话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在《尚书》、《春秋》、《国语》这些典籍上，我们看到，很多有学问的读书人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一个军队的作风、一个国家人民的所思所想，就

能够判断出这一个人会不会有发展、这个军队能不能够打胜仗、这个国家能不能够兴盛，最后无一例外地都被他说中。是靠什么来看的呢？其实就是靠这两句话。能做到省部级的官员最后还锒铛入狱了，那不都是“积恶”的结果吗？所以因果的教育不是迷信，从我们生活中都可以观察得到。

在《孔子家语》上也说道：“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弗能加也。”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存亡祸福都是自作自受，自然的灾害不能够对你有所改变。很多人说传统文化是宿命论，实际上真正的圣贤教诲不是宿命论，而是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都是自作自受的结果，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主宰。

在《贾子》上也有这样一句话：“故见祥而为不可，祥必为祸。”见到吉祥的征兆，但是去做不应该做的事，吉祥也会转为祸害。那么相反，一个人能够“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以德报怨”的德行。《贾子》上的这两句话都是有典故的，讲了两个不同的故事，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老子》上就说得更清楚了。《老子》上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并不是对某一个人特别关注，而是会经常帮助那些善良的人。

（四）教育次序

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就说教育是有顺序的，一定是“首孝悌，次见闻”。首先，培养起孩子孝养父母、尊敬长辈、友爱兄弟的谦恭有礼的道德品质，然后才让他学习知识和见闻。否则的话，他学得越多就越傲慢，学得越多就越没有感恩心，学得越多越不把父母、老师放在眼里。而孔老夫子也说过，一个人即使有周

公的才华，但是又骄傲、又吝啬，其余的方面就不值得一提了。西方研究成功学的作家也说，一个人之所以不能够达到卓越，就是因为他不具备谦虚、好学、勇于承认过失、毅力等品质。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就是因为自以为太优秀了而达不到卓越。因为他自认为优秀，所以傲慢无礼、目中无人，没有了谦恭有礼的态度，因此就不能够达到卓越。所以，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古人的这些道德教育的规律，都告诉我们，要做事，首先要学会做人。

（五）学习经典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学习《国学治要》和《群书治要》呢？因为《国学治要》是我们中国古人治学的经验、理论、方法的一个集大成。我们现在的孩子学英语学得很好，英语歌曲唱得很流畅，但是看不懂自己母语的文言文、自己的经典。所以，我们提倡这些经典的学习，就是对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具体落实。我们连经典都不知所云，怎么能够体会得到古人的经验和智慧呢？

学习经典，首先背诵五十篇文言文，就能够看得懂文言文，背诵一百篇文言文，就可以写文言文，而这对孩子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我们需要改革，改革我们的教育。我们教育的内容要重视文言文的学习，因为它是传承五千年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传承至今，这绝非偶然，有祖先的智慧在其中。

古圣先贤发现，日常用语和我们写文章的文字如果不加区分，怎么说就怎么写，会有什么弊端呢？我们的日常用语随着时间的发展会变化。像我在国外待了四年半，刚回到国内的时候，很多网络上的词就看不懂。比如说，什么叫做“粉丝”？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fans”这个词音译过来的。什么叫“顶”？一开始我以为这个“顶”就是反对，因为我们经常与人顶撞。结果和朋友交流出现了笑话，人家说那是非常支持、非常拥护的意思。现在网络很发达，又出现了很多新鲜的词汇，老年人听到这些词汇，肯定是不知所云。如果我们的文字和日常用语不加区分，会有什么弊端呢？你看四年后很多的词你就看不懂，再传上百年、千年，后人再看前人写的文章，完全不知所云，就像读天书一样，怎么能够把智慧、经验传承下去呢？古圣先贤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发明了文言文这个标准化的书写工具。我们只要都学习文言文，掌握了这个标准化的书写工具，那我们的后代子孙就可以回到几千年前的孔老夫子、孟老夫子那里，他们的文章就能够被后人读懂。所以，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没有中断，那不是我们的骄傲吗？当然，这也不是偶然的，是有圣贤的智慧和后代子孙的存心在其中。所以，我们放着这么好的智慧不去学习、不去汲取，而全民都要学习英语，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我们的国民教育应该加重文言文的比例，以《国学治要》作为治学的课本。党校教育有一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群书治要》，这本书用五十万字就把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概括得淋漓尽致。我作为一个学习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人，看了这本书都觉得非常惭愧。因为什么呢？我们对古人的智慧知之甚少，古人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得多得多。我们没有读古人的书，对古人的观念不理解，却对古人妄加批判，这不就是我们后代子孙折福最大的地方吗？就像我们现在都没有看某篇文章，就可以写一篇评论说这个文章怎么怎么样，这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吗？所以，你想批判传统文化，首先要读得懂传统文化呀。否则

的话你怎么去批判呢？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就是人云亦云，就是以一种先入为主、断章取义的态度来对待古人的思想，没有恭敬心，更谈不上去汲取古人的智慧。

《群书治要》告诉我们怎样去治国，它能够帮助唐太宗创下“贞观之治”。这本书传到日本，也帮助日本成就了两代的盛世。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治国的理念是具有普遍规律的，不仅仅在中国适用，到日本也适用。为什么这样一本书却很少有人知道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印刷术还不发达，这本书流传很少。在宋朝以后，这本书在中国就看不到了、失传了。后来是到清朝的时候，日本人进贡，这套书才重新回到中国。但是清朝之后紧接着就是战乱频繁，很少有人去深入研读这本书。所以，这样好的一本书也很少有人知道。

（六）领导示范

为什么领导者要率先学习呢？因为我们知道“上行而下效”的道理。孔子说：“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礼记》）就是说，下级事奉上级，并不是看他所下达的命令，而是看他的行动。如果上面的人喜欢某个东西，下边的人一定会有更加喜欢的。所以上级领导所喜好的东西、所厌恶的东西不可以不谨慎，因为他是人民的表率。

如果我们的领导人真的希望社会民风好转、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提升，应该率先参加伦理道德的教育，而且把他们听课的镜头大加宣扬，人们看到领导者都在学习《群书治要》，都在参加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论坛，那么整个社会才能够真正地重视起来，

把这件事做好。

（七）注重孝廉

领导者的选拔必须具备孝廉的条件。为什么呢？很多人说，给领导者讲孝，这太简单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之心没有培养起来，你想让他“爱民如子，视民如伤”，那是不可能的。在《孝经》上说：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而去爱别的人，这是和德行的要求相背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亲而去尊敬别的人，这也是和礼的本质相背离的。为什么是相背离的呢？因为一个人不爱父母，他一生有一个重要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就是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没有树立。他不会什么原则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方式：这件事对我有利、有好处，我就会全力以赴；这件事由利变成害了，对不起，我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所以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敬，那他对百姓也会冷漠，没有仁爱之心。

孝的内容很广泛，要养父母之身，还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很多人说，你们讲孝有什么用啊？有一个领导，他对父母可好了，但是他不照样贪污受贿、违法乱纪吗？这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孝不仅仅是赡养父母，还要养父母之心，不要让父母为自己感到担忧，而且要养父母之志。在《礼记》上有这样一句话：“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径、舟而弗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危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就是说，每走一步路都不能够、

不敢忘记父母，每说一句话也不敢忘记父母。如果一个人走一步路都不敢忘父母，一定会走正道而不会走那些邪曲的小路，有舟可以乘就不会去游泳过河。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以父母给的身体去行危险的事。如果他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父母，他一定不敢口出恶言。为什么呢？如果你口出恶言骂别人了，别人也会骂你，那也会让别人的愤怒之言返到你自己的身上。不辱没自己的身心，也不使父母蒙羞，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孝”。

在《礼记》上还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陈”通“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这告诉我们，人的身体是父母生下来的，用父母给的身体去做事，怎么敢没有恭敬心呢？所以，如果你居家不庄重，这个就不是孝的表现；事奉君长不竭心尽力，这也不是孝的表现；身居官位却不负责任，这也不是孝的表现；与朋友相交往不讲信用，这也不是孝的表现；在作战的时候没有勇敢的精神，也不是孝的表现。如果这五者都做得不好，灾祸会殃及父母亲，怎么敢不恭敬呢？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孝的内容很广泛。你去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被抓进了监狱，让父母感觉到没面子、很羞辱，这我们还能说是孝吗？这是不懂得，孝的内容很广泛。

《孝经》上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现在很多大学生动不动就跳楼自杀，我们很多人说要提倡“生命教育”。诸位朋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了什么问题就要提倡什么教育，这个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有了孝道的教育，他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能够想到他的父母，他怎么可能轻易地就去自杀呢？我们中

国人都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从枝末上解决。

“孝廉”作为选拔官吏的条件，是因为：一个人在家孝，就会对国家忠；一个人廉洁没有贪心，才能够把自己的职责尽好。在《史记》上记载着公仪休的故事。公仪休是鲁国的宰相，他喜欢吃鱼，有人就投其所好送给他一些鱼。公仪休拒不接受，派人给送回去了。这个人问他说：“我知道您喜欢吃鱼，所以才送了一些鱼给您，您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说：“正是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我今天才不敢接受你的鱼。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宰相，我喜欢吃鱼可以自己花钱去买。假如我今天接受了你的鱼，改天因为接受贿赂把我这个宰相的位子丢掉了，那么以后谁还会给我送鱼呢？”你看，古人就是这样的明智，不愿意去做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事情，因为不值得。所以，领导者读了《史记》上的这个故事，就有了智慧，不会轻易地去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了。

唐太宗读了《群书治要》之后，他非常感叹地说：“大臣对自己的官位不珍惜，而拿着官位去营私舞弊、以权谋私，就等于拿着珍珠去射鸟雀。”珍珠非常昂贵，就像自己的官位很尊贵，但是他却不珍惜，最后自己锒铛入狱，别人以往对自己的尊敬全都没有了，还成了阶下囚。所以领导者多读一读这本书，他一定会更加知道怎么样去做官才能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古代为了保证能把具备孝廉品质的领导举荐出来，还有一个制度，那就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考察官员的政绩，还要看他为国家推荐了多少德才兼备的人才。如果他能够为国家推荐很多优秀的人才，那他也跟着受到国家最高的赏赐。如果他手底下有很多德才兼备的人，他都嫉贤妒能，把他们给埋没了，这样的人就要受到国家的惩罚。这些制度都是可以让我们借鉴的。

（八）办试验区

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那么，弘扬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甚至监狱作为落实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并将它的经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为什么呢？现在的人讲科学，科学就是要拿出成绩、拿出效果。我们现在的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已经丧失了，所以你没有一个样板出来，大家会说你那个是理想，办不到啊！所以，有人就在汤池办了一个试验点，三年下来，这个小镇的风气就有了明显的转变。而且，它还向社会广泛地办“幸福人生”讲座。很多的企业家、监狱管理局的领导，还有很多单位的领导，都去参加“幸福人生”讲座，结果只是四五天的时间，让他们感受很深。他们回去，把这种教育的理念落实在自己的企业、单位还有监狱，无一例外地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果。现在这样的企业可以说是遍布大江南北。

比如说，在南京，有一个菲尼克斯亚洲投资公司，是个外企，它的“海归”很多，他们受过很多西方的教育。一开始要推行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学习《弟子规》时，很多人都非常的抵制、反感。但是，他们的总裁就是趁着假日，亲自驾着车送这些高管去参加学习。经过四五天的学习，他们有了很大的转变。现在，菲尼克斯的企业文化是中西合璧的。你进去参观的时候，里边全是《弟子规》的教诲，以及《大学》、《论语》上的经句。还有像我们北京的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它的董事长学了《弟子规》之后，完完全全地把《弟子规》用于企业管理，事情只要不符合《弟子规》就坚决不做，结果企业现在是一团和气。

这些示范点的成功，还有单位、社区试验点的成功，为我们

通过恢复中华传统圣贤教育构建和谐社会树立了信心。

这就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社会的问题很多，确实需要改革。但是，改革的重点并不是盲目地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要恢复中华传统圣贤教育，并且在这种教育基础上能够办成“圣贤政治”，这个社会才能够真正和谐，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目标才能够实现。

第五讲 孝悌为本，上施下效

——从《群书治要》看传统道德教育的经验

这一讲我们特意讲一讲传统道德教育的经验。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似乎很重视道德教育，但是我们的道德教育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让很多人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总结一下传统道德教育的特点，看一看怎样进行道德教育才是切实有效的。

中国人对于道德教育是从建国理念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的。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提出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说，建立一个国家、领导一国的百姓，教育是最重要的。同样，我们建立一个企业、领导一个企业的员工，我们成立一个家庭、领导一个家庭的成员，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当然教育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效果也不是很好。现在的社会比较浮躁，急功近利的情况比较严重，把孩子的成绩看成是最重要的，而做人的教育却被忽视了。这是现代社会很多问题的根源。

中国人对于道德教育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八个特点。

一、教育目标：长善救失

到底什么是“教”呢？在《礼记·学记》上提出：“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告诉我们，教育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就是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地增长，第二就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

但是，我们现在教育儿女是不是把“长善救失”作为主要的任务呢？我们家长都知道，让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比把他的成绩从九十分提高到一百分更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的家长所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是更重视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还是更重视把他的成绩从九十分提高到一百分呢？很多人明明知道，教育孩子有一个正确的道德观更重要，但是行动上，又不得不在做着让他的成绩更提升的工作。可见，我们的家庭教育是急功近利的，没有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

那我们再看一看学校教育。请问现在是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好还是小学生的道德素质高呢？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总是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使这个孩子的善良不断增长，过失不断得以挽救，当然是随着受教育的时间越长他的道德越高尚，这才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吗？我们小学生学的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当然这都是很好的教导，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是我们想一想，一个孩子连他的父母都不知道去感恩、不知道去照顾，又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呢？到了大学的时候，这个孩子只要整理好自己的床铺、不偷别人的自行车、考试不作弊，这已经是不错了！由此可见，我们的学校教育并没有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也就是说，没有随着受教育的时间越长，他的道德越高尚。

有一位长者把我们现代这些高校的硕士生、博士生称为“有知识而没有教育的人”，说他们这一代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听了很不服气：“我们都硕士毕业了，都博士毕业了，您怎么还说我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呢？”其实，当我们看到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一代确实没有受过教育。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傲慢的，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在地回到《弟子规》，学习做人的基本道理。

现在，还有很多的高校把教育不好的孩子给开除了。那我们想一想，学校都不能够“长善救失”，反而把他推向了社会，请问，谁来承担教人的职能呢？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都能够把“教”视为“长善救失”，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就得以树立了。

二、教育次序：先做人，后知识

“教”是有规律的。从哪里教起呢？《大学》上有一句话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先后顺序，如果我们把先后顺序给做错了，结果完全不同。

（一）古代教育，德育为先

我们可以从古人对教育的定义来看一看教育的次序。古人讲，“首孝悌，次见闻”。就是说，首先培养起孩子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谦恭有礼的处事态度，然后才去学习知识和见闻等等。所以古人把“教”解释为“长善救失”，把“育”解释为“养子使作善也”。我们仅仅把儿子养大不叫做“育”，他必须顺着善良的方面发展成为一个好人，不至于对这个社会做出一些败坏的事情，这才叫真正地把孩子教育好了。所以，做人品德的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和核心。

我们现在的孩子教育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把教育的次序给颠倒了。孩子没有从《弟子规》学习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恭敬老师的态度，只学了许多的知识和见闻，结果是学得越多就越傲慢，学得越多就越不把父母、老师、长辈放在眼里。

现在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业余时间都是去学英语、学电脑、学唱歌、学跳舞、学书法、学围棋，这些都是知识和技能。有一个小孩英语学得很好，她背了很多单词，母亲就很高兴，见人就夸、逢人就讲：“你看我孩子的记忆力特好，背了很多的单词，不信你考考她。”她带着女儿来到了姥姥家，对姥姥也这样说。姥姥问了很多，孩子都对答如流，确实学得不错。姥姥问完她，她就开始问姥姥：“姥姥，‘伞’英语怎么说呀？”姥姥从来没有学过英语，当然就答不出来。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当着很多人的面讽刺她姥姥说：“姥姥，你可真是个白痴！”

像这种儿女对父母、对长辈没有礼貌的现象，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不以为然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因就在于我们把教育的次序给颠倒了。也就是说，父母没有送孩子去学习《弟

子规》，没有培养起她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意识，就让她学了很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学得越多就越傲慢，就越不把父母放在眼里。

看了这一点，我们自己确实也会反省，我们学到了硕士，学到了博士，甚至是博士后，但是没有学过《弟子规》，没有接受过做人的教育。我在西方读书的时候，有三四年都没有回过家，受到西方的人生观、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西方价值观是以自我为中心，儿女和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得当。父母教育儿女是给社会培养人才，等他长大之后，父母的养老也是由国家来负责，没有这种孝悌的教育。父母和女儿去超市，买菜的时候钱不够借了女儿一镑钱，回到家的时候他要还给女儿这一镑钱。

受这种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这种自我的意识特别的强，结果和母亲相处的时候就出了很多问题。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也学到了传统文化，但是学到的是知识，没有把它力行在生活当中，所以就让我母亲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误解，认为这些全都是因为你学传统化学的，你不学还好一点，一学了这个东西，好像和以前的儿女都完全不同了。

所以这个经验就是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教导人、影响人是潜移默化的，那你到西方去求学，西方的价值观对你的影响也同样是潜移默化的。究竟哪一种人生观、价值观更好呢？经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之后，我们就应该有一个答案了。教育的次序不能够颠倒。

教育的正确秩序是首先应该培养起孩子对父母、长辈的恭敬之心，然后才去学知识、学技能。那么我们学知识、学技能要学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学中国古代的文言文。为什么呢？因为文言

文蕴藏着祖先的智慧。如果你从小让孩子背上五十篇的文言文，他就可以看得懂文言文；背上一百篇的文言文，他就可以写文言文。而这对孩子来说，在他的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背这些经典是非常容易的事。文言文是开启五千年智慧的金钥匙，一旦你掌握了这个标准化的书写工具，你就有能力去熟读四书五经，甚至去熟读《四库全书》。

现在西方人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说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西方人特别热衷学习我们的汉语特别是古汉语。他们就是从背诵文言文来开始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抓紧时间教导孩子学习文言文，那么很可能几十年后，是一个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教导我们孩子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这就是很可悲的事情了。

在文言文之中有很多做人的道理，孩子经常读诵，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当然，也有人提出儿童读经的过程中遇到了瓶颈。遇到了什么瓶颈呢？有的孩子把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但是仍然不恭敬父母。很多人就觉得疑惑了，这是不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不合理、没有作用呢？实际上并非如此，只是因为我们教育他们的方法错误了。比如说学习《弟子规》，老师让孩子背下来、默写下来，一个字都不能错，但是和他的生活毫不相关，一句话都没有做到。为什么说没有做到呢？我们翻开《弟子规》，“入则孝”前面有四句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这四句话都没有做到、没有落实，我们这不就是把它当成学问来研究，等着考试要考我们了吗？这种教育的态度错误了，所以即使是学习经典诵读也会遇到问题、遇到挑战。

（二）德行教育，孝道为首

道德教育也是有先后次序的。这个先后次序是什么呢？在《孝经》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孔老夫子在家闲居，他的弟子曾子在旁边侍坐。孔老夫子问他：“古圣先贤有至高的道德、切要之道来使天下顺从，人民相处和睦，上下之间没有怨言，你知道这一个‘至德要道’是什么吗？”曾子听到老师问问题，马上起身离坐。他对老师的恭敬态度在“避席曰”这几个字上就体现了出来。一听老师问问题，不能还在那儿坐着不动，而是赶紧起身，对孔老夫子说：“我很愚钝，不够聪明，怎么能够知道这么重要的道理呢？”这表示曾子很谦虚。

曾子之所以能够接受孔老夫子的教导，正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孝敬的人。他有两个很著名的典故。

有一次，曾子上山去砍柴，他母亲在家里。正好从远方来了一位朋友要探望曾子，母亲很有仁爱之心，想到这个朋友大老远地来拜访曾子，但是他却不在，也不能让这个朋友白跑一趟。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让曾子回来呢？她情急生智，想了一个办法，她把自己的手指头咬破了。因为母子连心，父母和儿女之间都有一种感应的关系。当母亲把自己的手指咬破，由于曾子是一个大孝子，他心里时时刻刻都惦念着母亲，所以他突然感觉到一阵心痛，就知道家里母亲出了事，他就赶紧往回跑，回到家才知道原来是家里来了朋友。

诸位朋友，为什么曾子对母亲的身体不适有如此强烈的感应呢？就是因为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的父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父母之间的感应关系都是如此，和曾子没有丝毫的差别。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母亲即使把这个手指咬破了，

我们都感受不到母亲的痛苦呢？原因是我们的心已经不在父母身上了，所以你就没有这种敏锐度，感受不到父母的需要。所以一个孩子在外面处事，能不能观察到别人的需要，这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学了《弟子规》，学会了给人鞠躬，行九十度的礼鞠下去，恭恭敬敬，就是在学传统文化了。能够观察到别人的需要，这才是最重要的学问。

还有一次，曾子和父亲在耘苗的时候，本应该把草锄掉，他却不小心把苗给锄掉了。父亲就很生气，觉得他怎么这么不会做事，在盛怒之下，拿着锄头打了曾子一下，没想到一下子就把他打昏了。父亲在盛怒之下把儿子给打昏了，他也很后悔、很不安。曾子醒来之后，为了让父亲安心，他就特意地“援琴而歌”，他开始弹琴，表示身体没事，父亲不用担心。后来，这件事被孔老夫子听到，就非常生气，对身边的弟子说：“你们去对曾子说，他以后不是我的学生了，以后不要再见我了。”曾子这个学生很听话，即使孔子这样地对他生气，甚至都不愿意要他了，他仍然恭恭敬敬地来向老师请教。他说：“老师，我对父亲如此恭敬了，为什么您还对我不满意，还不要我这个学生呢？”孔子就说：“如果你的父亲在盛怒之下一下子把你给打死了，你就会陷你的父亲于不义。大家都会责怪他，说你看他把自己的儿子都给打死了，多么的狠心。所以你这样做的结果就会陷父母于不义之中，这不是真正的孝道。”那曾子就问：“那应该怎么做呢？”孔老夫子教他说：“大杖则走，小杖则受。”如果你的父亲是拿着像锄头这样很厉害的东西打你，你就赶紧跑，不要在那儿一直承受。如果拿的是像小柳条这些不是很重的东西打你，那你就可以接受。曾子就明白了，原来孝敬父母并不是要一味地顺从，否则你会陷父母于不义之中。

正是因为曾子是一个孝子，所以这样的“至德要道”讲给他听，他才能够接受。所以，孔老夫子强调“孝”是德行的根本，是教育所产生的根源——“教之所由生也”。从这里就引出了孔老夫子对孝道的阐述。这就告诉我们：教育人有德行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孝道开始。

在《孝经》上还有一句话：“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却去爱别的人，这是和德行的要求相背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亲，却去尊敬别的人，这是和礼的本质相背离的。为什么是相背离的？比如说，我们在家对父母不理不睬、不恭敬，到学校对老师很恭敬。因为什么呢？因为老师掌管着我们的分数、掌管着我们的前程。这个老师如果很有名，他写一封推荐信，那我们就会找到一份好工作。我们对领导很恭敬，因为领导掌握着我们的薪水、掌握着我们的升迁。一个人对父母不恭敬，对老师、领导很恭敬，这个恭敬一定是假的。因为如果是真的，这个恭敬是不变的。他对父母怎么恭敬，他对领导就怎么恭敬、对老师就怎么恭敬，这是出于真诚之心。我们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就是说所有的善是以孝道为最重要的、最先的，因为从孝培养了一个人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

我们想一想，人生在世，谁对我们的恩德最大呢？谁对我们的付出无私无求、没有条件、不求回报呢？我想除了父母以外，可能很难再找到第三个人了。别人对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怎么说是有条件的呢？你看夫妻两个人是不是相亲相爱？突然有一天你看到他（她）和另外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一起，你还会对他（她）有爱吗？你可能就转爱为恨了。所以说夫妻之间这个爱看似海誓山盟，但是很难经得起考验。只有我们的父母亲，无论我们做了

多错的事，多么伤害了父母亲的心，他们都能够原谅我们，都愿意再给我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所以连这么大的恩情我们都不能够记在心上，想着去报答的话，请问在这个世间，还有谁的恩情会让我们念念不忘地想着去报答？

有一个幻灯片叫《母亲》，讲的是：

妈妈，虽然孩子已经成年，但是我依然能够感受到您哺育我时那乳汁中饱含着的温暖。

当我毕业的喜讯充满着您的骄傲笑脸，您知道您期盼的世界已经开始将五彩渲染。

母爱无边，在生命中承袭绵绵，无穷的力量支撑着不朽的关怀，让爱走向生生不息的永远。

妈妈，虽然鱼白早现天边，我的耳旁依然回响着在雷鸣的轰响中，您深夜轻轻脚步点点。

好想为您递上一支拐杖，支撑起您曾经硬朗似铁的腰杆，所有的豪情岁月航行在您承诺的永远。

好想摘一朵鲜花，插在您白发苍苍的鬓边，在满是岁月的沟壑里为您种下永远的春天。

您依旧温柔的声音，哪怕是喋喋不休的叮嘱，也是在我神情不定的时刻延续着千年不绝的训言。

当我很久没有听到您的唠叨，偶尔有一天我发现，我在重复您的教诲。我才知道，我在将爱的信息承传。

好想为您点上一盏明灯，照亮您曾经秋水的眼帘，让所有记忆的诗集在您的眼眸里历历再现。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母亲一生的八大谎言》，非

常令人感动。里面说：

儿时家里很穷，饭常常不够吃，母亲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吃。母亲说：“孩子，快吃吧，我不饿。”孩子们吃鱼的时候，母亲不吃，又用筷子把鱼夹回孩子的碗里。母亲说：“孩子，快吃吧，我不爱吃鱼。”有个冬天，孩子半夜醒来，看到母亲还弓着身子在油灯下糊火柴盒。孩子说：“母亲，睡吧，明早您还要上班呢！”母亲笑笑说：“孩子，快睡吧，我不困。”高考结束的铃声响了，母亲迎上去递过一杯用罐头瓶泡好的浓茶，叮嘱孩子喝了。望着母亲干裂的嘴唇和满头的汗珠，男孩儿将手中的罐头瓶反递过来请母亲喝。母亲说：“孩子，快喝吧，我不渴。”父亲病逝之后，母亲又当爹又当娘，苦不堪言。然而，母亲多年来却始终不嫁，别人再劝，母亲也断然不听。母亲说：“我不爱。”身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常常寄钱回来补贴母亲，母亲坚决不要，并将钱退了回去。母亲说：“我有钱。”孩子长大了，有了一份好工作，想把母亲接来享享清福，却被老人回绝了。母亲说：“我不习惯。”晚年，母亲患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孩子千里迢迢赶回来时，手术后的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看着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母亲，孩子悲痛欲绝，潸然泪下。母亲却说：“孩子，别哭，我不疼。”

看了母亲的这几个谎言，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这都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故事，这些谎言我的母亲都曾说过。母亲不愿意让儿女担心，她总是说一些看似很让人相信的谎言。我们自己非常的粗心，体会不到父母对我们的关爱，还以这些话做借口，不愿意去尽为人儿女的孝心。

中国古人说：“诸事不顺因不孝。”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自己不能够孝敬父母。现在

我们的儿女教育不好，很多人都说：“我们家的孩子是‘小公主’、‘小皇帝’，干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去孝敬父母，更谈不上有什么恭敬心。”那么这些都是结果，请问原因在哪里？其实原因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饭桌前坐有孩子的父母、孩子的祖父母，还有这个孩子，请问我们做父母的夹起菜，把它放在了谁的碗里呢？我们放假的时候想带着家人出去旅游，挑选的是父母最喜欢的地方还是儿女最喜欢的地方呢？有的家长带着父母、儿女来到了游乐园，这是孩子最喜欢的地方。但是，游乐园里噪声很大，音乐声“咚咚”响，震得父母的心脏都受不了。父母为了让儿女高兴，他们去哪里，都跟着说好。再想一想，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无微不至**，要什么就给买什么，但是我们对父母的关心又有几分呢？很多人对父母是**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做父母的没有身体力行给儿女做一个孝亲的榜样，那我们的儿女怎么能够学会孝敬父母呢？

（三）与人相交，道义为重

中国古代有很多有学问的人通过观察人的行为就可预测一个人的未来。比如说，在《吕氏春秋》上就记载着，楚国有一个善于给人看相的人，他给人看相没有一个会失误，每一个都看得特别准。楚庄王就很好奇，把他请过来问事。这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并不是能够给人相面，我只不过是观看这个人所交的朋友而已。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布衣百姓，他所交的朋友在家都能够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自己做事很厚道、很严谨，对于国家的法令很畏服，这样的人他的家一定会越过越好，他的身心会越来越安定，这就是所说的‘吉人’。如果是一个事奉君主的臣子，

他所交的朋友各个都诚实守信、有德行、喜欢做善事，这样的人他事奉君主会一天比一天好，他的官职会一天比一天地更提升，这就是所谓的‘吉臣’。如果我观察君主，他的朝廷里有很多贤人，左右事奉的人都是忠诚之士，君主有过失这些群臣都敢于据理力争、犯颜直谏，那么这样的君主他的国家会一天比一天更安定，他的地位会一天比一天更尊贵，天下的百姓对他也会越来越心悦诚服，这就是所谓的‘吉主’。所以我并不是会给人看相，我不过是观察这个人所结交的朋友罢了。”庄王听了很高兴，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于是就广泛地招集贤良之士，自己处理朝政日夜不懈，最后终于称霸天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是孝悌忠信的，都是教你怎样去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怎样谨慎厚道的，这个人一定前途无量，而且不会有什么灾祸出现。比如说，今天很多人来参加这个讲座，可能就是你的朋友把你骗来的，甚至是朋友把你拽来的，那么这样的朋友你要特别地珍惜，这就是你的善友。有这样的朋友在身边，他不会让你做太多的恶事，你的家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身心也越来越安定。

在“管仲论相”这个故事中，就给我们证明了楚国的这个相面人所说的话。管仲是齐桓公的宰相，当他老了病在床上的时候，齐桓公来探望他，向他请教说：“我现在病了，眼看着就老了，您如果一旦病逝了，请问请谁来做宰相接替您的位置呢？”管仲其实知道齐桓公心目中已经有人选了，但是他还故意问：“主公啊，您觉得选谁比较合适呢？”齐桓公就说：“易牙怎么样？易牙这个人对我可好了。为什么好呢？有一次我们聊天，他问我有什么好吃的没有吃过，我说天下的山珍海味我都尝遍了，只有婴儿的肉不曾尝过。没有想到，易牙回到家里就把他的孩子给杀死了，

用孩子的肉做了一盘菜呈献给我。你看他爱我胜过了爱自己的儿女，对我是不是够忠诚了？”管仲就说：“一个人所挚爱的无过于自己的儿女了，但是易牙居然可以杀子奉君王，这个人一定别有所图，不符合人情，不能用他。”齐桓公听了说：“易牙不行，竖刁应该可以了，他对我也很好。他对我的好怎么表现呢？他为了能够陪伴我，不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太监，为的就是随时出入宫里陪伴我。你看，他爱我胜过了爱自己的身体，这个人是不是可信呢？”管仲听了之后就说：“人最关心的无过于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但是竖刁却可以自残以求荣，这个人也是别有用心，不能够信任。”桓公听了之后说：“他俩都不行，开方应该可以了。开方本来是卫国的太子，但是他来到了我们齐国，一住就是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从来没有回去再探望他的父母，甚至他的父母过世他都没有回去再探望一下。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信任了呢？”管仲听了之后就说：“主公，人生在世，恩德最大的无过于父母的养育之恩了。但是，开方这个人居然可以绝亲以干禄，为了到我们齐国这样一个大国得到一个禄位、一个荣宠，就和父母诀别了。这样的人一定是忘恩负义之人，不可以授以重任。”可惜的是，桓公没有听从管仲的劝告，还是用了这三个人，最后自己死得也很惨。

所以你看，齐桓公在任用管仲的时候把他称为“仲父”，对他是礼遇有加。管仲经常会给他一些指导，给他进谏，从而使他成为春秋的霸主。但是任用了这三个阿谀奉承之人、忘恩负义之人，结果自己死了之后都没有人去收尸。这确实告诉我们，结交什么样的人，就潜移默化地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在《孔子家语》上也有这样一个典故。有一天，鲁国的国君向孔子请教，他说：“我听说向东扩展房屋是不吉祥的事情，有

没有这回事？”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找人看看我们的风水，桌子往哪儿摆、床往哪儿放更合适。孔老夫子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听说天下有五种不祥的事，而向东扩展房屋并不包括在其中。哪五种不祥的事呢？“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也。”

“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就是损人利己，会给自身招致不吉祥。

“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放弃了老年人不去赡养、不去关心、不去照顾，把所有的关爱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这个家庭就不吉祥了。这一句话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为什么不吉祥呢？有人把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用一棵大树来比喻，这棵树的果实是孩子，树的树干是孩子的父母，而树的树根是孩子的祖父母等等。如果我们希望这棵树长得硕果累累，很繁茂，应该把水、养分浇在哪里呢？我们应该把水和养分浇在根上。可是现在，我们大部分家长所做的是把这个水和养分直接浇在了果实上，结果这个果实接受不了这些营养，都腐烂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儿女教育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有人说：“所谓‘孝子’，在古代的时候孝顺父母叫‘孝子’。在现代这个词的含义都改变了。现在什么叫‘孝子’呢？孝顺儿子、孝顺孙子叫‘孝子’。”还有人说得更加可笑，他说：“现在有的人，他有了儿他就成了儿，有了孙儿他就成了孙儿。”这怎么能够把孩子给教育好呢？有了儿，你是父亲、是母亲；有了孙儿，你是爷爷、是奶奶。你没有走到爷爷奶奶、父母的道上，而走到了儿孙的道上，道都走错了、颠倒了，怎么能够把孩子教导好呢？

父母的身教胜于言教，在家中你能够对父母说话和颜悦色，

对父母很恭敬，“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你的儿女看了，不用你去说，他自然会做这些事。有一个故事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说有一个父亲，年纪大了，也没有劳动能力了，儿子对他特别不好，不是打就是骂，经常地呵斥。但是儿女骂他的时候他也回骂，儿女打他的时候他也回打，整个家庭闹得不可开交。这样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一次，他就去拜访一位老人家，向他说：“我的儿女又是打我又是骂我，对我如此不孝，我生活得很痛苦，应该怎么办呢？”这个老人就对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我，我才能帮得上你的忙。”他说：“好，我答应你，我一定如实回答你。”老人家问他：“请问，你对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态度呢？”被他一问，这个人很惭愧，他说：“我对我的父母就和现在儿子对我一样，又打又骂。”原因找到了！于是老人说：“正是因为你对父母的不孝，才导致了今天儿子对你不孝敬。如是因，如是果，怨不得别人。从今以后，回到家里，你的儿子再骂你，你也不要跟他对骂了，你要承受。他打你，你就让他打，也不要再还手了。”这个父亲很难得，他很听话。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儿子再骂他，他也老老实实地，不再和他的儿子对骂了。他的儿子再打他，他也心甘情愿地承受，而且脸上还有惭愧的容色。他的儿子看了觉得很奇怪，有一天就问他说：“我以前骂你、打你，你就跟我对骂、跟我对打，为什么现在我打你你不还手、我骂你你也不还口了？”父亲说：“因为以前我对我的父母就是又打又骂，所以才招感了你这样的儿子，对我不孝，对我又打又骂，这是我应该承受的结果。我现在想开了，就不再和你对骂、对打了。”他的儿子也很有悟性，听了之后，马上跪在地上对他的父亲道歉说：“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对待你了！”

你看，儿女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对待父母的？比如说，我们看孩子对我们说话的口气，对我们的那个态度，是不是和我们对父母的态度一模一样，如出一辙？

第三个不祥就是“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也”。把贤德的人都放任了，任用的全是不肖之徒，这是国家的不吉祥。

第四个不祥就是“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老年人不愿意教年轻人了，幼年人也很傲慢，不愿意向老年人去请教，这是风俗的不吉祥。

第五个不祥就是“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也”。圣贤的人，有智慧、有德行的人，都隐居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被重用，不被国家重视，他们的谏言也不被采用。这些人不图名、不图利，所以就隐居起来，不出来做事了。愚蠢的人却把权力给夺取了，居于领导位置，这是天下的不吉祥。

所以，真正的不吉祥并不是说你家的风水不好。中国古人说：“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这个地方本来是风水很不好的地方，一个有福德的人去居住了一段时间，风水就变了，变得很吉祥了。假如这个地方本来风水很好，但是一个没有德行的人去居住了一段时间，也会把风水给变坏了。所以关键的不是去找人看一看风水，而是从我们的内心培养起对父母孝敬、感恩的这种品德。

《易经》上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是说，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会自然感召到一起。比如说，这个社会喜欢卡拉OK的人，他所结交的朋友很多就是喜欢卡拉OK的；喜欢赌博的人，他交的朋友很多都是喜欢赌博的；喜欢喝酒的人，他结交的朋友自然是喜欢喝酒的。那喜欢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孝道的人，今天就坐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传统文化。这就叫“感召”。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德之人、有福之人，这不是在奉承你们。我们有了

这样的—个机会能够学习传统文化，回去再把传统文化落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的命运也就从今天开始转变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们自己是一个不知道孝敬父母、不知道感恩父母的人，我们所招感的朋友、和我们交往的人也就会是不知道感恩、没有恭敬心的忘恩负义之人。

古人说，“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我们彼此是以利益相交往的，利益没有了交情就疏远了，谁还认识你呢？“以势交者，势倾而交绝”。我们彼此是以权势相交往的，有一天我从领导位置上下来了，不在这个位置了，权力倾覆了，这个交情也就决裂了。“以色交者，花落而爱渝”。就是男的喜欢女的美色、女的喜欢男的英俊潇洒，这是以外在的色相相交往，如果有一天女子年华不再了，脸上又长了很多的皱纹，爱也就终止了。“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我们彼此是以道义、情义、恩义相交往，这个交往才经得起考验，才是天长地久。所以，我们希望自己家庭能够美满幸福，夫妻能够白头偕老，就应该一起来学习传统文化，彼此有了这种恩义、情义、道义，才是使夫妻能够长久和睦相处的保证。

三、德育内容：五伦、五常、四维、八德

中国古人用什么来教导人们呢？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说得太复杂，大家记不住，就无从去力行了。我们现在提倡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提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简单、易记、易行的概括，人们就无所适从。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多年都是在

用四个科目教育人们。哪四个科目呢？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

（一）“五伦”关系

“五伦”关系，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1. 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是说，父母爱儿女，儿女爱父母，他们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情。那怎么样把这种自然的亲情保持一生，顺着“亲”的方向去发展？圣人观察发现，只有父母慈爱教导儿女、儿女孝敬父母，这样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情才能保持一生。

当然，父母慈爱儿女并不是一味顺从儿女的欲望，他想吃什么好吃的就给他买，想穿什么好穿的就给他买。现在父母爱儿女有一个错误的倾向，就是认为他喜欢什么我们就满足他什么，忽视了“从奢返俭难”的道理。随着孩子欲望的不断满足，孩子从小已经过惯了奢侈浪费的生活，你想让他再过俭朴的生活，就很难很难了。所以，他犯了错误要严厉地训斥他，甚至打他一顿，这也是对他的慈爱。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哥因为做了一件错事，被我妈妈知道了，我妈妈拿着皮鞭把他背上打得青一道紫一道，全是伤疤，很严重。其实我母亲打他的时候，自己也很心疼。但是，为了让他记住这个过失很严重，下次不再重犯，所以下手也很重。后来我哥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和朋友在聊天时说起了这件事，他说：

“如果不是我母亲当时那么严厉地教训我，我今天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他现在做事特别的本分，不敢去做那些违法乱纪的

事。别人当了工程部的部长，当了几年就已经富得很了，但是有的人被抓进了监狱。他做工程做了几年，仍然是很奉公守法，没有做贪污受贿的事，所以名声很好，在外边有很多人愿意信任他，把很多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

这件事告诉我们，“爱之不以道，适足以害之也”。父母爱儿女，如果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爱他，反而把他给害了。正是因为中国古人从小就有这样的教导，所以才不会出现“孩子从日本留学回来了，在机场就把他的母亲捅了很多刀”这样的情形。

2. 君臣有义

“君臣有义”是告诉我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不是矛盾的、冲突的、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一体的关系。什么叫“一体”呢？就是一个身体，谁也离不开谁。领导如果离开了下属员工的辛勤工作，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和业绩，所以对于员工是一种感恩之心而不是一种控制的欲望。员工对于领导，应该经常这样想：你看我们下班了，我们把工作任务完成了，可以回家和家人、朋友去逛公园、下饭店，但是我们的领导还要想下一个发展目标在哪里、我们的业绩如何完成、贷款怎么样处理，他还要为这些事去操劳。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也是得益于领导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得益于领导给我们的关爱。所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互相都有感恩之心，还有什么对立可言？

3. 夫妇有别

“夫妇有别”是告诉我们，一家的妻子和丈夫是有职责上的分工，并不是说地位上有差别。中国古人讲“男主外，女主内”，这种分工实际上是符合人的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的。现在社会越发展越强调社会分工，其实古人很早就强调了社会分工：丈夫要负责经济的收入，养家糊口；妻子要教育儿女，使家业、家风

得以承传。所以，在古人看来，一个女子的价值并不在于她在外面创造一番事业，能够和男人去竞争，打拼天下，而是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圣贤人。你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孔子、培养成范仲淹这样的圣人、贤人，那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功劳有多大！相反，如果男人在外面工作打拼，女人也在外面竞争，忙得很累，两个人都忙于工作，没有人来教育儿女，儿女能够长得很好吗？等他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做出了很多悖逆行为，你这个时候再后悔，那是悔之晚矣！

中国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无后”并不是说没有儿子，那仅仅是一方面。有了儿子你没有给他很好的教育，你生了七八个儿子，都是败家子，不能把良好的家业、家风承传下去，还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事，这样的儿子与其有还真的不如没有，这才是真正的“无后为大”。

我们看现在的年轻人，出了很多的“啃老族”和“白领一族”。什么叫“白领一族”呢？工作嫌太累，天天在家里，吃喝都是父母给供养，白白地领着父母给的生活费，这个就叫“白领一族”。现在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不知道为人的责任和本分。这显示出做母亲的职责很重要。

那么，做丈夫的在外面工作，不能因为自己机会很多，就去寻花问柳、见异思迁，应该是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人家把一生托付给我们了，我们就要对人家负责，不能动不动就发火、动不动就生气。一生气就会说一些过分的话，伤了人家的自尊心。

做丈夫的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做妻子的有德行，两个人这样互相配合，才能把一个家庭的关系处理好了。有人也把夫妻关系比作“儿女健康成长的土壤”。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孩子是植物，假如夫妻关系处理不好，就等于把孩子种在了盐碱

地、种在了沙漠地，是不可能健康成长的。一旦儿女成长的土地不平稳了，就像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大地晃动，站在上面的人是惊慌失措的，我们就能够联想到，当儿女看到父母吵架的时候，他的那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了。所以夫妻之间应该和睦相处，为儿女的健康成长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这是真正地爱护子女。

4. 长幼有序

“长幼有序”是告诉我们，一家的兄弟姐妹的出生有一个自然的顺序，按着这一自然的顺序出发，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弟弟、妹妹。这个“友”是两只手互相搀扶的意思，意思是说，弟弟、妹妹有了困难，兄长给予帮助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还打一个借条，指望着他还，还有什么条件。

我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生活就是靠我母亲的退休金来维持的。后来，我的哥哥毕业工作了，从那以后，我生活、学习的条件就有了很大的改善。我每次从家去上学的时候，都是哥哥给我带路费、带学费，包括送给老师的礼物，全都是哥哥给我准备好，然后一路把我送到车站，看着车走了他才往回走。几十年来，他对我的照顾都是没有条件的。当我到英国去留学的时候，学费不是很多，他就把当时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都拿了出来，就是希望我能够放心地去国外学习。他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想有一天我飞黄腾达了能够给他有任何的回报。我的姐姐也是如此。小时候我从县城考到了市里，但是找学校特别的不容易，是姐姐为我联系学校。由于学校要求很严格，需要参加面试，是姐姐骑着自行车冒着风雨带着我去参加考试。当时我坐在车子后面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够回报我的姐姐的话，无论做什么，我都要报答她今天对我的这一份厚爱。

古人有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情义，我们这一代虽然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但是从我们的父辈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我母亲照顾自己的两个弟弟就是无微不至，自己宁愿受苦挨饿，也会把省出的粮食给两个弟弟。所以，他们现在一提起我的母亲，对她都是非常的感恩。

我们现代人没有接受这样良好的教育，兄弟姐妹之间是什么样的呢？都是向西方学习。西方人通常以自我为中心，哥哥有玩具不可以分享给弟弟，如果弟弟也喜欢，父母就得再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玩具给弟弟。这种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现在也被我们有的中国人学到了。结果，有的家庭，兄弟姐妹为了一点点财产纷争就吵上了法庭，这都是没有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果。

5. 朋友有信

“朋友有信”是说，在社会上与人相交往的时候，必须守住一个原则，那就是诚实守信。这个“信”字，是一个“人”字加一个“言”字。这告诉我们，人所讲的话必须守信用，否则那就不是人所说的话了。现在有的人说谎话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不诚信了。比如说，我们上街买菜，跟人家说：“我过一会儿再来买。”结果过一会儿你就没有来买，你这一句话就是谎话，就是不诚信的话。人要言而有信，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任，不能够说了就过去了。

这五种伦理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遵守的人伦大道。今天之所以出现了父子纷争、兄弟之间因为财产吵上了法庭、夫妻之间上午刚结婚下午就去离婚的情景，都是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所导致的。

（二）五常、四维、八德

“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因为它概括得很简单，每一个规范只有一个字，所以易记易行，容易理解，深入人心，千百年来成为中国人奉行的价值观。

此外，还有“四维”和“八德”。“四维”是“礼、义、廉、耻”。朱熹概括的“八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另一种“八德”是孙中山先生概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把“八德”的两种说法中重复的去掉，得到的就是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讲什么呢？可以用这十二个字回答。

如果我们的社会，人人都具备了这样的道德品质，那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孩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只要开启孩子的孝心，这些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有很多的食品安全事件，我们只要让老板生起诚信心，具备这一个品质，这些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现在的社会腐败现象很严重，只要官员都有了廉耻之心，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现在的状况是很多人不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所以才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四、因果教育，内容丰富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很丰富，不仅仅包括了伦理教育（如“五伦”教育）、道德教育（“四维”、“八德”的教育），还包括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因果教育。

（一）德本财末，悖入悖出

说起因果教育，它并不是道教和佛教的独创，其实儒、释、道三家都有很深刻的、很精辟的因果教育内容。比如，在“四书”的《大学》之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意思是说，德行是根本，财富是枝叶花果。一个人的德行有多深厚，你外在的财富、身份、地位、名声才有多繁茂。《大学》上还有一句话，“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也是在强调因果教育。你的财富是以不好的方式获得的，也一定会以不好的方式给败散掉，这是一定的规律。

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讲扶贫，其实扶贫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扶贫，更重要的是精神的扶贫、教育的扶贫。你要让贫贱的人知道他贫贱的原因在哪里。他可能就是很爱占别人的便宜，甚至偷盗别人的东西，这都是导致他自身贫贱的真正原因。我们观察到，越是爱占别人便宜的人，甚至还有一些偷盗行为的人，他的家庭是越来越没落，财富是越来越少。相反，很多人出手很大方，总是拿着钱去帮助别人、救济别人，钱从这一边出去了，又从另一边回来了。所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道理我们明白了，贪污腐败的现象就会大大地减少。

不好的败散财富的方式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是官府。比如我们的钱是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而来，最后东窗事发，自己银铛入狱时家产就会被没收、被充公。第二，是水灾。第三，是火灾。这些自然灾害会把不义之财焚烧掉、剥夺走。第四，是盗贼。中国古人讲“盗亦有道”，盗贼也讲他的道义。他的道义之一就是专门劫富济贫，偷盗、敲诈、勒索为富不仁的人。他看你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己过得花天酒地、骄奢淫逸，

别人上不了学、就不了医你都无动于衷，盗贼看了都过意不去，所以专门来偷盗你。还有一个是防不胜防，就是不肖子孙、败家子，也会把你的不义之财给败散掉。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人家给你钱你都不敢要了。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廉洁的人物。比如说，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司城官叫子罕，他负责一个国家的建筑工程，很多人就给他行贿。有一次，一个人送给他一块美玉，他拒不接受。这个人以为他怕美玉是假的才不愿意接受，就对他说：“您就放心地接受了吧！这个美玉是我们经过专家鉴定确认为价值连城，才敢呈送给您的。”子罕说：“你以美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收了你的美玉，那我们两个人不是各失其宝了吗？不如你守住你的美玉，而我守住我的廉洁，我们各守其宝好了。”你看，古人熟读圣贤书，面对这些贿赂的时候能够提起警觉、提起正知正见。

（二）大德必得位、禄、名、寿

在《中庸》上，孔老夫子称赞舜王时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像大舜这样真正有德行的人，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得到很好的俸禄，得到很好的名声，还会健康长寿。

大舜是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他的德行就表现在他对父母的孝上。他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后母、父亲还有一个弟弟三番五次地要置他于死地，但是大舜并没有因此就生出了对立、生起怨恨，要报复、打击他们。他当了天子的时候，还因为自己不能够得父母的欢心，跑到原野上号泣。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父母才不能够理解他。就是这样的德行，

一直是反省自己，没有抱怨、对立的心，终于感化了他的父母，也感化了天下的百姓，最后尧帝把位子让给他。

我们读了这样的故事，不要认为只有古代的圣贤人才做得出来，我们就离他很远了。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就是说，你在路上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像禹那样的圣贤人。我们自己更不能够自暴自弃，我们和他们都同样是人，为什么舜能够感化要置自己于死地的父母，而我们连亲爱我们、关心我们、爱护我们的人都不能感化？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我们做得不够好，不能够感动身边的人。古人说，你连身边的人都不能感动，而想去感动远方的人，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在《群书治要·昌言》上有这样一句话：“故事亲而不为亲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为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与人交而不为人所知，是信义未至者也。”其中意思说得很明确，你侍奉父母但是父母不能够理解你，是你的孝心尽得不够极致。你连父母都感化不了，请问你能感化得了谁？

我以前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却不这样认为。当时，我也是在各个地方讲传统文化，到处去讲《你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哪一个是我》。每次讲的时候自己很惭愧，但是回到家里一遇到我母亲很挑剔，又给我找一个事不让我出去参加论坛的时候，我就想：你看人家的父母一听说要去讲传统文化，给人家讲孝道，那都不知道怎么样地支持，回家是好菜好饭地招待。而我经常是晚上去论坛地点，第二天上课。为了节省时间，经常订的是当天晚上的票，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三更了。结果，我妈很生气，不给我开门，把我锁在门外。在外面冻得很冷，也不知所措。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觉得我这样地为大众尽心尽力，我母

亲却不理解我，真是刚强难化。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一句话的时候，说你侍奉父母亲都不能够让父母亲理解，是你的孝心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我就能够理解了，因为我现在把境界给转过来了。如果你转不过来的时候，你对圣贤人的教诲就有怀疑。

为什么现在转过来了呢？比如说，前几天我跟我母亲说：“我过几天要去青岛讲课，刚好可以趁着这几天讲课的时候到家里探望你。”我母亲听了当然很高兴了。但是，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却说：“如果你时间太忙，事情很多，就不必要特意回来看我了，你不要耽误了工作。”我以前出门去讲课，我要去哪里、对象是谁，都要向我母亲汇报得一清二楚，得到她的同意我才能去。现在她也不管了，而且在我哥哥那里安住，我再做什么她也都不过问了。这个转变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以前去给人家讲孝道，但是没有体会到父母的心。母亲她的心在想什么呢？我出去讲课了，家里就剩母亲一个人，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就感觉到很孤单。而且我经常在外面跑，都是三更半夜地回来，第二天又一早去讲课了，她作为母亲看了心里也会很难过，她担心我的健康，不愿意让我经常往外跑。其实这也就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关心我。但是我体会不到母亲的关爱，还跟她起了对立、起了不满，甚至还有怨恨。

中国人为什么讲“孝”这么重要呢？就是想通过孝心把一个人的“我执”破掉。一个人他总是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希望事事要听“我”的。但是你通过孝敬父母，顺父母的意，你自己这个“我”就越来越淡化了。当这个“我”越来越淡化的时候，你才能够观察到对方真正的需要。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一句话：“事亲而不为亲所知”，一定是你的孝心尽得不够；“事君而不为君所知”，你事奉领导结果领导不理解，也一定是你的忠心没有达

到极致。为什么侍君没有忠心呢？就是因为在家里没有培养起对父母的孝。在家里父母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不乐意，心里有怨言。当你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领导说你，你会高兴吗？你心里自然会有怨言。“与人交而不为人所知，是信义未至者也”，你与朋友相交往却不为朋友所了解，是我们的信义没有达到极致的缘故。所以，事君不忠，待朋友没有信义，对老师不恭敬，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父母不恭敬所导致的，这是根源。因此，中国古人说“孝”是“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

（三）积善必庆，积恶必殃

在《尚书》上也有关于因果的教育。比如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自然的灾害你通过积德修善还可以避开，如果你自己作孽、自己做坏事不知道回头、不知道忏悔，灾难就不可以避开了。这也是在讲因果的教育。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宿命论。它并不是说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天主宰着你的命运，它恰恰认为一切都是自作自受，你自己应该承担你行为的后果，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在《易经》上也有因果教育。例如我们经常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在《左传》和《国语》上记载着很多有学问、有道德的读书人，他们观察一个人现在的所作所为、观察一个家庭现在的状况、观察一个军队现在的作风，就能够推断出这个人以后有没有发展、这个家族以后的兴衰成败、这个军队能不能够打胜仗，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被他们说中。他们是根据什么来看的呢？其实，根据的就是这两句话。

中国人看问题都是以发展的眼光，看的是趋势。比如说，这一家虽然很贫寒，但是兄弟姐妹团结互助、勤奋好学、孝敬父母，你看了之后，就能推断出过几年这个家庭就会兴盛起来。相反，另一个家庭，现在有钱、有势，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自以为是，还作奸犯科，做很多贪污受贿的事，认为自己很聪明，别人都不知道，那你就会知道，过一段时间他们家一定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我们再看现在有很多的高官，做到了省部级官员，突然锒铛入狱。我们想一想，这也印证了“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这句话。就是他的恶积累得太多了，才导致了今天的身败名裂。这些都是像物理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自然而然。

正是因为中国古人重视因果教育，所以人们害怕做恶事得恶报，一般人们都不敢去作恶。而现在有的人是无法无天。这个“法”就是自然的规律，这个“天”就是自然的因果。现在有的人既不承认有世间的法律可以起作用，也不承认有自然的因果道理，结果做事就没有底线了，作恶多端。

五、德育路径：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

（一）家庭教育，德育之始

中国古人的道德教育始自家庭，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始。而家庭教育贯穿了一个人一生的过程，始从胎教，一直到“慎终追远”。早在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怀文王的时候，她就很重视胎教，做到了“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就是不好看

的景色不去看，淫词歌舞不去听，口里说的话很温柔，连傲慢的言语都没有，更何况是粗鲁、骂人的话！正因为文王的母亲是一位圣人，所以她教出的孩子也是一位圣人。孩子出生之后，虽然眼睛张开了还不会说话，但是不意味着他没有在学习，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他效仿的榜样。

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太子出生之后就给他以良好的教导了。《汉书》中就记载着这样一段怎样教育太子的论述。里面说，古代圣王作为太子，刚一出生就要用礼来教育他。让成年男子背着他，有专门负责礼的官员穿好正服、戴好礼帽带着太子拜天，行祭天之礼。过宫门的时候，要把太子从背上放下来。过宗庙（祭祀祖先的地方）的时候，就要恭敬地快步小跑，表示对祖先的恭敬。这都是教孝子之道。所以太子从孩童开始，教育就已经在实行了。书上举了一个周成王的例子。周成王尚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让召公做太保、周公做太傅、姜太公做太师来教导他，就是请了全国最有学问、最有德行的人担任太子的老师。什么叫“太保”呢？就是保护太子的身体，让他言行都中规中矩。“傅”就是传授他德育，培养起他高尚的道德品质。“师”导之教训，给他一些教育训诲的引导。这是太保、太傅、太师的职责。此外，还要置“三少”，就是少师、少傅、少保。这些人是和太子日常起居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们负责把太傅、太师、太保教导太子的事情表演在生活中，让太子看到。所以太子从有生之日开始，“三公”、“三少”就教导他孝敬父母、有仁爱之心、明礼义，用这些来引导太子。那些邪曲不正的人都让他远离，不让他见到恶人，不让他见到恶的行为。还要选来天下端士，“孝悌博文有道术者”，就是有道德学问的人，在家能够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见识广博而且有道之人，来辅佐太子，让他们这些人和太子一起生活，一

起出入。所以，太子一出生，见的就是正事，听的就是正言，行的就是正道，前后左右所事奉的人也都是正人，因此他“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他习惯了和这些正人一起生活起居，他的行为就不能够不端正，就像一个人生长在楚国，就不能不懂得楚国的方言一样。古人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这一段论述就是告诉我们，中国的古人是怎样对待儿女教育的。虽然一般的家庭不像教导太子那样的讲究，但也是非常重视对儿女的教育，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非常的谨慎小心。我们现在做父母的人都不懂得这一点了。比如说，孩子抱在父母的怀里，父母就骂人、说谎，这些都被儿女看到了、听到了，结果这个孩子就学会了骂人、说谎，这都是“身教胜于言教”的结果。

我们说家庭教育贯穿了人的一生。到父母老了、过世的时候，要谨慎地办理丧事，追奠亡故的先人。古代人讲春秋祭祀祖宗。每一家都有祠堂，祠堂里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到祭祀祖先的时候，就要把全家的人召集在祠堂之中，宣讲祖先的德行，说我们家出了哪一位有德行的人，他对国家、人民有哪些贡献，他有什么德行我们可以效仿学习。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列祖列宗都是这样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我们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就会非常小心、非常负责，生怕自己的言行让自己祖先的德行受辱。所以，中国古人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民风就自然地归于淳厚了。

但是，在十年“文革”的时候，我们把祠堂作为封建迷信给破坏了，祭祀祖宗的传统也就没有了。可是，我们想一想，一个人连他的祖先都念念不忘，想着定时去祭祀的话，对于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尊重、不孝敬的道理？这就是告诉我们，“慎终追远”培养起的是一个人深厚的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

（二）学校教育，德育延续

学校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延续。学校教育的首要内容就是要孝敬父母。因为父母不能老是跟孩子说：“我对你怎么样尽心尽力，抚育你千辛万苦，你可要孝敬我！”一般的父母都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没有人教他，他怎么知道孝敬父母呢？所以，孝敬父母就由老师来教导，孝亲和尊师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古人对于老师是非常的尊敬，这种尊敬表现在礼仪之中。比如说，孩子的父亲带着孩子要去见老师，先要带着孩子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首的礼。当时最重的礼是三跪九叩首，现在我们社会最重的礼就是三鞠躬礼。拜完孔子像之后，父亲带着孩子请老师上座，还要带着孩子对老师行最重礼。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些都是教育。因为孩子心目中最尊敬的人、最敬畏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对老师如此敬重，他对老师的教诲怎么敢不听从？那老师教他什么呢？老师教他要孝敬父母。所以老师和家长一配合，这个孩子就很容易受教了。

尊师之礼表现在方方面面。例如，在丧礼之中，父母过世三年期间，儿女都要穿孝服。老师过世三年期间，虽然不用穿孝服，但是要守心丧三年。你在心里常常忆念老师的恩德和教诲，不敢忘记老师的教诲，这个叫“心丧三年”。男子二十岁的时候行“冠礼”，就是行成人礼，说明他已经成人了，不能再叫他的名，要给他一个字，表示对他的尊重。他的平辈送给他一个字之后，他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要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重。他到朝廷里做官，皇帝也要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他的父母，还有他的老师，可以一生称他的名。这就是告诉我们，老师的恩德

和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老师给我们的是慧命，父母给我们的是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师的恩德比父母的恩德还更大。皇帝是一国之尊，他要接见群臣的时候都是面南背北，以君臣之礼来接见。但是，在接见老师的时候必须降阶，一个站在东面，一个站在西面，以主宾之礼来接见。这就是提醒皇帝，虽然你是一国之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是老师永远是你的老师，他不是你的臣子。这样“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才兴起了尊师重教的风气。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承传到今天，就是因为有孝道、有师道。尊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尊师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现在的孩子对老师没有恭敬心，原因在哪里呢？还是因为他在家不懂得孝敬父母所导致的。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尊敬老师了，也很孝敬父母了。实际上，我们看一看古人对于老师的尊敬、对于父母的孝敬，我们才知道自己做的差得很远。在《吕氏春秋》上有这样一段话：“先王的教诲没有比孝更荣耀的了，没有比忠更显扬的了。忠臣、孝子是做君主的、做父母亲的都想得到的。显荣（就是能够有好的名声，很显达），这是做人臣、做人子特别希望得到的。但是人君、人亲得不到忠臣、孝子，人臣、人子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显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知礼义。不知礼义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学习。所以，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

我们在教学之中、在学习过程中也发现，一个人他有什么样的毛病、什么样的过失都好纠正，只有一种人是最难最难帮助的，这就是特别自以为是的人。他很傲慢，认为谁都不如他好，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他觉得没有人值得成为自己的老师。在《吕氏春秋》后边就接着讲道：“现在的人，他的地位比不上古代的圣王，

他的智慧更不如古圣先贤，但是还不尊敬老师，想得到‘道’那是不可能的了。”这个话是说给我们听的。他说，我们自己的地位不是圣王的地位，智慧也不是圣贤人的智慧，但是我们还不认真地尊师重道，我们还想有什么成就吗？不尊敬老师确实也是因为在家不孝敬父母。所以中国古人对于孝敬父母很重视。

我们看一看《礼记》中一段描述怎样孝敬父母的话。里面说，儿女侍奉父母，在鸡刚叫头遍的时候就赶紧起床了。起床之后，就是洗脸、洗手、漱口、戴上冠帽、穿上端服（就是正式场合穿的衣服），再套上蔽膝，系上大带，再把这个笏给插好（古代的人进谏皇帝的时候，有一个长方形的记事板，这个就叫“笏”），左右都佩戴好饰物（为的是一旦父母有需要），来到父母舅姑之所（舅姑就是指公婆），“下气怡声，问所欲而敬进之”，就是和颜悦色地说话，问父母公婆需要什么，就给他们敬奉上什么。而且这个“色”是温柔的面容，要用温柔的面容来呈奉父母。即使父母有过失，做错了事，仍然是“下气怡色，柔声以谏”，就是和颜悦色地、低声地、温柔地给他劝谏，不能够厉声厉气地把父母训一顿。“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如果你的谏言、规劝不被父母采用，你要更加地恭敬孝顺，也没有什么抱怨之心，等到父母高兴的时候再次去向父母进谏。如果父母不高兴了、生气了，把儿女打得都流血了，也不敢有怨恨之心。不能说你劝父母是为了他好，他还不接受甚至把你打了一顿，你就对父母有怨恨。你看，就是从侍奉父母的过程中培养起一个孩子永远不与人对立的心。我们现在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吗？现在父母骂你一下、打你一下你就起了对立，到了社会上老师再说你一下、再打你一下，那不就更对立了吗？甚至他不理解，都把父母、老师给杀了。这就是现在的社会没有教育的结果。父母过世之后，你想去做善

事，想到这个善事会给父母留下美名，就一定要把这件事做成。虽然你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想到我做成这一件好事会让父母有美名，也一定会把这件事给做好。所以，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侍奉父母应该怎么样去做。

《礼记》上还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担任乐正之职的子春在下堂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脚给伤到了。过了几个月，他还面带愁容。他的一个弟子就问他：“老师，您的脚已经好了，为什么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您还是满面愁容的？”子春怎么回答的呢？他说：“父母生下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完完整整的身子，我们要把这一个人身体完完整整地保护好，这才叫孝。我们尽孝的话，每行一步路都不能够忘记父母。如果我们每走一步路都不敢忘记父母、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会怎么样呢？如果有大道的話就不能走邪僻的小路，如果有舟可乘就不能涉水过河，这都是因为不敢以父母所给予的身体去做危险的事情。如果你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的话，你就不能够口出恶言，因为你一旦口出恶言，别人也会以这样的恶言来对待你。你不口出恶言，说让人家愤恨的话，人家也不会来骂你，就不会辱没自己的名声，不使父母亲蒙羞。这样的话，我们才算尽到了孝。”

这是告诉我们，古代的人他是这样学习的，他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力行的。所以，子春因为这一次没有注意把自己的脚给伤到了，他就觉得是对自己的父母没有尽到孝心。

《礼记》上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生养的。用父母所给予的身体去做事，怎么敢不恭敬呢？生活起居不庄重，这就不是孝的表现。事奉君主不尽心到自己的忠心，这就不是孝的表现。做官不敬业，这也不是孝的表现。与朋友相处不诚信，这也不是孝的

表现。上阵作战不勇敢，这也不是孝的表现。如果这五者都做不到，灾祸就会殃及父母，怎么敢不恭敬呢？

所以，古人因为有孝心，时时想到养育自己的父母，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小心谨慎，生怕因为自己的言行给父母带来羞辱。《弟子规》上说：“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你不做那些让父母感到羞耻的事，那才是养父母之心。

当然，古代的父母也是受圣贤教育的，他们的志向也很远大，并不是想我养了这个孩子，他在我面前给我端茶倒水来给我奉养就好了。他们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有学识、有道德，能够惠及国家和更多的百姓。所以《孝经》上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意思是说，你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很好，而且还要能够把这个“道”给大家都行出来、讲出来，让后世的人都记得你，让你的父母很显荣，这个“孝”才尽到了极致。这就是告诉我们，“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才是真正尽到了孝道。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为什么呢？因为孝子在家能孝敬父母，他有这个孝心。你把这样的人举荐出来让他做官，他一定会尽职尽责。

（三）社会教育，德育扩展

中国古代所有的社会教育形式，包括我们看的诗词、歌舞、戏剧、小说等，都秉持了孔老夫子的一个理念，那就是“思无邪”。不要可能引起人们邪曲不正思想的内容，要的都是教导人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容。我们看古代的诗词，比如《诗经·蓼莪》上这样写道：“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这是当时斥责周幽王的政治太过暴力，连孝子都难以奉养父母的一段诗。这一篇诗中也教导人要孝敬父母。看那个又长又高的莪蒿，原来不是莪蒿而是青蒿。可怜我的父母，生养我多么的辛劳！没有父亲有何凭依？没有母亲何所依靠？出门在外心里就思念着父母，回到家里却又见不到父母的面。父亲是您生了我，母亲是您教育我。生养我，照顾我，牵挂我，出门进门抱着我。想要报答父母恩，父母恩高像天无以回报。

这一段话讲，父母是儿女的依靠，对儿女的牵挂和爱护无微不至。比如，我们自己会说我好久没有吃什么什么饭了，这无意中一句话被母亲听到了，下一次我们回家的时候，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被端到了饭桌上。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体会不到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

还有很多的礼乐也是教导人培养起正确的好恶，返回到人道之正上来。《礼记》上说，古代圣王制礼作乐，并不是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养成正确的好恶观念，返回到做人的正路上来。像我们在传统文化的论坛上，经常能听到靳雅佳老师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我第一次去听的时候，自己也是泪流满面。本来我自己是要参加一个到西藏的考察访问，我觉得西藏是梦寐以求想去的地方，就报了名。正好母亲没有事做，我就让我的学生带着母亲去参加一个传统文化的论坛。但是，恰巧这个考察取消了，于是我自己也去参加了这个传统文化的论坛。好像是上天的安排，就是在这一个论坛上，我第一次听到了靳老师唱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我们当时听得泪流满面，从头哭到尾。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像都是在讲自己，自己做得太差了。从那以后我才知道，需要学习的人不是父母，而是我自己。从那

时起，我才走上了真正学习传统文化的路。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在《吕氏春秋》上还讲了各种各样的音乐的特点。“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意思是说，乱世的音乐，演奏木制、革制乐器的声音就像打雷，演奏铜制、石制乐器的声音就像雷霆震怒，演奏丝竹器之类的歌舞音乐就像大嚷大叫。这样的噪响，用来惊骇人们的精神、震动人们的耳目、动摇放荡人们的性情，倒是可以办到的，用来作为音乐演奏，那绝对不可能给人带来欢乐。所以音乐越是奢华放纵，民众就越是抑郁，国家就愈是混乱，君主的地位亦越是卑下，这样也就失去了音乐的本来意义了。

从这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大多数都不是德音雅乐。因为什么呢？听了这些歌曲，没有让人心平气和，生起喜悦，反而就像大嚷大叫、雷霆震怒，伤害了人的性情。古人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一个人走到一个地方，还没有问这个地方政事办得如何，只是听这里流行什么歌曲，就知道这一个地方的民风如何了。所以，我们也要注意通过音乐的教育来引导孩子。像用古筝、古琴弹奏的乐曲，就非常的平和。本来你心情很烦躁，听上这一段舒缓的音乐，烦躁的心一下子就给抚平了。

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是靠儒、释、道三家来承担的。儒教、道教、佛教并不是宗教的意思，而是教育的含义。我们看佛教的寺院是怎么来的，就知道佛教也是教育而不是宗教。在汉朝的时候，皇权和相权区分得很清楚。在皇帝下面的一级办事机构称为“寺”，它的最高长官称为“卿”，所以有“九卿”之说。在宰相下面的一级办事机构称为“部”，有六部——“吏、户、礼、兵、刑、

工”，部的长官称为“尚书”，副长官称为“侍郎”。当时外国的僧人都是皇帝派人礼请而来，由鸿胪寺负责接待。这些僧人和中国的皇帝、大臣一交流，发现中国人对佛教非常的向往，并希望他们留下来，不要再回去了。但是，鸿胪寺就像我们的外交部，接待的是短期来访的客人，长期住在这里不方便。所以，皇帝下令，在九寺之外增设一个寺，那就是白马寺，专门负责推行佛陀教育。所以，白马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编译局，它负责把外文经典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解释经中的意思，指导修学。

那么很多人说了，既然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那我们到一个寺院里为什么看到很多的佛像、菩萨像，很多人给他们顶礼膜拜，这和宗教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不懂得佛教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学方式。它和儒家的教育内容是很接近的，但它更加朝着艺术化的方向发展。当然，中国古人很有文化，他们也很重视艺术化的教学。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供孔子像，给孔老夫子鞠躬？就是要“见贤思齐”，要向他学习，纪念老师。供奉这些佛像、菩萨像意义也是如此，而且它还有表法的含义，也就是说每一尊像它都有着教育的含义。

可能很多人会问：佛家还讲孝亲尊师吗？你看这个人出家了，就到寺院里去住了，他是孝亲尊师吗？实际上，佛家的孝和儒家的孝有异曲同工之处。儒家讲孝父母不仅要孝父母之身，还要孝父母之心、孝父母之志。佛家也是如此。就像一个人落水了，他的父母也在水中，他想去救他的父母，但是自己又不会游泳，他想帮助父母也无能为力。出家修行就是为了去学习“游泳的技术”，更好地去帮助父母。所以，他也是要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心。在佛教的戒律中也有规定，父母不同意，这个人还不能出家。

佛教讲父母恩重难报，专门有一部《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

它讲了父母对我们有“十重恩”。有一次，佛带着弟子出行，在路上看到了一堆白骨，他就对着这堆白骨礼拜，并且对弟子说：

“把这个骨头分开来，这一堆是男人的骨头，这一堆是女人的骨头。”弟子听了就很奇怪，说：“人生在世的时候，女子穿的衣服是五颜六色的，通过她的装扮可以判断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难道人死后还能通过骨头判断出他是男是女吗？”佛就说了：“人生在世的时候，女子要哺乳，儿女喝的乳汁都是从她的身体供养的。因为要长期地哺乳孩子，所以她的骨头就比较轻，而且颜色是黑的。而男子的骨头分量很重，是白色的。因此，凭这些就能判断出这个骨头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后来，佛又跟这些弟子说了父母恩重难报的教诲，“父母有十重恩：第一，怀胎守护恩；第二，临产受苦恩；第三，生子忘忧恩；第四，咽苦吐甘恩；第五，回干就湿恩；第六，哺乳养育恩；第七，洗濯不净恩；第八，远行忆念恩；第九，深加体恤恩；第十，究竟怜愍恩。”

我们把这“十重恩”分别看一下。

第一恩，怀胎守护恩。“累劫因缘重，今来托母胎。月逾生五脏，七七六精开。体重如山岳，动止劫风灾。罗衣都不挂，妆镜惹尘埃。”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儿女和父母是有着很深厚的缘分，才成为母子。怀胎一个月之后，儿女的五脏才生出来。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六窍就分开了。但是这个时候母亲怀孕在身，行动非常的不方便，身体重得就像山一样，走路也是非常的困难。为了养育儿女，好看的衣服、装扮也都不去管了，梳妆镜也沾上了尘埃。

第二恩，临产受苦恩。“怀经十个月，难产将欲临。朝朝如重病，日日似昏沉。难将惶怖述，愁泪满胸襟。含悲告亲族，惟惧死来侵。”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但是却生得不是很顺利，难产的时候就更加的严重了。每一天都像得了重病昏沉，这个痛苦只有生过儿女

的人才能够体会到。有人说，母亲临产的时候她的手抓着钢筋，那个力度都可以把钢筋扭成麻花，你就能知道痛苦是如何了！

第三恩，生子忘忧恩。“慈母生儿日，五脏总张开。身心俱闷绝，血流似屠羊。生已闻儿健，欢喜倍加常。喜定悲还至，痛苦彻心肠。”母亲生了儿子之后，五脏张开，气很憋闷，血流得像屠羊一样，非常的多。但是，听到这个孩子是健康的，她就忘却了自己的痛苦，非常的欢喜。但是，欢喜一过，生儿的痛苦还是痛彻心肠。

第四恩，咽苦吐甘恩。“父母恩深重，顾怜没失时。吐甘无稍息，咽苦不颦眉。爱重情难忍，恩深复倍悲。但令孩儿饱，慈母不辞饥。”父母的恩深重，照顾儿女时，宁愿自己挨饿受冻，也要让孩子的温饱得到满足。

第五恩，回干就湿恩。“母愿身投湿，将儿移就干。两乳充饥渴，罗袖掩风寒。恩连恒废枕，宠弄才能欢。但令孩儿稳，慈母不求安。”有的父母听了这一句话，真的是跟我们这样分享，她说她在孩子小的时候，孩子把这个地方尿湿了，深更半夜也不能去换洗，她确实就是把这个湿的地方自己去躺，然后把孩子移到干的地方，让他能够睡得安稳。这就是做母亲的心。

第六恩，哺乳养育恩。“慈母像大地，严父配于天。覆载恩同等，父娘恩亦然。不憎无怒目，不嫌手足挛。诞腹亲生子，终日惜兼怜。”父母养了儿女，不管是男儿、是女儿，他都会对他非常的关爱，每一天对他照顾、爱护。

第七恩，洗濯不净恩。“本是芙蓉质，精神健且丰。眉分新柳碧，脸色夺莲红。恩深摧玉貌，洗濯损盘龙。只为怜男女，慈母改颜容。”本来母亲是天生丽质，非常的美貌，精神也很好，脸色也很红润，但是经常给儿女洗濯尿布，照顾孩子，自己的这种很好的容貌也都改变了，就是为了让儿女们能够渐渐长大，只要儿女能够成才，

自己不惜劳苦。

第八恩，远行忆念恩。“死别诚难忍，生离实亦伤。子出关山外，母忆在他乡。日夜心相随，流泪数千行。如猿泣爱子，寸寸断肝肠。”儿女要远行了，父母的心里十分地牵挂。临行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看儿女已经走了很远了，父母还不愿意回家。

第九恩，深加体恤恩。“父母恩情重，恩深报实难。子苦愿代受，儿劳母不安。闻道远行去，怜儿夜卧寒。男女暂辛苦，长使母心酸。”儿女有了苦，父母的心就是想代儿女去受苦。儿女有了病，父母都希望得病的不是儿女而是自己。父母对儿女的体恤达到了这种程度，是一种忘我的境界。

第十恩，究竟怜愍恩。“父母恩深重，恩怜无歇时。起坐心相逐，近遥意与随。母年一百岁，长忧八十几。欲知恩爱断，命尽始分离。”这是告诉我们，父母对儿女的牵挂无时无刻也没有停歇。即使自己已经是百岁的高龄了，还常常忧虑牵挂着八十岁的儿女。

从“十重恩”我们就知道，父母的恩德，儿女怎样都无以回报！

六、德育保障：完善的制度和法律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并不是空洞的说教，它是通过各种制度、法律来加以保障的。以教育制度为例，在《汉书》上就记载说：古代圣王都把教化视为最重要的事，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镇设立乡间的学校，教民以“仁义礼智”的道理。所以虽然当时的刑罚很轻，但是人民因为有了良好的教育，都不会去违法乱纪。这是教育盛行、社会风气得以淳美的原因。

教育制度如此，选拔制度也是如此。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实行“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让地方官把一个地方有孝心的、有廉洁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作为官吏的候补。为了保证地方官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还有一个制度加以保证，那就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评价一个官员的政绩，就是看他为国家推荐了多少德才兼备的人才。《汉书》上记载，汉武帝的时候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制度，还有很多推选贤良文学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一实行，“名臣辈出，文武并兴”，出现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人才，这就是“举孝廉”的效果。

《晋书》上也记载着一些故事，告诉我们，古人通过“举孝廉”选拔出来的人才确实是德才兼备，为官非常的清廉，吴隐之就是其中之一。

吴隐之是濮阳人，早年的时候父亲过世了，他侍奉母亲非常的孝敬、恭谨，对母亲特别和颜悦色。后来母亲过世，吴隐之怀念母亲，守孝之时，因为悲伤过度差点丧失了性命。他的邻居是韩康伯家。韩康伯的母亲是一位贤明的、有德行的妇人。她每一次听到吴隐之哭泣的时候，如果在吃饭就放下碗筷，如果在织布就放下梭子，和他一同悲泣，这样一直到吴隐之服满丧期。韩康伯的母亲对韩康伯说：“你以后如果当了官，应该举荐像吴隐之这样有孝顺之心的人。”

后来韩康伯果然当了官，而且是到吏部去做官，他就推荐了吴隐之。吴隐之因而成为一位清廉官吏，被封为龙骧将军和广州刺史。他到广州上任的时候，广州的北边有一处水叫“贪泉”。父老乡亲都传说，一旦饮了这个泉水里的水，就会使清廉的人变成贪官污吏。吴隐之到了广州，先到“贪泉”边舀了一口水喝了，并赋了一首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

不易心。”意思是说，古人传说一喝这个水就会变成贪官污吏，假使让伯夷、叔齐这样的廉洁之士饮了这些水，我想他们终究也不会改变廉洁之心。所以，他在广州做官的时候更加地注重道德，非常的清廉、有操守，结果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蛮荒之地都被他感化了。当时的皇帝晋安帝就下了一个诏书，诏书这样写道：“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心过人，他把自己的俸禄平均分配给九族的亲属，处在可以贪得的官位上，却不改变他的节操，不讲求自己的享受。虽然家庭可以享受富裕生活，但是他们家的人所穿的还是粗布的衣服。他不改变服饰，革除奢侈的作风，务求简约，所以使这些南方地带的社会风气大大地改观。朕以为，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嘉奖，可以给他进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赐谷千斛。”

这就是说，一个人有孝心，他做官才能够清廉，这是选拔官员的一个很好的标准。

唐朝科举考试之后，我们古人考试都要考十三经、考四书五经。这里面有很多关于孝道的教诲，而在法律制度上也要对人们的行孝加以保证。《孝经》上说：“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属于五刑的最重的刑罚有三千多条，其中最大的罪过就是不孝敬父母。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儿子把他的父亲杀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这件事出现之后，这个儿子肯定是被斩首，当地的县长也被撤职查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县出了这样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是县长没有尽到教化的本分。皇帝还下令把这个县的城墙拆去一角，因为你们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整个县的耻辱，所以把城墙拆去一角，以示惩戒。他们的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也被连降两级。

这就告诉我们，孝很重要。应该从各种制度上培养起人们的孝心，从制度上保证人们愿意去行孝。在新加坡也有这样一个制

度：如果孩子是和父母同住的，他买房屋就会比别人便宜；如果他的房屋和父母的房屋离得很近，他也会受到相应的照顾。这些制度都是鼓励人们去尽孝。

七、成败关键：上行下效

在《说文解字》上，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什么叫“教”呢？就是上面怎么做，下面跟着怎么效仿，以此来起到良好有效的教育效果。在《孝经》上也说：“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君子、领导者教人孝道，并不是到家家户户去宣讲，而是自己要力行孝道，上行下效，整个社会才能兴起这种孝敬父母的风气。古人还有一句话说：“言教者讼，身教者从。”用言语去教导儿女、教导下属，他们就跟你起争讼。你不用言语去教他，而是自己先做到，他们才会效仿学习。《弟子规》上的每一句教诲，你不用说一句，你自己先做到，孩子就会跟着你去做正确的事。

现在很多人都说，孩子到十四五岁了，开始要有逆反之心了。结果心想事成，果然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有逆反心理。我们想一想，孩子为什么会有逆反心理呢？在他小的时候，你让他去做什么他不去做，你就可以打他一顿、骂他一顿。他虽然心里不服气，但是没有你更刚强有力，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你让他做的事，这就是“势服人，心不然”。等他长大之后，一天天地强壮，而你一天天地衰老了，你让他去做你自己都没有做到的事，他就可以不去做了。他心里在想：“你都没有做到，有什么资格

说我呢？”心里就跟你起了对立、起了争讼了。这就是逆反心理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

我们打开中国的历史，会发现古人非常重视孝的教育，而且还强调父母要做出榜样。所以，《弟子规》并不是让你拿给孩子去学的，而是孩子从父母的身上学到了《弟子规》。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记下来都符合《弟子规》的要求，孩子就从父母的身上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了。

八、德育心法：反求诸己

中国人的道德教育强调，从小就不要和人家去竞争、去对立，强调“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就是任何事情做得不顺利，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希望和效果，不要去责怪别人，而是马上去反省自己。

如今我们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了，应该怎么做呢？在《群书治要·新语》上有这样一段阐述。“君子见恶于外，则知变于内矣”。你看到外边的各种各样恶的行为，就应该知道在内起变革了。“今之为君者则不然，治不以五帝之术，则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现在有些做领导的人却不是这样，他没有用五帝的治国方略治理国家，还说现在的时代不能够用道德来治理了。“为臣者不师稷、契，则曰今之民不可以仁义正也”。做臣子的不能够效仿后稷和契（契以“五伦”大道来教育人民），自己首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说现在的人民不能够用仁义来教正了。“为子者不执曾、闵之贤，朝夕不休，而曰家人不和也”。做儿女的人不能够效仿曾子、闵子骞从早到晚地孝顺父母，

还说家人不能够和睦，与父母都有代沟。“学者不操回、赐之精，昼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做学问的人没有像颜回、子贡那样昼夜不懈、精进不息的精神，还说世间不能够行大道了，在这个世间这一套行不通了。“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不法圣道而师贤者也”。从最高的领导者到一般的老百姓都应该遵从圣道、效法圣贤。“故仁者在位，而仁人来；义者在朝，而义士至”。在位上的领导者是个有仁德之心的人，他所感召的就都是有仁德之心的人。有道义的人在朝里为官，他所感召的也是讲道义的人来做官。因此，“墨子之门多勇士，仲尼之门多道德”。孔老夫子一生没有名、没有地位，但是他把自己所说的全都做到了。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个贤人跟着他，不离不弃，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文王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多不祥”。周文王的朝里多是贤良的、有道德的、有智慧的人，秦始皇的朝廷里多是不祥之人。“故善者必有所因而至，恶者必有所因而来。夫善恶不空作，祸福不滥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只要我们做领导的人真心实意地希望社会道德风气好转，那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身先力行孝道，我们的社会风气就可以扭转。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心向善。当然，“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是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领导、投向他人，是让我们从自身做起。比如我们是学习传统文化的人，我们就要身体力行孔孟之道，然后又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东西给大家讲清楚，让社会兴起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也是我们读书人的职责所在。

中国人经常说一句话，叫“否极泰来”。怎么样才能“否极泰来”呢？泰卦卦象是“坤上乾下”。“乾”代表了天，“坤”代表了地。正确的位置应该是乾在上、坤在下。但是，在泰卦之中，它们的

位置是互换的。什么意思呢？它们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反省自己的不足，这就叫“各自责，天清地宁”，结果就非常和美、非常吉祥。而否卦恰恰相反，乾在乾的位置，坤在坤的位置。它们各居本位要求对方、挑剔对方，说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你却没有做到。这就是“各相责，天翻地覆”。

现在，我们小到家庭夫妻之间的冲突，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都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这个道理而导致的。比如说，在同一个楼层里住着两户人家，一家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是“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而对门这一家相处了二十多年，感情越陈越香，就像陈年老酒一样。看得久了，这对年轻人就很羡慕，就去向对门请教：“为什么你们家相处了二十多年这么和乐，我们家却‘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呢？”对门就说了：“因为我们家都是恶人，你们家都是善人，所以我们家吵不起来，你们家天天吵架。”对门听了之后觉得很奇怪，说：“你是不是在讽刺我们啊！我们家都是好人还经常吵架，你们家都是恶人却吵不起来，这个道理何在？”邻居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没有讽刺你的意思。”邻居怎么说的呢？比如说，早晨起来，丈夫去上班，妻子很体贴他，给他端了一杯茶放在了桌子上。结果，丈夫不小心把茶杯碰洒了。妻子看到了，就走上来说：“你看都是我不会做事，把茶杯放得太靠边了，所以才让你不小心把它碰洒了，都是我的错。”说着就拿起抹布来收拾残局。丈夫看到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明明就是我的错，是我不小心才把它碰洒了，怎么能怨你，还是由我来擦吧！”于是，他就和妻子开始争夺抹布。

听到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家里熟悉吗？很多人说，我们不仅不熟悉，反而还很陌生，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在我们家。我们家所熟悉的事是，茶杯被碰洒了，丈夫

就开始破口大骂：“你会不会做事啊！一杯水放得这么靠边，看我把它碰洒了吧。”由于现在的女子很少学女德，妻子也不知道忍让，她比这个丈夫更厉害，说：“明明就是你不长眼睛把它碰洒的，怎么能怨得着我？真是岂有此理！”结果因为这样一点点小事，就把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不愉快的事又吵了一遍，最后赶着要离婚。到了那里，人家就问：“你们最初是因为什么事吵起来的？”他们都忘了自己最初吵架的原因了。

所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最初是“各自责”还是“各相责”，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大家可不要再想，如果让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来听一听这一段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你希望他来听一听这一段，言外之意是说他学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后做事他处处反省自己，那我就过得比较轻松了。你看人的习气很严重，虽然说学了要反省自己，但是还是希望别人先反省自己。所以，不是说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在生活中去力行，就能够转变我们的人生。要经过不断地提醒和学习，我们才能够做到事事反省自己，不去怨天尤人。



下篇

爱民而安，好士而荣：
安危荣辱的两大关键

第六讲 民贵君轻，富而后教

——《群书治要》中的民本思想

我们这一讲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在这里，我们既不把民本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进行比较，也不会对民本思想进行先入为主的评价，只是想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原原本本地呈现给大家。

中国历史上有很丰富的民本思想。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是贵民重民；第二，是爱民恤民；第三，是富民利民；第四，是恕民教民。

一、贵民重民

《尚书》上就有这样一句话：“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这个国家才能够安宁。

“四书”中的《孟子》也有这样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人民是最尊贵的。“社稷次之”，“社”是指土地神，“稷”是指谷神。在古代都要祭祀土地神和谷神，所以经常用“社稷”来代表国家。“君为轻”是强调君主是最轻的。这个可以誉为中国古代贵民思想的代表。在贾谊写的政论书《贾子》上也说道：“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对于办理政事来说，人民是一切政事的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君主以人民为根本，官吏也是以人民为根本。

（一）爱民而安，好士而荣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也就是《荀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你拥有国家，但是不能够爱民、不能利民，而期求人民钦服自己、爱戴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人民不钦服你、不爱戴你，而期求人民为自己所使用、为自己效死，这也是不可能的。“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人民不能为自己所使用，也不会为自己效死，而期求兵力的强劲、城池的坚固，也是不可能的。“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兵力不强劲，城池不坚固，而期求敌人不来侵犯，也是不可能的。外敌都是看到这个国家有机可乘才会发起战争。“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敌兵来了而求没有危险，不被削弱，不被灭亡，这也是不可能的。“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反之民”。所以，人君要想国家富强、稳固、安乐，就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对于人民的态度。“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

之政”。如果你想使下属都钦服、人民都团结一致，那就不如反省一下自己政事办得如何。“欲修政美国，则莫若求其人”。如果你想修明政治，使国家美善，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求德才兼备的人才来辅佐自己。由此，荀子得出结论说：“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也。”作为国家君主的人，因为爱民而安定，因为喜欢德才兼备的人而荣耀。如果这两者缺失一个，国家就会灭亡。

这一段话论述的逻辑很清晰，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人君一定是“爱民而安，好士而荣”。

在《管子》上也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能够让人民安定，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那么人民事奉他们的君主就如同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样。“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如果君主有了忧困，人民就会为他感觉到忧伤；国君有了困难、有了危难，人民也会拼死地为他效力。“人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反之，人君把人民看得如同泥土、草芥一样的低贱，那么人民反过来就不会为君主所使用。君主有什么忧困的，人民也不会为他忧困，不会为他感觉到忧心。国君有难，人民也不会为国君去赴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如果你不能够使人民安乐，他们也不会为你感觉到悲哀。你有了困难的时候，他不会为你分忧。如果你不让人们安居乐业，那么人民也不会拼死地为你效力。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深得老百姓的拥护，人君必须要能够安其民、能够爱民。

“好士”，就是喜欢德才兼备的人。那么，它和“爱民”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在《说苑》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齐宣王来到社山打猎，

老百姓听说了，都赶过来慰劳他。齐宣王很高兴，赐令百姓父老，可以免收租税。百姓们就很欢喜，纷纷拜谢，只有一位老人家闾丘先生没有拜谢。齐宣王看了之后说：“可能我的封赏不够丰厚，大家嫌我封赐得太少，那么再赐令百姓父老不用去服徭役。”大家听了更加欢喜，又纷纷地拜谢大王的恩典，但是闾丘先生还是没有拜谢。齐宣王就问他：“先生是不是觉得我有什么过失，所以两次都没有拜谢？”闾丘先生说：“我听说大王到此游猎，所以特地来拜见大王，希望从大王那里得到长寿，希望从大王那里得到富裕，还希望从大王那里得到尊贵。”齐宣王一听这话，可能觉得这个老人家太贪心了，于是他就说：“人的生死都是有定数的，天道会定时地夺去人的寿命，我没有办法让你长寿。虽然我们的仓廩府库很充实，但是那是用来防备不时之需的，也没有办法让你富裕。我们大的官职没有缺额，小的官位又太卑贱，所以也没有办法让你富贵。”闾丘先生说：“愿大王选有修行者以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寿焉。”意思是，我希望的不是这些，我希望您能够选拔那些有美德的人来做官吏，让他的法度、制度公平合理，这样我就可以稍微得到长寿了。“振之以时，无烦扰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赈济百姓要适时，不要有事没事随便地烦扰百姓，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少许地得到富裕了。“愿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贵焉。”希望您发布一个命令，命令年少的人尊敬年老的人，广布教化，兴起孝悌之风，这样作为老者的我就可以稍微地得到尊贵了。最后，闾丘先生又说，如果您让我们不交田租，也不去服徭役，那么仓廩必然会空虚，国家也没有可指使的人了，这本来就不是我所希望的。你看，这位闾丘先生虽然是一介布衣，但是他考虑得很深远，不是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是从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来考虑。

齐宣王听了这样的话也非常的赞叹，称许他：“你说得太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民如子，就应该选择委任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来做官。这样的话，百姓才能够得到长寿、富裕和尊贵。

（二）求贤辅佐，以利天下

古人非常重视选任德才兼备的人来辅佐自己，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言非常的重要。比如，在《新序》上就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有一个官员有事来请教齐桓公，齐桓公对他说：“把这件事禀告仲父就可以了。”后来又有一个官员有事来请教桓公，桓公又说：“把这件事告诉仲父就可以了。”如此三番五次，凡是有人来向他请教怎么办，他就告诉人家去请教仲父。旁边一个人看了之后就说：“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易哉为君！”意思是说，第一件事要禀告仲父，再有一件事还是禀告仲父，当国君也太容易了。齐桓公说：“我在没有得到仲父之前确实感觉到治国很难，但是得到了管仲的辅佐之后，我干什么不很容易呢？”“故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人”。所以，君王在求贤的时候很辛苦。像三国时的刘备去求贤要“三顾茅庐”，三番五次地去求见诸葛亮，最后人家才出来辅佐他。因为什么呢？要考验他的诚心和敬重心。所以，在求贤的过程中确实是很辛苦。“逸于得人”，得到了这个人才之后，治国就很安逸了。“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舜王在位的时候，他举荐了各位德才兼备的人在适合的职位上，结果他自己垂衣拱手，恭敬地面南背北，没有做什么事，但是天下却得到了大治。“汤文用伊、吕，成王用周、邵，刑措不用，用众贤也”。汤王和周文王选用了伊尹、

吕尚来辅佐自己，周成王用周公、邵公来辅佐自己，以致刑法都搁置不用。这是由于这些贤德的人兴起了教化之风、德才兼备的人能够被重用而产生的效果。所以领导者能够尊重贤者，自己就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当然，我们看他在求贤的过程中，确实不是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贤德的人没有私心，他出来做官、做事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为什么要出来做官呢？他看这个领导者、国君，有诚敬之心，能够听从自己的劝告，辅佐这样的人可以使自己的学说得以推广，使天下得以治理。所以，在齐桓公刚刚任用管仲治国的时候，管仲怎么说？他说：“贱不能临贵。”意思是说，我是身份低贱的人，不能去管理那些身份高贵的人。桓公就拜他为上卿，但是国家还是没有得到治理。桓公就问：“我已经拜你为上卿了，可是国家还得不到治理，这是什么缘故呢？”管仲回答说：“贫不能使富。”贫贱的人不能指使富裕的人。齐桓公听了，就把齐国市场上一年税收全都赐给了管仲，然而国家还是得不到治理。齐桓公又问：“为什么国家还是得不到治理呢？”管仲回答说：“疏不能制亲。”关系疏远的不能去制止、管理那些关系亲密的人。于是桓公就把管仲立为“仲父”，尊之如父，又给他很好的待遇。最后，“齐国大安”，齐国得到了安定，齐桓公也称霸天下。孔子听到这件事，做了这样一句评论：“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即使有管仲这样的贤德之才，如若不能够得到这三种权力，也不能够使他的君主面南背北，称霸天下。所以，中国古人经常感叹说：“世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能够知人善任很难得。任用了之后，你能够对他尊重，能够对他的话听从不怀疑，你这个国家才能得到利益。这就是告诉我们，任贤对于治理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三）贤德之人，教君爱民

贤德的人教导国君什么道理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汤王用伊尹，文王用吕尚”，那么吕尚他是怎么教导武王的呢？武王主动地向尚父请教：“五帝时期是如何戒惧自己，给自己以警诫的，可以说给我听听吗？”尚父就是姜尚，也就是姜太公。姜太公就回答说：“黄帝之时，他是这样警诫自己的：‘我处在民众之上，经常是身心不安，恐夕不至朝。’尧帝处在民众之上，他戒惧谨慎，小心翼翼。舜处在民众之上，也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禹处在民众之上，战战栗栗，恐怕自己的统治到不了明天。汤处在民众之上，也是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治理达不到第二天早晨。”武王很受教，听了教诲之后说：“现在，我刚刚兼并了殷国，处在民众之上，也应该小心翼翼，不敢怠慢。”所以，这些圣贤人处在君王之侧，都是教导他们要爱民如子，不要随意地役使民众，甚至残害损伤民众。

齐桓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天，管仲和隰朋来求见。他们站了一会儿，看到两只鸿雁从天边飞过。桓公感慨地说：“你看那只鸿鹄，时而南飞，时而北飞，不管四方有多远，它想飞到哪儿就能飞到哪儿。现在，我有了仲父来辅佐我，就像鸿鹄有了羽翼，像渡大河有了舟楫。那么，仲父不教导寡人一句话，给我一句适时的教诲吗？”你看，从这里我们就知道，那些贤明的君主，你不去教导他，他还主动地要求你去教导。于是，管仲回答说：“我想君主一定是想称霸天下，干一番大的事业吧？既然如此，就应该从根本上做起。”桓公接着就问：“何为根本？”管仲回答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齐国的老百姓才是您的根本。所以说，这些贤德的人在君主的旁边都是劝导君主要“爱民如子，视民如

伤”，要战战兢兢、小心谨慎，这样才能够把统治维持下去。

（四）对继承人，谆谆教导

在《孔子家语》上有一句话，唐太宗经常引以为鉴，就是“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以覆舟”。唐太宗自己不仅经常听这样的劝谏、这样去做，而且还经常用这样的话教导太子。在《贞观政要》上就记载，唐太宗说：“我听说古人自古以来就重视胎教，我却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但是，我总是不失时机地教导太子。自从他被立为太子之后，我总是在生活中给予他适时的引导。”例如，在太子吃饭的时候，唐太宗就问：“你知道饭的道理吗？”太子说：“不知道。”唐太宗就说：“饭是农民通过辛勤的劳作才能够获得。我们要役民以时，不要横征暴敛，才能够经常地吃到这样的好饭。”看到太子骑马的时候，他就问：“你懂得马的道理吗？”太子说：“不知道。”太宗就说：“马可以帮人做很多的事、帮人劳作，但是不能够把马力用尽，这样才能经常有这样的马骑。”当太子去乘船的时候，唐太宗就问：“你懂得船的道理吗？”太子又说：“不知道。”太宗说：“君主就好比是船，人民就像是水，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把这只船颠覆。你以后要当皇帝了，对于这个道理可不能够不小心警戒。”看到太子靠在一棵弯曲的树上休息，太宗就问：“你懂得这棵树的道理吗？”太子说：“不知道。”太宗就说：“你看这棵树虽然弯曲了，但是你用东西来校正它，仍然可以把它做成直木来使用。君主有的时候会不务正业、不走正道，但是只要听从臣下的劝谏，也可以维持自己的统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创下“贞观之治”，

是因为他不仅以“君者舟也，民者水也”这样的教导经常提醒自己，而且还非常重视对继承人的教导。中国人经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并不是指没有儿子，而是说没有能够承继你的事业、家业、家风的后继人才。所以，中国古人对于国家继承人，对于像我们现在说的企业继承人，还有家族的继承人，都是非常用心地教导，这是值得我们现代人来学习借鉴的。如果我们在生活之中不时地对员工进行教导，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都是老一套了，我们现在要刺激生产，谁还要学这些？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经常看到日本人把儒家的这些思想运用到他们的管理之中，致使他们的经济迅速地发展。中国很多的礼节在我们中国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却随处可见。

（五）对普通人，一言而赏

在《晏子》上也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齐景公到麦丘这个地方去游猎，见到一个当地人，就问他：“您高寿啊？”这个人回答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齐景公听了之后说：“真是长寿！给我说一句祝福的话吧！”这个人就说：“祝君长寿，祝您的寿命比国家还长！”齐景公听了说：“很好！再说一句祝福的话吧！”这个人说：“祝君主的后代子孙都长寿，他们都像我这样的长寿，都像我这么年长！”齐景公又说：“说得很好！再说一句祝福的话吧！”结果这个人就说：“使君无得罪于民。”愿我们的国君不要得罪于民众百姓。齐景公听了之后就有点奇怪了。他说：“确实有下民得罪于君主的，这是可能的。怎么还有国君得罪于百姓的呢？”晏子在旁边听到了，就不失时机地说：“国君您说错了，请问像夏桀王、商纣王这样的暴君，是君主诛杀人民的呢？还是

人民诛杀他们的呢？”你看这一句话说得很契合时机。齐景公一听就说：“寡人过矣。”并把麦丘赐给了这位年长之人作为食邑。

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齐景公，他们对于这些贤才，不仅是委以重任、非常的尊重，而且还非常愿意听他们的劝告。而这些贤德之人的可贵之处，就是教导君主要对百姓经常地施以恩惠，不要过分地役使民众。这都是从根本上教导君主国泰民安的道理，而不是从技巧上、枝节上教导人如何使国家得到治理。

（六）与民为仇，民必胜之

《贾子》上也有这样一句话：“自古而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矣。”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君王的根本。他说，你看历史上，自古至今，与人民为仇的人，与人民为敌的人，有迟有早，人民一定会战胜他。

在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汉书》上就记载，过去在周初的时候，大概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有一千八百多个诸侯国的国君。他们役使民众非常的轻微，每一年百姓服徭役不超过三日，国君还有很多的财富用不尽，国库还很充实。但是秦始皇统一以后，他让这一千八百国的人民来奉养自己，人民筋疲力尽还服不完劳役，财富用尽了还供不上他的需求。为了供养他一个人的享用，天下的人都很辛苦，可还是不能够让他满足。“劳疲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无辜死刑者无所告诉。”疲劳的人得不到休息，饥寒交迫的人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无辜被判死刑的人没有地方去上告。人人与他结怨，家家与他结仇，所以天下就这样败坏了。然而，秦始皇居于灭绝之中而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天下莫敢告也”，天下没有人敢告诉他

实情。那天下人为什么不敢告诉他实情呢？因为他没有养老的恩义，没有辅佐的臣子，没有敢犯颜直谏的士人。他骄纵恣意地实行诛杀，贬退了可以批评的人，杀戮了犯颜直谏的人。臣子们吓得战战兢兢，苟且地投其所好以求能够容身。比喻他的德行的时候，就说秦始皇比尧、舜还贤明。称赞他功劳的时候，就说秦始皇超过了汤、武。天下已经溃败了，但是没有人告诉他实情。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你重视人民，必须要让人民说话，要能够使下情上达。

（七）求取谏言，下情上达

中国古人很重视听取人民的劝谏。《潜夫论》上讲：“故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治国的道理是要劝导臣下能够犯颜直谏，使人民都能够广开言路，君主就能够明察秋毫，下情就能够上达。

《管子》上记载着，齐桓公有一次向管仲请教，他说：“我想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想得到权力而不亡失，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管仲回答说：“不要忙于首创，不要忙于作新，而要随着时节因缘的成熟自然地把事情促成。不要以自己私人的好恶损害了法律的公正，你要认真地考察人民所厌恶的，从而引以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在黄帝的时候，设立明台让群臣在这里议论国事；尧设立衢室也是让下情上达，主动去问人民有什么意见；舜的时候，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旌旗；禹王的时候，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鼓；汤王设立了一个能够使街头巷尾的议论、意见都能够汇总的庭堂。这些制度是干什么的呢？“以观民

诽也”，都是来听人民的批评的。“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这是古代英明的圣王之所以能够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得到权力而不亡失权力的规律。在这里，管子是劝谏齐桓公能够效仿古圣先贤，主动地去听取民众的批评。这样才能够知道自己的得失，使天下保持不失。

《汉书》上说：“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古代圣王的制度，由史官在前面记载君主的过失，“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就是把皇帝、君主的言行、事例都一一记载下来。“工诵箴谏”，乐工要诵读规劝的谏言。平头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政的得失，做生意的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见论朝政。这样国君才能够听到他的过失。重要的是能够改过。见到正义的、符合道义的就应该听从，顺着这样去做，才能够永久地保持天下。这些制度其实都是想让下面的民情能够通达到君王的身边，让下情能够上达。

那么相反，如果你“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你把那些正直的人的气节都给挫折了，把那些可以犯颜直谏的臣子的嘴给封住了，群臣都知道这个君主做错了，但是不敢谏诤。天下以犯颜直谏为恐惧，这是国家最值得忧患的大事。

在《史记》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周厉王的时候任用荣夷公，而荣夷公这个人贪财好利，把国家所有的财货都据为己有。周厉王为什么用他呢？中国古人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为周厉王就是一个贪财好利之人。厉王下面也有可以犯颜直谏的臣子对他劝谏。有一个叫芮良夫的臣子，就劝谏他说：“财利都是万物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所孕育的，现在却想一个人专有，这样一定会招致祸害。作为国家的君主，应该倡导开发田地、生

产，然后公平地给以分配，这样还恐怕人民怨声载道。一般的百姓想独占财利都被称为强盗，更何况是国君？荣夷公不懂这个道理，他就想把所有的财利都据为己有。如果您任用这样的人，一定会给国家招来祸害。”但是周厉王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反而重用荣夷公，搜刮民财，自己过着暴虐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对人民很苛刻，人民怨声载道，在道路上批评周厉王的过失。这个时候召公就来劝谏了，他说：“人民已经忍受不了您的政令了。”周厉王不仅没有反省自己，去改变苛虐的政治，反而找了卫国的一个巫师来监察人民，只要他来上告说某某人说周厉王的过失，就把那人处死。结果过了不多久，人民被吓得没有人再敢评价时事的得失了，甚至在街上走路的时候都不敢多说话，都是以眼睛示意一下，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思就可以了，诸侯也都不来朝拜了。这个时候，周厉王就很得意，对召公说：“你看，人民都不敢乱说话了！”召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并不是人民不敢说话，而是您把人民的口给堵住了而已。“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你堵塞人民的嘴巴比堵塞河流的危害还要严重。如果河流堵塞了，蓄积的洪水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你堵塞民众的嘴巴，结果也是一样。因此，治理水的人一定会使河道畅通。治理国家的人也要开放言路，让人民能够宣泄自己的想法。人民有口，就像大地有山川，一切财物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又像大地有高低、干湿种种不同，衣食也是从这里产生的。让人民说话，让人民把意见表达出来，那么你时政的得失成败就能够从这里观察出来了。人民想在心里，表达在口中，成熟的意见你可以推行。如果你现在不这样做，反而把人们的嘴巴都堵塞了，那能赞同你、能拥护你的人又有多少呢？结果周厉王还是听不进去，以致人们怨声载道，一起起来讨伐他，最后他落荒而逃。

这一历史故事告诉我们，要让民众说话，要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且从他们表达的意愿之中，为政者可以看到自己政治的得失。

历史上，有很多贤明的君主都是主动地去求取百姓的意见。例如，《新序》上记载，齐桓公去见一个叫稷的平民百姓，结果他一天跑了三次都没有见到稷。跟从的人就说：“作为一国之尊、万乘之主，见一个平头百姓，一天来了三次都见不到，那就应该就此作罢，不要再去了吧！”齐桓公就告诉他说：“你说得不对。有德行的士大夫、读书人轻视爵禄，因此他也会轻视他的君主，而那些不想称霸天下的君主会轻视有德行的士大夫、读书人。纵然这位先生轻视爵禄，可是我怎么敢轻视称霸天下呢？”齐桓公一连去了五次才见到了稷。其他人听到了这件事就说：“齐桓公对于布衣之士都能够如此的尊敬，那对于一般的诸侯国君肯定会更加的尊重。”所以这些人都纷纷来朝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上贤明的君主不仅要让百姓说话、宣泄自己的意愿，而且还主动地去求取谏言、了解民情，这样才能够使民情上达。

《后汉书》上记载着杨震的一段话：“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我听说在尧、舜的时候，进谏的鼓、可以批评的木牌都立在朝门之外，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周朝和殷朝的圣哲君王，百姓有了怨言甚至有了责备都是洗耳恭听，这样才能使自己耳聪目明。开放言路，无所忌讳，甚至要去征求那些砍柴的平民百姓的意见，使下情上达。这个论述告诉我们，古人十分重视采纳民众的意见，并根据民众的意见来判断时政的得失，以此来改善政治。

二、爱民恤民

《群书治要·汉书（二）》上有这样一句话：“《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意思是，天子是人民的父母，所以才称王天下。圣人通过比喻的方式来正名，所以把君喻为父母，显明仁爱德让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典语》上也说：“王者所以称天子者，以其号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君王之所以被称为天子，就是因为他办理政事是遵循天道而行的。那么天道有什么特点呢？天道都是好生而恶杀，天都有仁爱之心。所以《政要论》上说：天是万物的保护伞，君主是万民的保护伞。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如果不被雨露所润泽，天就认为有负万物；一国的人民如果不能够沾濡到君主的恩泽，那么做君主的也以此为羞耻。这就告诉我们，天子之所以称为天子，就是因为他顺着天道而行事，他作为人民的父母才能够名副其实。所以，爱民是君主应尽的本分。

（一）先恕后教，尧之道也

古代治理国家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三皇时期，也就是在伏羲、神农、黄帝的时候，他们是以“道”治天下，达到了无为而治。到了尧、舜的时候，“失道而后德”，他们是以“德”来治天下。

《说苑》上记载说：“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尧帝念念存心于天下的百姓，心里

记挂着这些穷苦的人民，对于百姓的苦难、罪过都感到哀痛，也对众生不能顺利地生长感觉到忧虑。如果有一个百姓挨饿，他就说这是自己让他们挨饿的；有一个人受寒，他就说这是自己让他们受冻的；有一个人犯罪，他就说这是自己的过失使他们犯罪的。他的仁德昭著，道义树立起来了，德行广博，教化也很广泛。他不用去赏赐，人民自然勉励做善；不用刑罚，人民自然得到治理。“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先宽恕百姓，以这种仁恕之心待民，然后再去教导百姓，这是尧的治国之道。

在这些圣王那里，他们确实做到了我们古圣先贤所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说苑》上记载着，尧帝有一次出去考察，在路上遇到两个犯了罪的人，正被狱卒押往监狱。尧帝看到自己的两个人民犯罪，他很惶恐，就问：“你们两个为什么犯了罪？为什么被抓了起来？”这两个人说：“因为上天久旱不雨，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吃，不得已偷了邻居家的东西，结果被发现了，就被抓了起来。”尧帝听到了这样的回答，他就让押解犯人的狱卒把这两个人给放了，说：“你们把他们放了，把我抓起来吧。”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怎么能够把国君抓起来呢？当时尧帝就很诚恳地说：“我作为一国之君，没有承担好君、亲、师的职责，没有把百姓教导好，才让他们今天犯了罪，这是我的第一个过失。我作为一国之君，却没有德行，所以惹怒了上天久旱不雨，这是我的第二个过失。”尧帝话音刚落，本来晴空万里的天空就飘过了乌云，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正是尧的至诚心所感动的。

尧帝是这样，禹王也是如此。禹王有一次出门，遇到了一个罪人，他便下车询问情况并为之哭泣。左右的人看了大惑不解，说：“这个犯罪的人是不走正路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君王您何必如此的伤痛啊？”禹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尧舜时期的人民都

是以尧舜之心为心，现在我当了国君，百姓却各以他们的私心为心，我为此感到伤痛。”所以说，尧、舜、禹这些圣人都是以“德”来治理天下。

（二）仁者爱民，天下归心

到了夏、商、周时期，“德”也没有了，他们以“仁”来治天下。《六韬》上记载，文王向姜太公请教治国之道。太公回答说“爱民”，并做了形象的比喻：“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统御人民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就像兄长慈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到他们饥寒交迫，就为他们感觉到哀伤。见到他们很劳苦奔波，会为他们感觉到悲愁。这就是说，到了夏、商、周的时候，这些圣王还能够以仁爱来治天下，是以这样一种爱民如子的心来爱戴百姓。

周文王的仁爱之心，不仅仅是施及百姓，而且还施及枯骨。《新序》记载，有一次，周文王建造灵台，要挖个池沼，但在挖地的时候却挖到了一具死人的骨头。有关的官吏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文王，文王命令给他改葬。官吏说：“这是一具无主之骨。”文王说：“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意思是说，拥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的君主、主人，拥有一国的人就是一国百姓的主人。“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我就是他的主人，又到哪里去求他的主人呢？所以就命令官吏给他更衣、置办棺木，把他改葬了。天下的人听到这一件事，都说文王真是太贤德了，他的恩泽都能够泽及朽骨，更何况对人呢？人们评论说，有的人是以金银财富为宝，他得了这些宝就使国家危险了。文王得到了

朽骨而表明了他仁爱的心意，结果天下的人都纷纷地归心。

（三）循义而治，循理而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仁”也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些能够称霸的人是以什么来治天下的呢？就是以“义”来治天下的。

在《新序》上记载着“臧孙行猛政”的故事。臧孙这个人施行很严苛的政治，受到子贡的批评。臧孙就把子贡召过来向他请教：“我没有奉公守法吗？”子贡回答说：“你是守法的。”他说：“我不廉洁吗？”子贡说：“你也很廉洁。”臧孙说：“我没有执政能力吗？不能够办事吗？”子贡说：“你也很能办事。”臧孙就说：“这三者我都唯恐自己做不到，那么既然这三者我都能做到，为什么你还批评我呢？”子贡说：“你虽然守法，但是好以法来损害人；你虽然很廉洁，但是因为廉洁而很骄傲；你虽然有执政能力，但是以此就欺凌属下。”

子贡接着说道，为政的人就像调琴瑟一样，如果大弦上得太紧，小弦就会崩断。所以，有尊位的人，他的德行不可以浅薄；官阶高的人，他的管理不可以琐碎；辖地广阔的人，他的制度不可以偏狭；管理很多人口的人，他的法律不能够严苛。这是自然的法则，是自然而然的规律。所以，“罚得则奸邪止矣，赏得则下欢悦矣”。如果你的刑罚得当，那么邪曲不正、作奸犯科的事就能够制止。如果你的奖赏得当，那么属下都应该欢心喜悦地拥护你。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

子贡又说，你没有听说过子产是怎么治国的吗？子产治国的时候，用仁爱礼义来教导人们，役使人民从不违道，所以政事非常的宽松。对于奖赏的多少，难于确定时就宁可从重；对于惩罚

的轻重，难于判定时则宁可从轻。因为实行了这样宽松的政治，子产治理郑国七年之后，社会风俗非常的和平，自然灾害都没有，国家也没有需要用刑处罚的人，监狱都空虚了。到子产过世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百姓听说了都痛哭流涕，非常的哀伤。百姓说：“子产已经死了，我们还怎么能过上安稳的生活？我们把安定的生活寄托给谁呢？如果能够使子产重新活过来，用我们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换取子产的生命，我都愿意。”子产活着的时候，被人们所爱戴。他死了的时候，人们都为他感到悲伤，做官的人在朝廷里哭泣，商人在市场上哭泣，农民在原野里哭泣，姑娘在她自己家的内室里哭泣，琴瑟声音也都听不到了，大夫的佩玦不戴了，妇人把她的簪子、耳饰也都摘下来了，人们在大街小巷痛哭流涕。这就是因为他行了仁恕之道的缘故。

而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呢？听说你有病了，人民都非常的欢喜，互相祝贺，说：“臧孙子病了，最好他能够死去。”你的病刚刚有一些好转，人民都非常的恐惧，说：“臧孙子的病又痊愈了，我的命运太不幸了，为什么臧孙子没有死呢？”所以你看，你病了的时候，人们都非常欢喜，互相祝贺。你生活在这个世间，人们都以你为恐惧。你害人的心可见有多么深了！你这样办理政治，怎么还能够不遭受批评呢？臧孙子还是挺明白道理的，“义者循理”，他听到子贡这种劝谏很符合道理，就主动地把位置给让出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你赏罚分明，也很廉洁，但是对人民过于苛刻，人民也不会感恩戴德，而且还会怨声载道。所以，子贡说了这样一句话：“盖德厚者报美，怨大者祸深。”德行深厚的人，回报给他的也很丰美。与人结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有灾祸。所以说，最大的德行莫过于“仁”，最大的祸害莫过于刻薄、苛刻。

这就告诉我们，为政要宽和、要仁恕，而不能过于苛刻。

春秋战国的时候，以“义”来治理国家，能够循理而治。《晏子》上记载着，齐景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年大雪下了三天都没有见晴。齐景公披着“狐白之裘”，就是穿着一种白色的裘衣，坐在堂上。晏子来进谏，站了一会儿，齐景公就说：“真奇怪，雪下三天了也不觉得寒冷。”晏子听了之后说：“天气真的不寒冷吗？”被晏子这么一问，齐景公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晏子说道：“我听说古代的贤君，自己吃饱时便想到还有百姓在挨饿，自己穿暖时便想到还有百姓在受冻，自己很安逸时便想到百姓的劳苦。可惜您现在却感觉不到啊。”齐景公说：“善！寡人闻命矣。”齐景公很难得，他一听晏子说得对，马上就赞叹，说：“我懂得你的教诲了。”于是下令取出府库中的皮衣，开仓放粮，救济那些挨饿受冻的百姓。这就告诉我们，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些君主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也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循义而治，治理天下能够循理而为。

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君主、官员还不失仁义之心，做出了很多让人感慨的事情。比如说，季文子在鲁国做宰相的时候，他的妾不穿丝绸、马不喂粮食。有一个仲孙大夫就向他进谏说：“您是鲁国的上卿，可是你们家的妾不穿丝绸，马也不喂粮食，人们都认为您这样做是吝啬，而且对我们国家也不光彩。”季文子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是这样吗？我看到国人的父母还穿着粗布衣服、吃着蔬食，我因此不敢奢侈。而且我听说君子是以德行来使国家光彩，没有听说是以妾和马让国家光彩的。所谓的‘德’，就是如果我有获得也让人家有获得，这样才可以推行开来。如果骄奢淫逸，每天沉迷于光彩的纹饰，不能够反躬自省，这样怎么能够守卫自己的国家？”仲孙大夫听了之后，很惭愧地退了下去。

所以说，即使到了春秋战国，出现了很多“臣弑君”的现象，但是仍有许多国君和臣子能以义来治理国家，以仁爱之心来对待百姓，事事循理而为。

（四）施恩加惠，体恤百姓

《政要论》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的君主很难，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人民的怨恨，把他推翻，所以时时要体恤人民的辛苦，要恤民。

在《政要论》上有这样一段阐述。“服一綵，则念女功之劳”，穿一件丝织品就要想到织女的辛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进用一粒谷子都要体恤农夫劳作的勤苦。“决不听之狱，则惧刑之不中”，判决那些未加详审的诉讼，就唯恐刑罚不当。“进一士之爵，则恐官之失贤”，晋升一个人的官位，就怕这个封赐有失贤明。“赏毫厘之善，必有所劝”，即使是赏赐微小的善事，也要让它能够起到劝人为善的效果。“罚纤芥之恶，必有所阻”，即使是对微小的恶事进行惩罚，也应该起到劝阻恶事、给人以警告的作用。“使化若春气，泽如时雨”，使他的教化像春风一样，像适时的雨露润泽万物。“消凋污之人，移薄伪之俗”，要减少那些道德腐化的人，改变轻薄虚伪的风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朴”，要挽救衰败世道的弊政，返回到上古的淳朴。“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就是把这种高尚的德行施于天下，把仁慈、厚道施及百姓的身上。这就是告诉我们，做君主的应该念念体恤百姓的不容易，做事应该非常的小心谨慎，生怕得罪于百姓。

也许有人觉得这可能都是古人的教诲了，在我们现代社会就

没有必要了。那我们看，在松下幸之助的企业之中，他们培养后继的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是从我们的古圣先贤的教诲中汲取了很多的经验。有一篇登在《参考消息》上的文章，叫《松下商学院的一天》。其中就有这样一段：

七点十分的时候开始吃早饭，每一顿饭前全体学员都正襟危坐、双手合十，口里念诵着这些偈语。第一句话说“此膳耗费多少劳力”。我吃这一顿饭耗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多少人为此付出了辛劳。看似是一碗普通的饭端在我们的面前，实际上这一碗饭能够端到我们的面前何尝容易！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把种子播撒在大地上，然后要给它适时地浇水、耘苗、割草，到秋天的时候才有收获，还把米脱去壳，装在袋子里，然后把它送到收购的地方，收购的人把它买回来送到超市，超市的人把它摆在货架上，采购的人再把它从货架上买回来送到食堂里，食堂里的师傅又把它做成熟饭，还要有人端到我们的面前。所以，看似一碗饭，其实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的劳力，所以要有感恩之心。第二句话，“自己是否具有享用此膳之功德”。要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国家人民的贡献，我有没有功德来享用这一碗饭呢？第三句话，“以清心寡欲为宗”。不要骄奢淫逸，放纵没有止境。第四句话，“为走人之正享用此膳”。我要走人间的正道来享用这碗饭。吃完饭之后还要双手合十，诵念“愿此功德，广播天下。吾与众生，共成道业”。

《松下商学院的一天》描述的他们吃饭之前、吃饭之后的情景，学的是谁的传统？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我们在寺院中还能够看到。寺院的斋堂叫“五观堂”。为什么呢？在吃饭之前就要问自己这些问题。这全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认为这是形式、是迷信，却被日本人学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们很少看

到日本人有随意浪费粮食的现象，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富民利民

在《管子》上很明确地说了一句话：“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治国首先应该富民。

（一）节欲富民，重视本业

怎么样富民呢？古人眼中的“富民”可能和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富民”还不太一样。《晏子》上记载着，齐景公请教晏子：“富民安众难乎？”使人民富裕、百姓安定很困难吗？晏子回答说，很容易。“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如果能够节制欲望，人民自然富裕；审判诉讼能够公平合理，人民就会安定。想富民安众，把这两条实施到位就可以了。所以，在古人看起来怎么样富民呢？并不是说去刺激消费、发展经济、追求 GDP 的增长人民才富裕。其实单单追求 GDP 的增长，往往会导致两极分化，人民并没有真正地富裕，财富还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说苑》上记载，魏文侯向李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刑罚的根源产生于哪里呢？”李克回答：“是产生于人民邪曲不正、放纵奢侈的行为。凡是奸诈的、邪曲不正的这种心，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才生起的。过分放纵安逸的人都是把心思耗费在纹饰之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把心思用在奢侈品之上）。”“饥

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百姓饥寒交迫，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衣服，这个时候能不作奸犯科、不做邪曲不正的事，是很少有的。“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男女都装饰得很精美，而且以此来互相骄矜，来比试看谁的更奢华，如果这样做的话，要让人民不骄奢淫逸，这也是很难办到的。因此，如果上面不禁止奇技淫巧，奇技淫巧的事情越来越多，奢侈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导致的结果就是“国贫民侈”，国家越来越贫困，而人民越来越奢侈浪费。“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如果这个国家贫穷，而人民又奢侈浪费，那贫穷的人为了过上好的生活一定会去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一定会放纵自己的欲望、骄奢淫逸，这就等于是驱使人们去做邪曲不正的事。当人民已经被驱上了邪路，又用法来诛杀他们，这就等于给人民设置了陷阱。所以，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本，而在枝节小事上进行督促，这是“伤国之道”。

在《崔寔政论》上也有一段类似的阐述。他讲：“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意思是说，人的这种自然的欲望，也就是人之情（人之情和性还不一样。人的本性都是清静无为的，就像这个水很清澈，没有任何的染污）、人的习气、人的习染都是喜欢荣华富贵，喜欢美丽的服饰叮当作响而且炫人眼目，喜欢吃的都是香喷喷的佳肴美膳。白天想着这些事，夜里做梦还是想着这些事，一心一意地就是想着怎么吃喝玩乐，须臾都不离开自己的心。这就和水往下流、瀑布往深壑里流淌是一样的道理，这是自然而然的。

古代的人对人的欲望看得很清楚，所以把“欲”比作深渊。人的欲望如果没有节制，任其发展，最后人自己也没有办法来束

缚自己。所以，古人通过礼法、制度来严格地防患于未然，而且让人把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做到欲而不贪。

但是，现在却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市场上都卖那些奢侈的工艺品，商家都可以卖那种僭礼的服饰，百工也可以做奢侈品。人民看到了这些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就不能不去买。而商人之流，家家户户都超越等级地享受，奢靡无度。所以，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人民就都去追求奢侈浪费、僭礼的生活，这并不需要到家里去宣传劝导，而是时势潮流驱使他们这样去做的，这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

而且这还不止，世间奢侈的风气越来越重，服饰都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越来越昂贵，而农业这个本业却越来越低贱，务农的人、种桑的人很勤苦，但是收入却很微薄，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但是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那会怎么样呢？这样就导致农夫都放下了锄头去雕花刻镂，织女也放下了织机去学习刺绣。如此一来，亲自耕种的人越来越少，从事末业的人越来越多。荒地虽然有开垦，但是因为人们没有把心思放在种地之上，所以没有尽心尽力地去耕种、收割，怎么会有丰收的年景呢？财富都集聚在少数人的手里、商家的手里，百姓穷匮，于是很多人就沦为奸寇、强盗了。国家的仓库越来越空虚，监狱却人满为患。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丰登，那受饥挨饿、流亡过世的人就不可胜数，而由于从上到下都很穷匮，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互相接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国家是以人民为根本，人民是以粮食作为命根的。现在粮食都没有人去耕种，人民不能够保命，这个根本就削弱了。根本被削弱了，国家也会陷入危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

这告诉我们，中国古人之所以“重农抑商”，是有一定原因的。

因为农业付出得多，收入得少，而工商业付出得少，收入却很丰厚。两者有着鲜明的对比。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的话，亲自去耕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贞观政要》其实也秉持了这样一种“节欲则富民”的理念。书中讲，“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啖腹，腹饱而自毙”。为君之道，必须先使百姓能够生存，安居乐业。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就像割了大腿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但是终究会身亡。如果想使天下安定，必须首先使自身端正。没有自身端正但是影子却是歪斜的，没有上面治理得很好下面却是混乱的。“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真正伤害人身的并不是外界的事物，都是人过分的嗜欲导致的灾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如果这个君主沉迷于美食，放纵于享乐，欲望越来越多，所带来的损失也就越来越大，既妨害了政事，也侵扰了百姓。“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再说出一些不符合礼义的话，百姓就分崩离析了。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我每每想到这一点，就不敢放纵、过分地安逸。这是告诉我们，历代的明君能够治理好天下，缘于他自己率先垂范，节制自己的欲望，能够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

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鲁哀公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政治最急迫的事没有比让人们富裕长寿更重要的了。哀公就问：“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孔子就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就是说，征徭役不要太多，收的税不要太重，这样的话民众就会富裕了。要重视礼乐的教化，让人民远离疾病

和犯罪，这样人民就可以长寿了。鲁哀公接着又说：“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他说，如果我真的按着你说的话来做，很少地征收徭役，减轻税敛，那我们这个国家不就很贫穷了吗？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不知道《诗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吗？‘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平易近人的仁德君子执政，他是百姓的父母。既然是百姓的父母，哪有子女富裕而父母贫穷的事呢？”意思是说，君是百姓的父母，百姓都富裕了，做国君的怎么会贫乏呢？这告诉我们，在古圣先贤看来，国君和百姓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而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二）爱出爱返，福往福来

战国时期，邹穆公爱民如子，对百姓很宽厚，对自己的供奉很刻薄，因此在他过世的时候，全国的百姓都非常的哀痛。即使是邻国的百姓，也朝着邹国礼拜表示哀思，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听到有人弹琴瑟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仁爱的国君。所以《贾子》上说：“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的人，百姓也一定以仁爱之心对待他；给人们福利的人，他也是有福之人。

邹穆公他是怎么做的呢？有一个故事，说邹穆公有一个命令，喂养野鸭、大雁一定要用粃谷，而不能用粟米（就是小米）。等到粮仓里的粃谷用光了，他就派人到民间拿着小米去交换粃谷，两石的小米换一石的粃谷。官吏觉得这样太浪费了，就向他请示：“我们给人家两石的小米，却只换来一石的粃谷来喂养这些野鸭和大雁，那还不如直接用小米去喂它们，不是很好吗？”邹穆公说：“你说得不对。你知道吗？百姓光着脊背辛勤地耕作，不敢懈惰，难道

是为了要喂养这些鸟兽吗？粟米是人上等的食物，怎么能用来养鸟呢？你只知道算小账，却不知道算大账。周朝有一个谚语说‘囊漏贮中’，盛粮食的口袋漏了，粮食还是漏在了更大的容器里。你没有听说过这个道理吗？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我们把粮仓里的小米转移到百姓的家中，难道这就不是国家的小米了吗？让鸟吃这些粃谷，为的是不伤害我们国家的粟米。小米在我们的仓库里还是在人民那里，对我有什么区别呢？”意思是说，这些小米在我的仓库和转移到人民的手上，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人们听到这里，就知道了他们自己私积的粮食和公家是一体的，这就是真正的富国之道。

邹穆公是以这样一颗心来对待百姓的，百姓有的就是他自己有的，确实和百姓是一体的关系。他这样爱民如子，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才换来了百姓如此的哀思。

（三）分配公平，不与民争利

爱民要富民，还要分配公平，分配不公就不是爱民的表现了。古人对这一点也有很多的阐述。

在《汉书》上就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现在的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砍伐薪柴非常的辛苦，还要支应徭役。春天不能够避开风尘，夏天不能避开暑热，秋天不能避开阴雨，冬天不能避开寒冻，四季之间没有一日可以得到休息。私下里还有送往迎来、吊问死者、探问疾病、养育孤儿、抚育子孙，这其中都包含了那么多的辛苦。另外，还会有自然灾害、暴虐的政治、赋敛的不适时、朝令夕改这些事情加到他们的身上。他们有的东西可能因为太多，半价就出卖了，没有的东西要用两倍的代价来获取，结果就有很多人卖了田地、住宅、儿孙来偿还债务，这就是农夫的生活。

那么那些商贾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大的商人积储了很多的东西，价格高的时候可以加倍地获得利润。小的商人坐在摊子上贩卖，因为他手里有着一些别人没有的货物，每天在市场上游荡，趁着上面征敛很急迫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得到的利润也是加倍的。所以，这些商人，男的不用亲自去耕种，女的不用亲自去养蚕织布，但是穿的却是非常豪华的丝绸，吃的也是珍馐美味。他们没有农夫的辛苦，但是大地所生产的东西却被他们所享用。又因为他们家产很丰厚，所以结交了那些王公大人，他们的势力可以超过官吏的势力，进行权钱交易。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游逛，冠盖相望，不绝于路。这样就导致商人兼并了农夫，农夫流离失所。而且农夫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就可能作奸犯科。

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也很重视这种分配的公平。当社会有不公平的时候，臣下就要向皇帝劝谏，劝导皇帝重农抑商。

当然，利民还包含一点，就是当官的人不能够和小民争利。在《史记》上记载着公仪休的故事。公仪休做宰相时，别人送给他鱼，他说：“我做宰相自己买得起鱼，不用别人给送。一旦我因为吃了你的鱼，改天把宰相的位子给丢了，谁还给我送鱼呢？”公仪休非常重视法律的公平。他要求属下不能够与民争利。他家种的蔬菜非常的好吃，他就把自己家的蔬菜拔掉了。看到自己家的织工织的布非常的好、质量非常的上乘，他就让织女回家了，把织机也烧掉了。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自己家种的粮食、种的蔬菜这么好吃，自己家织的布这么好，那么谁还会去买那些农人的粮食呢？谁还去买那些织女的布呢？”所以，他强调做官员的人不能够与小民争利，这也是利民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四、恕民教民

（一）教化不行，罪不在百姓

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孔老夫子在鲁国做大司寇的时候，有父子两个人因为争讼来告状，孔老夫子把他们关在了同一间牢狱，三个月也没有进行判决。后来，父亲提出撤诉，孔老夫子就把他们给释放了，没有再进行追究。鲁国的大夫季孙听到了这件事，就很不高兴。他说：“我曾经听您说过，孝是治国的根本。现在杀一个不孝之人可以警诫全国的百姓都行孝，但是您不把他杀掉，还把他给放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孔老夫子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上司没有教导人们走正道、行孝悌，结果下属犯了罪、平民百姓犯了罪，就把他给杀掉，这不符合情理。“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不教导民众培养起孝心，而用这个“孝”来审判官司，这是杀无辜之人。“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全军溃败不可以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可以处置惩罚百姓。为什么呢？“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上面的教化不能施行，罪责不在人民百姓的身上。“夫慢令谨诛，贼也”。法令非常的不严谨，诛杀却很严谨，这是残害百姓。“征敛无时，暴也”。横征暴敛没有一定的时节、不适时，这是暴政。“不诫责成，虐也”。不事先警诫就苛求他做到，这是虐政。“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如果政事杜绝了这三个方面，然后才可以用刑。

（二）反复教化，不得已而用刑

那么，又该怎么样教导人们、给人们以道德的教化呢？这也是有步骤的。孔老夫子说：“既陈道德，以先服之。”首先要给人们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让人们顺服。人们明白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就不会轻易地去作恶了。

我们现在的社会看似重视道德教育，但是实际上人们没有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比如，我们从小到大也上了很多的课，但是很少有哪一堂课教过我们如何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就是说，没有把道德给大家宣讲，使之家喻户晓。

那么宣讲了道德之后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则尚贤以劝之”，要崇尚那些有德行的人，劝勉百姓向善。“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还是不行，就把那些不能遵守这些道德规范的人给废弃、给贬退，让人们有畏惧之心。“若是，百姓正矣”。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就端正了。“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倘若还有一些奸邪之徒顽固不化，最后才给他们以刑罚的制裁。这样，民众就能明理而知耻，羞于犯罪了。“是以威力而不诫，刑措而不用也”。于是，就不须使用严厉、苛责的政令，而刑罚也可以搁置不用了。“今世不然，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然而现在的世间却不是这样做的。现在的世间是什么样的呢？教育混乱，刑罚繁多，使人迷惑，人们不知不觉就犯了罪，结果又用刑罚来制裁他。刑罚越来越繁多，但是强盗却数不胜数。“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踰乎？”社会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刑法，人民怎么能不逾越这个刑法呢？

所以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先要给民众教化，如果人民没有接

受教育做了邪曲不正的事，那是应该给予宽恕的。宽恕了他之后，一定要给他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他知道做人的本分。

《汉书》上也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圣王都是承顺天道来从事政治。天道都是好生恶杀、有仁爱之心，所以圣王一定是把道德的教育作为首要任务，而把刑罚设置得非常简单。现在废除了古圣先王的道德教化，单单地用执法之吏来制裁人民，你还想让道德的教育化被四海，是很难成就的。

（三）用法严酷，祸在不远

《群书治要译注》二十卷补的《汉书（八）》上，就记载着一个酷吏严延年的故事。严延年身材短小，却精明强悍，办事灵活快捷，即使是历史上以精通政务著称的子贡、冉有也未必能胜过他。他作为一郡的长官，他的属下凡是忠诚奉公的，他就会像自家人一样优待他们、亲近他们，且一心为他们着想，居官办事也不顾个人得失，所以在他管辖的区域中没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但是，严延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痛恨坏人、坏事太过分了，所以被他伤害的人很多。他尤其擅长写狱词以及官府文书，他想要诛杀的人就亲手写奏折。因为他很擅长写狱词、奏折，所以上面核准判定一个人的死罪，很快就通过了。因为他狱词写得很好，大家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就把这个人很快判成死刑。到了冬天要行刑的时候，他就命令郡下所属的各县把这些囚犯都押解到郡上，集中在郡府统一处死，一时血流数里。为此，这个郡里的人都把他称为“屠伯”。这个“伯”就是老大的意思，说他是屠宰的老大。结果在他的辖区里，“有令则行，有禁则止”，

全郡上下都一派清明。有一次，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来看望他，本来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礼。但是，她到洛阳的时候，正好碰上严延年在处决犯人，她一看血流了好几里地，很震惊，于是就住在了道旁的亭舍，不肯进入郡府去住。严延年出城到亭舍拜见母亲，但是母亲却关门不见。他在门外脱帽叩头，过了好一阵母亲才愿意见他。见了面，母亲就斥责道：“你有幸当了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但是没有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让他们平安，反而利用刑罚大肆杀人，以此来建立威信。难道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就应该这样行事吗？”他的母亲深明大义，知道他做得不妥当。严延年就赶忙向母亲认错，重重地叩头谢罪，还亲自为母亲驾车，把母亲带回郡府去住。祭祀完毕之后，他的母亲就对严延年说：“苍天在上，明察秋毫，岂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想不到我人老了，还要看着壮年的儿子身受刑戮。”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已经预测到他以后结果一定不会很好。她说：“我走了，离开你回到东边的老家去为你准备好葬身之地。”他的母亲回到家乡，见着他们同族的兄弟，也把以上的这些话讲给了他们。过了一年多，严延年果然出了事。东海郡的人没有不称颂严延年的母亲贤明智慧的。

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凡是古代深明大义的人，都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那么我们从政，一定要顺应天道，要以仁恕之心待民，不能够过于苛刻。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他是百姓的父母官，所谓的“民之父母”，本应爱民如子，哪有父母官对儿女这样屠戮的呀？如果他把人民放在了自己的对立面，把能够逮捕多少人、杀戮多少人作为自己的功绩去称颂，毫无怜悯之心，这个是与天道不相符的，结果一定不是很好。所以古人看到他的所作所为，就能评价出他的兴衰成败了。

（四）不得已而执法，虽罚不怨

相反，一个人即使身为执掌刑罚的司法官员，只要他有仁爱之心，也会受到人民的爱戴。

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孔老夫子的弟子季羔在卫国当司法的狱官。他亲自判处了一个人刑罚，给他实施了断足之刑，就是把他的双足给砍掉了。后来卫国有动乱，季羔逃跑。被他砍掉双足的这个人恰好正在守护城门，他就对季羔说：“这墙上有一个缺口。”季羔说：“君子不跳墙。”他又对季羔说：“里边有一个洞。”季羔说：“君子不钻洞。”这个人又说：“这里边有一间房屋可以藏身。”季羔就进去了。当这些追他的人都走了，季羔要离开的时候，就对这个被实施了断足之刑的人说：“我不能够亏损君主的法律，所以亲自把你的双足给砍掉了。现在我遇到了危难，这正是你报怨的时候。但是你却帮助我逃跑，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人就说：“砍断我的双足是因为我犯下了罪过，是无可奈何的事。在以前我看到您要用法律治我罪行的时候，是先判了别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是希望我能够得到减免，这个我看出来了。在我被判定了罪刑，将要行刑的时候，您面带忧愁，有一种伤痛之心见于颜色，这一点我也观察到了。您这样做并不是对我有什么偏袒，而是像您这样的君子，自自然然就有这种表现，看到人民犯罪他是一种哀怜之心：你看，这个人因为没有受教育，被处以刖足之刑，这多可怜！多值得同情！这就是我之所以爱戴您、帮助您的原因。”孔子听了这件事后就说：“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其子羔乎！”意思是说，子羔做官吏真是不错！虽然都是在依法办事，但是心存仁恕之心树立的就是德行，太过严厉苛暴树立的就是怨气。既

能够公正，又有德行，有这种关爱百姓的心，子羔做到了！

这就是说，同样是做司法工作的人，但存心却不一样。有的是虐民，用残酷的刑罚对待百姓，树立自己的威严，且以此为荣耀，而有的却是心存怜悯之心，那百姓对他们的回报也是截然不同的。

（五）为人着想，小人可为君子

中国人所受的教育是看到人做坏事就非常的痛恨，与他产生对立。事实上，通过感化的方式来帮助人反而是更好的方式。

有一个幻灯片，题目叫《母亲的借据》，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母亲在中学教政治，爱教训人，爱板着脸讲大道理，不仅学生怕她念紧箍咒，连家长也怵她。

十五年前的一天，我和母亲从亲戚家借了钱后回家，为省下坐车的钱我们选择走小路。我们急匆匆地走着，谁都不说一句话。在过一个小桥时，我右脚的鞋子掉了下来。借着穿鞋的工夫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天已全黑，耳边再次响起亲戚的话：“年底治安乱，今晚别赶回去了。”但母亲谢绝了亲戚的好意，借到钱我们很高兴地从亲戚家出来。母亲笑着说：“想吃巧克力吗？我明天给你姐俩称半斤。”

那件事发生时我们离家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一声凶巴巴的“站住，别动”，两个男人像山一样堵住了我们的路。我哆哆嗦嗦地拽着母亲的手。母亲捏捏我的手心，轻轻说：“不怕，有妈妈！”

那是两个男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棍子，夜色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我想他们脸上肯定杀气腾腾。我知道我们该跑，可我也清楚，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无论如何都跑不过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我急

得要命，母亲却低头望了望我，她神色平静、面色从容。母亲很有定力，遇到这样的事还是很冷静。

可怕的沉默之后，右边的男人说话了：“我只想要钱！”他似乎并不比我们轻松，我捕捉到他话音里的颤抖。母亲没吭声。男人继续说道：“我们真不想伤害你们！我们也没办法，辛辛苦苦打工一年老板带钱跑了，我们必须拿钱回家过年。你们城里人好歹比我们容易些。”说话的人语气倒老实，可他的棍子凶神恶煞般地戳在那里。我很清楚，此时稍有不慎，我们就会受到伤害。

对峙片刻，母亲忽然叹着气，从口袋里拿出蓝色手绢，手绢里包裹的是刚刚借来的二百元钱。我记得那是四张崭新的票子，每张面额五十元。男人看到钱，自然地伸出他空着的手。“慢！”母亲把钱往怀里一缩，她说：“这钱不能让你们抢走！”那人的手停在半空。母亲说：“如果今天你们抢了我的钱，不管数额多少，你们都是犯了罪的。我知道你们有难言之隐，可法律不管那么多。不光法律判你们的罪，就是你们自己内心深处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的罪。”这个时候母亲竟讲起课来，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但她仍然不慌不忙地说：“我现在写张借条，不管你们多久还钱，五年也好，十年、二十年也好，甚至你们没钱还也好，只要记住今天你们没有抢，你们是借我的钱。我希望你们以后也不要抢别人的钱。”

说完话，母亲从口袋里摸出纸笔，在黑暗中凭感觉写了张借据。她把钱和借据一起放到那个人的手里，说：“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至于你们的名字，回去后你们自己填吧！”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歹徒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愣了片刻，互相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拿上钱和借据跑了。

余下的路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失望极了：母亲居然向两个手拿棍棒的劫匪写下世间最愚蠢的借据！那个春节，尽管母亲还是给我们

买了巧克力，可是我心里很难过，关于那张愚蠢的借据我始终无法释怀。我想这绝对不是母亲平日嘴里所说的勇敢。

两年后的一天，母亲从学校下班回家，她手里拿着一张汇款单，上面的数额是一千块钱，汇款人的名字却是陌生的。附言栏上这样写着：“谢谢您没让我们走错路！”

曾被我认为“非常愚蠢”的那张母亲写下的借据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就是因为他们听了母亲的劝告，虽然在窘迫之下拿走了母亲的钱，但是也引起了他们的忏悔心，最后有钱的时候还加倍地来偿还。

中国人有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还有句话说：“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激之，则君子可使为小人。”这位母亲用的就是“愧之”的方法，让他们生起了惭愧心，结果小人也变成了君子。

这位母亲特别的难得，难得就在她的仁爱之心。即使遭到别人抢劫，她都没有生起对立之心。这种仁爱之心，就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这位令人敬佩的母亲，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老师了。面对歹徒，她是那么的镇定、仁慈和智慧，她救两人于罪恶之门，并感化他们悔过、向善，实在是功德无量！修善积德就在这平日待人接物、起心动念之处吧！古人说，“公门好积德”。作为一个平凡的母亲，她都能够这样地感化强盗。那么作为官员，如果能够有一片仁慈之心，能够爱民如子，相信也有很多的人会被感化。

（六）要教百姓，先教自己

《晏子》记载，齐景公问晏子说：“明王之教民何若？”圣明

的君主是怎样来教导人民的呢？晏子回答说：“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养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于下者，必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下从其教也。”首先要使教育明确，法令也明确，做君主的人要率先垂范。“养民不苛”，就是对待人民不是很苛虐，而是要用刑罚来防止他们做作奸犯科的事。要求臣民做到的，上面的人、做领导的人必须先做到；禁止于人民的，那自己也一定不去违反。这样的话，属下才能够服从他的教诲。“称事以任民，中听以禁邪，不穷之以劳，不害之以罚，上以爱民为法，下以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违也。”就是说，衡量事情的轻重来任用民众，司法很公正，这样才能够禁止邪恶。不让民众非常的劳苦，也不能够用刑罚来残害百姓。上面的人以爱民为原则，下面的人就会以相亲相爱为道义。这是圣明的君主教导民众的方法。

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教民，首先领导者要受教育。我们翻开四书五经，没有看到有哪一句话是教导百姓的，全都是在劝导领导者和君主的。百姓受到教化，实际上是从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间学到的。他们不需要教育，需要教育的是领导者和君主。所以现在很多人学了《弟子规》，认为《弟子规》很好，就说“赶紧给我的儿子买一本让他学一下”。其实这样不仅起不到教育的效果，反而还会让他产生逆反之心。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表现出来的全都符合《弟子规》的要求，儿女就从他的父母身上学到了《弟子规》。

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之所以不能够深入人心，就是有两个重点没有做到。第一，没有从孝道开启人的爱心。所有的亲爱的原点就是这个孝心，但是我们没有教导人们孝敬父母。建筑物没有一层，就想要二层、三层、四层、五层，效果就不会太好，建的都是空中楼阁。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认为古代的道德教育、儒

家的这些伦理道德都是统治者用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也是这样去做的。我们认为谁需要教化呢？老百姓需要教化！我们确实是拿着这些道德教百姓，而自己并没有做到，也不去学习、不去力行，结果“言教者讼”，你用言语去教导人们，人们就给你起争讼、逆反，说：“你都没有做到，还怎么教我呢？有什么资格说我呢？”结果百姓都不会去做上面所命令的、所倡导的事。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应该领导者率先垂范学习“仁义慈悌”的道理，把它表现在自己生活、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我们的属下自然会受到感化，从领导者的身上学到了什么是“仁义慈悌”。这才是教民的正确方法。

第七讲 任贤使能，纳谏远佞

——《群书治要》中的用人之道

一、用人之道，事关重大

《群书治要》中把用人的重要性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用人关系国家治乱

《毛诗》上讲道：“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任用贤德、有能力之人是周室中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书》上讲道：“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这是总结历史发展得出的一个经验教训。《典语》上也讲道：“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社会治理的好坏、安危，不是由其他什么原因所导致的。“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如果君主喜欢有才华、有德行的人，且贤能的人在领导的位置上，国家

政治就会清明。如果君主喜欢逢迎巴结的人，且邪恶之人干预朝政，则祸乱就不可避免。

《墨子》中提到一般人对于治理国家、任贤使能并不重视，有个很形象的比喻：现在的王公贵族都想使他的国家富裕、人民增多，希望法令都能够合理有序运转，但却不懂得尚贤使能。从这里可得出结论：士君子只明于小术，而不明于大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假如现在的王公贵族，有一只牛羊不能够杀，他一定会找个好的屠夫来屠宰牛羊；如果有套衣服不能够裁制，他也一定会找好的裁缝来缝制；如果有一匹病马不能医治，也一定会找好的兽医来医治；如果有张破弓不能张开，也一定会找好的工匠来修补。虽然身边有骨肉至亲、无缘无故富贵起来的人和相貌俊美的人，但知道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技能，所以一定不会让他们去做这些事，唯恐他们败坏了自己的财物。王公贵族们对于这些事尚且知道尚贤使能，但是对于治理国家，却不知道任用贤能。真正治理国家政务时，王公贵族们就不假思索地举荐、任用他的骨肉至亲、无缘无故富贵起来的人和面貌姣好的人。由此可见，这些王公贵族热爱他的国家还不如热爱他的坏弓、病马、衣服和牛羊之类的财物。所以说，天下的士大夫、君子都是明于小术，而不明于大道的。

这个比喻形象恰当，说明我们对于一般的财物都知道去爱护，但对于治理天下却不是如此，都是任用自己的亲人、徒有其表的人和富贵的人。

《说苑》上也说：没有恒常安定的国家，也没有恒常得以治理的百姓。如果得到贤德的人，国家就会安昌，失去贤德的人，国家就会危亡。从古至今无不如此。

《新序》中记载着魏文侯的一个故事。魏文侯非常重视贤才，

每次路过段干木居住的巷子门口时，一定会站起身来，扶着车前的横木向他致敬。仆人不解，就问他原因。魏文侯说：“这不是段干木居住的巷子吗？段干木是一个贤德的人，我怎敢不对他伏轼致敬呢？段干木是因为有德行而荣光，我不过是因为土地广阔而荣光。段干木富有的是道义，而我富有的不过是财富。土地不如德行，财富不如道义，我理应重用这个人。”所以他就给了段干木百万的薪禄，而且经常去向他请教治国的道理。魏国的人知道后，都非常的欢喜。没过多久，秦国想兴兵攻打魏国。司马唐且听到此事后，就劝谏秦国的君主说，段干木是个贤德之士，而魏文侯对他礼遇有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这时还不该去攻打魏国。秦君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就按兵不动，不去攻打魏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能够重用贤德的人，让天下人都为之叹服，不敢轻易对它有所企图。为什么？《孟子》中提到：一个人一定是先侮辱了自己，然后才被别人侮辱；一个家庭一定是先自己毁灭了自己，才让别人看到这个家庭有机可乘；一个国家一定是自己内部先起了纷乱，别的国家看到这个国家不团结，才会打它的主意。所以，一个国家如果内部团结一致，特别是任用贤德的人，使上下都有公心，不自私自利，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别的国家也不敢对它别有企图。

《潜夫论》上也说：国家为什么会乱？怎么能够判断出国家将要混乱呢？关键是看这个国家是否重视贤德的人。为什么有的国君重视贤德的人，有的国君不重视贤德的人呢？不重视贤德的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君喜欢财货。《六韬》上说，如果在上位的国君喜欢财货，群臣就都喜欢获得利益。贤德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自私自利，欲望对他没有诱惑。贤德的人一旦不被国君

重用，就会隐居起来。这个国家因为没有兴起好的教导——伦理道德的教育，于是人的自私自利的心都生起来，国家的祸乱也就到来了。

《新序》中还记载着一个典故。秦国要去讨伐楚国，先派使者去看一看楚国有没有什么宝器。楚王听到后，就把令尹子西召过来，问他：“秦国要观一观我们国家的宝器，我们国家的和氏璧、隋侯珠是不是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呢？”令尹子西回答说：“我不知道。”楚王又召昭奚恤，询问他这件事。昭奚恤答道：“秦国是想看一看我国政治的得失而另有企图。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宝器在于贤德的臣子，像珍珠玉器这些玩好之物，算不上国家最宝贵的东西。”楚王听他回答得很有道理，就派昭奚恤来应对这件事。昭奚恤就在东面设立一个高台，在南面建了四个高台，在西面建一个高台。等秦国的使者来时，昭奚恤对他说：“您是我们国家的客人，请到东面的上位就座。”令尹子西坐在南面的高台上，然后太宗子敖、叶公子高、司马子反依次坐在南面。昭奚恤自己就坐在西面的高台上，对秦国的使者说：“您想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宝器，楚国的宝器是贤德的臣子。能够治理百姓，充实仓库，使百姓各得其所，有令尹子西在这里。手里拿着珪璧出使诸侯，能够化解彼此之间的仇怨，结交两国之间的友谊，使双方没有战争的忧患，有太宗子敖在这里。能够保卫国土、谨守边疆、不侵犯邻国，邻国也不能够侵犯我们国家，有叶公子高在这里。治理军队，整修军器装备抵御强敌，手里拿着战鼓激励百万民众，他所任用的人都可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有司马子反在这里。缅怀先王霸业所成就的功绩，能够吸取治理动乱的经验，有我昭奚恤在这里。请您尽情地观看吧。”秦国的使者听后，惊讶地无言以对，回去就向秦君禀告说，楚国有很多贤德的臣子，这时出兵

打它，还不是时候。因此，秦国就没有去征伐楚国。

可见，历史上贤明的君主都是以贤臣为宝，而不是以珍珠宝玉为宝，因此国家得以安定。如果在位的人喜欢珍珠宝玉这些财富，结果会怎么样呢？《孟子》上讲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从上面的领导者到下面的老百姓，都去争相获取利益，这个国家就处于危险之中。《盐铁论》上对这件事也做了一个评论。“隋和，世之名宝也，而不能安危存亡”。隋侯珠与和氏璧，虽然是世间名贵的宝物，但是它有什么用呢？并不能使危亡的国家得以安存。所以，“喻德示威，唯贤臣良相，不在戎马珍怪也”。你要彰显自己的威德，只有靠贤臣良相，而不是这些珍禽、异兽、珠宝等等。因此，圣王以贤为宝，而不以珠玉为宝，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二）用人关系民风善恶

《后汉书》上讲道：“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一定要进用贤德的人，让他们来处理朝政。如果是真正贤德的人在位，不过几个人，社会人心就会得到转化，民风习俗也会由恶变善。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道德学问的皇帝把儒、释、道三家的大家选为国师，自己跟着国师学习，对国师礼遇有加。因为儒、释、道的大德们都能够身体力行，而皇帝又对他们如此恭敬，通过“上行则下效”，整个社会就兴起了追求道德、爱好仁义的风尚。因此，如果我们能够选拔那些德才兼备、对传统美德有认知的人，每天在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相信不过两三年，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广东一个县的电视台每天都选择最佳时段，在新闻联播前

播放一小时蔡礼旭老师的“幸福人生讲座——《细讲弟子规》”，整个县的风气逐渐好转，不孝敬父母、兄弟争讼的人有所减少，离婚率也下降了。有一次，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按时播放这个节目。出乎预料，有很多老百姓纷纷打电话到电视台来咨询情况。这说明，只要有一个频道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人们就能分辨是非善恶，从而做到扬善抑恶，达到一正压百邪的效果。所以说社会风气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任用的人是否贤德。

《文子》中指出了国家不任用贤德之人的原因。“上多欲即下多诈，上烦扰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争。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清朝自康乾盛世直至慈禧专政的历史，恰反映出贤德的人得不到任用的原因。康乾盛世时，有请儒、释、道的大德到宫廷里讲经的传统。皇帝带着群臣、妃嫔一起学习，上下思想高度一致，连自私自利的心都很少萌发。但慈禧太后当政后，她每天听讲经，总感觉这些大德在讲她。她就废弃了宫廷讲经的传统，于是自私自利的心又开始生起。最后，西方的列强看到中国有机可乘，就挑起侵略战争。

因此，领导者之所以不能任用贤德的人，没有兴起教化，原因是他自己的欲望太多。自己欲望太多，就不愿意听圣贤教诲，因为听后他也做不到。他知道民众学后，就能分辨是非善恶，即使是民主选举，也不投自己的票，所以他不任用贤德的人，唯恐民众明了一切。

《文子》上说，社会上层的人欲望很多，底层百姓就会兴起欺诈之风；上面的法令非常的繁多，而且经常没有条理，下面的百姓就不安定；上面的人有很多贪求，下面的人就会交相争夺利益。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在枝叶上解决问题，就如同想止

住水却开凿河渠、想要救火却往火里放木柴一样。

这告诉我们，要想任用贤德的人，必须有圣王出现。《文子》中提到：“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人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德也。”圣明的君主在世，他会把他喜爱的和厌恶的明确地宣告天下，让人们有正确的行为规范，通过非议、称誉来引导舆论，通过亲近任用贤德之人、鄙视并罢退不肖之徒来治理国家。刑罚虽已颁布，但却能放置不用。这是因为礼义道德得到推行，而贤德之人得到重用的缘故。也就是说，如果有贤德的君主出现，而且能够任用贤德之人，兴起伦理教化之风，那么，社会的风气要转好也不是一件难事。

（三）用人关系领导者个人安危

广义上讲，“君主”不仅仅是指一国之君，也包含了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他任用什么样的人，也关系到他自身的命运。

1. 谨慎任用身边人

《蒋子万机论》中讲道：“夫君王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君王治理国家，必须有贤德的人辅佐，才能达到国泰民安。因此，君主被称为头脑，臣子被称为四肢，就像身体一样，他们必须相互协调，才能治理好国家。因此，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君主的正邪。

《体论》上讲道：“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当领导的人，一定要审慎地选择他所亲近的人。如果亲近的人正直，就没有人不正直。人主能够正直，国家就兴起正气。

对于领导者身边的人，小心谨慎地任用达到何种程度呢？《尚

书》上记载：古代圣王所使用的侍御仆从，即他身边的秘书、司机、保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罔匪正人”，没有一个不是正直的、道德高尚的人。这些人从早到晚服侍在君主身边，君主才能受到正人的监督，自己的行为才能正确。同时，古人还设立了一个“大仆正”的官员，专门教导侍御仆从。他们的职责不是要谄媚、巴结领导人，而是要监督领导的一言一行，并且指正他的过失。正所谓“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君主身边的人都是正直之人，君主就能正直，如果君主身边的人都是阿谀奉承之人，久而久之，这个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洋洋得意，以为自己真的像他们所谄媚的那样好。所以古人特别强调，不要让那些阿谀逢迎的人留在身边充当自己的耳目之官。

由此可见，古代领导者对自己德行修养的要求的确非常的严格，因为他知道自己也有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人生而有五欲六尘的喜好，一旦自己的欲望打开，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必须依靠他身边的人时时提醒他、时时监督他、时时校正他，才不至于做错事。

《说苑》上记载着一个典故。齐桓公请教管仲，问治国最大的忧患是什么。管仲说，最担心的是“社鼠”。桓公不明白，管仲就说，“社”（指土地的神像），是把很多的木头捆绑在一起，然后在上面涂了泥做成的。因为神像中间一般都是空的，老鼠就常以神像为托身之所。如果你用烟熏它，就怕烧了一整根木头也烧不死老鼠；用水灌它，又怕把神像上面的泥给毁坏。老鼠不能杀死，是因为土地神像的缘故。齐国也有“社鼠”，就是君主身边的这些人。君主身边的人如果不正，就会蒙蔽善恶，让君主无法了解实情。君主身边的人仰仗君主的庇护，就会在百姓中夸耀自己的权势而鱼肉乡里。不诛杀他们，会给国家带来混乱。诛杀

他们，他又是人主所庇护的人，很难把他诛杀掉。因此这些人正是国家的“社鼠”。所以，治理国家，最担心的是君主身边的人不正。

清朝时，提出用人“莫用三爷”。何为“三爷”？指少爷、姑爷、舅爷。这些都是君主身边有亲属关系的人。如果用了这些人，别人会因为他和君主关系亲近，即使他做错了事，因为自己关系疏远，也不敢去向君主进谏。如果他们做错了事，用法律制裁他们，就会伤了彼此之间的恩情。如果不用法律制裁他们，又会落得徇私舞弊的罪名。所以要慎用这些亲属。

这告诉我们，越是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越要选择那些有德行的人，送他们去参加传统文化的学习，让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理念，然后再委以重任。如果他没有接受传统文化的学习，就对他委以重任，很容易出问题。

《体论》中也说：“故准圣主明君，莫不皆有献可退否纳忠之臣也。”凡圣明君主，没有一个不任用可以奉献可行之计、斥退邪恶、进献忠心的臣子。也就是说，这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圣王明君，是因为身边有这些可以犯颜直谏、忠诚不二的臣子不断地给他提醒，不断地校正他的行为。

《吴子》上记载着一个故事。魏武侯和群臣谋议国事，群臣没有能赶得上他的。退朝之后，他面露喜色，因为群臣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吴起看到后就进谏说：“楚庄王和群臣谋议国事，群臣都赶不上他，他退朝之后就面带忧愁。什么原因呢？他说，我听说世上不会没有圣贤人，国家也不会缺乏贤德的人。如果能够得到贤师，这样的国君能够称王；能够得到贤友，这样的国君可以称霸。现在我既不是一个有才能的国君，而我手下的群臣又都比不上我，我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楚庄王所忧虑的事情，恰恰

是您所喜悦的事情，我为此替您深感忧惧。”魏武侯听后甚感惭愧，意识到楚庄王如此贤明都以自己得不到贤才辅佐、手下群臣不如自己而忧虑，何况自己未必比得上楚庄王。当然，好大喜功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喜欢出名的人，都会认为群臣不如自己是好事。结果他的用人方式就如“武大郎开店——一个不如一个”，致使事业难以兴盛。

2. 用人得当，领导者安逸

用人用得得当，自身就会很安逸，不会劳苦奔波。《尸子》上讲道：“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如果能够任用贤德之士，那么自身会很安乐，名声自然跟随而来，事情少而功绩多，国家得到治理，自身也能够安逸。

《说苑》上记载，孔老夫子的弟子宓子贱在治理单父时，弹着琴，自己没有离开公堂，单父就得到了治理。孔老夫子的另一个弟子巫马期也治理单父，他披星戴月，事必躬亲，忙碌得不能安居，不过单父也得到了治理。巫马期就问，为什么宓子贱弹着琴，很安逸地就把单父治理好了呢？宓子贱回答，我的做法是“任人”——任用贤人，而你的做法是“任力”——靠的是出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逸也。”出力的人，他肯定会劳苦奔波。任用贤德的人，他自身就会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够治理好。宓子贱属于后者，四肢安逸，耳目不劳，平心静气，让百官把事情给治理好。巫马期却不然，他损害自己的性情，而且辛苦地亲自去教诲百姓，虽然使单父也得到了治理，但是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根本在于领导者自身有德行，又不嫉贤妒能，信任那些贤德的人，对他们委以重任，这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

《淮南子》也告诉我们，在古代，虽然法律设立起来，却没

有人触犯，刑罚都可以放置不用，并不是因为该惩罚时没惩罚，而是因为百官都能各守其责，各种政绩都兴盛、成功，各项事业都治理得很好，礼仪道德都建立起来了，根本就没有人触犯法律。

任用贤德的人，具体的做法，是把天下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三公；把国家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九卿；把一县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二十七大夫；把一乡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用为八十一元士。都是以他们才能的大小，给以适当的官职，让他们做合适的事。道德教化由天子达至百姓，以位重的人来制约位轻的人。所以，上面一倡导什么，下面的民众就跟着应和什么；上面有所行动，下面也会自然跟随。四海之内同归一心，都背弃贪婪鄙陋，而心向道义。用这样的办法来教化民众，就像风往哪儿吹草就往哪儿倒一样，没有人不跟从。这就告诉我们，古代任才都是以德行、才能高低为取舍，而不是任人唯亲，或徇私枉法。

《体论》上有段阐述说：君主之所以需要忠臣谋士来辅助，是因为如果没有忠臣谋士来辅助他处理众多的政务，那他一定会有很多细微之处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君主的尊贵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在于他能够随顺自己的志趣来调养自身。当他想享受欢乐时，就有高雅的音乐充盈于耳，古玩珍宝足以悦目，美丽的姿色满足欲望，漂亮的衣服正合其身；想要登高远眺、极目展望时，就登上耸立入云的高台；想逍遥自在，就穿过有飞阁的楼观，嬉戏于碧水清池，游览于桂林芳园，戏射野鸡与大雁，跟踪飞鸟，追逐走兽，出行有佳丽为伴，回宫有美人共处。像这样，又怎能体会到穷困、忧愁的悲哀，了解鳏寡孤独的难以忍受呢？

用餐时，则有烹煮食物的钟鼎，用以切肉的砧板，美味佳肴

多种多样，五味俱全。珍馐美味摆满了厅堂，音乐声起开始用餐，鸣钟之后撤去宴席，一道一道的美食交替而上，口中的美味不断，又怎能感觉到饥馁的苦楚、困窘的难堪呢？

天热的时候，盖上薄如云雾的绉纱，穿上细葛布做的衣裳，居住在有华丽帐幔的高大房舍，安处于有重重浓荫的北向庭堂，揭开美观的丝帐，迎来清凉的轻风，破开凝冻的冰块，遏止轻微的暑热，侍奉起居的人摇动着粉扇，主管穿衣服的人更换薄衫，飘飘然似有秋日的凉爽，又怎能体会到炎夏的酷热、怎能知道酷热的难耐呢？

寒冷的时候，则身着棉袍，套上软软的皮衣，盖上锦绣的被子，铺上貂皮褥子，还有层层叠叠的垫子，处于幽深的居室之中，身在重重的帷幕里，房角烧红火炭以提高温度，献上玉杯盛着的美酒以抵御寒气，暖呼呼地如同夏日的温热，又怎能体察到隆冬的惨烈、知道严寒的难耐呢？

以上这些确实是君主无从得知的事情。其他众多的隐微之事，以上面这些情况来类比，就可以知道必定会有被君主遗漏而不被明察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忠心的臣子怎能不辅助君主开阔视听，以使其醒悟呢？

也就是说，君主身处万人之上，日理万机，要关心的事情很多。君主有荣华富贵可以享受，且被服侍得很周到，自然会有很多隐微的事情被他遗漏，不能体会一般百姓的苦楚。因此，就必须依靠贤明忠心的臣子来辅助他，他才能够洞察百姓的疾苦。比如说齐景公。下了三天的雪，天也没有放晴，他穿着狐白的貂衣，坐在温热的室内。他说：“奇怪了，下了三天的雪，也不觉得寒冷。”晏子就说：“天真的不寒冷吗？”这句话就提醒了齐景公，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后来晏子就对他说：“圣明的君主自己吃得饱，

就想到饥饿的百姓；自己穿得暖，就想到挨冻的百姓；自己很安逸，还能想到劳苦的百姓。可是君主您却不懂得这些道理啊。”齐景公一听就说：“你说得很好，我一定会领受你的教诲。”此后，他就开仓放粮，把仓库里的皮衣皮裤都拿出来救济贫寒的百姓。所以，君主高高在上，很难洞察隐微之事，确实需要有这些忠心的臣子不时地加以提醒，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袁子正书》上也说：“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贤乎？”你想安处天下大道，而你的智慧不会穷尽；兴办天下的大业，思虑也不会枯竭；能够统一百家之言，而不费口舌；兼听古今言论，而心智不感到疲倦。靠什么来达到呢？只有靠任用贤德的人才能办得到。这就告诉我们，任用贤德之士，能够使君主不费劳苦，自身安逸，进而使天下得到治理。

3. 用人不当，必致败亡

《昌言》上有段话说得很好。“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这段话是说，君主所任用的不是自己的亲属就是自己宠幸的人，所爱的不是美女就是谄媚巴结的人。以自己的观点相同与否作为评判好人坏人的标志，根据自己的喜怒来行赏行罚。喜欢美女就忽视了朝政，不理国家大事，黎民被冤枉、被残害。虽然对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违背四时之礼；审判案件，都是在冬日的时候来行刑。用于占卜的蓍草和龟甲，堆积于庙门之中；用以祭祀的纯色的牲畜，都成群成对地系在竖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

占星台上不下来，祝史跪在祭坛旁不离去。纵然做到了所有这些，也无益于挽救他的败亡。

这就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寻找国家治乱安危的原因。国家的治乱安危，并不在于你找人来算一卦，就可以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即使算卦的人能够推断出灾祸，但想要避免，还是要靠积德行善。积德行善，就能使整个社会风气转好，人们都做有道德的事。当然还要上行下效，在上之人能够率先垂范，任用贤德的人，用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百姓做一个表率，这一点尤其重要。

《说苑》上说：“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君主要想平治天下，而且使自己名垂不朽，必须要任用贤德的人，礼敬读书人、士大夫。所以《易经·益卦》说：“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身处上位，而能够以礼敬的态度对待在下位的人，他的前途一片光明。《易经·屯卦》又说：“以贵下贱，大得民。”虽然身处高位，但能够谦恭地尊敬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够大得民心。“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将怀远而致近也”。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够布施恩德，而且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够安抚远方的人，而使近处的人亲附。“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你的朝中没有贤德的人，就像鸿鹄没有翅膀一样，虽然想翱翔千里，但最终也不能够达到。那么，如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呢？“是故绝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所以你想横渡江海，就要依托于舟船；你想走远路，就要依托于马车；你想称霸天下，兴起王业，就必须依托于贤德的人。“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如果你所任用的不是合宜的人，而想成就功业，就如同在夏至当天还期望夜晚更长一样、向天射箭以求能射到鱼一样，是

不可能的。“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这样的事对于虞舜、大禹这样的人都是很困难的，他们都会陷于困境，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这就是说，要成就霸业的话，必须依托贤明的人。

《晏子》上记载着一个齐景公的故事。齐景公有一次问晏子：“我的先君齐桓公，曾经率领兵车三百辆，九次会盟诸侯，统一天下。现在我率领的兵车有一千辆，可以赶上齐桓公的业绩、在他之后一统天下吗？”晏子回答：“齐桓公率领兵车三百乘，九次会盟诸侯，一统天下，是因为他左有鲍叔牙、右有管仲的辅佐。而现在您左右全是娼优。谄媚、邪恶的人在前，阿谀奉承的人在后，又怎么可能赶上齐桓公而成就霸业呢？”这就从侧面告诉景公，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他能够任用贤才、信任贤才。如果你也想称霸天下的话，不是效法他有多少的兵力，而应该效法他有任用贤人的智慧和肚量。显然，用人关系到君主的成败。

4. 不知觉醒，最为可悲

《体论》上说：人没有不想安存而厌恶危亡的，没有不想得到荣耀、安乐而厌恶劳苦、受辱的。但是很多人都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又免不了他们所厌恶的。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按照规律办事。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宫室又高又华丽，一定会悬重赏以求良匠来把这个宫室建造好，对内不因为他是亲戚就任用他，对外也不因为他和我的关系疏远就遗漏他，必须要得到适合的人，才把这份工作交给他。这样，建起来的宫室才又高又华丽，住在这里很安逸、很快乐。而在求取辅佐之臣的时候，却不像寻求建造宫室的人这样有公心，所求的都是谄媚巴结的人、亲近的人。所以“图国不如图舍，是人主之大患也”，意指你为国家谋事，还不如去谋划一个宫室，这是君主最大的忧患。

那么，领导者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来辅佐自己呢？

《韩诗外传》上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的智慧像有源头的活水一样源源不断，他的行为可以做大众的表率，这样的人可誉为“人师”；他的智慧可以砥砺磨炼人，他的行为可以辅正人，这样的人可称为“人友”；他严格按照法律来行事，奉公守法，忠于职守，不敢做错事，不敢为非作歹，这样的人可誉为“人吏”；在他人面前一味讨好对方，使人高兴，人家一呼喊他，他就连声答应，这样的人被称为“人隶”，如同奴隶一样。上等的君主以“师”为辅佐，中等的君主以“友”为辅佐，下等的君主以“吏”为辅佐，使国家危亡的君主是以“隶”为辅佐。所以我们观察一个人所任用的人，就可知道他的兴衰成败。

“欲观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有同样敏锐眼光的人，能够互相发现；有同样敏锐听力的人，能够互相倾听；志同道合的人，才会相互跟从。所以说，“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任使，有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也，可无慎乎”。不是贤德的人，他就不能够用贤，因为他发现不了贤德的人，即使有贤德的人在他身边，他也认识不到。因此，君主任用的辅佐之臣，关系到君主存亡的征兆、得失的关键，怎么能够不谨慎呢？这些都告诉我们，任用什么样的人，对于领导者事业的兴衰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汉书》上讲道：“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秦朝为什么灭亡呢？就是因为能够谏诤的人被诛杀，阿谀奉承的人受到赏赐，善言凝结于忠臣的口中说不出来，国家的命令都是出于谗邪之口，这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贾子》上记载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梁怀王对贾子说，现在人把能够得到天地之道的人称为“先生”，这是为

什么呢？贾子就说，“先生”这个号是个泛称，大可称国君，中可称卿大夫，下可称一般的平民百姓。如果为其正名的话，它不是“先生”而是“先醒”，即“先生”来自于“先醒”，即先觉醒。有的君主没有学治国之道，终日茫然不明得失，不知道治乱存亡的根本原因，每天匆匆忙忙，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而贤明的君主好学不倦，勤于治国之道而不觉厌倦，因此，他很聪慧，较先明白治国之道。一旦治理国家，他就知道怎样把国家治理好；国家还没有混乱，他就知道国家混乱的原因；国家还没有安定，他也知道如何使国家安定；国家没有危亡，他也知道它危亡的根源何在。这样的人称为“先醒”，就是先觉悟、先觉醒。

世间的君主，有先醒者，有后醒者，有不醒者。下面就分别举三个例子。

楚庄王与晋国交战，大获全胜。回来路过申侯的封地，申侯为他进奉饭食。但到了日中，楚庄王还没有吃饭。申侯就来请罪。楚庄王叹道：“这不是你的过失。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君主是贤明的君主，又有贤师来辅佐的人，可以称王；君主是中等的君主，又有良师来辅佐的人，可以称霸；君主是下等的君主，他的群臣又没有一个赶得上他的，这样的人一定会灭亡。’现在我是下等的君主，而我的群臣又没有人能比得上我。我也听说过，‘这个世间不会缺少贤德的人’，而天下有贤德的人，我却得不到，像我这样的人，生活在世上，还吃什么饭呢？”这就是说，楚庄王虽然战胜了晋国这样的大国，他的道义都能够使诸侯顺从，但是他还想着怎么样得到贤良的人来辅佐自己，到了日中都忘记吃饭。这样的人可称得上是明君了，这被誉为“先醒者”。

宋昭公逃亡到了边境，喟然叹了一口气说：“唉，我知道我所以灭亡的原因了。因为自从我称王之后，我身边事奉的人有数

百人，无一不说我是圣明的君主。在内听不到我的过失，在外也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沦落到了今天的地步。我今天有这样的困境也是应该的。”此后，他洗心革面，白天学道，晚上讲道，这样勤学不厌。两年之后，他的美名远闻。宋人就把他迎回来，重新使他复国，终于成为一代贤君。死后，人们给他一个谥号，称为“昭公”。这个例子就是说，他亡国后又醒悟存亡的原因，所以被称为“后醒者”。

还有一个“不醒者”。从前虢国的国君骄纵放逸，而且自吹自擂，谄媚巴结的人都受到了重用，亲属也受到了重用，犯颜直谏的臣子都被诛杀放逐，致使政治一片混乱，整个国家的人都不服从他了。后来，晋国就举兵讨伐他，虢君被迫出走。他逃到一个水泽地，说：“我渴了，想喝水。”他的车夫就给他敬献了一杯清酒。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饿了，想吃饭。”他的车夫又给他敬献些肉干、干粮等等。虢君就很高兴地问：“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啊？”车夫就说：“我已经储备很久了。”虢君就问：“你为何要储备这些东西呢？”车夫说：“是为了国君您逃亡的时候，防备路上饥渴而准备的。”虢君就问：“你早知道我会有逃亡的这一天吗？”车夫说：“我知道。”虢君说：“那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劝谏我呢？”车夫就说：“因为您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话，而厌恶正直的话。如果我过去劝谏的话，恐怕早就没命了。”虢君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于是，车夫就赶紧谢罪，他说：“对不起，我的话确实有点言过其实。”虢君问他：“那我为什么逃亡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车夫说：“国君您不知道，您之所以逃亡，是因为您太贤明了。”虢君就说：“贤明是可以使人生存的，我却落得逃亡的地步，是什么原因呢？”车夫就说：“因为天下的君主都不贤德，只有君主您贤德，所以才会逃亡。”虢君听了之

后喜笑颜开，说：“唉，你看，是贤德使我落得了如此困苦的地境呀！”后来，他走到山中，又困又饿，很疲倦，枕着车夫的腿就睡着了。这个车夫趁他睡着时，把自己的腿撤走，用一个石块代替，自己就离去了。而这个虢君就饿死在山中，最后被禽兽所吞食。这就是一个已经灭亡了还不醒悟存亡原因的人，这就是“不醒者”。

这几个故事对比非常鲜明，告诉我们什么叫“先醒”、“后醒”、“不醒”。这个车夫对虢君这样的忠心，虢君逃亡时还跟着他一起逃亡，还为他准备了逃亡的清酒和干粮，确实是忠心可嘉。在逃亡途中，车夫想劝谏君主，告诉他为何如此落魄，君主却不愿接受劝谏，仍喜欢听逢迎巴结的假话。最后，这个车夫看他无可救药，才不得不离他而去。所以说，并不是身边没有贤明的臣子，而是君主不贤明。只有贤君能够任人唯贤，任用那些一心一意辅正他、可以犯颜直谏的人。

以上是第一个问题，讲的是用人的重要性。

二、用人原则：任贤远佞

用四个字来概括用什么样的人，就是“任贤远佞”。

《说苑》上记载，周成王将要行成人礼，即行冠礼，周公让祝雍来做一些祝辞，并要求他要简明扼要。祝雍就说：“使王近于仁，远于佞，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意思是，希望大王能够亲近仁德的人，远离奸佞的人，珍惜时间，惠施财物，任用贤德的人和有能力的人。这里就提出“任贤使能”这个用人的

标准。

用人特别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孔子家语》上说：“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迓也。”弓必须调好之后，才能使它成为强劲的弓；马必须让它驯服之后，才能够成为良马；士必须谨慎、诚实，才能让他再求智能。如果士没有诚敬之心，而多才多艺、能力很强，就像豺狼一样不可亲近。

因此，有人把人才分成几个层次：第一，“有德有才是正品”。这个人既有德行，又有才能，是我们社会、我们团体所急需的，比作“正品”。第二，“有德无才是次品”。这个人有德行，没有才能，培养一下，他还是可以使用的，虽然不像“正品”那样用得好，但是也勉强可以用。第三，“有才无德是毒品”。这个人有才能，但是没有德行，他就是“毒品”，言外之意是，这种人会对我们社会、我们团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比如一个人，他的电脑技术很好，却没有用来服务社会，而是去黑其他网站。显然，这种人才越高，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所以“有才无德是毒品”，不可以亲近，也不可以使用。最后，第四种，“无才无德是废品”。当然这样的人比较少。

《韩诗外传》上记载，孔老夫子说，士有五种，有家里有权势的士人，有家庭富裕、资财雄厚的士人，有天资勇猛、强悍的士人，有智慧聪敏的士人，有相貌美好的士人。如果家里有权势的士人，却不用尊贵的权势爱护民众、实行道义，反而以它暴戾傲慢民众；家庭富裕的士人，不用财富赈济穷苦的人，反而凭它奢侈糜烂，过着没有节制的生活；天资勇猛、强悍的士人，不用勇敢保卫国君、攻城野战、建功立业，反而用它欺凌百姓，而且挑起私人之间的争斗；智慧聪敏的士人，不用智慧为国家出谋划

策，反而用智慧做邪恶的事，而且掩饰奸诈的行为；相貌美好的士人，不用美貌统御群臣、治理民众，反而用美貌蛊惑女子，以满足私欲，这些士人就丧失了他们各自的美好的禀赋。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优势，应按着这些优势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而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择手段地利用这些优势去做坏事。

那么，具体来说，应该用什么样的人呢？

（一）任用孝廉之人

自古以来，中国就把“孝廉”作为人才选拔的根本标准。

1. 孝

《孝经》上说：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而能够爱其他的人，这是和德行的本质相背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亲，而尊敬其他的人，这是和礼的本质相背离的。试想一下，一个人出门在外很久了，都不愿意回家看望他的父母，这样的人，连父母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而想着去报答，他能够对领导忠心吗？如果他对领导很忠心、很听话，那也是因为有图可图。《弟子规》开篇就讲“入则孝”，而“入则孝”前面有四句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如果父母叫我们时，我们都爱答不理，让我们去办什么事，也不认真负责，这种态度会影响我们以后对领导、对同事、对工作的态度。一个人对待领导不负责任，大吼大叫，甚至一不高兴，就把他的老板给炒掉，其原因是他在家对父母就经常发火，动不动就生气，不高兴就离家出走。把这种态度带到工作上，就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中国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因为一个孝子有恩义、有情义、有道义，他不会做出见利忘义、忘恩负义的事。如果在家你能做到“父母呼，应勿缓”，到了企业、单位、团体，你就能够做到领导呼应勿缓、老板呼应勿缓、老师呼应勿缓。所以，这个态度，我们反省来反省去，其实都来自于对家庭、对父母的态度。

我们学习《弟子规》，重在力行，而不是谈玄说妙。背了很多名言，把《弟子规》当成知识，倒背如流，默写得一字不差，那没用，和我们的修身没有任何关系，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态度。

孔老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学《群书治要》呢？我们是为了提高自己做学问、做事的能力，还是为了学习一些名言警句，在我们同事、朋友面前炫耀？如果我们读经典的目的，是为了在他人面前展现我们的学识，张扬自己的好口才，那么这种学问是“为人之学”。而真正有学问的人，他是要把所学的东西都力行到生活中去，通过修养自身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2. 廉

(1) 不贪

“廉”，首先意味着不贪。一个人如果欲望过重，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就会去做一些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事。《大学》上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要从格物开始。格物，是格除物欲的意思。在财色名利、各种诱惑面前，都能够把持住自己，如如不动，这样的人才能够格除物欲。但是，人的欲望一旦打开，自己都难以控制。虽然学了圣贤教诲，习气还是很重，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可能因为习惯的原因，仍会犯过失。颜回问孔老夫子什么是“仁”，孔老夫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如果你能够克服自己的欲望，回归到礼的要求，按着礼的规范、教诲来检点自己的行为，来要求自己，这样就能够达到仁了。而《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和《十善业道经》这些经典上所讲的，都是最基本的礼。

所以，修身是真实的功夫。修身好不好，就在于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境界，例如面对财色名利时，有没有动心，有没有贪心。如果你有贪心，甚至还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这说明我们的修身做得不好，说明我们学习传统文化还处在幼儿园水平，还没有入门。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修学程度的浅深。

一个人学得越多越谦虚，因为越和圣贤人比起来，越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如果一个人学得越多就越傲慢，觉得别人都不如我，那么他为学的方向就错了。所以，圣贤书不可一日不读，圣贤教诲不可一日不听。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古时候，几乎人人都学习圣贤经典，每个人从小在私塾里学的都是四书五经，社会的风气都是崇善抑恶，讲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这样的环境下，三日不读书，还面目可憎。而现在我们周围的人，很少有人读圣贤书，很少有人按照圣贤书的教诲来要求自己，每个人告诉你的都是如何去享乐、如何追求奢华的生活。但我们这些人确实非常幸运，在这样一个花花世界、五欲六尘的诱惑之中，我们还有机会学习圣贤经典，还经常有老师在身边提醒、指正我们。而如果遇不到圣贤经典，我们也会和一般的社会大众一样，醉生梦死，每天都是吃喝玩乐，享受不断，就像猪猡一样地生活。猪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它不思考人生的方向、人生的价值何在，更不会想到提升自己的灵性。因此，我们不应辜负这个难得的生命，应重视修身。修身应从格物做起，每天对照《弟子规》、《太上感

应篇》反省自身，看看自己哪些地方还没有做到，这才叫修身的功夫。

古代人看官员能不能够任用，就看他是不是有贪心，也就是说看他够不够理智，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是否能保持清醒的态度。《后汉书》上记载着杨震不受“四知财”的故事。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的途中，路过昌邑县，他过去举荐的秀才王密当时正任昌邑县令。当王密知道自己的恩人路过此地时，就趁着夜色，带了十斤黄金，要呈给杨震。杨震拒不接受，并且叹了一口气说：“唉，我了解你，知道你有德学，把你举荐出来，可惜你却不了解我。”王密还以为杨震是怕这件事被人知道才不愿意接受的，所以他就说：“这件事没有人知道，您就放心地接受吧。”结果杨震回答说：“这件事有天知、有神知、有你知、有我知，这是‘四知财’，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他拒不接受这“四知财”。他这种廉洁的作风影响了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乃至曾孙，他们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非常的显达。他的后代子孙为了纪念祖先这种廉洁的作风，把他的一个房屋取名为“四知堂”，以此来提醒后代子孙，他们的祖先不收“四知财”。所以凡是杨家的子孙走过这个匾额的时候，都能够受到提醒，时刻警醒自己，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行给祖先抹黑。

（2）廉正

“廉”，除了不贪，还有廉正的意思。《潜夫论》上有这样一句话：“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贤德的人作为臣子，他不会一味地谄媚巴结君主来损害君主的威德，不会阿谀奉承众人而苟且容身，不会败坏公家的利益来任意处事，他也不会歪曲法律而畏惧权贵。他的贤明能够明察奸邪，他的道

义使他不结党营私。这才是廉正的臣子。

《后汉书》记载着一个祭遵的故事。祭遵是颍川人，曾经跟着光武帝出征黄河以北，并被任命为军市令。在光武帝的族中，有个小儿犯了法，祭遵就按照法律，严格地把他处死了。光武帝听了这件事，非常生气，想命令人把祭遵收监。当时任主簿的陈副就进谏说：“您常常想让军纪严明，现在祭遵奉法不避权贵，这就是想让军令严明，使法令得到实施。”光武帝听这话有道理，于是就赦免了祭遵，并且任命他为刺奸将军。光武帝还经常告诫将领说：“应该小心祭遵，我们家族中的一个小儿犯了法尚且被他杀掉，那他也一定不会对你们这些将领有所偏向。”光武帝平定了黄河以北之后，又把祭遵拜为征虏将军。

由此可见，贤明的君主用人，都是用那些严格执法、不徇私枉法的人。光武帝任用祭遵，给他很高的待遇，祭遵也严格要求自己，所受到的赏赐都分给手下的人，确实是做得非常好。他过世的时候，光武帝亲自去送他，看到他曾经坐过的车马，都痛哭流涕。他过世很久之后，光武帝还经常对群臣说：“怎样能够找到像祭遵这样忠于职守、奉公守法的臣子呢？”光武帝也很了不起，因为他能够任用廉洁奉公的人。

《孙卿子》中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你顺从国君的命令，而这个命令执行下去对国君是有利的，这才叫顺。如果不是真正对他有利的事，你也去顺，那就不叫顺了。“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遵从君主的命令，实际上对君主并没有利益，这叫谄媚。“逆命而利君，谓之忠”。就是违抗了君主的命令，但这件事是对君主有利的，这叫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如果违抗了君主的命令，而做的事也不利于君主，这叫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谓之国贼”。什么

叫国贼呢？就是不考虑、不担心君主的荣辱，也不考虑国家的善恶、风气如何，一味投合大众，或者投合君主，苟且容身，为了保持自己的俸禄，和很多人都结交，这样的人叫国贼。我们反思自己日常的所作所为，是顺、是谄、是忠还是篡呢？千万要避免做国贼。

（二）任用德化百姓之人

要重用圣贤人。《吕氏春秋》上说，忠臣孝子是当君主、做父母亲的人都特别想得到的，荣华富贵也是做人臣、做人子的所希望的。但是，君主得不到忠臣，父母得不到孝子，臣子、儿女也不能够得到自己的富贵显荣。这都是因为不懂得礼义所导致的，而不知道礼义是因为不学圣贤教诲所导致的。所以，古代的圣王，没有人不尊师重道。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尊师，无从了解大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以及世俗的观念，那很可能会走冤枉路。

《荀子》上讲，“非我而当者，吾师也”。能够批评我，且批评得很恰当，这样的人就是我的老师。“是我而当者，吾友也”。他表扬我，但表扬得恰当，这是我的朋友。“谄谀我者，吾贼也”。我本没有真才实德，没有能力，而他为了让我高兴，谄媚我，奉承我，这样的人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区分清楚，我们身边的人是师、是友，还是邪佞之人。

前不久，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他跟我说，你看蔡老师、钟博士他们讲课都是满面春风，面带笑容，看着很欢喜，但你讲课的时候满面寒风、冷冰冰的。其实我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一向都比较严肃，所以讲起课来也是如此，可能给人的印象就

不像那些老师那么柔和、满面春风。虽然我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当我收到这条短信时，心里还是很不舒服。这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很重，平时走到哪里，人家都是赞叹我们、夸奖我们，我们已经习惯于听赞叹话了，所以一收到这样的短信，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但幸运的是我们学了《群书治要》，明白批评自己且批评得当的人是吾师，因此，尽管非常客气地、很尊敬地回了短信，但是最初的一念还是有点不开心，这就是习气使然。

中国历史上，任用大臣都是任德不任力，首先看他的德行。晋文公在逃亡的时候，陶叔狐跟从着他。晋文公返回国之后，他三次封赏，都没封陶叔狐。陶叔狐就去见咎犯，说：“我跟从着君主逃亡已经十三年了，面色都变黑了，手足都长了老茧，可是现在君主返回国，三次行赏都没有轮到我。是君主把我忘了呢？还是我有什么大的过失呢？”结果咎犯就把这句话告诉了文公。晋文公说：“我怎么会忘了这个人呢？能够用道使我精神专注，用义来说服我，使我的名声得以显扬，使我成为德才兼备的君主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奖赏；以礼来规范我，以义来劝谏我，使我不能够为非作歹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次一级的封赏；那些勇猛强壮的勇士，有难在前，他就冲锋在前，有难在后，他就在后断后，让我免于危难，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第三等的赏赐。陶叔狐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吗？能够为人效死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生命；和人逃亡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国家。三次行赏之后，就应该轮到有劳苦功绩的人了，而有劳苦功绩的人，陶叔狐应该是第一位，我怎么敢把他忘了呢？”后来周朝的内史听到了这句话，他就说：“晋文公要称霸了吧。”因为古代的圣王都是“先德后力”，优先重视的是德行，而不是劳力。晋文公可以称得上做到这一点了。这就告诉我们，能够以

德行教化百姓、言传身教的人，应该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因为他可以使你的国家兴盛，而不至于有覆亡的危险。

《尸子》上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它说，如果你们家的房屋着火了，有人赶来把火给救了，你会对他感恩戴德。而年老的人、有经验的人很早就告诉你，把这个墙的缝隙涂好，要谨慎地做好这个烟囱，让你终身没有失火的忧患，但你却不知道对他感恩戴德。如果你现在被抓进了牢狱，有人使你免于牢狱之灾，你们家三代的人都会对他感恩戴德。现在的问题是，圣贤人教导人“仁义慈悌”的道理，让人终身都没有牢狱之灾，但是人们却不知道对他感恩戴德！

《孙卿子》在谈及用人时也说道，“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这种人口里所讲的是圣贤的教诲，又能够身体力行，就像孔子一样，他自己所说的自己全都做到了，这种人被誉为国宝。“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这种人口里讲不出圣贤的道理，但是他能够身体力行仁义礼智信这些规范，这种人被称为国家的重器。“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这种人口里能够讲得很好，但是不能够身体力行。不能身体力行，并不是说他作恶，而是不能够行得很好，还有一些不圆满之处，这种人是国家的用具。“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这种人口里讲的全都是好话，所作所为却是恶的，这是国家最邪恶的人。“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尊敬“国宝”，爱戴“国器”，任用“国用”，并且除去“国妖”。

“国妖”并不仅指国家的臣子。其实在我们的集体里、社会上也都有这样的人，就是身行的是恶，但口里讲的是善，阳奉阴违。结果让人看了之后，不仅不会对传统文化生起信心，还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恰当，让人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这对社会、

团体的危害是最大的。所以弘扬传统文化的人，特别要小心谨慎。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是在给人做表率，可能我们一个微小的恶或者是一个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会让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所以我们要格外地严格要求自己。

（三）任用犯言直谏之人

第三种就是敢于犯颜直谏的人。这一点古书上讲得特别的多，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韩诗外传》上记载，晋平公到河里去游玩，很快乐，他就说：“怎么样能得到贤士共享这种快乐呢？”划船的人就跪下来对他说：“我们的君主不喜欢贤士罢了。珍珠产生于大江大海，玉器出于昆仑山，它们没有长脚，但是来到了我们的国家，原因是君主您喜欢它。现在有贤士，贤士长着脚，但是没有来到我们国家，是因为您没有真正喜好贤士的意愿。怎么能担心没有贤士呢？”平公说：“我的食客，门左有一千人，门右有一千人。早晨的食物不够吃，就派人晚上去征收赋税；晚上的食物不够吃，就早晨派人到市场上征收租税。怎么还说我不喜欢贤士呢？”划船的人就说：“鸿鹄一振翅就能飞翔千里，所依靠的是它翅膀上的六条强劲有力的茎羽，而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增加一把不会让它飞得更高，减损一把也不会让它飞得更低，您现在的食客不过是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罢了。”意思是说，真正有用的、贤德的人少之又少。《诗经》上说，谋划的人太多，事业就不能成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个团体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并不是人越多就越好，真正有贤德的、有能力的人是最重要的。

《新序》上也记载着，晋平公向叔向请教国家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叔向回答说：“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大臣为了保存自己的禄位不敢犯颜直谏，身边的近臣因为怕犯罪不敢直言向君主禀报，结果下情不上达，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大臣重禄不进谏，是因为君主没有雅量，不愿意听人家的劝谏。所以这些大臣也会投其所好，说他喜欢听的话。古代圣明的君主，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会引导属下去犯颜直谏。

《吕氏春秋》上记载，赵简子把他的一个叫栾黶的臣子沉到河里去了。他说：“我曾经喜欢音乐、美色，栾黶就把这些呈现在我面前；我曾经喜欢宫室楼台，栾黶就为我建设好；我曾经喜欢良马和善御者，栾黶也给我送来了。而我现在喜欢贤士已经六年了，但是栾黶却没有给我进谏一个贤人。这是在助长我的过失，而减损我的美德。”能够以道理来督察责罚他的臣子，这样的君主就可以和他们共同做善事，而不可以和他们做错事；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做正直的事，而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做邪妄的事。赵简子这件事，表明了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引导臣子去做正当的事。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以理督责于其臣”。

还有一个关于赵简子的典故。赵简子曾经说过：“赵厥爱我，尹铎就不爱我。为什么呢？因为赵厥向我进谏时，一定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而尹铎在进谏的时候，就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质问我，一定要让我出丑。”尹铎说：“赵厥他顾惜的是君主您的脸面，怕您出丑，而不顾惜您的过失。而我是顾惜您的过失，而不顾惜您的颜面。如果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质问你，怕的是您不会改变。”我们看了这个故事，不要觉得赵简子他分不清谁是良臣、谁是可以犯颜直谏的人。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一典故说明了赵简子的贤

德。因为“人主贤，则人臣之言刻”，如果这个人主非常的贤德，他的臣子对他的要求才会非常的严厉，对他的批评才非常的彻底。他有尹铎这样能够在天庭广众之下斥责他、质问他的臣子，说明他的胸怀很广大，能够任用这些犯颜直谏的人。

《吕氏春秋》上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贤明的君主最重视的无过于士，之所以贵士，就是因为他能够犯颜直谏。如果他说的话非常的直接，那么这个君主就能够看到自己邪曲不正的地方。然而君主的通病，就是他既想知道自己的过失，但是却又厌恶直言。这就如同把水的源头阻塞了却想得到水一样。如果我们想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那就要任用那些可以犯颜直谏的人。就像我们脸上有一个黑点，出去之后怕人看见觉得没面子。别人告诉你说，你脸上有一个黑点，你尚且对他感恩戴德。而我们做事有不足，人格上有欠缺，别人给我们指正出来，希望我们做得更好，我们为什么不对人家感恩戴德呢？

在现代社会，我们也要明白，能够真正指正我们过失的人很少，所以那些能够犯颜直谏的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亲人，他们是最值得我们珍重的人。他们经常直言不讳地指正你的过失，让你一听都很难接受，但是你细细想来，他们所说的话一针见血，说得非常精辟。

有个人在没学习传统文化之前，夫妻关系非常不好，因为他的妻子非常严厉，一批评他就没完没了，骂几个小时都不休止。他很难忍受，就想和妻子离婚。学了传统文化之后，他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师。这个老师就对他说，你妻子所说的话，一百句中有没有一句是对的呢？如果这一百句话中有一句是正确的，那你就听这一句、采纳这一句就好了，那九十九句你都可以忽略不记。于是，他采取了这个方法。从此以后，他的妻子一骂他，他就去

听她哪句话说的是对的，结果越听越觉得她说得对，越听越觉得她指正的全都是自己的缺点，把自己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他是越听越高兴。有一次，这个妻子把他骂了两个小时，他不仅没有生气，还端了一杯水放在桌子上，说你休息休息，骂了两个小时也挺累的。他真的是从内心感恩妻子指正自己的过失。你想，她骂了两个多小时，能不累吗？这样的行为一做出来，让他的妻子感觉到很意外，说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他说，我确实非常感恩你多年来对我的提醒，你说的话都是在指正我的缺点，把我的毛病看得一清二楚，非常的感谢。正是因为他这样一种态度，感化了他的妻子，所以他们现在的夫妻感情非常好，家庭和睦幸福。

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要举一反三，就是我们身旁的人，最关心我们的人，最爱护我们的人，指正我们的缺点，往往不考虑你能不能接受，目的是能够触动你的内心，让你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你才能够有所改正。

《吕氏春秋》上记载着一个典故。能意去见齐宣王，齐宣王就说：“我听说你这个人‘好直’（喜欢正直、直言不讳），有这回事吗？”能意说：“我怎么能称得上‘好直’呢？我听说过‘好直’的人，他的家不选在动乱的国家，他不会去见品德上有污垢的君主。今天我亲自来见您，而我们的家安住在齐国，怎么能说我喜欢直呢？”能意如果在君主之旁，他一定能够做到不阿谀奉承君主。如果他不阿谀奉承君主，君主所得的就不会少。这是为贤主所求，而为不肖的君主所厌恶的。

《吕氏春秋》上也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楚文王得到了“茹黄狗，宛路箭”，这都是非常有名的狗和箭。他到了云梦去田猎，三个月都不回来。他从丹地得到一个美女后，每天和这个美女在一起，一年都没有去听朝，不务朝政。后来，他的太保申就说：

“先王曾经卜卦，认为我作为太保是很吉祥的。现在您的罪理应受鞭刑。”楚王就说：“能不能变换一个方法，不要用鞭刑责罚我呢？”太保申就说：“我承继的是先王的法令，不敢废除。如果您不受这个鞭刑，我就等于是废弃了先王的法令。我宁愿获罪于您，也不愿意获罪于先王。”楚王听了之后，就说：“好吧。”于是，太保申把席子拉过来，让楚王趴在上面，把五十根细细的荆条绑在一起，跪着把它放在了楚王的背上。如此做了两次，说：“大王您可以起来了。”楚王就说：“既然有鞭笞的名义，你就不如痛快淋漓地、名副其实地打我一顿好了。”太保申就说：“我听说，对于君子，能让他感到羞耻就可以了；对于小人，才要让他感到疼痛。如果让他感到羞耻，他都不改变自己的行为，那让他感到疼痛又有什么帮助呢？”太保申说完之后，就站起身来出去，请求楚王把他处死。楚文王就说：“这是我的过失，太保您有什么过失呢？”他也被这个太保的忠诚所感动了。后来他就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把太保申重新召回来，杀了茹黄狗，折了宛路箭，把丹地的美女也放回去了，并且一心一意地治理楚国，最后他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使楚国的地盘非常广大。

楚文王后来能够有这样的功业，都是太保申犯颜直谏的功劳。《昌言》上说，人主有五种情况不可以劝谏：第一就是废除皇后、废除太子，第二就是对自己的情欲很放纵、不节制，第三就是专宠一个人，第四就是宠幸那些阿谀奉承的人，第五就是骄贵外戚。有这五种情况之一，都不能够犯颜直谏。言外之意，如果臣子犯颜直谏，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是这位太保申，虽然看到楚文王不节制情欲，而且宠爱一个人，仍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劝谏君主，可以说是忠义之士。

《易经》上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大王的臣子都忠

厚老实、犯颜直谏，这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人臣之所以能够忠厚老实、犯颜直谏，去进谏他的君主，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是想匡正君主的过失。如果君主有过失，这就是危亡的征兆。见到君主有过失而不去劝谏，就是轻视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轻视君主陷于危亡，忠臣是不忍心这样做的。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周围有能够犯颜直谏的臣子，冒着大不韪的、大不敬的后果，还能够劝谏你，这个人就是最忠心的人。

《政要论》上讲道，“贤人君子，不忍观上之危，而不爱身之殆”。贤人君子，不忍心看到他们的君主处于危殆的境地，所以他不关心自己的危难。“故蒙危辱之灾，逆人主之鳞，及罪而弗避者，忠也、义也”。所以他冒着蒙受危难、受辱的灾祸，揭开人主的龙鳞，即使有罪也不愿意去避开，全是一片忠义之心。唐太宗之所以能够任用犯颜直谏的魏征，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读《群书治要》手不释卷，他明白这些道理，知道能够犯颜直谏的人是忠义之士。

《说苑》还记载着一个魏文侯的故事。我们知道赵简子是一位贤明的君主，魏文侯也是如此。魏文侯的乐师在鼓琴，他就随着乐器翩翩起舞，并且唱到：“让我的言语没有人违背。”这个乐师听到后，就抱着琴去撞魏文侯。结果没撞中他，但是他冠冕上的玉串都被撞散了。魏文侯就对左右的人说：“做臣子的居然敢撞他的君主，他的罪该如何处置？”他的左右说：“他应该被烹杀。”于是，左右就把这个乐师提到下面去受刑。刚下了一个台阶，乐师就说：“我可不可以说一句话再死。”文侯说：“可以。”这个乐师就说：“从前尧舜做君主的时候，唯恐自己的言语不被人违背，而桀纣做君主的时候，唯恐自己的言语被人违背。所以我撞的是桀纣，而不是撞我的君主。”文侯听这话觉得很有

道理，就把他放了，说：“这是我的过失。把这个琴悬挂在城门口，作为我可以改过自新、接受谏言的凭证。这个帽子上的玉串就不要修补了，留它作为我的鉴戒。”意思是说，我一看到这个被撞碎的玉串，就知道我不应该做像桀纣这样的君主。所以魏文侯很可爱，可爱之处是他知过就改，这也是很难得的。

还有一个典故。魏文侯和诸位大夫在一起坐着，他就问他们说：“你们看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群臣都说：“您是仁德的君主。”而翟黄回答得很直接，他说：“您并不是仁君。”魏文侯就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翟黄就说：“您去征伐中山国，讨伐之后没有把中山封给您的弟弟，而把它分封给了您的长子。从这件事上我就知道，您不是一个仁德的君主。”结果，这句话把魏文侯触怒了，就把翟黄逐出了厅堂。到了任座的时候，文侯又问他说：“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任座就回答说：“您是一个仁德的君主。”“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任座回答得很巧妙，他说：“我听说，君主仁慈，他的臣子说话才会很直接，可以犯颜直谏。刚才翟黄的言语非常直截了当，不惜触犯您的龙颜。所以我从这件事上知道，您是一个仁德的君主。”魏文侯听了之后说：“嗯，说得好！”又把翟黄给召了回来。这两件事都表明魏文侯也能够接受谏言，而且知错就改。只要臣子说得有道理，他都会接纳。

《袁子正书》上也讲道：“夫佞邪之言，柔顺而有文；忠正之言，简直而多逆。”就是说，这个邪恶的、巴结的言语都是很温柔、很顺从的，而且还有文饰，让你听起来很痛快、很愿意接受；忠正的言语很简单、很直接，而且都和你的心思不符合。所以一般的人都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言语，而不愿意接受那些犯颜直谏的言语。

《吕氏春秋》上记载着一个反面的例子。齐宣王喜欢射箭，

他特别喜欢听别人称赞自己拉强弓。其实他平常所用的弓箭的拉力不过三石，每次他拿着弓给左右人看的时候，他们都会来尝试拉这个弓，结果拉到一半的时候就停止了。他们说：“哎呀，这个弓的拉力不下九石，如果不是大王您，谁能用这么强拉力的弓呢？”宣王一生都自以为他能够拉开九石的弓箭，这不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吗？如果不是能够犯颜直谏的人，谁不去阿谀奉承他们的领导呢？所以，“乱国之主，患在乎用三石为九石”。使国家混乱的君主，他的病在于把这个三石当成九石。这不仅仅是他的拉力的问题，而且包括他的道德和做事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本来做得不够完满，左右的人都奉承说做得非常好，我们讲课还有很多不到之处，很多人都说你讲得已经很好了，久而久之，我们的前后左右都为这样的人所充斥，我们就会自以为贤明，认为自己确实做得不错，就很难再提高了，因为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四）任用不嫉贤妒能之人

第四种是能够举贤而不嫉贤妒能的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韩诗外传》上记载着楚庄王与樊姬的故事。楚庄王一天和群臣商议朝政，谈得很开心，回来晚了。樊姬还在等着他，就问：“大王今天为何回来得这么晚呢？”楚庄王就很高兴地说：“我和贤德的臣子商议国政，不知不觉忘了吃饭，也忘了时间，所以回来晚了。”樊姬就问了：“您所说的忠贤之士，是我们诸侯国的人呢？还是来自其他诸侯国的人呢？”楚庄王回答说：“我所说的忠贤之士就是沈令尹。”樊姬一听说是沈令尹，禁不住笑了。楚庄王问其原因。樊姬就说：“自从我被选入宫，能够事奉大王

您，我何尝不想得到您的专宠呢？但是我还四处去寻找德才兼备的女子，来帮助您治理后宫。现在，她们地位超过我的有两人，地位和我一样的有十人。而沈令尹自从当了令尹之后，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为您举荐过贤德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被称为忠贤之士呢？”楚庄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隔日就把这个话说给了沈令尹，结果沈令尹也很聪明，马上向楚庄王推荐了孙叔敖。孙叔敖很有能力，协助楚庄王治理国家，三年便使庄王成为一代霸主。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真正贤德的人是不嫉贤妒能的人。为什么他嫉贤妒能呢？是因为有私心，他想的不是让这个团体更团结、做得更好，而是怕别人能力超过自己，受到领导的重用，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人气量很小，成就也不会很大。中国有句古话：“观德于忍，观福于量。”看一个人有没有德行，就看他能不能忍，能不能忍辱；看这个人有没有福气，就看他有没有度量，因为量大福大。

《孔子家语》上记载，子贡来向孔子请教，说：“现在的人臣，谁能被称为贤德的臣子呢？”孔老夫子就回答说：“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可以被称为贤者。”子贡就很好奇，他说：“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因为管仲协助齐桓公治理齐国，子产做郑国的宰相，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把齐国和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孔老夫子回答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说是出力的人还是进贤的人贤德呢？”子贡回答说：“当然是进谏贤德之士的人才能够称为贤明。”孔老夫子说：“对啊。我听说鲍叔牙能够让管仲显达，子皮能够让子产显达，而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有让比自己贤德的人显达的。”因此，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贤明，也要看他是不是嫉贤妒能，能不能够推荐那些德才兼备的人。

《说苑》上有这样一个典故，发人深省。这也是管仲所讲的。

有一个卖酒的人，他的酒器非常干净，他的酒旗也悬挂得很高，但是他的酒搁酸了也卖不出去。他就问邻居是什么缘故。邻居就说：“因为你们家有一只猛狗，别人带着酒器想来买酒的时候，这只狗就迎上去咬人，这就是你的酒卖不出去的原因。”其实，国家也同样有“猛狗”，“猛狗”就是国家里有权势的人，那些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想来辅佐国君，但这些有权势的人却迎上来诋毁、陷害，这就是国家的“猛狗”。

这就告诉我们，贤能之人之所以没有被采用，也是因为国君身边所任用的人都是那些嫉贤妒能的人。他们就像猛狗一样，生怕贤德的人来到国君的身边取代自己的位置，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因为古人能够认识到贤德之人对国家的安危成败至关重要，所以在制度上就有这样的规定，即“进贤者必有赏，进不肖者必有罪”，而不敢推荐人才的人，被称为“无能之人”。一旦这样的制度实行，臣子都愿意去推荐贤者。

（五）任用隐恶扬善之人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隐恶扬善。

《体论》上说：“君子掩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君子都是把别人的过恶加以掩饰，来长养自己的厚道善良。而小人却是毁谤别人的善行善举，而且自以为有功，夸耀自己的功劳。所以古人观人，也要观这个人的言语，看他所说的话是经常称颂别人、夸奖别人，还是经常毁谤别人、挑剔别人。

《格言别录》上也有这样一句话，“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行很高的人，他心平气和，他见到每个人都有可取之处，都有比自己强的地方、值得学习的地

方，所以他口里所赞叹的、肯定的人就很多。相反，“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德行浅薄的人，他的心地是刻薄傲慢的，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厌恶的地方、不如自己的地方、可挑剔的地方，所以他眼中瞧不起的人就很多。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是经常毁谤别人、挑剔别人，还是经常赞叹别人、称扬别人，就可知道这个人的善恶。

我对这句话感受深刻，也许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刻薄的人，看到别人做事，总觉得不如我，想着如果换了我去做，一定会比别人做得更好。其实真的把这件事交给我了，我可能做得还不如别人好。所以我们要经常看到别人的优点，称扬别人的善。《弟子规》讲：“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别人知道你在背后称扬他的善，他就受到了鼓励，他觉得自己做了这样小小的善事，人家都在背后到处去称扬，所以就更加勉励他去多做善事。“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如果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传，这本身就是一件恶，因为别人知道你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他对你非常的痛恨，无形之中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做领导的人应该都知道，“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有德行的人，他念念不忘的是整个集体能够团结一致、能够把事情办好，所以他不会到领导面前说别人的坏话。当然在开会的时候，要指出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应该畅所欲言，能够把这个问题摆在桌面上。开会之后，就不要在私下里说三道四，否则就有失厚道。

这就是我们看人、用人的基本原则：第一，任用孝廉之人；第二，任用言传身教、德化百姓的人；第三，任用能够犯颜直谏的人；第四，任用不嫉贤妒能的人；最后，任用能隐恶扬善的人。这就是领导在用人时要坚持的五个最基本的原则。

第八讲 八观六验，三参九虑

——《群书治要》中的观人之道

前面我们讲了用人的重要性，以及用什么样的人。我们再来谈谈如何识人、如何观人。

古人非常重视观人，原因有很多。第一，要知人善任，只有对这个人认识透彻，才能够委以重任，用之不疑。第二，要观察别人，首先要自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通过观察自己、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去观察别人。《孟子》上说：“知其性，则知天矣。”一个人能知道自己的本性，他才能知道万物的本性。所以他洞察了自己的这些特点，他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别人。第三，观人也是在提升自己的品性。我们观察别人，并不是要和别人钩心斗角，想出办法去对付别人，而是提高自己的德行，更好地去帮助别人。当然，这些也要靠经验，也要靠心地的清静。

《群书治要》中有很多具体的观人方法。在《吕氏春秋》上就说，观人必须外以“八观六验”，内以“六戚四隐”。

“六戚四隐”中的“六戚”，指的是父、母、兄、弟、妻、

子六种非常亲密的亲属关系。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人要委以重任时，首先要向他的父母了解一下这个儿子对父母够不够孝敬。如果这个儿子在家不能够孝敬父母，对父母没有恭敬心，那这个人对于领导也不能够尽忠。所以中国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其次，还要向他的兄弟了解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够尊敬兄长、帮助弟弟妹妹。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最亲近的兄弟姐妹都不能够给以帮助的话，他对朋友也好不到哪儿去。最后，还要问一问他最亲近的妻子、儿女。这些人整日和他生活在一起，对他的生活习惯、毛病、习气是最了解的。因为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可以装饰得很好，但在家里，一些坏的毛病、习惯就暴露无遗。因此，要通过这六种最亲密的亲属关系来考察一个人。

“四隐”是四种隐恶扬善的、可以信任的关系。第一，交友，就是他现在所交的朋友。第二，故旧，就是他以前交过的朋友。第三，邑里，即他的同乡。第四，门廊，即他的邻居。显然，这四种人对他的过去、现在都了解得很清楚。

因此，我们对人委以重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对这些人进行详细的调查，然后才能够委以重任。

一、观人八法

观人有很多具体的方法，我们概括为八个方面。

（一）观言

观言，即观察一个人的言语。《周易》上有这样一段话，对我们通过观察人的言语来看这个人的性情很有帮助。“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将要背叛的人，他的言辞就显示出惭愧不安；心中有疑虑的人，他的言辞表现出来就是散漫枝节；吉祥善良的人，他的言辞很少，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说“吉人寡言语”。“躁人之辞多”，一个人心浮气躁，内心很烦躁，表现在外面就是爱说话，言辞很多。“诬善之人其辞游”，诬陷好人的人，他的言语表现出来会游移不定。失去操守的人，他的言辞就会屈曲不直，因为他做了坏事，失去了品格，所以他就有理屈词穷的那种感觉。《了凡四训》上有句话，说一个人有很多的过恶时，“见君子而赧然消沮”，就是看到有德行的人、德行很高的人，他就感到非常的惭愧，不好意思，非常的扭捏。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的错事，他很惭愧，所以表现在外面，他的言辞也是屈曲不直。这是在告诉我们，应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语来了解一个人的品性。

《论语》中有很多关于言语的经典之谈。比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辞的好听，而伪装出和善的面目，也就是一味地去取悦别人，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之心。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在言语上应该迟缓，但是在行为上要敏捷、雷厉风行。正因为一个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不因为他说得很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他对你做出了很多承诺，但是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论语》上也说，“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个人言语很好听，

但他不一定有那个实德。这就告诉我们，既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

在《中论》上有一段关于言语的话，也非常有道理。“夫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不倦，喋喋如也”。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心智可以洞察到细小的环节，他的言辞也非常的巧妙、很有修饰，他的伶牙俐齿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他的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人断定疑惑。但是他喜欢言谈不知疲倦，喋喋不休。“夫类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然而在世间，那些可以按类归纳推理而能分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钝、被蒙蔽、不通达的人是多数，那谁知道他说得不正确呢？因为他的口才很好，甚至有很高的学历，说得头头是道，一般的世俗之人就非常相信他的话，但是他所说的可能是有违大道的。“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这就是他之所以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不被废弃、很低贱却不被人遗弃的原因。“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者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浇乱至道也”。古圣先王有个法律，巧说诡辩而曲解法令、混乱礼法和名分使其失去原意、行为邪僻却坚持不改、言语虚伪而能言善辩的人，要被处以死刑。

像孔老夫子，他当大司寇没几天，就把“行僻而坚，言伪而辩”的少正卯给诛杀了。因为少正卯的口才非常好，致使孔老夫子的很多弟子都被吸引去听讲。这些弟子都跟着孔老夫子学了很长时间，但是还不能够辨别哪一个是符合道的，只是因为少正卯口才好、能言善辩，就被吸引了。对于这样的人，只有把他给杀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会使民众产生疑惑，而且使治道混乱，让人分不清是非善恶。这就是说，虽然他口才很好，但讲的都不符合道，不符合自然规律，不符合人性，而这些东西都是能够迷惑民众的。

在《汉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张释之和汉文帝一起出行，文帝登上了虎圈，就是饲养虎的地方，向上林苑的主管询问关于禽兽簿上的各种事情。他问了十多个问题，上林尉却左顾右盼，一个都回答不上来。而在旁边有一个官职很低的啬夫，就代替上林尉来回答这些问题。皇上所问的有关禽兽簿上的问题他都非常熟悉，而且为了让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问必答、滔滔不绝，给人的感觉是他对这个禽兽簿很熟悉，而且口才很好。文帝看了，果然很欢喜。此刻，文帝也忘记了孔老夫子的教诲——“巧言令色，鲜矣仁”，文帝就说：“当官吏的人不就应该这样吗？”因此，他下诏拜这个啬夫为上林令。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最高长官，比上林尉的官职还要高。张释之看到后，就赶忙上前劝谏。他就问文帝：“您觉得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周勃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西汉的功臣，他因为被封在绛县，所以称为绛侯。文帝说：“他当然是长者了。”张释之又问他：“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呢？”张相如也是因为有战功才被封侯，他在西汉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中列居一百一十八位。文帝回答说：“他当然也是长者。”张释之就说：“绛侯、东阳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但这两个人在上书言事的时候，口里竟说不出话。您现在越级提拔这个啬夫，那不是想让大家仿效此人喋喋不休的口辩之才吗？秦国任用了只会舞文弄墨的刀笔之吏，这些人争相以亟疾苛察相比试，做事很急迫，督察又非常的严苛，认为这才是负责尽职。结果是徒有官文的形式，却并没有实际的德行，没有恻隐之心。秦始皇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逐渐地衰败。到了秦二世时，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因为这个啬夫能言善辩，就越级提拔他，我恐怕天下会随风响应，争相去追求能言善辩，而不求实德。况且下级顺从上级，他们的速度就如响之应

声、影之随行一样的迅速。因此，皇帝的一个政策、一个举动，都不能够不审慎、明察。”文帝听后，也受到警醒，称他说得好，就废弃了要把这个人封为上林令的诏书，也不再封他为上林令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古人评判一个人才，并不是看他说得多么漂亮。

《傅子》上说，“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如果君主喜欢德行，那么属下都会纷纷地去修养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欢言谈，下边的人都会争相地修饰自己的言辞、能言善辩，向这个方向发展。“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人人都重视修养品行，天下的仁义之风就兴起来。人人都去学能言善辩，虚伪的风气就会兴起。这是必然的征兆。“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德行的成就是很难的，也很难被发现、被看见，而言语是很容易被撰写的，也很容易取悦人。“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古圣先王都知道言语很容易，而且爱听好话的人很多，所以并不崇尚言谈。“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尠矣”。如果不尊崇贤能之人、重视道德，即通过引导人们向善来教化百姓，却只以一句好话来取悦人，那么天下背弃道德，追求言辞修饰、能言善辩，来要求他们的君主给他们封赏的人就不会少。“德难为而言易饰也”，德行很难修养、很难成就，但言语却很容易修饰。把口才锻炼得很好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难，当然这是相对于德行的修养而言。这就告诉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言语很好，看他说得很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正所谓“观言不如观事”。

（二）观事

观事，就是要看他所做的具体的事情。在《论语》上，孔老夫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如果所有的人都厌恶他，你也不要轻易地相信，要认真地去考察。如果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你也不要认为他很有德行，你也要认真地去考察他。在《论语》中，子贡向孔老夫子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乡人皆好之，何如？”全乡的人都称叹他，认为他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能不能判定他是一个善人呢？孔老夫子回答说：“未可也。”还不一定。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如果全乡的人都厌恶他，那可不可以判定这个人就是个恶人呢？孔老夫子就说：“未可也。”也是不能够判定。“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不如全乡里，善良的人都喜欢他，不善良的人都厌恶他，这样才能够判断出这个人的善恶。

在《史记》上就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齐威王刚即位时，九年之间，诸侯都来讨伐他，致使国家得不到治理。于是，齐威王就把即墨的大夫，即负责治理即墨的地方官，给召来了。齐威王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去之后，毁谤你的言语每一天都能够听到。但我派人去视察即墨，发现田野都得以开辟，人民都丰衣足食，官府也没有积压的公事，齐国东部地区因此得以安宁，这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的缘故。”于是，封一万的食邑给这个即墨大夫。接着，他又把阿地的大夫召来了，对他说：“自从派你去驻守阿城，每一天都能够听到赞誉你的声音。我派人去视察阿县，田野没有得到开辟，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赵国攻打甄地的时候，你不能出兵去援救。卫国获取薛陵的时候，你却连这事都不知道。这是因为你以重金巴结我的左右以求取声誉所导

致的。”所以当天就烹杀了阿地大夫，并把他身边曾经赞誉这个阿大夫的人也一同烹杀掉了。后来，他起兵向西去出击赵国、卫国，并在浊泽打败了魏军。齐国上下都感觉到恐惧，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做事务求真实，尽自己的本分，最终齐国得到了治理。诸侯听到此事，也都不敢再轻易地和齐国打仗。

这就告诉我们，即使有很多人称赞一个人好，你也要考察一下这些人是不是都受了他的贿赂，所以才帮他说好话。即使这个人受到很多人的毁谤，你也要考察一下，是不是这些人都贪污受贿，只有这个人廉洁自律，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古人说“难得糊涂”。为什么难得糊涂？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因为世间的人都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择手段，那这个读书人他有道义，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因此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就是观事。

《六韬》上也讲，如果不审慎地考察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只是听人们的赞誉来评价一个人，我们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如果君主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为贤德、智慧之人，以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为不肖之徒，那么党徒多的人就会被举荐上来担任领导，而不愿意结党营私、党羽少的人就会被罢退。结果，这些邪曲不正的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把真正贤德的人给掩蔽了，忠臣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虚有的声誉取得了领导的位置。这个世间的乱象就会越来越严重，他的国家就免不了要危亡。

这实际上也把民主制可能导致的弊端给我们揭示了出来。因为民主要看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你给他花一点钱，贿赂一下他，他就投你的票，最后选出的领导者不一定是一个有德行的领导者。所以，即使是民主制，也是以民众的道德水平做基础的。因此，无论是民主制还是其他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还是把人教成一个有德行的人。这是最根本的。

在《新序》上还记载着一个“观事”的故事。子路治理蒲县三年了，孔老夫子路过这个地方。刚进入蒲县县境，他就说子路治理得不错，能够恭敬、诚信。到了这个城镇里，他又说子路治理得不错，说他尽忠职守，与民讲信用，而且宽容对待百姓。到了县衙时，就是办公的场所，孔老夫子又说子路治理得不错，说他能够明察秋毫以审断案件。子贡听后，手执着马缰就问，夫子还没看见子路，就三次称他治理得不错，理由是什么，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孔老夫子说，我进到蒲县县境时，看到荒地都得以开垦，田野都修治得很整齐，沟渠都挖得很深，这是因为他恭敬而诚实，所以民众才愿意尽力地耕种田地。到了城镇时，看到房屋的墙都很高大，树木长得很茂盛，这是因为他对待民众忠信而宽厚，所以人民做事就不敢苟且。到了他的县衙，发现衙门里非常的清闲，这是因为他平时判案的时候能够明察善断，所以人民就不会轻易地来申诉打扰。

这就告诉我们，通过一个人所做的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恭敬心。因此，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只要我们仔细去观察，都可以观察得到。

《弟子规》上说：“字不敬，心先病。”当自己心不恭敬时，你看看自己所写的字，非常潦草，别人都认不清楚。有个朋友送给我一个清代状元的考卷，我打开这个考卷看了一下，非常的感叹。为什么？因为这个状元所写的考卷，一笔一画，全是小楷字，没有丝毫潦草。乍看起来，就像现在的字帖一样，像印刷字体一样，

大小匀称，笔画都非常的清楚。因此，我们说现在的人心浮气躁，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看了这个考卷的复制品，我们突然意识到现在的人的心浮气躁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三）观行

观事不如观行。《说苑》上给我们指出“六正”、“六邪”，以帮助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行为。

“六邪”，即观察臣子六种邪曲不正的行为。

“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一个人安享官位，贪图俸禄，但是不致力于公事，心思根本不在公事之上，随波逐流，做事左右观望，这样的人是具位充数之臣，即“具臣”。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君主说的话都说好，君主所作所为都认可，暗地里还去探求君主的喜好，并把他喜好的东西进奉给他，以愉悦君主的耳目，一味苟且地迎合君主的意思以求荣身，与君主整天寻欢作乐，不顾及他的后患，这样的人是“谀臣”，即阿谀奉承的臣子。

《新序》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楚恭王生了大病，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把令尹召过来，对他说：“常侍管苏和我相处时常常用道义来劝导我，我和他在一起就感到不安心，不见他也不会思念他。虽然如此，他对我很有帮助，他的功劳不小，一定要重用他，给他很高的爵位。申侯伯和我相处，他常放纵我的欲望，我的行为肆无忌惮都不去劝谏。我喜欢的，他就让我去做，甚至劝我去做；我喜好的，他就先我去尝试。我和他在一起非常欢乐，

看不到他就会有点忧戚，就很想念他。虽然如此，他对我却没有帮助，他的过失不小，一定赶快把他打发走。”令尹听后说“好”。第二天，楚恭王过世了。令尹就拜管苏为上卿，委以重任，而把这个申侯伯逐出了楚国。这就告诉我们，阿谀奉承的臣子可能一时讨我们喜欢，但对我们的德行没有助益。因此，要和什么样的人相处呢？要和那些能够劝我们以道义的人、能够规劝我们走正道的人相处。

《贞观政要》上说：“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君主很昏暗，臣子又阿谀奉承，君主昏暗不能够识别人才，臣子还一味地讨好他、巴结他，不给他指正过失，他的危亡就马上到来了。这是给我们指出了谀臣的危害。

“三曰中实险谄，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他的心中实际上是险诈邪僻，但外表却谨小慎微，花言巧语，致饰于伪善，表面给人一种善的感觉，其实内心嫉贤妒能。对于他要举荐的人，就宣扬他的美德，隐藏他的过恶；对于他要罢退的人，就宣扬他的过恶，隐匿他的美德。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能够施行。这样的人被称为“奸臣”。

“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他的智慧足以文过饰非，他的口才足以到处游说，在宫内可以离间君主的骨肉亲情，在宫外因为他的妒忌使得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称为“谗臣”。

“五曰专权擅势，以为轻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他独揽大权，自己说了算；巴结权贵，结党营私，为的是使自家富裕；擅自篡改君主的命令，为的是使自己显达、富贵。这样的人是“贼臣”。

“六曰谄主以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用邪曲不正的道理谄媚君主，陷君主于不义；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蒙蔽君主的视线，使君主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使君主的恶名传布于国内，闻于四邻。这样的臣子被称为“亡国之臣”。如果一个国家任用的是亡国之臣，像赵高、易牙等这样的臣子，就会使国家陷于危亡。

因此，看一个臣子的行为，可以通过这六种邪曲不正的方面来观察。

（四）观友

观友，就是观他结交的朋友。《孙卿子》上说，“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智，必求贤师而事之，择贤友而友之”。这个人虽然禀性质朴、美善，心智非常的聪慧，但必须求贤师学习，选择贤友交往。“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如果你得到的是真正贤明的老师，并向他学习，那你每天所听到的都是尧、舜、禹、汤这些古圣先王的大道。尧、舜、禹、汤都是很有德行的人，都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怨天尤人的人，他们的德行很高，确实可以让后人效仿。“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得到善良的朋友和他交往，你所见到的都是忠诚信实、恭敬礼让的品行。“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你每天进修仁义以求进步，却不知不觉，这是潜移默化的结果。“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如果现在结交的都是不善之人，所听的都是欺骗、巧诈、虚伪的

言行，所看的都是邪污卑下、放荡邪曲、贪图利益的行为，则会使自己遭受刑罚处罚还不知不觉，这也是潜移默化的结果。

因此，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朋友来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如荀子所说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蓬草本来是很软、很弯曲的，但是生在笔直向上的麻中，它也会自然地向上生长，也会长得笔直。因此，古人常说：“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和善良的、有德行的人交朋友，亲近这样的善友，就像在雾水中行走一样，虽然打湿不了你的衣服，但你时时都蒙受他德风的滋润，不知不觉地你就受到了熏陶。

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楚国有一个善于给人看相的人，他给人看相，说的和实际情况都非常的相符。楚庄王很奇怪，就向他请教。这个人就说：“我并不是能给人看相，我只不过是观察这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布衣百姓，他所结交的朋友都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长辈、醇厚善良、行为谨慎、畏惧法律，这样的人，他的家庭会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他的身心会一天比一天更安定，这样的人被称为‘吉人’。如果这个人是在事奉君主的臣子，他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诚实守信、有德行并乐于为善的人，这样的人，他事奉君主会一天比一天事奉得好，官职也会一天比一天提升，这样的人是‘吉臣’。如果观察人主，他的朝臣都是贤德之士，左右事奉的人都是忠诚的人，这个君主有过失，他身边的群臣、左右都能够犯颜直谏，给他指正过失，这样的君主，他的国家会一天比一天更安定，他自己也会一天比一天受人尊敬，天下人对他会一天比一天地心悦诚服，这样的人被称为‘吉主’。所以说，我并不会给人看相，我只不过是观察这个人所结交的朋友而已。”这个人只是观察人所结交的朋友，就能够判断出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可见，朋友对自己的潜移默化，

影响非常深远。

《孔子家语》上也记载着孔老夫子的一个典故。孔老夫子说，我过世后，子夏的德行会与日增进，而子贡的德行却会一天比一天地减损。曾子就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孔老夫子说，子夏喜欢和比自己贤德的人相处，而子贡恰恰相反，他喜欢和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交往。“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儿子怎么样，你就观察他的父亲；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样，就看他结交的朋友；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君主什么样，你就看他的属下——所执事的人。这样，你也就能知道他们如何了。“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者焉”。与善良的人交往，就像进入种植着芝兰的房屋，久而久之，你闻不到它的香味，因为你已经被它同化了。和不善的人交往，就如同进了一个卖鲍鱼的店铺，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你还觉得腥臭难闻，但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就闻不到这种腥臭了，你也被它同化了。所以君子必须谨慎地结交朋友。观察一个人的朋友，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德行，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的人，有同样品德、志趣的人，自然会结交到一起。

（五）观德

观德，就是观一个人的德行。

观德有很多方法。《六韬》告诉我们，要从仁、义、忠、信、勇、谋六个方面，即“六守”，来观察一个人的德行。“富之而不犯者，仁也”。你让他富裕起来，但他能不触犯礼法，这是仁的表现。

“贵之而不骄者，义也”。让他很尊贵，但他不骄傲，不自以为是，这是义的表现。“付之而不专者，忠也”。你授予他官职，他不独断专行，这是忠的表现。“使之而不隐者，信也”。让他去做某事，他对你没有隐瞒，这是信的表现。“危之而不恐者，勇也”。让他处于危难的境地，看看他有没有恐惧。如果没有恐惧、泰然自若，说明这个人有勇气、很勇敢。“事之而不穷者，谋也”。让他处理一些事情，甚至是突发事件，看看他会不会困窘。他如果不困窘、不会计穷，说明他有谋略。这六个方面次序不能颠倒。仁、义、忠、信、勇、谋，这个“谋”是放在最后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仁义、忠信，但他很有谋略，这个人也不可不用。

《说苑》告诉我们，观一个人的德行，就看他是不是谦虚。如果一个人，有了功名，有了成就，有了事业、地位，但还很谦虚，能够自卑而尊人，这个人是有发展的人。《说苑》上说，“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一个人德行广大高尚，又对人守持恭敬，这样的人才能够荣显。“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拥有的土地广阔富饶，但是能够守持节俭，不奢侈浪费，这样的人才能够安宁。“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他身居高位，非常尊贵，但他对人谦恭有礼，这样的人才能受人尊敬。“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他的人口众多，军队势力强大，但他还能够小心谨慎，这样的人才能战无不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这个人很聪明、有智慧，但他还守持着愚拙的姿态，这样的人才能增益他的学问、道德。因为一旦一个人聪明、有智慧，但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强，那他就不会谦虚地向人学习、请教，他的人生也就不能再进步了。“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一个人博闻强记，记忆力非常好，见闻广博，但还守持着浅陋的态度，这样的人才能够更加的广博。“此六守者，皆谦德也”。这六种德行都是谦

德的表现。“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谦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一个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没有谦虚的德行，结果导致失去天下，丧失性命，这就是桀纣的所作所为，怎么能不谨慎？“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其中的“道”是什么呢？“谦之谓也”。《易经》上有个道理，大可以守护天下，中足以守护国家，小可以守护自身，这个“道”就是谦虚。

中国人说，“谦卦六爻皆吉”。谦卦的卦象是“地山谦”。平时高山都是处于平地之上，但在谦卦中，高山宁愿居于平地之下。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才华横溢，又有权有势，就像一座高山一样，但他非常的谦卑，自卑而尊人，不居功自傲。这样的人，即使很有成就、很有才华，也不会招人嫉妒、招人障碍。

对“谦卦六爻皆吉”的道理，我自己也有深刻体会。我在人民大学读书时，功课非常好，非常的勤奋，几乎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一等奖学金意味着你一学年的科目、所有的考试全都是优秀。如果有一门不是优秀，包括英语不是优秀，就不能获得一等奖学金，就是二等奖学金了。因为自己成绩很好，就觉得自己什么事都不用去求别人，走在路上都是两眼朝天看。并且我还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主动和别人要联系方式。因为觉得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事需要去求别人的，都是别人主动来找我们。因此，自己成绩虽然很好，但一到评“三好学生”时，大家要投票，就像现在流行的民主选举，结果一投票，自己就投不上。当时我还不知道原因，我以为是自己成绩太好，他们都嫉妒我，所以才不投我的票。因为没有学传统文化，不知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所以处处都是找别人的原因，一遇到不如意，马上就去怨天尤人。学了传统文化之后，有一次听蔡老师讲课，他说：“君子敬而无失，

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论语》中的一句话，指这个人对别人很恭敬，为人处事没有过失，对每个人都谦恭有礼，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而我们现在走到哪里，我们就和哪里的人起对立、起矛盾，有不愉快。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没有谦恭有礼的态度，甚至还处处要求别人恭敬自己，自己遇到不如意，马上就怨天尤人。

所以学和不学确实不一样。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我们体会到一个深刻的道理，当然这个深刻又很简单，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别人的问题，都不是外在的原因，都是自己的问题。如果你遇到了不如意，你马上反省自心，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刻薄、不够厚道、事事挑剔等，这些问题都反省后，你处处都能如意吉祥了。如果我们生活还有不如意，说明我们的德行还有缺损，还有不足之处。这些不如意，不要去怨天尤人，而要自我反省，以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德行。

古语说：“观德于忍，观福于量。”看一个人有没有德行，就看他能不能忍。“忍”字意味深长，它的内容也很全面。要忍什么呢？比如说，利益现前的时候，你能够忍住不去贪，见利思义，如果不符合道义，你能够忍住不去获取，这就是有德行的表现。当看到美色现前，你能忍住不去贪爱，不去放纵自己的行为，这也是有德行的表现。有人毁谤你，对你不理解，批评你，怨恨你，你能忍住不去和他分辩，不去打击报复他，不和他一样去搞对立，这也是有德行的表现。所以古人说“一切法得成于忍”，就看你在难忍处能不能忍。贫穷时，你能够忍住贫寒的生活，奋发图强，然后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天下。到事事如意时，处处受人恭维时，你能忍住不起欢喜心，不去贪恋。这也是一个人德行的表现。所以顺境淘汰人和逆境淘汰人，都非常的严厉。并不是说你事事如

意时，就没什么可提升的了。顺境可以消磨人的意志，让人放纵自己的情欲，寻欢作乐，享受人生。如果你能够面对这些享乐，不去贪恋，这也是有德行的表现。所以孔老夫子的弟子颜回向老师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除自己的欲望、私利，最后返回到礼的规范，依礼去做，这才是有德行，这才是仁心的表现。因此，一个人有没有德行，就看他在难忍时能不能忍。

“观福于量”，看一个人有没有福气，以后有没有发展，就看他是不是心量很大、心胸宽广。中国人说“量大福大”。《了凡四训》上讲，袁了凡先生年轻时仕途不顺利，他后来反省到就是因为自己不能容人，认为别人对不起自己，做了很多对不起自己的事，不能宽容别人、宽恕别人，这是量不够大。

总之，我们古人有很多观察人的方法，观察一个人的德行，最重要的是综合去考虑。

《晏子》上讲，齐景公向晏子请教求贤之道，晏子说：“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则视其所不取。”这个人通达时、得志时，看看他举荐的是什么人，是贤德之人，还是结党营私的人，还是自己的亲属。穷困潦倒时，就看看他不去做的事，人穷志不短。虽然一个人很穷困，但是不符合道义的事也不应该去获取。“富则视其所分”，他富裕时，就看他是不是会与人分享，惠施财富。孔老夫子也说，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华，但他又骄傲、又吝啬，那其余的方面都不值一提。一个人富裕了，不仅不吝啬，而且还能惠施财富，这个人才有可取之处。“贫则视其所不取”，这个人很贫困，但是他不苟取，也要看这个是不是符合道义。像范仲淹，小的时候家境非常贫寒，他就到一个寺院去读书，在寺院中偶然发现了一坛金子。那时，他的生

活非常俭朴、非常贫穷，但他得到这个金子后，知道这金子不属于自己，他又把它埋回到树底下。后来，他考中科举，做了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命里该有的，你丢都丢不掉。范仲淹当了宰相后，这个寺院的方丈就向他来化缘，想重修寺院。因为他以前在这个寺院读过书，现在又当了宰相，所以这个方丈就向他来化缘。范仲淹说，其实你们寺院里就有这样的财宝，就告诉他这个金子埋在树底下。他们一找，果然找到了。因此说，一个人在贫穷的时候，他还能够不苟取、不苟得，这样的人才是可取之人。

“夫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你看这个人是不是贤德的人，有三个等级。最贤德的人难以进朝为官。就像诸葛亮，你要请他出来辅佐刘备，刘备要三顾茅庐，很恭敬地去请他，他才出来辅佐。因为贤德之人没有自己的私利，他出来工作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为的是把自己的所学所能来贡献天下，能够辅佐君主，使社会和谐、人心安定。如果君主不贤明，认识不到他的贤德，他出来对君主也没有帮助，他还是难以被举荐，难以进朝为官。纵使被举荐，他也容易退下来。次一等的人“易进而易退也”。他容易进朝为官，也容易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最下等的人“易进而难退也”。他很容易去进朝为官，但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就难了，他要给你提很多条件，这样的人私心很重。因此，我们古人有个识人的简单方法，他任用那个推让最多的人，即那个推辞次数最多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他不争名好利，没有私心。他看到君主、领导对他有诚心，他才出来帮助他，为了让这个团体获益，让百姓获利。

通过这几点来任用人，这是观德。

（六）观佞

《韩子》中说：“凡奸臣者，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是奸臣，都愿意顺着君主的心思去做，为的是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宠幸。君主认为好的事，他就会跟着去赞叹它。君主所憎恶的事，他就跟着去诋毁它。这是奸臣。

《新序》上有个故事，反映出奸佞之臣的一个显著特点。齐国有个田巴先生，他内在修行得很好，名声也远扬在外。齐王听说田巴先生很贤明，就召他进朝，问怎么样办政治。田巴先生穿了件新制的衣服，把这个须发都修饰得很好，然后戴上帽子，束好腰带，回过头来问他的宠妾怎么样。他的宠妾说“佞”，意思是美极了、很好、很漂亮。他要出门的时候，就问他的侍从怎么样。这个侍从也说“佞”。他路过淄水时，面对着淄水看自己的影子，发现自己其实长得非常丑陋。这件事启发了他。去见齐王时，齐王问他怎么办理政治，他说：“办理政治，最重要的在于正身，正身的根本在于左右的群臣。今天大王召见臣的时候，我穿了件新衣服，把头发、胡须都修整一新。将要出门的时候，就问我的宠妾，宠妾因为爱臣的缘故，她就阿谀奉承地说‘很漂亮’。将出门了，又问我的侍从，侍从因为畏惧我的原因，也说‘很漂亮’。后来，我路过淄河的时候，观察水中的倒影，才知道自己实际上很丑陋。因此，现在齐王身边的臣子、宠妾，阿谀奉承大王的人可不止两个吧？如果齐王您能够面临淄水，查看自己的过恶，有过失就能马上改正，这样齐国就能够得到治理了。”田巴先生非常的有智慧，他早晨要去见齐王的时候遇到了这件事，就借题发挥，以此来劝谏齐王任用能够犯颜直谏的人，指正自己的过失，

而不要任用那些阿谀奉承的人。

这就是观佞。

（七）观心

现在有很多的观心术。那这个心怎么能够观察到呢？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相由心生”，还有一句话，叫“言为心声”。

我们首先看“言为心声”，即观察人的言语，就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仁厚还是刻薄。《格言别录》上说，“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德行浅薄的人心地刻薄傲慢，见到每个人都有可憎恶的地方、可挑剔的地方、不如自己的地方。所以，他眼中鄙视的人、瞧不起的人就很多。现在的民主政治、民主选举，两党互相竞争时，都要揭对方的隐私，挑剔对方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让人变得更加刻薄，而不是让德行更加的宽厚。相反，“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行很高的人心平气和，见到每个人都有可取之处，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所以他口里所赞叹的人、称许的人就很多。因此，我们观察一个人德行宽厚还是刻薄，从他的言语就能判断了。

此外，中国人还经常说“相由心生”，是指一个人的相貌也是他内心的一种反映。我们观察宽厚的长者，他们都有一种慈眉善目的相，一看到这个人，你就愿意跟他亲近。有的人就是贼眉鼠眼相。比如说，警察一上公共汽车，拿眼一扫，他就知道谁是小偷，因为这个小偷的特点很明显。在海关工作的检查人员，从他身边过了很多人，他都没有让他们去检查。但当他让一个人去检查时，这个人通常就有问题。因为，这个人的相貌，或者他的神情，都表现出一些特征，让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奸邪之人，

可以从他的表情、眼睛、相貌上得以观察。而那些大的抢劫犯、杀人犯等等，他们脸上也有一种凶相。酒色之徒，从他的眼神中也能观察得到他有这种特点。所以相貌很重要。

现在很多人都去美容院，实际上美容院是在破坏人的自然生态。人天生的模样是自然而然的，而你去美容院把鼻子给隆起来，把单眼皮给割成双眼皮，还去做很多的这种手术，其实是和自然不相符合的。因此，想让自己面貌美好，最好的方法就是培养自己的善心、修养自己的德行。你这样去做，三个月的时间就会有变化，就能看到效果。时间越长，你就越能够感受到这个变化。我们从小到大，照了很多的照片，不妨把这些照片拿过来对比一下，我们看看自己的相貌是变得更加纯真无邪、宽厚善良了，还是变得更加邪恶、更加刻薄了？这个都可以从相片上观察得到。

观察人心时，重要的是观察这个人是不是有仁爱、同情之心。《韩诗外传》上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田子方外出时，看到道旁有一匹老马，他长叹了一口气，就问车夫这是什么马。车夫回答说，这是公家养的畜牲，现在老迈了不能再使用，所以把它放出来了。田子方说，年轻的时候用尽了它的力气，到年老力衰了就把它给抛弃，仁者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他就花钱把这匹马赎了回来。穷困的士人听了这件事之后，就知道谁是他们可以归附的人了，显然应该归附的是像田子方这样有仁心的人。他对有功劳的畜生都不会到老的时候把它抛弃，更何况是对人呢？

《韩子》上也记载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乐羊在魏国做将领，他去攻打中山国，这是一个小诸侯国。而乐羊的儿子恰恰在中山，结果这个中山国的国君就把他的儿子烹杀了，又把这个东西送给他。乐羊居然就吃了。魏文侯听了，就对堵师赞说：“乐羊为了我，居然把他儿子的肉都吃了。”堵师赞就说：“他都能

够吃他儿子的肉，那谁的肉他不能吃呢？”后来，乐羊攻下了中山，魏文侯对他的功劳进行赏赐，但却怀疑他的用心，怀疑他没有仁爱之心。

还有一个故事。孟孙出去打猎，捕获了一只幼鹿，让秦西巴把它带回去。但这只幼鹿的母亲跟在后边呼号着，久久不肯离去。秦西巴看了之后不忍心，就把幼鹿送还给了这只母鹿。孟孙听说秦西巴居然把他捕到的猎物给送回去了，就非常的生气，把他给逐出去了。但是没过三个月，孟孙又把他召了回来，让他当自己儿子的师傅。他的车夫就说：“您以前怪罪秦西巴，把他给驱逐了，现在又让他当您儿子的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呢？”孟孙说：“秦西巴都不忍心伤害一只幼鹿，他又怎么忍心伤害我的儿子？”

所以，《韩子》一书得出结论说“巧诈不如拙诚”。与其巧于欺诈，不如守拙存诚。乐羊因为有功，但是虽然受了赏，却被魏文侯怀疑他的存心。秦西巴虽然获罪，但却越加地被孟孙所信任。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去观察一个人，就是观察他有没有仁爱之心。

（八）观诚

这里“诚”的意思并不是指“诚恳”的“诚”，而是说要全面地省察，才能够得出结论。

《周书》上说，“富贵者，观其有礼施”。一个人很富贵，就看他是不是有礼好施，愿不愿意施舍给贫穷的人。“贫穷者，观其有德守”。这个人地位卑贱，又贫穷，就观他有没有德行操守。“嬖宠者，观其不骄奢。隐约者，观其不畏惧”。受宠的人，观他是不是不骄傲、不奢侈；处于困厄境地的人，观他是不是没有

畏惧之心。“其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弟”。年轻人，观察他是不是有恭敬心，是不是好学上进，又能够尊敬长辈、友爱兄弟。“其壮者，观其洁廉务行而胜其私”。人到壮年，观察他做事是不是廉洁有守，是不是能够克制自己的私心。“其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上了年纪的人，观察他的思考是不是审慎，让他勉强去做他力所不足的事，看他是不是能够不逾越规矩。“父子之间，观其慈孝”。父子之间相处，看看是不是父亲慈爱儿女、儿女孝敬父母。“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兄弟之间相处，观察他们是不是和睦友爱。“君臣之间，观其忠惠”。君臣之间相处，观察君对臣是不是有仁惠、臣对君是不是竭忠尽智。“乡党之间，观其信诚”。和同乡、朋友之间相处，观他是不是信实诚恳。“设之以谋，以观其智”。让他谋划一个事情，看他的智慧如何。“示之以难，以观其勇”。把困难展示在他面前，看看他有没有勇气去承担。“烦之以事，以观其治”。让他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看他有没有治理的能力。“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让他面临利益的诱惑，看他有没有贪心、够不够廉洁。“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让他沉迷于声色、声乐，看看他是不是荒淫无度、放纵没有节制。“喜之，以观其轻”。以利益、名声让他高兴，看看他是不是轻佻。“怒之，以观其重”。让他生气，看看他够不够沉稳。“醉之，以观其失”。让他喝醉酒，看看他酒后是不是有过失。“纵之，以观其常”。放任他，看看他还能不能够信守伦常。“远之，以观其不贰”。疏远他，看看他是不是有二心、够不够忠诚。“昵之，以观其不狎”。亲近他，看看他是不是轻薄。“复征其言，以观其精”。反复地对比他前后的言论，看看他是不是精通自己所说的。“曲省其行，以观其备”。暗地里访查他的品行，看看他的品行是不是完备。经过以上种种考察之后，

你才能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就是全面的省察。这是《周书》告诉我们的全面考察人的方法。

二、其他观人法

在《群书治要》中还有很多具体的观察人的方法，我们把它总结为“三参”、“四慎”、“五仪”、“六验”、“七害”、“八征”、“九虑”。

（一）“三参”

《傅子》上说，“君人者，将和众定民，而殊其善恶，以通天下之志者也，闻言不可不审也”。国君要和睦众人，安定民众，而分辨善恶，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所以听到言论，不可以不审慎。“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如果听了人家的言论，没有去审查，就来确定是非善恶，可能会致使判断有误。因为你听信一个人的言语，就下结论，那么能言善辩、花言巧语的风气就会兴起。“故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所以，听言不如观察他做事，观察他做事不如观察他的行为。“听言必审其本”，听一个人的言论，一定要去观察他说这个话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话的用心何在。“观事必校其实”，观察他做的事情，一定要核查它是不是符合事实、是否真实可信。“观行必考其迹”，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也要观察他这样做的成因。把这三者都综合起来考虑，就会减少言论判定的过失。这是“三参”。

（二）“四慎”

“四慎”出自《管子》。“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授国柄”。“大德不至仁”，指他崇尚道德、标榜道德，但却没有仁爱、同情、恻隐之心，不可以轻易地把国家的权柄交给这样的人。因为有生杀大权，而没有仁爱之心，这样的人可能会非常的苛刻、暴虐，导致民心背离、怨恨。“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看到有贤德的人，甚至比他做得更好的人，他不能够把这个位子让给别人，不能够让贤，这样的人还是有私心的，而且私心很重，这样的人不可把高位授予他。“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他进行刑罚的时候，对有亲戚关系的人和权贵之人不给以刑法处罚，这样的人不可以让他当率领军队的将军。“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古代以农业为本，民以食为天。他不重视农业生产，不重视地利，而轻易地去征收赋敛，不可以让他做地方官负责治理都邑。这四种考虑是安危的根本。这是“四慎”。

（三）“五仪”

《孔子家语》中记载着“五仪”。鲁哀公向孔老夫子请教，怎样任用鲁国的士人来治理国家，孔老夫子说人有五等，即五个等级。“五仪”指的是五个等级：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你能够审慎地辨别这五个等级，那你就完全明白了治理的道理。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庸人，就是心里没有存着谨慎行事、慎始慎终的原则，口里也不讲伦理道德的教诲之言，因此，他们不

会选择贤人以托付终身，不去力行伦理道德以成就自己，在小事上明白，在大事上糊涂，不知道自己要做的是做什么，随波逐流而没有主见，这样的人就是庸人。世间的庸人很多，他们每天谈论的是张家长李家短，谈的是怎样损人利己。而对于怎样谨慎地落实伦理道德的教诲，怎样提升自己的德行，他们都不去理会。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士人心中有一定的目标，做事也有一定的原则。虽然不能够尽知道德学问的根本，但是他一定有所遵循的标准。虽然不能够做事尽善尽美，即具备各种美德，但是他一定有所安处的规范、道德。“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所以他的智慧不务多，而一定要知道是非善恶，他有一定的判断；言语不务多，但一定要说到点子上，能够明确地表达他的意思；他的行为不务多，但是一定要知道他行为的原因。“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既知道善恶，言语也能够表达清楚，能够知道它的要点，行为的原因也明了了，那么就像性命身体一样，不会改变了。就是他心有所主，他不会随意地更改自己的志向。“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富贵也不足以让他更加的骄傲，贫贱也不足以让他有所忧戚，这是士人。显而易见，做士人是不容易的，士人他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坚持不懈，并且能做到宠辱不惊，这是士人。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君子，他说话忠诚守信，心里没有埋怨；行为符合仁义道德，但他又没有夸耀自己的神态；思虑非常的通达明了，言辞却不专断。他信奉道义，而且身体力行、自强不息。

他所作所为是自自然然的，就好像你能够超过他，但终究又赶不上。这样的人就是君子。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所谓贤者，他的德行符合礼法的要求，中规中矩，行为一定没有逾越。他的言论可以成为天下的标准，让天下人效仿，又不伤害到他自身。他的道可以教化百姓，也因为他自己身体力行，所以伤及不到本人。如果他富裕了，天下的人就不会积财丧道，因为他富裕了，就会惠施百姓，不会把钱财都积累在自己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如果他惠施天下，就没有病贫的人。这就是贤者。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圣者也。”圣者，他的德行合于天地。《易经》上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他不是像贤者那样中规中矩地去做事，他会随着这个时节因缘来变通无碍，没有一定的执著。他能够穷究万世万物终始的规律和道理，能够使万物自然协调，能够把他的大道传布天下，使天下人自然地改变情性，形成一定的道德品性。他的光明和日月同辉，他的教化的影响也非常的神速，就像神明一样，效果非常的神奇。一般的百姓不知道他的德行这样的高大，即使见到他，也不知道他的高深，不知道他的边界在哪里。因为他不是要故意表现得与众不同，他和众人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他的德行教化影响却非常的广泛。这样的人就是圣者。

这是“五仪”。

(四) “六验”

《吕氏春秋》告诉我们，看人有“八观六验、六戚四隐”。“六验”，头两个是“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喜之以验其守”，就是让他高兴。拿什么让他高兴呢？可能是声名，也可能是利益，看看他有没有操守。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考验自己。比如说，别人突然送给你一个礼物，面对这个礼物，自己是不是生起了欢喜心、贪爱心。如果欢喜心生起来了，说明你还有贪爱，操守不够。“乐之以验其僻”，让他沉迷于声乐等欢乐的场合，看看他是不是会去做邪僻的事情、有没有邪僻的行为。然后是“怒之以验其节”。“节”即性，就是让他生气，看看他的性情如何、他的气度如何。“惧之以验其特”，“特”即独，让他独自去面对，看看他有没有畏惧之心、够不够坦荡。“哀之以验其仁”，告诉他一些哀痛的事，或者让他处于哀痛的环境，看看他有没有同情心、有没有仁爱之心。“苦之以验其志”，让他受苦，磨炼他，看看他有没有意志能够坚持。因此，修学提升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能够吃苦才行。如果吃不了苦，就不能真正提升自己。要让自己接受苦难的磨砺，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意志。

这是“六验”。

(五) “七害”

“七害”出自《六韬》，指的是七种有损国君的臣子。

“一曰无智略大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将。”第一种臣子，他没有大的智谋策略，但因为重视奖赏，还喜欢高官的缘故，恃强好战，轻易地就去出战，希望

获得侥幸之功。这样的人，君王要谨慎，不要让他担任将领。

“二曰有名而无用，出入异言，掩善扬恶，进退为巧，王者慎勿与谋。”第二种臣子是有名无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掩人之善，扬人之恶。看到别人好的地方、有美德的地方，他不去说，给掩藏起来，而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扬。无论进退，都是为了取巧营私。这样的人，君王要谨慎，不要和他谋划大事。

“三曰朴其身躬，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得，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他躬行俭朴，衣服穿得很粗恶。谈着无为的道理，实际是为求取美名。说着无欲的言辞，实际是为了贪图利益。这是虚伪之人，君王要谨慎，不要接近这样的人。

“四曰博文辩辞，高行论议，而非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第四种臣子博览文章，而且很会说话，口才非常好，高谈阔论，而非议时俗的流弊。这是奸人，君王要谨慎，不要宠信这样的人。

“五曰果敢轻死，苟以贪得，尊爵重禄，不图大事，待利而动，王者慎勿使。”第五种臣子，他非常鲁莽，轻易地就牺牲自己的性命，只要能够贪得高官厚禄他就不顾大局，看到有利他就去行动。这样的人君王要谨慎，不要任用他。

“六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以伤农事，王者必禁之。”第六种臣子，他喜欢雕文刻镂、奇技淫巧、过分的华丽装饰，因而伤害了农业这个根本，做君王的必须禁止这样的事。

“七曰为方伎咒诅，作蛊道鬼神不验之物、不祥之言，欺诈良民，王者必禁止之。”第七种臣子，他通过方术咒语，借助于巫蛊邪道，假借鬼神这些不能被验证的事、不吉祥的话，来欺诈骗取良民百姓，君王一定要制止这些行为。

这是“七害”。

（六）“八征”

“八征”出自《六韬》，指的是通过八个方面来审查一个人。“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你对他提出问题，看看他的言语，回答得是不是有理有据、有逻辑性。他的言语有逻辑性，说明他的思路清晰，他的头脑很冷静。接着，对他追根究底地提问，看看他有没有应变的能力，能不能随机应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用间谍来考验他，看看他是不是忠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这件事你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来龙去脉你很清楚，但你还要故意问一问他，看看他对你是不是有隐瞒，他的德行操守如何。“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让他有得财的机会，看看他有没有贪心、够不够廉洁。“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用美色去试验他，看看他有没有贞节，看他的品行如何。“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告诉他这件事有困难，看看他有没有勇气去承担。“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让他喝醉酒，看一看他酒后是不是失态、是不是失言。一个人可能平时都很严谨，但是喝醉酒之后，就会借题发挥，去做一些邪僻的事。所以你还要对他“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这八个方面的考察，他都过关了，这样的人才可以委以重任。

（七）“九虑”

“九虑”出自《政要论》。“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臣下，有的是在小事上忠诚，为的是实现在大事上的不忠诚；有的是在小事上诚信，为的是成就在大事上的不诚信。怎能不考虑这是欺诈呢？“臣有貌厉而内

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臣下，有的外表刚强，但内心其实很软弱；有的外表上看起来很仁爱，但实际行为和它相违背。怎能不考虑这是虚伪呢？“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臣下，有的伤害同僚来独揽大权、闭塞下情来蒙蔽君上，怎能不考虑这是嫉妒呢？“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奸乎？”臣下，还有的进献邪说来混乱是非，用似是而非的道理来伤害贤德之人，怎能不考虑这是奸猾呢？“臣有因赏以恩，因罚以佐威，可不虑之以奸乎？”臣下，也有的靠行赏来推展自己的私恩，靠实施刑罚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怎能不考虑这是营私呢？“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有的臣子，在外表上显现的是互相推荐，其实内部钩心斗角，假借为公办事之名，实际上挟持私心，怎能不考虑这是欺诈呢？“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臣下，有的通过讨好君主左右的人来求取晋身之阶，依靠权贵私下来结交，怎能不考虑这是欺伪呢？“臣有和同以取谐，苟合以求荐，可不虑之以祸乎？”有的臣下，为了一味地和人和谐相处而苟且认同别人，一味地迎合长上的意思来求取被推荐，这样的人怎能不考虑是祸害呢？“臣有悦君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臣下，有的投合君主的意思来求得亲附，投合君主的言语来让自己能够苟且容身，怎能不考虑这是奸佞呢？这九个方面的考虑，是防止恶人、防止恶行的。

中国古人观察人的经验确实非常丰富，有着五千年的经验、五千年的智慧、五千年的方法，对于我们现在人观察人、任用人非常有帮助。我们学了这些观人的方法，并不是让我们通过观察别人以更好地对付别人。如果这样想，就和我们的学问道德相悖

离了。其实真正观察一个人，首先要求的是自己心地清静。人心像湖水一样，心被污染了，就像湖水起了波澜，它对外界的映照就不清楚了。现在人心中波澜很多，甚至起了很多的波涛，亦即我们心中有了大悲、大怒、大喜。有了喜好、厌恶，心就不清静了。此时你对人的判断，不是如实的，有歪曲和偏激之处。比如说，我们在盛怒之中，所说的话一定是过分的，对人的判断也不是如实的。所以，你真正地想认清一个人到底怎么样，必须先修养自己，使自己身心清静。你自己的心清静了，水波不兴，那别人来到你面前时，他的想法、他的神态、他的行为，你都不用刻意去注意，你自然而然地就能够映照出来。因此，有人说这是第六感觉，那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心地不清静，去观察人，往往会导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他自己擅于钩心斗角，擅于算计别人，那他就会觉得别人也是如此。如果他用自己的心去看别人，往往把人的好心也看成恶意。所以我们观察别人，要观察得清晰彻底，重要的还是要修养自身，使自己身心清静。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你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性，然后你才能明白自己和他人、和万物都是一体的，所以你才能够尽知他人之性、尽知万物之性。

这一讲我们讲的是如何观人、识人。虽然讲了具体的方法，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注重自身的修养，让自己心地归于清静，这样才能真正地观察一个人、真正地识别一个人。

第九讲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群书治要》中的得人之道

关于得人的重要性，在《孔子家语》上有这样一段阐述。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回答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意思是说，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制度、治国的理念，都散布、记载在方策之中。（“方”就是古代写字用的木板，“策”就是指写字的竹简串在一起。“方策”也就是典籍的意思。）如果有像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人来推行的话，这些政治制度、理念就能够兴起。如果没有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贤君圣主，这些治国之道也就无从谈起了。“为政在于得人”，说明“得人”对于治理国家、管理企业都至关重要。

一、贤能之士，何世无之

也许有人会质疑，当前社会确实得不到好的人才啊！其实不然。

在《傅子》上这样说道：“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意思是说，圣人确实不是世代代都有的，但是贤德之士、有能力的人，哪一个时代没有呢？那既然有，为什么我们却获得不了呢？在《傅子》上也有明确论述：虞舜、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圣人，他们想实行王道，贤臣就会出现来辅佐他们；齐桓公想称霸天下，管仲这样的臣子也就出现了；秦孝公想富国强兵，商鞅这样的法家人物也就来辅助他了。所以说，“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则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天下并不缺乏人才，如果你想称王天下，辅佐你称王天下的人就出现了；如果你想称霸天下，使你称霸天下的臣子也就出现了；如果你想富国强兵，帮助你富国强兵的人也就来到了。只要追求，没有求不得的。至圣明王一旦倡导，天下的贤人就自然会应和。所以天下并不缺乏贤才，只看我们求与不求罢了。怎么还忧愁天下没有人才呢？

《说苑》上有一个典故是这样说的。齐宣王坐着，淳于髡在旁边侍坐。齐宣王说：“先生啊，谈论谈论我有什么喜好。”淳于髡说：“古代的君王所喜欢的有四种，而您只喜欢其中的三种。”齐宣王说：“您可以详细地说给我听一听吗？”淳于髡说：“古代的人喜欢骏马，您也喜欢骏马；古代的人喜欢美味，您也喜欢美味；古代的人喜欢美色，您也喜欢美色。但是，古代的人喜欢贤士，大王您唯独不喜欢贤士。”齐宣王是怎么回答的呢？齐宣

王说：“国家没有贤士。如果有贤士的话，那我也喜欢他们。”淳于髡说：“古代有骅骝、骐骥这样的骏马（骅骝、骐骥都是非常好的马，是马中的精品），现在没有这样的骏马了，您就从众多的马中去选取，可见大王喜好骏马；古代有豹胎、象胎这样的美味，现在没有这样的美味了，但是您也从众多的美味中去选取，可见您也是喜好美味；古代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现在没有毛嫱、西施了，但是您也从众多的美女中去选取，可见大王也喜好美色。如果大王一定要等待尧舜禹汤时代那样的贤士出现才喜欢他们，那么尧舜禹汤时代那样的贤士也就不喜欢大王您了。”齐宣王听完之后，就默默无语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下其实并不缺少贤士，德才兼备的人很多，只是领导者没有用心去求取罢了。

在《中论》上也有这样一段阐述。“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即使是末代的使国家灭亡的君主，他的朝廷中也不是没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他的府库中也不是没有圣贤的典籍。但是还是免不了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有了贤德的人也不被君主重用，他的治国方法、策略也不被君主推行。于是，“苟书法而不行其事，爵贤而不用其道，则法无异于路说，而贤无异于木主也”。意思是，即使把这些治国的理念方法都书写下来，记在典籍之中，但是统治者将它束之高阁，不去学习，任命了贤臣而又不采用他的意见和策略，那么，这些治国的方法就同路边的闲话没有区别，贤德之人也就像木制的神主一样不起作用。

所以天下并不是缺少贤臣，事实是，即使有了贤臣，往往也得不到重用，甚至统治者根本没有想方设法地去求取贤才。由此

可见，得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应该怎样才能得人呢？

二、得人七方，吸引贤才

如果真正地按以下七个方面去做，我们的国家就不会缺少贤德之士。有了贤德之士辅政，政治自然会清明，人民自然会富足，国家自然会长盛不衰。

（一）以善感人

《新语》上说，“夫善道存乎心，无远而不至也。恶行著乎己，无近而不去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所言所行都是按着善道来做的，那么即使很远地方的人，也都会被你感召而来；如果你恶行昭著，即使是你身边很亲近的人，也会离你而去。“周公躬行礼义，郊祀后稷，越裳奉贡而至，麟凤白雉草泽而应”。周公亲身实践礼义，以郊祀之礼隆重地祭祀他的先祖后稷，所以感得远在南海边的越裳国的使者都带着贡品来朝拜，麒麟、凤凰、白雉这些祥瑞之物都在草泽中应现。相反，“殷纣无道，微子弃骨肉而亡”。商纣王荒淫无道，不听大臣的劝谏，整天不务正业、荒于朝政，结果他的庶兄微子就弃他而逃亡了。所以，“行善者则百姓悦，行恶者则子孙怨。是以明者可以致远，否者以失近”。如果行善，百姓就对他爱戴；行恶，子孙就对他怨恨。所以，明智的人可以招致远方的贤才，而以身行恶的人连身边的人都会失去。

上述皆表明，我们能否感召到人才，关键在于我们自身的修

为。如果我们自己有公心，并且有善、有德，就会感召很远地方的人都来投奔、学习。假如我们自己恶行昭著或者是自私自利，那么身边的人都会弃己而去。

当今社会，高薪养才蔚然成风。现在招聘人才，都是用高薪聘请。但是高薪真的可以聘请到贤才吗？据统计，在1980年的时候，全美国收入最多的CEO，每年的年薪是数百万美元。到了2000年的时候，全美国收入最多的CEO，年薪高达七千六百万美元。前后比较，可以说是增长了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都不止。但从企业的稳定发展来看，当今的企业反而没有以前的企业更具优势。所以这个事例说明，企业发展的好坏与员工福利待遇的高低并没有决定性的关系。对企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实质上是企业员工的德行修养。假如员工没有德行，无论怎样的企业，最后还是会像安然公司一样破产、一样负债累累。因此说，高薪并不一定能够聘请到人才。

“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平均寿命，是四十年到五十年。中国大企业的平均寿命是七到八年，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二点九年。所以在企业界有这样一句话，“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两年”。那么，为什么企业不能可持续地发展，过不了十年就垮掉了呢？其实原因就是在于我们不学习圣贤经典，不注重德行修养，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把做事的次序搞颠倒了。

《大学》上有这样一句话：“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领导者若是一个有德行的人，那么他所感召的人才都是德才兼备的人。这些有德行的人汇聚到一起，众志成城，才能将资源最大化利用，自然就有“土”。市场营销能力有了，继而人力资源也具备了，各种技术也就具备了，就叫做“有人此有土”，有了发展的根本。企业如果将员工各自的能

力才智激发出来，那么自然就会创造财富。而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如何利用，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今社会，很多经济基础雄厚的人一顿饭就会一掷千金，桌子上琳琅满目，山珍海味一应俱全，这其实是没有智慧的表现。所以，越是有钱的人越需要有智慧，有智慧才知道应该将钱用在哪儿。那么应该用在哪儿呢？要用在“德日进，过日少”上，就是使自己的德行不断地提升，过失一天一天地减少。这样的话，企业才能赢得好的社会声誉，才会有良性的发展。所以聘请人才关键在于考察人才的德行修养，一味地进行金钱诱惑，最终只会得不偿失。

上述表明，高薪所聘请到的人才，不一定是德行的人才。如果这些人是因为钱财而来，那么终有一天也会因为钱财而走。例如，我们现在的企业，跳槽的现象很严重，只要别的企业提出更高的薪酬条件，那么人才便会义无反顾地跳槽。什么原因？他是为财而来，终有一天也会因财而去，所以这样的人是留不住的。那么，用什么方法求取贤才，就是领导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略》中有这样的阐述。“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禄得；有守节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胁”。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人很清高，他的志向很纯洁，那你就不能够用高官厚禄来获得他；如果这个人坚守节操，很有志向，那么便不能够靠威刑来胁迫他，因为有节操的人宁愿一死，也不接受威刑胁迫。“故明君求臣，必视其所以为人者而致焉”。因此，明智的君主求取臣子，一定要看这个人的志向，之后才会招致他。“致清白之士，修其礼”。对于那些很清高、道德很纯洁的士人，领导者就必须修明自己的礼义，要有礼敬之心。“致守节之士，修其道”。若要想招致坚守节操的人，领导者就要修明自己的道义。“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这样的话，贤士才能够被招来，自己的名声才可以保全。

《傅子》上同样记载了一段话。“举贤之本，莫大乎正身而壹其听”。若想得到贤才，就要修正自身，按照圣贤人的教诲去做。“身不正，听不壹，则贤者不至”。如果自己的修身不端正，听的不是圣贤教诲，反而是世俗的言论，那么贤德的人就不会来了，即使来了也不会被你所重用，因为志不同、道不合，所以便会错失贤才。像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就是因为二人志同道合，他们都有贪财牟利、残暴不仁的嗜好，两人在一起，沆瀣一气，排除异己，最后导致了国破家亡。所以，举贤的根本，还是在于修正自己的身心，一心听从圣贤的教诲。

《中论》上也明确指出：“故人君苟修其道义，昭其德音，慎其威仪，审其教令，刑无颇僻，惠泽播流，百官乐职，万民得所，则贤者仰之如天地，爱之如亲戚，乐之如埙篪，歆之如兰芳。故其归我也，犹决壅导滞，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意思是说，如果君主、领导者修明自己的道义，彰显自己美好的声誉，谨慎自己的言行、威仪，慎重地颁布他的教化和政令，刑法没有偏颇邪僻之处，恩泽广泛地流布，百官都安于自己的本分，以尽职尽责为乐，万民各得其所，百姓安居乐业，那么贤德的人敬仰他就像敬仰天地一样，爱戴他就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亲属一样，快乐得就像听到了埙篪（“埙”是陶制的乐器，“篪”是竹制的乐器，两种乐器配合，能够奏出美妙的音乐），愉悦得就像闻到兰草的芬芳。所以贤德的人归附，就像是除去了水流的壅塞那样的通畅。如果这样做了，哪会有贤德的人不来归附呢？

因此，要求取贤才，关键还是在于领导者。领导者若具备美好的德行，那么就能够感召同类的人来相聚。领导者缺乏德行，即使身边有有德行的人，也会离你而去。

《孔子家语》上曾这样记载，“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为政的首要任务就是获取贤才，获取贤才就要靠修养自身，修身要依道而行，而行道要以仁爱为根本。“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要从“亲亲”发端，也就是首先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若一个人连父母都不爱，那么爱祖国、爱人民、爱他人都无从谈起。“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所谓的“义”，就是做适宜的事。要想做事适宜，关键就在于尊重贤才、依靠贤才，这样才能达到垂拱而治，毫无差错。

对于尊重贤才的重要性，《尸子》上也有所提及。《尸子》上讲，虞舜是一个极爱才重贤的人，他任用了大禹、后稷、皋陶等五人，自己便无为而治了。但是天下的人都以他为父母，因为他“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对内推荐贤才不避讳自己的亲属，从外面选举贤才也不回避自己的仇人，是极为贤善之人，对人没有分别心，没有个人的好恶，所以人民才对他爱戴不已。尧帝向他请教治国之道，舜回答说“事天”，就是按照天地自然的规律去做。“平地而注水，水流湿”。在平地上浇水，水自然会流向低洼潮湿的地方。“均薪而施火，火从燥。召之类也”。在地上放置很多柴火，然后点燃，火自然会首先烧着那些干燥的木柴。这都是自然感召的结果。因此，“尧为善而众美至焉，桀为非而众恶至焉”。尧凭借自己的美好德行，感召而来的都是贤良的臣子和人才。而桀品行败坏，招致的则是德行缺失、奸诈狡猾的人来与他为伍。

这其实与《易经》上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一个道理。所以，若我们身边没有德才兼备的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德行上有哪些欠缺，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若自己德行没有缺失，优秀的人才就会蜂拥而至。

这个道理适用于当今社会的一切问题。我们现在做慈善事业，

困难的原因并非世人吝啬，而是担心自己的捐助会落入奸诈小人之手，因此大家做慈善事业就有顾虑了。归根结底，还是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从事者个人修养还不达标，没有起到感召他人的效果。所以任何事情都需要用善良的德行去感召，“以善感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

（二）以礼敬人

当今社会，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大多都采用竞争上岗的方法，其实古人并不认为竞争上岗能选出人才，反而认为礼让、谦让的人才是有德行的人。

《说苑》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周公代理天子之位七年，在这七年之间，他以拜师之礼所求见的人有十个，以见朋友之礼去求见的人有十二个，那些贫寒之士可以优先见到周公的有四十九个人，他举荐的贤良的、德才兼备的人有上百个，他教导的读书人有上千人，而使那些来朝拜的人被封官的大小小有上万人。

试想，如果周公既骄傲又吝啬，那么天下的贤士就很少有能够来朝拜的了。即使有来的，也一定是贪图财利、尸位素餐之人。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待真正有德行的人，领导者一定要带着礼物，非常恭敬地、以见师之礼去求见，对方才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你。而现在我们提倡竞争上岗，那就不能排除竞争应聘者急功近利，是为利而来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来，竞争上岗有可能是选不到人才的。

《孔子家语》上也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当今的君主，您认为谁最贤明呢？”孔子说：“我没有碰到过贤明的君主，如果非要有一个贤明的君主的话，那就是卫灵公吧。”鲁哀公就问了：

“卫灵公是怎么做的呢？”孔子说：“卫灵公有一个弟弟，叫公子渠牟，他的智慧、信义可以治千乘兵车的中等国家，卫灵公对他很喜爱，并且非常重用。卫国有一个士人叫王林国，他若发现贤德的人，一定会举荐，如果贤德的人被退黜了，他还要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他，所以卫国就没有被埋没的读书人。卫灵公知道了此事，便对王林国非常的尊敬。卫国有一个士大夫叫庆足，每逢多事之秋，他一定会出来帮助治理，而国泰民安的时候，他便从官位上退下来，让与那些贤德的人。因此卫灵公也对他非常的尊敬，供为上客。卫国还有一个大夫叫史鱄，因为开始和卫灵公政见不和，便想离开卫国。结果卫灵公在郊外住了三日，反省自己，琴瑟不奏，一定要等史鱄回国之后，灵公方肯回朝。所以我认为卫灵公是一个贤德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贤德的君主，一定是任用贤德之士并对他们非常的尊敬。所以若想真正获取贤才，必须用礼敬、谦让的态度。而用竞争上岗的方式获得的人才，并不一定是一流的德才兼备之士。

《晏子》中说：最上等的人才，是很难举进，并且轻易便会退位而去的；次一等的贤才，是很容易出仕，但同时也很容易罢官而去的；最下等的人，是最容易被举荐，但是却最难以被罢退的人。所以愿意出来竞争的，大体都是有些私心的。所以古人任用贤才有一个方法，就是任用最谦虚、最礼让的人，重在让而不在于争。

《孙卿子》中指出：“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意思是，尊敬圣贤的人，可以称王天下；以贤人为贵的，可以称霸天下；尊敬贤德的人，可以免于灭亡；怠慢、侮慢贤德的人，会终究走上灭亡的道路。这是古今通用的道理。

《韩子》上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文王曾经去讨伐崇国，到了黄凤旧城的时候，他的袜带开了。他左右看了一眼，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为他系袜带，文王便自己把袜带系上了。姜太公看了之后就问：“君王您为什么自己系上这个袜带呢？”文王说：“我听说，上等的君主，和他相处的人都是他的老师；中等的君主，所交往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而下等的君主，所交往的人都是他指使的人。我虽然不贤德，但是和我相处的人都是先君的旧臣，所以没有人可以被指使帮助我系袜带的。”正是因为文王的谦敬礼让，才使得众臣心悦诚服，最终推翻了商纣的统治。

不仅周文王礼贤下士、尊重臣民，文王的儿子周公也继承了他谦虚待人的作风。在《史记》上记载，周公的儿子伯禽代周公到鲁地去就任、受封。临行之前，周公反复地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当今成王的叔父，对于天下而言，身份也不低贱了。但是我在洗头发的过程中，还多次停下来去接见贤才，吃饭的时间也是因为接待贤士而多次被打断。即使我这样地恭敬谨慎，还恐怕失去了天下贤德之人。所以你到了鲁国一定要谨慎，不要因为你是国君的原因，就骄傲世人。”

《吕氏春秋》上也说道：“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贤明的君主，一定要自己去结交、知遇那些士人。若士人觉得你对他有知遇之恩，就会竭尽全力地回报你。如果你做错了事，他就敢犯颜直谏，不担心自己被处死。

春秋战国的时候，豫让在晋国做智瑶的家臣。智瑶被杀了，豫让费尽心机想要替他报仇。他的朋友问他：“以前你事奉过范氏，也事奉过中行氏，但是他们被诸侯灭亡之后，你并不想着去为他们报仇。现在智氏被人灭亡了，为什么你一定要为他报仇呢？”豫让说：“以前的范氏、中行氏，在我寒冷的时候不给我衣服穿，

在我吃不饱饭的时候也不给我食物吃。他们是以一般士人的礼节来对待我，那我也以一般士人的回报来对待他们。但是到了智氏这儿就不一样了，我吃不饱饭他就给我食物，我穿不暖衣服他就给我衣服。在朝会的时候，他一定特别地尊敬我。他是以国士的待遇来礼遇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态度来对待他，因此一定要为他报仇。”

这个故事主要是告诉我们，即使像豫让这样被称为国家贤士的人，也要根据君主对他的态度来选择回报国君的方式。那么对于一般的人而言，就更是如此了。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要自己去结交而且礼敬贤德之士，这样才会拥有真正的股肱之臣、国家良将。

关于这点，在《说苑》上也有记载。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他想让管仲来帮他治理国家。管仲说：“身份低贱的人不能统治身份高贵的人。”桓公就拜他为上卿。但国家还是没有得到治理，齐桓公就询问原因。管仲说：“贫穷的人不能指使富裕的人。”齐桓公听了之后，便把齐国市场上一年度的租税都交给了管仲。但国家还是没有得到治理，齐桓公便又询问是什么原因。管仲说：“关系疏远的人不能够控制、管理关系亲密的人。”齐桓公听了之后，便把管仲立为“仲父”，以待奉父亲的礼节来礼敬管仲。最后齐国终于得到了治理，而且称霸天下。孔子听闻这个事情之后，便这样评论：即使是管仲这样的贤德之才，不得到这三种权力，也不能够使他的君主南面称霸天下。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与他对待管仲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仅齐桓公因礼敬管仲而称霸天下，魏文侯也是因礼贤下士而称霸诸侯的代表之一。《说苑》上记载，魏文侯从中山国急奔安邑，田子方居队伍之后，途中魏

文侯的儿子——太子击遇到了田子方，便下车快步走上前去。结果田子方还是坐在那儿，像原来一样一动不动，并且告诉太子说：“你替我告诉君主，在朝歌等着我。”太子听了之后，脸上露出不悦的颜色，他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穷的人待人傲慢呢，还是富贵的人待人傲慢？”田子方回答说：“当然是贫穷的人待人傲慢了，富贵的人怎么敢待人傲慢呢？如果是一个君主，待人傲慢就会导致亡国。如果大夫对人傲慢，便会丧失地位。如果贫穷的人傲慢，他也只是保持贫穷而已，对个人而言没有什么损失。”太子听后，赶上了文侯，将田子方与他的对话转告了魏文侯。魏文侯感叹道：“如果不是你的缘故，我怎么能够听得到圣贤人的这一番话呢？因为我在仁德方面比不上子方，所以对他很礼敬，才和他成为朋友。自从我和子方成为朋友之后，君臣之间的关系越加的亲密，百姓越加的归附，从这里我得到了友爱贤士的功效。当我想攻打中山国的时候，因为我在作战、用兵方面比不上乐羊，所以我就对他非常的礼敬，结果乐羊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把中山国打下来献给我，那时我便得到了和武士交友的功效。如今，我之所以不能够稍有进步，就是因为我没有遇到以智慧骄傲我的人。如果我能够得到以智慧骄傲我的人，我的功绩怎么能够比不上古时的圣贤呢？”

所以魏文侯能够称霸天下，就是因为他对仁人贤士非常礼遇。田子方对他的太子这样傲慢，魏文侯不仅没有指责，而且还教导太子用仁爱之心去结交有德有才之士，所以文侯称霸天下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田子方这样对待君上的方法，招致了其他人臣的批评。魏文侯的一个弟弟，叫季成，他对魏文侯说：“田子方虽然是一个贤德的人，但他并不是拥有国土的君主，而您经常对他以君主

之礼相待。如果有比田子方更贤德的人出现，您又以什么样的礼遇来对待他呢？”魏文侯回答说：“像田子方这样的人，不是你可以议论的。因为子方是有仁心的人，有仁心的人是国家的珍宝。有智慧的人理应被国家器重，知识广博通达的人应该被国家所尊崇。一个国家，拥有有仁心的人，群臣之间就不会相争；拥有有智慧的人，四邻的诸侯便不敢存窥视之心；拥有广博通达的人，人主的地位就越来越尊崇。所以像田子方这样的人，不是你所能够议论的。”

从这两个故事，就可以看到魏文侯的明智。他任用贤才，即使别人对他所任用的贤才有所微词，他也依然信任如故。这也是他成就霸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个方面，能和魏文侯相媲美的就是赵简子。《新序》上记载着赵简子一个类似的故事。赵简子走上一条狭长又弯曲的山路，群臣都下车光着膀子帮他推车，只有虎会不帮忙，自己扛着戟，还唱着歌，也不去推车。赵简子看了就非常不高兴，便说：“群臣都来帮助推车，而虎会你单单地扛着一个戟，还唱着歌，你身为人臣，而侮辱了君主，该当何罪呢？”虎会回答说：“作为人臣的侮辱了他的君主，那罪过是死而又死。”那赵简子就问了：“如何叫死而又死啊？”虎会说：“首先罪臣自己被处死，然后他的妻子儿女也受到牵连。这叫死而又死。君主您已经听到了臣子侮辱君主的下场，您想听一听做人君的侮辱臣子的结果吗？”赵简子说：“那是什么结果？”虎会说：“做君主的侮辱他的臣子，有智慧的人就不会为他出谋划策，能言善辩的人就不为他出使其他的国家，勇敢善战的人也不会为他去作战。有智慧的人不为他出谋划策，国家就危险了；能言善辩的人不为他出使，那就不能够和别的国家交好；勇敢的人不为他去作战，边境就会受到侵犯。”

赵简子一听，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就拜虎会为上客，对他非常的敬重。所以古代的君主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就，那也绝非偶然，与他们对待贤德之士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说苑》上还记载着一个故事。田忌离开了齐国，奔往楚国。楚王就问他说：“齐国和楚国常常想互相吞并，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田忌就回答说：“如果齐国任命申孺做将军，那楚国只要发五万的兵士，使上将军率领他们，就能够擒获敌军将领的首级而返。但是齐国如果使眇子做将军，楚国即便征发了所有的兵士，而且加上楚王您亲自做将军出征，也仅仅是免于不被擒获而已。”结果，两军交战，开始的时候，齐国确实是派申孺做将军。楚国便征发了五万士兵，派上将军率领，果然就带着敌军将领的首级凯旋。之后，齐王换眇子做将军，结果楚国征发了所有的兵士，而且楚王亲自率领，最后确实是仅仅没有被敌军擒获而已。楚王就问田忌：“先生您为什么很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呢？”田忌回答说：“申孺为人有这样一个特点，他傲慢、轻视贤德的人，又对不肖之人很轻贱。他这种态度，使得贤德的人和不肖之人都不愿意为他效力，因此得以灭亡。而眇子，他尊敬贤德的人，又爱那些不肖之人，所以贤德的人和不肖之士都会竭尽全力承担责任，因此楚王您大败而回。”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看一个将军能否打胜仗，只要考察他的德行就可以了。若他是贤德之士，对属下的态度毕恭毕敬，便会不战而胜。而如果将军好大喜功，刚愎自用，那么打仗的结果同样不言而喻。所以，“以礼敬人”在各个方面都特别重要。

《尸子》上说：“下士者得贤，下敌者得友，下众者得誉。故度于往古，观于先王，非求贤务士，而能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者，未之尝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尝见也。”

意思是，礼贤下士的人能够获得贤才，能够对敌人礼敬的人可以化敌为友，能够对众人礼敬的人可以获得众人的称誉。所以纵观历史的发展和古代圣王的治国经验，如果不依靠贤才，没有哪个先王可以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而且君主若没有按照道来求取贤才的话，那么贤才也是不会被招致的。上述说明，礼敬的态度非常重要。一个领导者对贤德之士有礼敬的态度，他才能够得到贤能之士的帮助，才能够成就事业。

这个道理在《说苑》上也有说明。《说苑》上记载，孔子对宓子贱说：“你治理单父，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满意。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达到这一点的呢？”宓子贱回答说：“我对待百姓的父亲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对待百姓的儿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体恤那些孤儿，而且百姓有丧事的时候，我都为他们感到哀痛。”孔子说：“你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还不足够。”宓子贱便接着说：“我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的人有三个，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人有五个，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孔子听了之后说：“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的有三人，可以教导百姓孝了；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有五人，可以教导百姓友悌了；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可以教导百姓好学了。但这也是中等的善事，中等的人会归附，还是不足够。”宓子贱听了之后便又说：“在百姓之中，比我贤德的人有五个，我对待他们非常的恭敬，他们教导我怎样使国家、百姓得到治理的方法。”孔老夫子说：“想成就大事的人，秘诀就在于此了。以前尧舜都是非常谦恭地对待臣下，这样才招来贤德之士，帮助他们治理国家。所以能够举荐贤德的人，这才是百福的根本、神明的关键。可惜你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你所治理的地方大，你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与尧舜相继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若想真正使百姓归附，礼贤下士、尊敬贤才是至关重要的。

（三）以富安人

《墨子》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王公贵族治理国家，都想使国家富裕、人口众多、刑政都能够得民心，但是却得不到这个效果，就是因为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够以尚贤使能的原则来办政治，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贤良之士越多，国家的风气就越淳厚。所以，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众多的贤才。而如何才能得到众多的贤才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想让国家善于驾车、善于射箭的人越来越多，就要让他们富裕起来，并且尊敬他们，使他们得到良好的声誉。这样，国家善于射箭的、善于驾车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因此，若想国泰民安，对于国家的贤人便更要使他们富裕起来，使人们尊敬他们，让他们得到很高的位置、得到好的声誉，这样国家的贤德之士才会越来越多。所以，古代圣王治理政事、治理国家，有这样一句话：不要让不义的人富裕，不要让不义的人尊贵，不要亲爱不义之人，也不要接近不义之人。

这就告诉我们，虽然高薪不能够聘请到人才，但是对于真正的人才，首要任务就是让他们富裕，并给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发挥他们的才能，尊敬他们，给他们好的声誉。

《韩诗外传》上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宋燕在齐国做宰相，结果被驱逐了。回来之后，他便招集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人，说：“诸位大夫，有哪些人愿意和我一起去其他的诸侯国呢？”陈饶等人都伏在地上，没有人回答。宋燕就说：“唉，太可悲了，为什么士大夫容易获得，但却难以使用呢？”陈饶回答说：“并不是士大夫容易获得而难以使用，是您不能够正确地安抚他们。”宋燕说：“你这话怎么说？”陈饶说：“您给士人的薪俸，是三斗的黍稷，他们都不能够养家糊口，但是您家的野鸭、大雁却有吃不完的粮

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您家的果园种满了梨子、栗子，后宫的妇女用这些果子互相投掷，但是士人却没有尝到过一颗。这是您的第二大过失。您家的绫罗绸缎，华丽地装饰在厅堂之上，随风而破败，但是士人却不能够用它们做自己衣服的滚边。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钱财是君主您所轻视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视的。您不能付出您所轻视的东西，却希望士人能够付出他们所重视的东西，这就好比您做的是铅刀（用铅纸做的刀，刀质非常的软，不锋利），却希望它有干将（古代的名剑）的用途，这不也是很难吗？”宋燕一听，便知道自己做错了。

所以，尊敬贤才，“富之”是基本要求。特别是现在弘扬传统文化的人，家人并不一定能够理解，家人希望他们能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每个月收入可观，能够照顾家庭。这种想法无可厚非。所以如果想要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也需要给这些从业者富裕的生活保证。

《傅子》上有这样一句话：“凡欲为治者，无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意思是，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哪一个人不希望他的官吏都很清廉呢？但是不知道怎样使官吏清廉，而一味地要求官吏清廉，这就像是搅浑了水源，而希望水流很清洁一样。

如何使官员保持廉洁呢？《傅子》就做了一个比喻：伯夷、叔齐这样清高的人，假使让他们任官做事，但是只给他们很微薄的俸禄，那么他们既不能养活自己，又不能奉养家人，这样的结果必定会导致他们营取私利。从孝道而言，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骨肉之道不能亏失。但从国家法制的角度出发，营取私利又触犯了刑法。这样他们便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久而久之就会对君主滋生怨恨。怨恨的心产生了，心中的仁义之理也就衰微了。

《崔寔政论》上对于这样的道理做了更好的比喻：对于俸禄不足的官员而言，希求他们奉公执法就像是让渴马守水、饿犬护肉，若想让他们不越雷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虽然世间存在着清廉的、有傲骨的人，但百中难有其一，所以仅凭道德修养的约束，不能使所有官员都洁身自好。因此，明智的君王有必要给予官员丰厚的俸禄，这样可以防止他们的贪心。贪欲止住了，为官者便不会与百姓去争利了。

历史上，晏子就是明显的例子。晏子做宰相的时候，他的俸禄可以养活五百家的人口。也就是说，他不必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自己的俸禄都花不过来。因此这里就提出了高薪养廉的问题。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都提倡高薪养廉。不得不承认，从古至今，高薪养廉不失为一个遏制腐败的良好途径。

《袁子正书》上曾提出，明智的君主设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称，不会让人浮于事。人和事相称，官吏很少，人民众多，从事农业的人多了，物质基础就丰厚了。另一方面，官吏少了，即使提高官员的收入水平，但整体所需要的俸禄相对而言是减少的。假如官吏的俸禄很厚重，他们靠俸禄便可以奉养自己，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有求于人民，去与民争利。“无求于民，奸宄息矣”，如果对人民没有所求，不与民争利，作奸犯科的行为就没有了。这说明，高薪养廉确实是很必要的。

但是高薪养廉也需要前提条件。当今社会，高薪养廉的一个前提，就是要精简机构、精简官员的数量，这样才不至于给国家造成太大的负担。《傅子》上说，“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则事繁而职乱”。意思是说，若想治理人民，但是不精简职事，就会导致事务繁多，而职能混乱。“知省其职而不知节其利，厚其禄也，则下力既竭而上犹未供”。知道精简官职，但却不知道节制官员

的逐利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官员的俸禄，那么下面的百姓竭尽全力也无法供养做官的人。所以高薪养廉既要做到精简职位，还要做到“知节其利”，控制官员的欲望。这些都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才能做到。

（四）以公待人

若想得到人才，必须公平地对待下属。因为只有为政者公正地对待贤人，贤人才会近者来归、远者来附。

1. 官人无私，唯贤是亲

《昌言》上说：“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赐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意思是说，做君王的人，授予官职应该摒除私心，只将贤德与否作为考察官员、提拔官员的标准；勤于政事，多次去探望有功劳的人。只对有功劳的人才赏赐，对于那些有罪恶的人一定有惩罚。这样的话，政治平稳，人民安定，大家各得其所。天地就会因我而自然地正常了，祥瑞的事情也会因我而汇集了，恶的事情也会舍我而去了。这些都是因为“官人无私，唯贤是亲”所得到的成果。

《新序》上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晋平公路过九原的时候感叹说：“这个地方埋藏了我多少的忠臣呢？如果能够使这些人起死复生的话，我应该带着谁回去呢？”叔向就说：“那一定是赵武吧。”晋平公说：“你是偏向你的老师吧？”叔向说：“让我谈一谈赵武的为人吧。赵武站立起来，好像都撑不起自己的衣服；说话的时候，好像不善言谈，都说不出口。但是他所亲自举荐的

贫寒之士，竟有四十六人，这是因为他没有私心的原因。我因此以为他贤德。”这说明，为官者一定要公正地对待贤人、公平地进行选拔，这样才可称得上贤臣。

2. 尊重贤德，罢黜不肖

《孔子家语》中记载着子路来请教孔子的一段话。子路问：“贤明的君主治国首先应该重视什么呢？”孔子就说：“尊敬贤德的人，轻贱不贤德的人。”子路又问：“那我听说，晋国的中行氏，他也尊敬贤德的人，轻贱不肖之人，为什么他还灭亡了呢？”孔子说：“中行氏尊敬贤德的人，却不能任用他们；轻贱不肖的人，却不能够罢免他们。所以，贤德的人知道中行氏不重用自己，就有怨恨之心；不肖之人知道他一定轻视自己，就对他有仇恨之心。怨仇这两种情绪并存于国家，而邻国的敌兵又在郊外作战，中行氏还想不灭亡，怎么可能呢？”

所以，有贤德的人一定要重用，不贤德的人一定要罢免。如果像中行氏这样，有了贤德的人不能够重用，不肖之人不能够罢免，那么事业就很难兴盛，甚至容易导致灭亡。

在《典语》上也有这样的记载：“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尊敬一个贤德的人，很多贤德的人都高兴了。诛杀一个恶人，那么所有的恶人也就畏惧了。这个道理说明，赏罚要分明，不能够是非不清、黑白不分。

此外，《六韬》上也描述了七种贤者不被重用的情况。第一种，“主弱亲强，贤者不用”。君主很弱小，反而他的亲属都很强势，那么权力就无法集中在君主手中，即使出现贤德的人，也不能够被任用。第二种，“主不明，正者少，邪者众，贤者不用”。君主不够明智，而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很多，那么贤德的人也不会被重用。第三种，“贼臣在外，奸臣在内，贤者不用”。

贼臣在外诽谤，奸臣在内进献谗言，贤德的人也不被重用。第四种，“法政阿宗族，贤者不用”。法律政策都是偏向于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的话，贤者就得不到重用。第五种，“以欺为忠，贤者不用”。把欺骗自己的人当成是忠臣，贤者就不会被重用。第六种，“忠谏者死，贤者不用”。贤臣发现你有错误，犯颜直谏，但是君主喜欢巴结谄媚，厌恶忠言逆耳，不仅不会奖赏贤臣，反而会置其于危险的境地，贤者也得不到重用。第七种，“货财上流，贤者不用”。财货都流到上面去了，即表明君主贪财好利，那么贤者也不能得到重用。

上述七条告诉我们，贤德的人世世代代都不缺乏，只是领导者没有加以重用。所以我们要待人公平，“尊贤去不肖”，同时也必须有智慧，分得清哪些人是贤德的人、哪些人是不肖之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待人。

《桓子新论》中，记载了淳于髡的故事。淳于髡到了邻居家，看到灶台的烟囱非常直，而柴火就堆在灶台旁边，他就提醒邻居家的人说，这样恐怕会有火灾。他建议邻居，把烟囱做得弯曲一些，将柴火远离灶台。但是邻居没有听从。后来果然发生了火灾，烧到了旁边堆放的柴火，把邻居家的房屋烧着了。火灾发生后，邻里都赶来救火。火被扑灭之后，邻居家便开始杀羊摆酒，犒劳这些救火的人。之后，邻居便把烟囱变得弯曲了，把柴火也搬离了灶台。但是，他仍然不肯请淳于髡来饮酒吃饭。所以有智慧的人就讥讽他，“教人曲突远薪，固无恩泽，焦头烂额，反为上客”。这就说明，人若没有智慧，便分不清孰轻孰重，便会舍近求远、本末倒置。

当今之所以出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们不知道做人的本分，失去了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复

兴伦理教育，弘扬传统文化。因此，国家应该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弘扬者，让他们富裕起来，受到尊敬，给予他们好的名誉。

3. 得师者帝，得友者王

《贾子》记载，君王给人授官分为六个等级：第一叫“师”，第二叫“友”，第三叫“大臣”，第四叫“左右”，第五叫“侍御”，第六叫“厮役”。“师”的智慧是源源不断的，他的行为可以作为世人的表率，对世人的要求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他到一个封地，就可以让这个封地受人尊重，加重这个封地的分量；他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让这个国家受人尊重，加重这个国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这样的人叫做“师”。“友”的智慧足以磨砺人，行为足以辅助人，明于进贤之道，敢于退黜不肖之徒，对内能够匡正君主的过失，对外能够称扬君主的美名，这样的人是第二等的人。“大臣”的智慧足以帮为政者谋划国事，他的行为足以作为人民的表率，他的仁德足以使上下相处愉悦，国家的法律他谨然遵守，君主有难他会为君主效死，他忠于职守，不徇私枉法，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够托他办一些私事。这是第三等的人。“左右”可以修养自己的身心，端正自己的行为，在乡里不会做对不起乡里的事，他的所言所行不会让朝廷有惭愧之心，他不怕冒死去劝谏君主。这是第四等的人。“侍御”可以既不贪财也不淫色，侍君没有二心，君主有过失，虽然不敢犯颜直谏，但是忧愁的颜色表露在脸上。这是第五等的人。“厮役”是专指谄媚、巴结、奉承君主的人，这是最末一等的人。“故与师为国者，帝；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霸；与左右为国者，强；与侍御为国者，若存若亡；与厮役为国者，亡可立而待。”意思是说，若能够与师一起来治理国家，可以称帝；和友一起来治理国家，可以称王；和大臣一起治理国家，能够称霸；和左右一起治国，能够很强盛；

与侍御一起治理国家，存亡就难置一词；但是和厮役一起治理国家，灭亡是顷刻间的事情。所以圣明的领导者都是和老师相处，这样才能使人民富裕、国家安定。

《尸子》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范献子在河里游玩，大夫都在左右事奉。范献子问：“谁知道栾氏的后人？”大夫们没有人能回答。这时清涓就放下了楫，问范献子：“您为什么要问栾氏的后代呢？”范献子就说：“自从我灭了栾氏以后，留下的年老的人还没有死，年少的人已经成壮年了，我怕他们复仇，所以才问这件事。”清涓说：“君主您如果修明晋国的政治，内得大夫之心，外不失去百姓，那么即使是栾氏之子，又能够对您怎样呢？如果您不修明晋国的政治，内不得大夫之心，外又失去了百姓，那么这个船中所坐的人都是栾氏的后人。”范献子听了，说：“你说得太好了。”第二天上朝的时候，他就命令赏赐清涓良田万亩，但是清涓推辞不受。范献子说：“我是用这万亩的良田，来换你的这一番善言。即便如此，这些也远比不上你的一番话。这样看来，我还是占了便宜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对于贤德的人是何等的尊重。

4. 进贤上赏，蔽贤上戮

《尸子》中记载：作为臣子，如果举荐贤才给君主，意味着将自己置于被冷落的危险之中。君主如果不赏赐他，他就不会再这样做。所以，进荐贤臣的人应该受上赏，得到最高的地位。古时的宰相并不是最有能力的人，但都是能够进荐贤才的人。只有这样，贤才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国家才会日益昌盛。

关于进贤，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故事，就是鲍叔牙向齐桓公举荐管仲的典故。桓公从莒国返回到齐国之后，就想让鲍叔牙做宰相。但是鲍叔牙推辞说：“君主您对我有特别的恩惠，使我不受

冻馁，这已经是您的赏赐了，但是要谈到治理国家，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及，这一件事必须用管夷吾（管仲）才能做好。”接着他分析了自己不如管仲的五个方面：“管仲对待百姓很宽容，这是我不如他的地方；治国不失根本，这也是我不如他的地方；他的忠信可结交于诸侯，这也是我不如他的地方；他制定的礼义，可以让四方的诸侯都效法，这也是我所不如的；他能够披盔戴甲、手执鼓锤、立于军门来鼓舞将士的士气，这还是我所不如的。所以您一定要重用管仲。”鲍叔牙的一番言论将齐桓公劝说得心悦诚服。但齐桓公说：“管夷吾曾经亲自射过寡人，射中了我的腰钩，几乎把我给射死，现在我任用他，岂不是引狼入室？”鲍叔牙说：“当时管仲是为了他的君主。如果您能够宽恕他，让他返回齐国，他对待您也会非常的忠心，也会像对待他以前的君主那样。”于是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力荐，亲自迎接管仲，和他一起在庙堂上行礼，并且向他请教治国之方，所以齐国才能在众多的诸侯国中称霸。

《尸子》中说：“有大善者必问孰进之，有大过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赏罚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意为：臣子若有大的功绩，就要追问是谁推荐他的，一同给以赏赐，而臣子有了大的过失，也一定要追问是谁举荐了此人，并且对举荐人进行连带的处罚。所以，对于为政者而言，一定要秉承“进贤者为上赏，蔽贤者为上戮”的原则，这样才会使得国家野无遗贤，昌盛发达。

（五）以诚动人

《体论》中记载：“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临。”君臣之间应该以道义相处，没有真诚之心，就不能互相面对，君主也

不能去统治这些臣子。

对此，《尸子》中列举了文王和桓公的例子。周文王去求见太公的时候，一天五次往返。“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数”，桓公对待管仲极为慷慨，赐予他数座城池作为封赏。文王之所以能够得人心，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就是因为他们任用贤才，利用贤才弥补他们的不足，受到了天下的尊重和认可。

《中论》上说：“故明主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意思是，明智的君主得到贤才，是得到他的心，不是得到他的身。如果“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你也没有太多的帮助。所以，对待下属，关键要做到用真诚心来感动。

而我们很多人，对于自己身边的人非常不尊重，而对于那些远方的人反而会特别尊重，习惯性地舍近求远。有一位老人家说，他讲课讲了很多年，但是他身边没有一个真正的学生。他还是孜孜不倦地讲解，因为他知道有很多人，在电视机前、在屏幕前向他学习。所以，人经常犯的错误就是不懂得珍惜，结果就会导致即使有贤德之士在身边，也不能够被重用。

古时的君主对于臣子，却可以以诚相待。《体论》中记叙了古代的圣君对于臣子关心爱护的状况：当臣子生病的时候，他会多次去探望；当臣子过世的时候，他会亲临大敛、小敛这样的丧礼，并且在丧葬期间他都会减衣缩食，不奏琴瑟。这种表现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形式主义，他的忧戚悲伤之心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所以，“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说明世间没有不是出自于本心而得人的。“色取仁而实违之者，谓之虚”，若是表面对人仁慈，内心实际上有所违背，这就叫虚伪。“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不能够以真诚心去对待自己的臣子，还希望你的臣子能够以真诚心来事奉自己，这是愚蠢

的君主。所以要得到贤臣，只有以仁爱之心、真诚之心，才能够以诚换诚、以心交心，而不是靠什么计谋、权术、钻营等等。

《傅子》上也记载：“使用人如用己，恶有不得其性者乎？”如果你使用别人像使用自己一样，怎么能够不得到人心呢？怎么会不让人真诚地回馈呢？

《吕氏春秋》中也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君主能够有德行，真心实意地爱人，那么人民就会亲附其上。人民亲附其上，就都愿意为他的君主去效死。

古时候，赵简子有两匹白色的骡子，他非常喜欢。阳城胥渠是广门的一个小官，夜晚来求见说：“我是您的臣子胥渠，现在得了病，医生告诉我说，如果能够得到白骡的肝，病就可以治好，如果得不到，就得等死。”禀告的人就去通告赵简子。赵简子说：“杀死一个畜生，可以活人命，这不是仁义之事吗？”于是就召来了厨师，杀了白骡，取得肝脏，送给了阳城胥渠。结果没多久，赵国兴兵去攻打翟族，而这位广门的官吏带着左部七百人、右部七百人，奋勇争先登上城池，斩获了敌军将领的首级。从这个故事可以得知，君主若能够以诚心、爱心来对待自己的属下，属下才会竭尽全力地事奉君主。这是以心换心的结果。

（六）以德教人

《管子》中曾这样记载：“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得人的方法，就是要让人们受到利益。而真正使人们受到利益的，就是要教育他。“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地增长，而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所以教导的内容就是如何做人。因而古人说，“育”是“养

子使作善也”。仅仅把子女养大，不叫“育”，必须顺着善良的方面去发展，才叫“育”。而一个团体的领导者、一个国家的国君，应该同时具备三个职能，那就是君、亲、师。这意味着领导者不仅仅要管理下属，还要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地去关爱下属。除此之外，还要教导下属做人的道理，不要让下属不懂得做人的本分。这些才是真正的利人之道。

《汉书》记载着这样一段话：“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闻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意思是说，我听说尧受命为天子之后，是以天下为忧，没有听说他是以天子之位为享乐的。因此他诛杀、驱逐了那些乱臣贼子，一定要求得贤圣的人来治理国家。所以教化才能够流行，天下才能够和睦融洽。这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如果他真心地关爱百姓，想使百姓得到治理，那么他任命的官员也必须是贤圣之人。

那么如何教化百姓呢？在《政要论》上有这样的记载：“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于野。”只有正己才能化人，而教导人们，以及制定惩罚和禁止的这些规定，都是其次的，领导者首先要做出表率。

《傅子》中对于这方面的解释更为具体。“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立德的根本就在于端正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心端正之后，行为就自然端正了。自己的行为端正了，左右的人也会跟着端正。左右亲近之人都端正了，整个朝廷也就端正了。整个朝廷端正了，整个国家就能端正，最后天下也都能够端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

之心”。所以为政者若想治国平天下，必须要从修养自己的身心来做起。

《傅子》上还指出：“正道之不行，常由佞人乱之也。”正道不能够得以推行，是由于邪曲奸佞之人在作怪。桀信任他的佞臣推役侈，把敢犯颜直谏的诤臣关龙逢诛杀了，结果夏朝就灭亡了。商纣王信任佞臣恶来，把犯颜直谏的臣子比干剖视其心，结果殷朝也灭亡了。

然而从古到今，奸佞之人却大多受到重用。针对此种现象，《傅子》回答说：奸佞之人善于养人的私欲，所以私利、欲望很多的领导者便喜欢奸佞之人。“唯圣人无私欲，贤者能去私欲也”。圣人是没有私欲的，贤者能够去除自己的私利和欲望。“有见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矫之者，正人之徒也”。看到人的私利、欲望生起了，用正道来矫正、劝告，这就是正直的人。“违正而从之者，佞人之徒也”。若违背了正道，而顺从了人的私利和欲望，这便是奸佞之人。领导者以此标准进行考察，就能了解佞正的区别了。

所以教人还是要先正己，自己只有去除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才能够把人带好、把人教好。

（七）以道成人

《论语》中明确指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是宇宙和人生的真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律。儒家、道家、佛家都是以追求道为根本目的，虽然说法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所以人生于世，就要思考人生的价值，不能够像禽兽一样，只满足生理需求。

孔老夫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说明道一定是超脱

生死的大事，若明了道，那么对于死亡也就不恐惧了。在《说文解字》中，将“德”解释为“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表明有德的人就是得道之人。有德之人对宇宙人生的真相都明白了，那么从外面看起来，便会受到众人的支持与拥护，在内而言，他获得的是心灵的坦荡、安宁，所以了悟道的人便会具备“君子坦荡荡”的特点。“君子”，是指在学道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像圣贤、得道之人那样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地通达明了，但是他能够助人为乐、成人之美，还能够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做到心胸坦荡，对人宽容，所以每一天都是欢心喜悦。而“小人长戚戚”，小人的特点是一心只想到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还想方设法地去谋算别人，这样的人总是处于郁郁寡欢的忧戚状态。

上述说明，如果我们内心还没有到“坦荡荡”的境界，还有牵挂、忧虑，还有一些算计，说明我们在学小人，而没有学做君子。

《大学》上有这样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使自己的明德开显出来，是使自己觉悟。而“亲民”就是觉他，让他人也觉悟，开发他人的明德。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们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开启自己的明德，同时也帮助他人觉悟。“止于至善”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也就是止于道。因此得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帮助他、提升他、成就他，这样他才会真正地依赖于你，而且会非常尽心尽力的完成自己的本分。

综上所述，《群书治要》的得人之道已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真正地按着这七个方面去做的话，那么相信我们的国家就不会缺少贤德之士。招致了贤德之士，政治自然会清明，人民自然会富足，国家自然会长治久安。

第十讲 德不称位，能不称官

——《群书治要》中的用人大忌

本章节讲述《群书治要》用人之道的最后一部分——用人大忌。之前，我们讲述了用人之道，也就是用人的重要性以及用什么样的人，涵盖了如何识人、如何观人和如何得人。最后，我们将讲述用人应该避免的几个倾向。作为领导者，得人固然很重要，但懂得如何用人，才能真正留住人才，因此领导者务必注意用人大忌。

《六韬》中记载，周文王向姜太公请教说，君主非常重视举贤任德，但国家却得不到治理，这是什么原因呢？姜太公说，虽然君主任命了贤人，但没有重用贤人，所以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而贤人得不到重用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在用人之中，应该避免这些倾向，把握用人的八个大忌。

一、用贤而疑，人主大患

《刘廙政论》上说：“自古人君，莫不愿得忠贤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访之于众人也。忠于君者，岂能必利于人？苟无利于人，又何能保誉于人哉？”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当君主的人没有不想得到忠贤之士而任用他们的。而得到这些忠贤之士后，却又免不了去向众人调查，问问这些忠贤之士究竟如何。但是，忠于君主的人哪里能够事事都有利于他人呢？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没有给人带来利益，那怎么能够让众人都称赞他，在众人中都得到好的名声呢？

所以，人君如果自己不贤明，他就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忠贤之士。那么即便得到了忠贤之士，忠贤之士来到他的身边辅佐他，他也会怀着一种猜疑之心，向众人去调查。而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贤德而不嫉贤妒能的人，那就会对这个贤德之士有一些偏颇的言语和评论。如果君主听之任之，可能就会对忠贤之士产生怀疑，从而不予重用。

所以在《体论》上有这样一句话：“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虑之，与愚者断之；使修士履之，与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意思是说，任命了贤德的人去做事，但是又让不肖之人来议论他；让有智慧的人来谋划，却又让愚钝的人来决断；让有修为的人去履行某一件事，却又让邪曲不正的人去怀疑他。这些也是人主经常犯的毛病啊。正是因为这些君主和当领导的人，对于贤德之人不能用而不疑，经常产生猜虑之心，结果使得贤才的才华不能够得到施展。

在《新序》上还说，贤明的人不被重用，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不

肖嫉贤，愚者妒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岁不合者也”。不贤德的人会嫉妒贤德的人，愚钝的人也会嫉妒有智慧的人，所以贤明的人就被阻隔，不能够被君主所用，以致君主千载也难以碰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有的是不肯用贤德之士，有的是用了贤德之士但不能持久，有的是用得很久但不能善始善终，还有的是不肖的儿子把父亲的贤明忠臣给废弃了。这样所导致的灾祸和败亡难以一一地记录。但是要点在于什么呢？在于君主自己不明智。他分不清什么是贤德之人、什么是不贤德之人，所以就一味地听大家的评论。群臣认为一个人好，他就认为好；群臣对一个人有诽谤，他就认为不行。所以书中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潜诉不行，斯为明矣。”“潜”是诬陷的话，“诉”是诽谤的话。如果诬陷、诽谤的话都不能够通行，君主能够判断什么样的人的说什么样的话，这才叫明智。

这段论述也是告诉我们，贤者之所以不被使用，或者用着用着就被废弃了，不能善始善终，终归还是因为君主自己不贤明。他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所以听取了那些邪曲不正的言词，然后谗言、诽谤之言盛行，使贤德之人被废弃不用。

《桓子新论》也为我们阐述了，求得贤能的辅佐之臣后还有三个难题。下面一一地进行论述。

“为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胜众”。这是说，在世间做事的人，中等平庸的人才比较多，有很高才能的人比较少，少不能够胜众。“一口不能与一国讼，持孤特之论，干雷同之计，以疏贱之处，逆贵近之心，则万不合，此一难也。”一个人的一张口，不能和一国之人来辩论，他保持着很清高的、很独特的言论，去冒犯那些众口一辞的言论，他以和君主疏远的关系及低贱的身份，去悖逆那些和君主亲近的人、权贵之士，这个是万万不能够

相容的。这是第一个难处。

“夫建蹕殊，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见也，又使明智图事，而与众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难也。”一个人想建立一些殊胜卓越的事业，做一些不平常的事情，这个是世俗所不能够理解，也不能够接受的。因此，使明智的人去谋划事情，但是又让那些平庸之辈来议论他，那么他的这些见解、主张，一定不能够被这些平庸之人所理解。这是第二种难处。

“既听纳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谗人随而恶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还受其尤，此三难也。”听取了谏言，按照谏言来施行，但是事情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谗毁的人就随之来诽谤他、厌恶他，结果在中途就怀疑贤德之人，有猜疑之心，进献善言的人反而受到怪罪。这是第三种难处。

上面说的是任用贤才之后还需解决的三个难题。此外，还有两种“止善”，也就是使贤才不能善始善终的原因。

“智者尽心竭言，以为国造事，众间之则反见疑，壹不当合，遂被譖诉，虽有十善，隔以一恶去，此一止善也。”有智慧的人，竭心尽力向国君进言，想为国家造福，但是众人离间他，而被国君怀疑。如果他有一个言论不恰当，或者不符合君主的意思，那就会被这些人谗毁诽谤，即使他有十件善事，就因为有一个小小的过恶，最终被罢免了。这是第一种使贤佐不能够善始善终的原因。

“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壹兴起，既幸得之，又复随众弗与知者，虽有若仲尼，犹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有才能的人，都被世间的人所嫉妒，只有他遇到了明智的君主，才能够被提拔重用，做一番大事。然而君主有幸得到了贤能的人才，又和众人去商议，不让他参与，不让他知晓，即使是孔子这样贤德的人，也会离去。这是第二种使贤佐难以善始善终的原因。

《说苑》上也记载着齐桓公向管仲请教的故事。桓公说：“我想把酒放在酒杯里放到变坏，把肉放在砧板上放到腐烂，这样的事会不会对我称霸有妨碍呢？”管仲说：“这些事不是什么值得崇尚的行为，但是并不妨碍称霸。”什么事才是妨碍称霸的呢？他说：“不知贤，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也。”他说了五种妨害称霸天下的事情，都和任用贤德之人有关系。第一种是“不知贤”，就是不知道天下有贤才之士，不能够分辨天下的贤德之士，这是妨害称霸的。第二种是“知而不用”，就是知道了这个人是贤德之士，但是你不重用他，这也是妨害称霸的。第三种是“用而不任”，就是你重用他，但是不给他任命一个适当的官职，没有给他名正言顺的位置，这也是妨害称霸的。第四种是“任而不信”，就是你任用了他，也对他委以重任了，但是你不相信他，这是妨害称霸的。第五种是“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就是信任了他之后让他去做事，但是还用小人来干预他，这也是妨害称霸的事。这五种妨害称霸的事，都和不能够知人善任、用而不疑有关系。

《刘廙政论》上有一段话：“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于己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则其臣不思其所以为国，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计而浅其事，以求其指撝。”这是说，君主之所以尊敬人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并且对他信任，然后把重事都托付给他，他就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保住太平。如果君主很多疑，自己亲自去做事，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么样可以治国，而是去思虑怎么样可以得到君主的欢心。他们一心一意就在谋划这些事情，都在琢磨人，而不琢磨事。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君主对于任用的臣子有所怀疑，他想事必躬亲，不想真正让臣子去做，造成过多的干预。结果臣

子也比较聪明，他就不想怎么样把事做好，因为做得太好，君主、领导还会嫉妒他、担心他。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地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君主爱好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君主对他也就没有什么疑虑和防范了。

《傅子》上说，“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从前人们都知道，身居高位，比如君主，他了解世人就特别的困难，所以他虚心去听取众人的意见。知道在下面的人，相互交往都比较容易，所以凭借着下属来招致更多的贤人。有两个例子。“舜之举咎陶难，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汤之举伊尹难，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舜举荐咎陶的时候，能够发现他，把他举荐出来，这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得到了咎陶之后，再通过他来招致天下的贤德之士，就比较容易了。商汤举荐伊尹，想让他出来做官也很难。但是得到伊尹之后，通过他来招致天下的贤士就很容易了。“故举一人而听之者，王道也；举二人而听之者，霸道也；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举荐了一个人，你对他非常的信任，对他言听计从，这是称王天下之道。如果你举荐了两个人，分别听从他们两个人的建议，这是因为对他们不能够完全信任，所以还有所怀疑，这只是称霸天下之道。如果你举荐了三个人，来听他们各自的意见，最后可能就是在三岔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是仅仅保持自己不灭亡的道。这一句话也是告诉我们，能够对人才委以重任，用而不疑，才是取得最好成就的途径。

我们传统文化所讲的求学也是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三字经》中有“教之道，贵以专”，其实学之道也是“贵以专”的。如果你选了一个老师，你就听一个老师的，那你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最后就会有所作为。你听了两个老师的，就是在十

字路口，有的时候，他们意见又不统一，你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何去何从就不清楚。听三个老师，三个老师的意见你兼而听之，你是在三岔路口，就更不知道何去何从了。所以，古代求学问的人，他一生就是跟从一位老师，专门听这个老师的教诲，对老师很信任，老师对他也很负责任，所以学生大多都很有成就。

古代很有成就的人，学生向他去请教，他首先要问一问学生，读过什么书，听过谁的课，接触过什么人。问完之后有时会对他说，你的缘分不在我这儿，你更适合到别处去求学，只有这样，你才会学有所成。这个人他也是慕名而来，听这么一说，他便去别的老师那里求学，结果学了一段时间，果然很有成就。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两个人在交谈的过程中，一定会涉及自己的喜好与偏向。比如学生会特别提及某一个人，显现出对他特别有信心、特别赞赏，所以老师就知道谁更适合教导他终生。因此，作为学生，一定要选自己最佩服的人、最尊敬的人、最信任的人做自己的老师，并且跟随老师不离不弃，而且由于你的尊敬与爱戴，老师对你也会非常负责，加之你学习努力勤奋，一定会有成就。

《典语》上把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做了比喻。“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古代的人把君主称为头脑，把臣子称为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这就表明大臣和君主是一体的关系——像一个身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尧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强四支而辅体也，其为己用，岂细也哉”。尧帝能明了辨别德才兼备的人，并且让德才兼备的人去担任官位，他强健了四肢，也就能够辅助他的身体，对自己的帮助怎么会小呢？“苟非其选，器不虚假。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击身”。如果一个人不符合选拔的标准，不是合适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如果这个

人是值得信任的、德才兼备的人才，那就任用他没有怀疑。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体信任他的手一样。臣子事奉他的君主，也就像这个手触摸他的身体一样。“安则共乐，痛则同忧”，他们共同享安乐，共同患难，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还怎么能够互相怀疑呢？这就表明了君主和大臣的关系就像头脑和四肢的关系一样，应该互相信任，而没有任何的疑虑之心。

以上讲的是第一条用人之忌。

二、求全责备，失贤之道

《袁子正书》上说：“故凡用人者，不求备于一人。桓公之于宁戚也，知之矣。”凡是君主用人、领导用人，都不能够对人求全责备。齐桓公与宁戚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宁戚想去齐桓公那里求得一个禄位，去事奉齐桓公，但是他穷困潦倒，没有办法举荐自己。于是，他就随着那些流动做生意的人，给他们驾车，到了齐国，晚上住在城门之外。这个时候，齐桓公到郊外去迎接客人，晚上开了城门，让赶车的人回避。宁戚正好在车下喂牛，他看到齐桓公，就赶紧地敲击牛角，唱起了凄厉的商歌。齐桓公听到了歌声，就说：“这个唱歌的人可不是平凡之人。”就命后面的车把宁戚载着进城去了。齐桓公返回国内，宁戚来求见，劝说他要统一整个国家。第二天宁戚又来求见，劝说他要称霸天下。齐桓公听了他的进谏，非常高兴，就想任命他做官，委以重任。但群臣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这个人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也不远，不如派人去问一问，打听一下，如果

他确是一个贤才、一个有德行的人，再任用也不迟。桓公说：“你讲得不对！如果你去打听他，恐怕他会有小的过恶。因为他小的过恶，就忘记了他大的好处，这是君主所以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而且人本来就难以用尺度去衡量。他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只要用他最擅长的地方就可以了。”所以就没有派人去打听宁戚的为人，而是对他委以重任，授之为卿。正是因为他这一个举动很得当，得到了贤士，所以能够称霸天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是圣贤，都有一些小的过失、小的缺点、小的不足。如果希望他没有任何瑕疵，是办不到的。所以任人不能够求全责备。

《晏子》上记载，齐景公向晏子请教古代治理国家的人怎样任用贤德之士。晏子回答说：“就像土地有很多差别，适宜不同种类的作物。如果各种土地不同，却只种一种作物，还希望它都能够长得很好，这是不可能的。人的才能是不一样的，让他们也去做同一件事，那就不可能让他们都能做得好、都能有成就。如果对人才求全责备，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够完全胜任。如果贪求的心没有厌倦、没有止境，即使是天地自然，也有不能满足他的时候。所以，明智的君主任用人才的时候，阿谀奉承的人不会被安排事奉在左右，有偏袒的、结党营私的人不会让他在朝为官。”

古人讲：“任人之工，不强其拙。”就是任用人才的特长之处，不强求他做不到的地方。这是任人的大纲。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不能够求全责备。只要一个人在大的方面是好的，他的本质是不错的，那就可以委以重任。

《文子》上记载，“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贤之道也”。现在，君主评论臣子的时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劳和贡献，而是在他细小的行为上做文章，求取他

小的不善、小的错误，这是失去贤士的原因。“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故”。所以一个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行为的小节上做文章；人有很大的声誉，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

这都是告诉我们，人无完人，如果你想求十全十美、一点错误不犯的人，在这个世间是很难找到的。

《文子》上说，“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从古至今，从历史上看，没有十全十美的、德行无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责备于任何一个人。还有两个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璧玉，也不是没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没有污点的。但是天下的人仍然认为它们是宝贵的东西，不以小小的瑕疵来妨碍它们的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现在却只记着别人的短处，而忘记了他的长处，还想在天下求得贤才，这是难上加难。

这些论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是很珍贵的璧玉、夜明珠，都不是没有瑕疵斑点的。如果我们对人求全责备，还想求得贤才，那就太难了。

三、能不当官，任非其才

《管子》上说：“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

就是说，要考察一个人的才能，不能听他说有才能就相信、就给以相应的官位。明智的君主选择贤人，说自己勇敢的，就应该让他去带领军队；说自己有智慧的，就让他试着去担任一个官职。他去率领军队，取得了功劳，就举荐他、任命他。他去做官，能够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很好，治理得很完美，那再任用他。这都是要试用的。

试用期很重要。在试用的过程中，能够看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有才德。这是告诉我们，如何避免“能不称官”的情形。用人是否得当，要看所用的人能力和官位是否相当。他可能能力很低，那就不能给他一个高官。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要根据他的才能，给以适当的官位，让他学有所用。

《典语》上讲，要“料才核能”地去任用人才。

“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料”就是要评估、估量。估量人才的才能，考核他的能力，这是治理国家的要务。“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达，自非圣人，谁兼资百行、备贯众理乎”。凡是人的才能、他的用处，都是有一定的范围的，能力也有偏通之处，并非每个人都是圣人，有谁能够兼通百行百业、明白各种道理呢？“故明君圣主，裁而用焉”。所以，明智的君主，都是衡量人的才能来给以任用。

“昔舜命群司，随才守位”。在历史上，舜任命百官的时候，也是根据每个人才能的不同，给以不同的位置。比如说，任命皋陶来断狱，任命契为司徒掌管“五伦”的教化，任命禹来治水。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特长，所以谁擅长什么，就让他去干什么，舜自己才能垂拱而治。

“汉述功臣，三杰异称”。汉朝表彰功臣的时候，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三杰”，根据他们的功劳，而给以不同的封号。

张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很善于谋划，很善于用兵，运筹帷幄；萧何“振国家，服百姓”，最擅长治理国家、治理百姓；韩信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他擅长率军打仗，是一个很好的带队将军。他们的才能不同，因此给以不同的封号。“况非此俦，而可备责乎”。更何况不是像他们这样的杰出人物呢？怎么可以对他们求全责备呢？

“且造父善御，师旷知音，皆古之至奇也”。造父是善于驾车的人。师旷天生就是盲人，但是他的听力特别好，他辨音的能力特别强，所以“师旷知音”。这都是古代神奇的人。“使其探事易伎，则彼此俱屈”。“探”也作“换”，就是让他们彼此交换自己从事的职业和技艺。“屈”也发“觉”音，意思是“尽”。意思是，他们也都尽力了，但是还不知道怎样去胜任。“何则”，为什么呢？“才有偏达也”。人的才能是有偏通的、有专长的。“人之才能，率皆此类，不可不料也”。人的才能大概都是像这种情况，所以不能够不估量人的才能而去委以重任。“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国不治者，未之有也”。如果你使用的是合适的人才，这个人能担当其职位，那么国家一定会得到好的治理。这也就是告诉我们，来到我们团队之中的人，都是有所擅长的人。有的人擅长治理事情、做具体的事，有的人善于出谋划策，有的人喜欢文字工作，有的人擅长讲课，有的人擅长人际交往。他们的才能是不一样的，根据他们所擅长的不同，分配不同的任务，才能够各尽其才、才堪其任。

“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尽其才，不核其能，故功难成而世不治也”。有的君主用了这些士人，还是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虽然任用了他，但是他的才能没有充分地发挥，也没有根据他的能力来给他一个适合的位置，

因此很难获得功效，国家也得不到治理。

“马无辇重之任，牛无千里之迹，违其本性，责其效事，岂可得哉”。马没有像牛一样的去负辇耕地的任务，牛也没有奔跑千里的能力。如果违背本性去任用它们，还希望能够有功效，这怎么可能得到呢？任用人才也是一样的。“使韩信下帷，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假使让韩信对军队和战争的规划运筹帷幄，使董仲舒去率军打仗，使于公（善于断狱）到处去游说、当外交官，让陆贾（善于游说）判断案子，结果一定获得不了他们以前所获得的功勋，也就没有今日的显名。因为韩信不善于筹谋而只善于打仗，董仲舒擅长通古博今，本人却手无缚鸡之力，于公公正不阿却不善辞令，陆贾善于辞令但缺乏断案的魄力、决心，如果将他们安插错位，结果自然不能尽如人意。

上述道理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现在有很多毕业生，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一个专业，但是毕业之后找工作，都是才非所用，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他所擅长的专业无法匹配，所以很多人这四年的工夫都白费了。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各有所长，不可能尽善尽美，如果以一个统一的标准衡量人才，这样就很难把真正的人才给选拔出来，有一些奇才会因为一个统一的标准被遗漏。现在的高考也有这个问题，高考所考的科目全都是统一的，考生如果想进入一流的大学，必须注重每一门功课的学习，绝对不能存在偏科的现象，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偏科的同学与自己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更甚者，国家便又失去了一批素质高超的专业人才。所以我们衡量人才、选拔人才，应该根据他们的不同才能，设定不同的标准，给予他们不同的职位，这样，真正的人才便会各得其所。

《傅子》上说，“故构大厦者，先择匠然后简材；治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定民”。要想建立一个大厦，一定要先选择良好的工匠，然后工匠去挑选好的材料。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的人，首先要选择贤良的臣子来辅佐，然后才能够使人民安定。“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椽。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能工巧匠在建造房屋的时候，一定是将大的木材作为栋梁，小的木材作为椽子。只要能够适宜，尺寸之木都不会被遗弃，大材就大用，小材就小用，没有被遗弃的材料。“非独屋有栋梁，国家亦然。大德为宰相，此国之栋梁也。审其栋梁，则经国之本立矣。经国之本立，则庶官无旷，而天工时叙矣”。并不是仅仅说建造房屋有栋梁之材，治理国家也是如此。有高尚德行的人做宰相，便是确立了国家的栋梁之材，那么治国的根本也就确立了。这就是告诉我们，人才有大有小，有各自擅长的方面，只要我们用得合适，那么任何人都不需要被遗弃，都有用武之地。

四、德不当位，功不当禄

中国古代很重视对官员的尊敬。《孟子》提出：“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天下有三种非常值得尊敬的人：尊敬有官位、有爵位的领导者，尊敬上了年纪的人，尊敬有德行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官员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徇私舞弊，鱼肉乡里，没有做他本分应该做的事，因此人民就认为“官本位”不好，对“官本位”提出了批判，认为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存在很深的误解。

《潜夫论》中记载：“是故先王为官择人，必得其材。功加于民，德称其位，此三代开国建侯，所以能传嗣百世、历载千数者也。”古代的先王为官职选择人才，一定要得到德才兼备的人，使他的功劳惠及广大的民众，他的德行和他的位子相称，这是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建立国家、分封诸侯的根本用意，所以他们的社稷能够传承百世，经历上千年。

在《管子》上也记载着，“君之所审者三”，君主所要审慎考虑的有三个方面。“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第一就是臣子的德行和位置不相匹配，第二就是臣子的功绩和他所享受的俸禄不相匹配，第三就是臣子的能力和他的官位不相匹配。这三者是治乱的根本。

《管子》上说，“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与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他的德义还没有显明于朝廷上的，就不可以给他很高的官位；他的功劳没有被国家、人民所认同，就不能够给以很重的俸禄；他做事不能够取信于民，就不可以让他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德行很高，位置很低，是“过”；德行很薄，位子却很高，这个是“失”。“宁过于君子，而无失于小人”。宁可让君子处于卑位，也不要让小人居于尊位。“过于君子，其为怨浅矣；失于小人，其为祸深矣”。君子很有德行，即使产生怨恨，也不会太厉害。但是如果让没有德行的小人处在很高的位置上，所产生的灾祸、影响可就深远了。《管子》这里是告诫我们，一定不要让没有德行的人处于高位。

《袁子正书》上也记载：“治国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赏功，四曰罚罪。四者明，则国治矣。”治国有四个方面应该给予重视：第一崇尚有德行的人，第二要考察人的能力来给以

官位，第三赏赐有功的人，第四要惩罚有罪的人。四者都做得很好，国家才能够得到治理。相反，如果你任用这个人，不是看他的德行，而是看你和他之间的关系，那么你就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有功之臣若没有受到封赏，就不会再竭尽全力地去效劳；有罪之臣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日日逍遥法外。这样下去，想让人们不作奸犯科，也是很难的。

《袁子正书》上又说：“夫人之所以贵于大人者，非为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笃敬，人主授之不虚，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论其能，赏其身不议其功，则私门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人们之所以尊重那些达官贵人，并不是因为他的官爵，而是因为他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有礼。人主不虚授人爵位，人臣也不以诈取的方式获得这个位子。但是如果“居其位不论其能”，这个人被任用在官位上，不是靠他的能力，“赏其身不议其功”，封赏他了，但是不看他的功劳，那么营私舞弊的道路就开通了，而公正之道也就被阻塞了。这样是选拔不到真正的人才的。

古代的人之所以尊重当官的人，是因为他们“制爵必俟有德，班禄必施有功。是以见其爵者昭其德，闻其禄者知其功”（《典语》）。爵位一定是授予那些有德行的人，俸禄也是根据人的功劳给以分配，所以你看这个人的爵位、看到这个人的官位，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德行高低了，听到他拿到什么样的俸禄，就知道这个人的功劳大小了。这是古人重视官、尊重官的根本原因。因为爵位都是授予有德的人，俸禄都是授予有功的人，所以他的爵位越高，也就意味着他越有德行，他拿的俸禄越多，也说明他越有功绩。

在《墨子》上说道，“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与之爵，重与之禄，任之以事，

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古代圣王治理国家，都是根据人的德行的高低来给以官位，崇尚贤德的人，即使是农民、工匠、商人，如果他们有能力，就举荐他们，授予他们爵位，给他们丰厚的俸禄，任以政事让他们来处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贤德就要受到封赏，而是因为想把事做成。“故当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受赏，量功而分禄”。所以就应该根据德行的高低来排列官位，以官职来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事奉君主，按功劳进行赏赐，评量功绩而给以俸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恒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故得士”。没有恒常富贵的官，也没有恒常贫贱的百姓，举荐贤德的人，罢免不贤的人，这样才能做到崇尚公义，避免私怨，才能够得到贤士的辅佐。

《墨子》上的这一段话，进一步阐明了要任人唯贤，对有德行、有功劳的人要给以封赏，无论贤臣的出身地位如何，都要客观公正地对待。

《中论》上也有类似的阐述。《中论》上说：“古之制爵禄也，爵以居有德，禄以养有功。功大者其禄厚，德远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禄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观其爵则别其人之德，见其禄则知其人之功，不待问之也。古之君子贵爵禄者，盖以此也。”古代的人对于当官的人特别尊重，因为古代制定的爵禄政策，官爵是给有德的人，俸禄是给有功劳的人。功劳大的人俸禄就厚重，德行高尚的人爵位就尊贵。功劳小的人俸禄就微薄，德行浅近的人爵位就卑下。所以，看大臣的爵位，就知道此人德行的高低；看他所拿的俸禄，就知道此人功劳的大小。古代的君子之所以贵爵禄，原因是在这里。

“官本位”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现在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选拔官员，并没有真正地做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因为一些官员德行的缺失，不顾法纪，与民争利，这样人民才对“官本位”提出了质疑。所以并不是“官本位”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彻底地按照古代的这种办法，来选拔官员、任用官员。

《傅子》上记载：“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二教既立，则良士不敢以贱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爵禄之制乎！”没有德行的人就不授予爵位，没有功劳的人就不让他获取俸禄，这两条纲领树立起来了，贤良的士人就不敢无德而受爵、无功而受禄，而没有德行与功劳的人便更不敢拿取俸禄了。

这些论述都是表明，古代的“官本位”是有前提的，即爵禄都是给贤德有功的人。这样的制度一施行，那些当官的人受尊重也就无可非议了。

在《韩子》上就记载着一则故事，来说明举荐贤才要根据他的才德而不是根据他和自己的关系亲疏这个道理。解狐和邢伯柳，他们之间有怨仇。一天，赵简子问解狐：“谁可以做上党的地方官呢？”解狐就回答说：“邢伯柳可以。”赵简子就问：“这个人不是你的仇敌吗？”解狐回答说：“我听说，忠臣举荐贤才不回避自己的仇人，废黜不肖之人也不偏袒自己的亲近。”赵简子一听，就很称赞，然后就任命邢伯柳为上党的地方官。邢伯柳知道解狐推荐了他，就去见解狐表示感谢。解狐说：“举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异日。”意思是，举荐你是出于公心，你能胜任这一个官职，我怨恨你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私仇，你回去吧，我还像从前一样地怨恨你。解狐虽然没有做到“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但是他有公心，这一点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现代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以上的道理在《袁子正书》上也给我们作了很好的阐述。比

如说现在选举的官员，不能够去见当事人，还要禁止人们过分地交往，交接宴会要阻止。《袁子正书》认为，“夫有近会者无远期”，如果你能在近处、身边找到贤德的人，就不要再到远方去寻找了。而现在的法律规定，选举人才的官员不能够去见当事人，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徇私舞弊。对这个观点，《袁子正书》上并不认同。书中说道：“夫处深宫之中，而选天下之人以为明，奚从而知之？”深处在深宫之内，还要选天下的人才，而且你要选得适合，不能够选的人“非其才”——不是德才兼备的人，那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个人是贤明的人呢？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人才呢？“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绝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正常人都应该要这样做的，是不能够断绝的。“故圣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绝交人”。圣人治理国家，不是断绝人们的交往，而是追求怎么样使这个交往合情、合理、合法。“莫问不交，以人禁人，是以私禁私也”。你没有询问过就不去交往，是以人禁人、以私禁私。“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论贵贱，不禁交游”。先王他任用人才，不分贫富贵贱，也不禁止人们去正常地交往。他的原则是“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录”，以他的德行给以爵位，以他的能力给以官位，以他的功劳给以相应的俸禄。只要把这一个原则坚持了，再加上“具赏罚以待其归”，那么便无人敢背离正道。这是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古人这个论述其实非常的有道理。比如说现在博士生考试，很多导师为了表明自己很公正，在面试之前拒绝与考生见面，以示自己公正无私。但是实际上，真正认识一个人才是很难的，没有和他交往，没有和他交谈，怎么知道这个人的德行如何？他的喜好如何？他有哪一方面的才能呢？因此你可以尽情地和这些人接触，和这些学生交流，只要坚持不因亲疏远近定官职，而以德

才多少授官位，只要把这个原则把握住了，你所录取的人一定是德才兼备之人。

在《傅子》上记载，“不修行崇德，则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禄，不获此赏，此先王立教之大体也”。如果没有很高的德行，就不会获得这个名声，不能居于这个官位，不能够获得这个俸禄，也不能够获得这个封赏，这是先王立教的根本。“夫德修之难，不积其实，不成其名”。德行的修养是很难的，如果没有长期的修养功夫，没有实际的德行，就不能够成就好的声誉。“夫言撰之易，合所悦而大用”。至于这个言说、撰写、粉饰却很容易，能够获得君主的喜悦，合君主的心思，往往会很快被重用。然而“修之不久，所悦无常，故君子不贵也”，言说、撰写、粉饰所修行的时间不需要很长久，而君主的喜好也不会不变，所以君子不贵通过言语投合君主的喜好来获得官位。

中国古人也告诉我们，“不以言取人”。这一句对我们现在也是很有针对性的。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主国家进行多党选举，就是请一个候选人去演讲。他演讲的时候承诺了很多，把话说得很漂亮，大家一听他说得好，就都投他的票。但是在他上任之后，自己所承诺的，很难一一地兑现。不守信用实际上是没有德行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就因为这个人很有口才，很有演讲能力，便任用了他，所以往往选出的都不是真正的人才。相反，有的人的言词很少，但却非常务实，这样的人你不去任用，那么你的身边便都是喜欢谄媚巴结、阿谀奉承的人，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便无从谈起。所以切实地考察下属的德行与才能是非常重要的，是用人的重要一环。

五、偏听偏信，受人蒙蔽

《政要论》上指出，“为人君之务，在于决壅。决壅之务，在于进下”。君主的主要务在于排除蒙蔽，不要受人蒙蔽。排除人蒙蔽的关键，就是在于使下面的言论都能够传达到君主这里。“进下之道，在于博听”。而能够使下面的言论传达到君主这里，最关键的在于广泛地听取众人的意见。“博听之义，无贵贱同异，隶竖牧圉，皆得达焉”。若想真正达到广泛地听取大众的建议，关键就要做到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使得做奴役的、做童仆的、放牧的、养马的都能够畅所欲言，并且他们的意见都能传达到君主那里。“若此，则所闻见者广。所闻见者广，则虽欲求壅，弗得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君主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就很广泛。如果他所听到的、所见到的很广博，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蒙蔽他了。

上述说明，君主不要偏信，以免被人蒙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广泛地听取众人的意见，甚至基层工作者的意见，只有这样，君主才不会被蒙蔽。

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臣子为了蒙蔽君主，就观察君主的喜好，君主喜欢什么他就顺着君主的意思去说，进而蒙蔽控制君主。秦朝赵高就是蒙蔽君主的佞臣。他看到皇帝很喜欢恣意游乐、放纵自己的情欲，便趁机对皇帝说：“当皇帝的之所以尊贵，就是因为他能够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人们感觉他像神明一样。只有得到人民的仰望，君主才能够被尊重。而神明是只能听说，不能露面的。所以不能让大臣总是能见到皇帝，这样才能显示出皇帝的威严。”结果秦二世就信以为真，从此赵高专权。当秦二世最后丧身亡国

时，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被赵高蒙蔽了。这个典故告诉我们，如果偏信一个人的言论，就容易被人蒙蔽，而听不到下面的意见。

六、妒贤畏能，功灭国危

《荀子》中有这样一句话：“故明主好同，暗主好独。明主尚贤使能而飡其盛，暗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明智的君主喜欢和大家共同商议事情，而昏庸的君主喜欢独断专行。明智的君主尚贤使能，进而使国家得到治理，人民安居乐业。而昏庸的君主妒忌贤德的人，畏惧有能力的人，于是就毁灭了他的功绩，致使国败家亡。这句话表明，妒贤忌能的人做不了大事，而且还把已有的功绩丧失掉。明智的君主对臣子用之不疑，而且认为臣子的贡献就是自己的贡献，臣子的能力就是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具备最高的智慧，进行最好的统治。

《吕氏春秋》上记载，卫灵公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要开挖一个深池。他的臣子宛春就进谏说：“天气这样寒冷还征发徭役，恐怕会伤害到百姓。”卫灵公就说：“天气很寒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皮大衣，坐着熊皮的垫子，所以您不觉得寒冷。但是百姓，他们的衣服破了得不到修补，他们的鞋子有缺口了也得不到编织。您自己感觉不到寒冷，但是百姓却能感到寒冷。”卫灵公说：“你说得太好了。”就下令不再征发徭役。这时左右的人便挑拨说：“君主您开挖深池，不知道天气寒冷，但是宛春知道。由于宛春劝谏，您就下令不再做这件事。恐怕现在福德会归到宛春的身上，而怨气都会归到君主您的身上。”不过卫灵公非常的明智，听到这样

的间言并没有采用。他说：“你说得不对。宛春不过是鲁国的一个匹夫而已，是我举荐他、任用他，百姓还没有看到他的能力，也没有看到他的德行。我现在让百姓通过这一件事，看到他的德行和能力，就如同让百姓看到我有善行是一样的，他的善不就是我的善吗？”

《吕氏春秋》上评论说，卫灵公谈论宛春的这句话，可以说明他明白做君主之道，这是明君应该具备的风范。而“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者恶之，与不肖者议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那些不懂得做君主之道的人，却不是像卫灵公这样做的。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又厌恶贤德的人，对贤德的人怀有忌心，并且与不肖的人评议忠良，这是功名之所以受到伤害、国家之所以危亡的重要原因。

《孔子家语》上记述了孔子和曾子的一段对话。曾子问：“敢问何谓三至？”孔子说：“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向夫子询问“三至”的道理。夫子说，“至礼不让而天下治”，最高的礼不需要讲谦让，天下却可以得到治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最高的奖赏不需要耗费资财，但是天下的士人都喜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最高境界的音乐不需要发出声音，但是天下的百姓都和睦。如果明智的君主能认真地实行这“三至”，那么天下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就可以知道他的名声，天下的士人都可以做他的臣子，天下的百姓都可以为他所使用。

曾子又问：“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再详细地解说一下？”孔老夫子说：“古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古代明智的君主，一定对天下贤德之士都很了解，知道他们的名字。“既

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道他们的名字，还要去调查一下是不是名副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知道他名副其实，有真才实德，那就以天下的爵位来尊敬他，给他授以高官厚位。“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这就是所谓的最高的礼不需要讲谦让，但是天下能够得到治理。“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用天下的俸禄，使这些贤德之士都富裕。“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因为君主封赏的都是那些有德行的贤良之士，所以天下的人都会非常的喜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天下赞叹的声音就兴起来了。“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这就是音乐教化的最高境界，不需要奏出声音但是天下都非常和睦。

这段论述就是告诉我们，只要君主知人善任，任用贤德，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使天下得到治理。而且也不要耗费资财，天下的贤士都能够各得其所而喜悦。人民因为贤德之士在位，他们言传身教，那么民众自然也受到良好的教化，彼此和睦相处。

《说苑》上也同样写道：“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知人善任是君主所应该做的事，处理具体的政务是臣下所应尽的责任。君主之道就是知人善任，不要本末倒置，造成君主整日忙于政务，无暇“慧眼识珠”，而受俸禄的臣子却非常清闲。所以君主最重要的任务是知人善任，只要把关键的人用好了，就可以垂拱而治了。

所以历史上评论说，舜“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做什么事了吗？其实他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他只是把自己做好了，自己很有德行，没有偏离正道，能够任用那些贤德的人，使他们处在合适的位置上，结果他垂衣拱手，天下自然就得到了治理。

上述内容再次说明，君主、臣子的位置不能够颠倒。君主的

任务就是知人善任，不能够嫉贤妒能，只要做好这一点，国家便可以得到治理。

七、已树而择，所树非贤

《说苑》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的阳虎获罪了，他跑到北面的晋国去见赵简子。见了赵简子他就说：“唉，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去培养人、举荐人了。”赵简子就问：“为什么呢？”阳虎就说：“朝堂上的大臣，我所培养的超过了一半。朝廷上的官吏，我所举荐的也超过了一半。边境的守卫、将士，我所举荐的也超过了一半。但是现在，朝堂上的大臣亲自在君主面前排斥我，朝廷上的官吏亲自用法令来危害我，边境的将士亲自用兵士来威胁我。所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去推荐人了。”赵简子就说：“唯贤者为能复恩，不肖者不能。”只有贤德的人才能知恩图报，不贤德的人做不到这一点。他做了一个比喻，“夫树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树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他说，种植桃、李的人，夏天能够得到休息，秋天还能吃到桃、李的果实。但若培育的是蒺藜，夏天不能够在树荫下乘凉，秋天得到的也只是蒺藜的刺。“今子之所树者蒺藜也，非桃李也”，现在你所培养、举荐的人都是蒺藜之类的，而不是桃李之类的。“自今已来，择人而树之，毋已树而择之也”，从此以后，不要再把这些不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一定要先选择好，然后再培养他，不要培养、重用过之后才发现当初所选非人。

八、事繁职乱，禄薄吏贪

《傅子》上记载：“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则事繁而职乱。知省其职而不知节其利，厚其禄也，则下力既竭而上犹未供，薄其禄也，则吏竞背公义营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废而不行也。”如果想治理好人民，就不能使国家机构的职责尾大不掉，职责要清楚明白，杜绝尸位素餐。不仅如此，还要节制官员的私欲，恰当处理官员的俸禄问题，既不要使官员的俸禄过高，导致百姓供给不足，也不要使得官员的俸禄过低，导致他们竞相与民争利，徇私枉法，中饱私囊。

《刘廙政论》记载，“夫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故选托于由、夷，而又威之以笃罚，欲其贪之必惩、令之必从也，而奸益多、巧弥大。何也？知清之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无耻也”。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想让他的官吏清廉的。所以就选择像许由、伯夷这样廉洁有守的人去当官，而且还要以刑罚来让他们感觉到畏惧，做到有贪必惩、有令必行。但是结果却不是很乐观，奸诈的事情反而越来越多，取巧营私也越来越厉害。这是什么原因呢？“知清之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若一心地想求清廉，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使官员清廉，只用刑罚来使其畏惧，结果是“免而无耻”。这与孔老夫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道理是一样的。“日欲其清，而薄其禄，禄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如果希望官员很清廉，但是给与的俸禄却很低，这样就很难让他们成为清官。身为国家的精英贤才，他们必须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并且期待体面的生活，若俸禄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那么官员自然会想方设法与民争利，中饱私囊。

《崔寔政论》中也有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人身居高位，俸禄很微薄，但是又有很大的权力，这就如同让渴马守水、饿犬护肉，要想不贪是不可能的。所以君主在要求臣子奉公守法、勤政廉洁的同时，需要首先考虑到臣子的需要，提供给他们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官员的腐败问题。

但是，不切实际的高薪养廉也有诸多危害。《刘廙政论》对于如何保持官员的廉洁性有这样一段论述：“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要保证官员的廉洁性，首先需要给予其充足的俸禄。但同时要注意精简机构，防止尾大不掉。不然，高薪养廉的代价太大，人民会筋疲力尽，导致民不聊生。再者，还要培养官员的工作能力，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这样才能以一抵三，不显得官员稀缺、办事不周。

所以高薪养廉起码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精简机构、精简官员；第二，还要重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责任感的教育。以最少的人数办最多的事情，在保证效率的原则下实行高薪养廉，这样才能防止高薪养廉带来的弊端。

《群书治要·魏志（上）》中有这样一句话：“夫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把没有事的官位给废除，把不急需的俸禄给减损，把过分的花费停止，将人浮于事的岗位合并，使得官员各司其职，条分缕析，责任到人，这样给他们以丰厚的俸禄，使得他们不用劳作便可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古代圣王都是这样做的，同时也符合当今的时宜。

《汉书》上这样记载：“夫天亦有所分与，与上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与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意思是，上天在造物之时，虽造出的万物各不相同，但遵循平等公正的理念，凡是给予动物锋利的牙齿，便不会再赋予它尖利的犄角，凡是给予它强壮的翅膀，必定只赋予它两只脚。这是因为如果它已经享受了一样强大的东西，就不能再去追求小利了。为政者也一样，既然不用劳动、不用从事商业就可以得到俸禄，那就不能与民争利、徇私枉法了。“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官员要与民争利，那人民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官员身居高位，权势倾天，平民百姓岂能敌得过？所以官员在得到自己应得的俸禄之后，就要对人民感恩戴德，感激因为人民的供养，自己才不用参与辛苦的劳动，切忌与民争利。

“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意思是说，天子、士大夫等，这都是百姓所仿效的对象，怎么可以居在贤人的位子上，而从事百姓的行为呢？“皇皇求财利，常恐匮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整天忙着求财利生，怕自己的生活有所匮乏，这是一般百姓的意图。每一天求仁义，常恐不能够教化百姓，这是士大夫的意图。《易经》有言：“负且乘，致寇至。”若担着担子，背着包袱，还坐着车子，一定会招致贼寇。因为“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乘着车子是君子、士大夫才可以享受的待遇，而背着包袱、挑着担子，这是一般百姓所从事的事。居在官位之上而从事百姓的行当，那一定会给自身招致祸患。所以古人阐述得很明白，官员不能够一面拿着国家的俸禄，一面又去从事工商

业与民争利，这是天理所不容的。

上述说明，精简官吏、机构，使人当于事，然后高薪养廉，这是一个方面。若要保证官员奉公守法，不与人民争利，还必须对官员进行道德的教育和引导。所以历朝古人都浓墨重彩地论证官德修养。

唐太宗学了《群书治要》之后，总结了这样一段话：“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做君主的贪心一定会亡国，做臣子的贪心最后导致身败名裂，这是得不偿失的。太宗认为，一个臣子对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去贪污受贿、违法乱纪，就等于是拿着珍珠弹射鸟雀，实质是愚蠢的。

《易经》中记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如果能够真正明白古今的道理，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去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了，所以道德的教育至关重要。但在当今社会，道德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很难有人能切实推行，原因就在于人们还没有真正明白传统文化中道德的可贵性。这就好比桌子上放着一块金子和一块石头，如果我们真正知道金子的价值比石头更贵重，一定会拿金子而不会去拿石头。而现在我们恰恰不知道孰轻孰重，所以才不知所措。

“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群书治要》，审视官员的兴衰成败，乃至他们后代子孙的兴衰成败，通过读书来明理。读史使人明智，从而不会让自己利令智昏、情令智迷。

上述说明了用人的八条大忌。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要真正地任用贤才，使人尽其才，必须从这八个方面去考虑，避免这八种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用，使人民生活富裕，政治清正廉明，国家长盛不衰。

附录

古镜今鉴——《群书治要》的当代价值

(2013年4月20日讲于香港国际博览馆)

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今天非常荣幸，应香港圣贤教育学会的邀请，来到了香港这块宝地，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群书治要》。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古镜今鉴——〈群书治要〉的当代价值》。

之所以选这样一个题目，我们都知道，我国老一辈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习老（习仲勋同志），早在2001年的时候，就为《群书治要考译》题了这样四个字——“古镜今鉴”，期许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来学习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教训，能够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些启示。

在今年的3月1日，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看了这段话，我们就会思考，为什么在中国古人那里有这样的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和献身精神，而这种精神在现代中国人的身上却不多见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读的书和古人不一样了。古人从小要熟读四书五经，接受的是古圣先贤的熏陶和教诲，所以久而久之自然有这样的人生理想、政治抱负。所以在这段话前面，习总书记特别强调，“各种文史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为什么要学习？目的就是“以学益智”，增长我们的智慧；“以学修身”，提升我们的修养水平。

一、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

我们今天选择了《群书治要》这部书，对于领导干部的修身治国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领导干部的首要任务，就是来治理国家，使社会安定。《群书治要》首先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治乱的根本究竟在哪里？

在《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上有这样一段话。“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意思是，大凡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治理的原因，通常都是因为君主承继太平的日子已经太久了，社会风气逐渐变坏也不觉悟，政治逐渐腐败也不更改，习惯于这种乱象，安于现状，还逸乐看不到危机。“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有

的沉迷于欲望的享乐，不理国家大事。“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有的耳朵里听不进劝谏和教诲的真言，满足于虚伪，忽视真诚。“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有的是在歧路徘徊，不知道何去何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有的是被信任的大臣，因为要保住自己的俸禄，而闭口不言，不敢犯言直谏。“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有的是被疏远了的臣子，因为自己的身份低微，言语不被采用。“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所以，国家的法度纲常在上很松弛，而有识之士在下忧心忡忡。真是可悲啊！

我们看了这样一段论述，感觉到这段话说古代的社会盛衰适用，说今天社会的盛衰也同样适用。一句话，社会盛衰的根本原因在哪里？那就是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诗人李商隐所说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之所以由盛转衰，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他们的德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很多人面对当今社会的腐败现象、食品安全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等，也都非常的忧虑。他们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国，这些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大家对这种看法认同吗？

在我没有学习《群书治要》之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譬如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学中国哲学的同学，他说要给孔老夫子写一部书——《至圣先师孔子》，为孔老夫子正名。当时我还和他争辩，我说就是因为孔老夫子的思想，使得我们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大大地落后于西方国家，把这个罪过全都归到了古圣先贤的身上。

但是，后来我到英国去读书，又到新加坡去学习，接触到了上净下空老教授的教诲，听到他说，在英国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叫汤恩比，他在研究了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句话：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

国的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一开始对这句话，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听了很多老教授的讲课，他讲儒释道的根本，讲“学儒”和“儒学”的区别，我们也被他的这一种说理的透彻给征服了，最后才生起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所以当我们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忽视了西方的制度建设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西方的历史上，它的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政治制度维护的是公平正义，但是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是靠教会来教导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忽视道德教育，只不过道德教育的主体是宗教而已，是教会而已。而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盲目地把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制度搬过来，但是并没有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应有的效果。

譬如说，安利公司刚刚来中国发展的时候，它有一个全球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这个产品用光了，用得一滴不剩，然后你对它不满意，可以拿着空瓶子到公司去退款，这个公司会把所有的货款退还给你。为什么？因为它觉得自己的产品质量很过关，没有人对它不满意。这个制度走过了很多的国家，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唯有来到中国的时候，却遇到了瓶颈、遇到了挑战。遇到了什么挑战？我们知道中国人都很聪明，但是有的时候聪明没有用到正确的地方。有的人拿着用光了产品的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而且很多人是倒光了产品，他不是用光了这个产品，然后也拿着空瓶子到公司去退款。结果每一天都有排着长龙的人，拿着空瓶子要求退款。这下可让安利公司开了眼界。最后怎么样？迫使他们在短短的时间内，改变了全球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

我们知道，安利公司的分配制度被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研究过，被誉为最完美的、无懈可击的分配制度。但是，就是这

样一个看似完美的制度，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却遇到了种种的弊端和挑战。

所以，诸位朋友，这是制度的问题吗？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如果我们盲目地把西方的制度搬到中国来，而忽视了它的宗教文化传统，就会出现“异体移植”的弊端，就是制度在西方用得很好，一挪到中国就会“水土不服”。

再譬如，我们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到中国的乡村，民主选举村干部，结果这个村民，谁给他的钱多，他就会选谁，最后出现了很多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的现象。这些现象都告诉我们，愈是实行民主，愈需要有一定的道德教育，民主要以道德素质做基础，否则的话，选出的这个村干部绝对不是最理想的。

这些案例为我们说明了孔老夫子反复强调的一个道理，那就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这个领导者是个有德行的、大公无私的领导者，无论是怎样的制度，都不会对企业、对国家造成很大的危害。相反，如果这个领导者德行败坏，以权谋私，他总是利用制度的漏洞，想方设法地以权谋私。

这句话在古代适用，在今天还适用不适用？我们看一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能人现象”。什么是“能人现象”？就是这个企业眼看着要倒闭了，但是换了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他用短短的时间，就使企业扭亏为盈。很多人认为这个人很能干，把他称为“能人”。其实当我们反观这个现象的时候，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首先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他没有想方设法地把国有资产化为私有，中饱私囊，所以他制定的政策，都是有利于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利于企业的每一个员工。所以，这个“能人”不仅是有能力的人，而且首先是有德行的人。

在美国也有一位伦理学家麦因泰尔，他专门研究美德，他有两本著名的著作，一本书叫《追寻美德》，另一本书叫《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在《追寻美德》这本书中，麦因泰尔就提到，他说：“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还说：“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正义的制度和规则是得有正义美德的人设计出来的，而正义的制度设计出来了，在它推行的过程中，也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把它推行得好，才不至于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他的这一句话，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也就是《荀子》）上，以另一种方式更加简洁地表述了出来。荀子说：“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也就是说，礼法制度不能单独地存在，不能单独地发挥作用，得到了圣贤君子这样的人，才能够把这个制度推行好，失去了圣贤君子这样的人，礼法制度就不能够发挥好的作用。所以，礼法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而圣贤君子是制定这个法律制度的人，他是“法之源也”。

在《群书治要·傅子》上，把制度建设和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就给我们表明了。《傅子》说：“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我们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好多人都在争论，究竟制度是更根本的，还是人是更根本的？二者的关系如何去平衡？这里《傅子》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明智的君主一定会顺着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的结果。好的制度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但是他接着强调，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必须要有“良佐”，

就是好的辅佐人才，有圣贤君子，来推行这个好的制度。所以圣贤君子也同样重要，甚至是更为根本。这句话就把制度建设和人的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给我们讲清楚了。

在今年的3月8日，习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的审议时这样说道：“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花费要多得多，而更多的还是我们倾注的精神和精力。但是，一着不慎，毁于一旦。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功罪不可相抵。如果搞不好，领导干部的岗位就真会变成高危职业。”他还说：“我在中央纪委全会上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项工作要继续坚持，去搞好完善、建设。同时在我们国家有一句话，叫‘面壁成佛’，就是自我境界的提升。”

这段讲话实际上讲了两层意思。也就是说，要反对腐败，必须要有制度建设，但是同时也要重视领导干部自我境界的提升，这两者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话的论述上就知道，习总书记他是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把古圣先贤的治国理念给我们讲出来了。其实这段话和《傅子》上的这一句话，是两种说法、一个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制度建设很重要，但是不能忽视道德教育。

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有一位法官叫勒纳德·汉德，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总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求助于宪法、法律、法院、法官来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反复地告诫你们，这么做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义在人们的心中死去，宪法、法律、法院、法官谁也救不了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法官认为谁给他的钱多他就可以偏向谁，就有失公平正义，那我们的法院、法官也没有办法真正起到维护公平正义的效果。这个就是告诉我们，道德教育很重要，绝对不可以忽视。

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只是强调制度建设，那就会有三个问题是不可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难以防患于未然。

在《汉书》上有这样一句话：“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仪的教化，伦理道德的教育，都是防患于未然，使消极结果根本就不发生。而法律的制裁是在消极结果产生之后，给予事后的惩罚和补救。你可以把这个犯罪的人、腐败分子抓进监狱，判处他无期徒刑，但是他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可挽回了。

这个“礼者禁于将然之前”的效果，我们可以从婚礼上得到观察。我们中国古代被誉为“礼仪之邦”，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礼的教化。譬如说，我们看婚礼，男女结婚前三天，女方三日不熄灯。为什么三日不熄灯？很多人说那是迷信。其实我们现在学习传统文化，学到了很多形式的东西，但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不为人所知，就被误解为迷信了。为什么要三日不熄灯？因为再过三天女儿就要出嫁了，父母趁着她还在家的时候，抓紧时间，彻夜不眠地给予她为人妻、为人母的教育。当然，平时父母之间相处很和睦，这个女儿已经学得很多了，但是在她出嫁前三天，还要彻夜不眠地抓紧时间教导她如何为人妻、为人母。

在娶妻这一天，新郎就早早地起身。干什么？他要祭祀祖先、祭祀天地。因为在中国古人看来，两个人的结合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它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关系到整个家风的承传，所以不能够不谨慎。他要去迎亲，出门之前，要接受他父亲的敬酒。中国人特别讲究长幼有序，平时吃饭的时候，都是儿子恭恭敬敬地给父亲敬酒。但是这一次不同了，他的父亲要给儿子敬酒，所以儿子就感觉到和平日不同，突然感觉到这件事情很重

要，自己肩上的责任也很重大。

新郎来到了新娘的家里，岳父岳母非常郑重地亲手把女儿交到新郎的手上，意思是说，从此以后，我们这个女儿一生的幸福就托付给你了，你要对她倍加关爱。这个时候新郎也能够体会到岳父岳母的心情，他就带着新娘跪拜岳父岳母，让他们放心，感恩岳父岳母给自己培养了一个贤内助。

新娘被娶上了花轿，在她坐上花轿之后，一定要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是把她的香扇从轿子的窗口给扔出去。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动作？这就是提醒自己，以前在家是千金小姐，天气热一点还要拿扇子扇一扇，说“天气好热”。现在你要去为人妻、为人母了，这些娇里娇气的小姐习气，就要随着这一把香扇都给它抛出去，扔得一干二净。

新娘来到了公公婆婆的家里，公公婆婆本来是在主人的位置上的，他们就从主人的位置退了下来，退到了客人的位置上，而把这个儿媳妇从主人的位置迎了上来。为什么？这个就是提醒儿媳妇，从此以后，我们这个家就托付给你了，你就是这个家的主妇了。

上孝公婆，中和妯娌、辅助丈夫，下教育好子女，这个责任无比的重大，必须有深厚的德行才能够承担好。所以在《易经》上有句话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象征的是女子的德行，女子应该效仿大地。大地非常的宽容，你把好的、干净的东西扔给它，你把脏的东西扔给它，它都没有怨言，一概接受。这就说明，一个女子愈有德行，愈能忍辱负重，这个家庭才愈能经营得好，这一家才愈能够幸福。

到了两个人要喝交杯酒了，这个交杯酒也会喝得终身不忘。他们拿着一个葫芦，一切两半，一人一半。意味着什么？提醒夫

妻两个人原本就是一体的，不分彼此。不是像我们现在学到的所谓西方的观念。什么观念？这两个人还没有结婚，就要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什么意思？意思是不要因为财产问题，一旦离婚，再惹出纷争吵上法庭。你看，两个人还没有结婚，就想到了以后可能会离婚，这个婚姻怎么能够经营得好？中国人恰恰相反，他认为夫妻本来是一体的，不分彼此。这个葫芦瓜里的酒是甜的，葫芦瓜的丝是苦的，喝了这杯交杯酒之后，就意味着夫妻从此以后要同甘共苦，彼此扶持，白头偕老，共度一生。这还不算，喝完交杯酒之后，还要把这个葫芦瓜拿绳子系在一起，挂在墙上。为什么？这就是提醒夫妻两个人，在今后的生活中，不要因为小小的磕磕绊绊影响了夫妻和睦相处的主旋律，不要忘记两个人结合时最初的发心。

这个婚礼进行下来，处处都起到了提醒和教育的意义，提起了每一个人的责任感。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古圣先贤对得起我们后代子孙，他们把夫妻如何和睦、如何教育好儿女、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方法，都已经给我们总结出来了，并且落实在礼仪之上。但是我们后代子孙体会不到古圣先贤的良苦用心，还把它误解为封建迷信，说是等级制度的产物，还对它进行批判。这就等于我们坐在一棵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却不知道感恩回报，还要拿着斧子对这棵大树猛砍，没有比这更折福的事情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社会出现了这么多逆伦现象，儿子把父母给杀了，夫妻同床异梦，兄弟因为财产起了纷争吵上了法庭。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之中，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让我们一度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所以十八大报告就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一句话讲得非常有必要。

第二个问题，就是容易导致人“免而无耻”。

什么叫“免而无耻”？就是没有触犯法律，做出的不道德的行为。西方把它称为“反社会行为”。譬如说，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青少年倚强凌弱，等等。这些现象，因为青少年的年纪很小，还达不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这些现象已经非常的普遍，已经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些问题靠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在《论语》上，孔老夫子就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西方式的管理方式，设置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用这个来引导人们，只要他触犯了政令条款，就给他以刑罚的处罚。结果是什么？人们因为惧怕处罚，免于去做坏事，但是他没有羞耻心，甚至他仍然想方设法地去做坏事，免于法律的制裁，还沾沾自喜，认为这是自己聪明智慧的表现。所以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确实能够把犯罪的人给予刑罚的处罚，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廉洁的节操；能够把犯罪的人处死，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的仁爱之心。这就是法律的局限。

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上，它就做了一个更加形象的比喻。它说，法律能够把不孝的人给杀死，但是不能够使人成为像孔子、曾子那样有德行的人；法律也能够把盗窃的人处以刑罚的处罚，但是培养不出像伯夷、叔齐那样高尚的廉洁的节操。孔老夫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这是靠什么所成就的？靠的不是法律，靠的是教育成就的。

我们看到“孔子养徒三千人”，我们也想到了我们目前也有一位类似孔子的老师，那就是我们所尊敬的上净下空老教授。你

看他培养的徒弟，可能比三千人还多，很多人都是各行各业的表率。譬如说，我们知道的刘素云老师，优秀共产党员；我们所知道的胡小林董事长，优秀的企业家，无私无求地在为弘扬传统文化做贡献。包括我们今天大会的主办方——圣贤教育学会的王会长，都是在老教授的教导下，来为社会公益事业无私无求地付出。当然我们所熟知的蔡老师、李越老师等等，更是长期接受老教授的理念，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所以我们想，这是靠什么成就的？靠的是教育成就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会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我们设置的法令条款，一天比一天更具体、更细致、更严密，但是社会没有因此安定和谐，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却愈来愈多。这就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譬如说，我们食品安全出现问题了，我们就可以出一个《食品安全法》；我们腐败现象很严重了，我们可以出一个《反贪污腐败法》。法律的条文愈来愈多、愈来愈细致。但是怎么样？社会并没有因为这些法令的出台而变得更加和谐，相反，钻法律空子的人、违法乱纪的人却愈来愈多。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会议上有很多西方的学者。其中有一位学者，是一位女士，她站起身来，用非常讽刺的口吻说：“你们中国人千万千万不要盲目地向我们西方人学习。为什么？因为我们西方社会并不像你们想象得那么美好，恰恰相反，还出现了你们几千年前老子所描述的情形。”什么情形？很难得，当时她就引用了这句话。你看一个外国人，她能够引用老子的话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这种情况？在近现代以来，很多人认为上帝死了，宗教是迷信，所以西方社会的很多年轻人不再相信宗教了，但是他们的

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来进行制度安排的。结果怎么样？结果法律虽然愈来愈多、愈来愈细致，但是青少年犯罪率不断地攀升，青少年的问题也愈来愈严重。

在《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就这样说道：“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每每我读到这些圣贤教诲，我就发自内心地佩服。为什么？你看他用三两句话，就把问题的关键给指出来了。你不能制止人民作奸犯科的心，而只是以刑罚来规范、处罚人的行为，就是你每一天在外面执行死刑，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我们从历史上看，在《汉书》上说，如果我们只是注重法律的严苛，忽视了道德教育，会出现什么问题？“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这个法律一出台，奸诈的行为就产生；这个命令一下达，欺诈的行为就兴起。就像“以汤止沸、以薪救火”一样，只会使这个事情发展愈来愈烈，于事无补。

所以这些论述都告诉我们，在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道德教育。因为什么？因为“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这也是我们学习《群书治要》得到的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

二、领导者成败的关键在道德修养

《群书治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领导者成败的关键在哪里。通过学习《群书治要》，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当领导者的，都希望自己一呼百应，受人爱戴和尊敬，走到

哪里，做事、说话都很有执行力。凡是领导者，都希望有这个效果。怎么样做才能有这个效果？《大学》上告诉我们：“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个名声、财富、社会地位，都是枝叶花果。它的根在哪里？根就在于一个人深厚的德行。所以说，领导者成败的关键，就是在于是否有深厚的德行。

在《中庸》上，孔老夫子在称赞舜王的时候，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真正有深厚德行的人，像大舜那样，他的后母、他的弟弟三番五次要置他于死地，他不仅没有怀恨在心，想着去打击报复，还总是反省自己做得不够。最后他的德行感动了尧帝，把这个王位、天子之位让给他，感化了天下的百姓，最后也感化了他的后母和弟弟。所以孔老夫子在称赞舜王的时候才说，真正有德行的人，一定是福禄寿名都齐全的。

在中国的史书上，有很多有道德学问的读书人，他们看到一个人现前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以后的发展趋势如何。他们靠什么来看的？其实这些有道德学问的读书人都明白天道，他们都从圣贤书上体悟到了这些规律。譬如说，在《尚书》上就有这样一句话：“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在内兴起迷恋女色之风，在外喜欢打猎，喜欢娱乐，喜欢饮酒没有节制，沉迷于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刻着花纹，以上六种情况，如果你做到了一件，就没有不灭亡的。魏征在《群书治要》的注释上加了这样一句话：“更何况是六种全都做到了呢？”所以我们看了这句话，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警觉，看自己是不是有六种表现之一。如果有其中一种表现，那就没有不灭亡的了。

在《群书治要·吕氏春秋》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楚国有

一个很会给人看相的人，他给好多人看相，说的都和这个人的实际情况一模一样。楚庄王感觉到很奇怪，就召见他，问他是怎么样一回事。这个人怎么回答？他说：“我并不是能够给人看相，我只不过是能够观察这个人所结交的朋友罢了。如果我看的这个人是一个布衣百姓，他所结交的朋友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做事非常的谨慎，自己很善良，还畏惧法令，这样的人，他的家一定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身心一天比一天更安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吉祥的人。如果我看的这个人是一个事奉君主的大臣，他所结交的朋友个个诚实守信、有德行、喜欢做善事，这样的人事奉君主，一定一天比一天事奉得好，他的官位会一天比一天更提升，这就是所谓的吉祥的臣子。如果我观察的这个人是一个君主，他的朝廷中的臣子都是贤德之人，左右都是忠诚之士，君主有过失，这些臣子都敢犯言直谏，这样的君主，他的国家会一天比一天更安定，他君主的地位会一天比一天更尊崇，天下的人对他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心悦诚服，这就是所谓吉祥的君主。”最后他还强调，他说我并不是会给人看相，我只不过是能够观察这个人所结交的朋友罢了。

诸位朋友，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会场，有可能是朋友劝告我们来的，或者是朋友骗我们来到了这个会场。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我们接触圣贤教诲，结交那些有德行、做善事的人。这样的朋友是最值得你尊敬的、最值得你信任的人，对他们要非常的感谢。当然我们为什么能够结交这样的朋友？在《易经》上也告诉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为我们自己有德行，我们才能够感召这样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身边。假如说我们喜欢赌博，那么你感召的许多朋友都是喜欢赌博的人。另一个人喜欢卡拉OK，他所感召的朋友都是喜欢卡拉OK的。我们喜欢学习传统文化、喜欢

《群书治要》，结果这些喜欢圣贤教诲的人就来到了这里汇聚一堂。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根本的根本还是在于自己的修身。所以领导者的成败何在？就是在于自己的道德修养。

在习总书记那里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他在没有担任总书记之前就强调说：“一个人不能够既当公务员又想发财。如果你既想当公务员又想发财，那就会有危险了。”为什么不能够这样想？在《群书治要》中，有董仲舒对汉武帝的上书，其中有这样一段阐述，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他在上书中说：古代的国土，也是今日的国土。同是一片国土，而古代能够使国家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诈邪恶，囹圄空虚（监狱里没有犯人），恩德润及草木，福泽广被四海。以古观今，为什么相差得这么远？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错乱，以至道德风气衰败成这样？你看，董仲舒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他自己进行了回答。他说：想来大概是现今的治国之道比之古时有所差失，或者是与天理有所违背。天道是什么样的？上天对待万物是有所分配的，它也是很公平的。譬如说，给予了一个动物很锋利的牙齿，就去掉它的犄角；让它长着翅膀的，就让它只长着两只脚。这就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能再获取小的好处。同样的道理，古代凡是接受俸禄的人（就是当官的人，现在来说就是公务员、领导干部），不以体力劳动谋生，不得从事商贸事业，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得再谋求小利。如果已经接受了大的好处，又要谋取小利，连上天都不能

使其满足，更何况是人？富有的人奢侈美满，贫穷的人艰难愁苦，而居上位者不予救助，人们就不乐意生存下去。人民不乐意生存下去，连死都不躲避，又怎么会去躲避犯罪？这就是刑罚之所以繁多但奸邪仍然制服不了的原因。所以享受俸禄之家（也就是领导干部、公务员），以俸禄为生就行了，不能与人民争占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普遍地分布，而人们也可以家给人足。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上古的治国之道。天子应该取法此道作为制度，大夫也应该遵循它，并成为自己的行为。

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古代的圣贤君子、身居爵位的人，他们不与民争利，不去从事工商业，所以百姓才崇敬他们的品行，听从他们的教导，人民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鄙陋。由此看来，天子、大夫是百姓所效仿的榜样，怎能居贤人之位，却像平民那样行为？惶惶不安地谋取财利，并经常担心财用匮乏的，那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意识。惶惶不安地求取仁义，并经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的，这才是士大夫应当考虑的事。

最后，董仲舒用《易经》上的一句话做了总结。《易经》上说：“负且乘，致寇至。”什么意思？乘车是君子的位分，而背负肩挑是平民百姓所做的事情。这句话就是说，身居君子之位，身为领导干部，身为公务员，而又去干平民百姓的事，必然会招致灾祸临头。

所以，为什么习主席他能够提出“不能够既当公务员又想发财”？说明什么？他提出这句话，并且说得很肯定，说明他对我们古圣先贤的治国理念非常的熟悉、非常的通达。如果没有读过历史书，也不能够提出这样肯定的结论。

这个是我们讲的，领导者的修养是领导者成败的关键。

三、领导者道德修养的内容（一）：修身

第三个问题，我们就要讲一讲，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内容是什么？很多人也想一呼百应、受人尊敬，也想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应该从哪里入手？我们讲，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是修身，第二就是爱民，第三就是用人。

首先我们看一看修身从哪里入手。修身也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戒贪，第二是惩忿，第三是改过。

（一）戒贪

修身从哪里提升自己的境界？从戒贪开始。

1. 贪财

《群书治要》被魏征等人编纂好之后，呈送给唐太宗。唐太宗每一天手不释卷地阅读，读得非常高兴。最后，他总结了这样一句话：“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当君主的很贪心，最后的结果就是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当臣子的很贪心，最后就是身败名裂。所以他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去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徇私舞弊，那就如同拿着珍珠弹射鸟雀。什么叫拿着珍珠弹射鸟雀？珍珠非常的昂贵，在中国古代那个时候还没有人造珍珠，所以都是自然珍珠，价值连城。但是拿着它去干嘛了？拿着它去射麻雀。这就是分不清哪一个重、哪一个轻。

在《曾国藩家书》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就是公家的一文钱他都不会挪作私用。我们现在的人看到这一句话，我们相信不相信曾国藩真的做到了不取军

中一文钱挪作私用？我们相不相信？大家都是学习传统文化的，所以能够相信。但是每每我给这些领导干部上课的时候，我问他们相不相信，很多干部都在下面摇头，说“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到，怎么能够相信他能够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所以我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曾国藩能够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而我们现在的很多领导干部却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和曾国藩的区别何在？

其实，我们和曾国藩的区别也不是很大，特别是在座的很多人，可能智商都比曾国藩高。为什么？我们讲一个故事，大家就相信了。曾国藩小的时候，有一次在读书，读得很累，天已经很晚了，他的家里就来了一个小偷。这个小偷趴在屋顶上，想等他读书累了，去休息了，然后再行窃。但是曾国藩读了一段书，翻来覆去地背诵，就是背诵不下来。结果怎么样？这个小偷等得有点不耐烦，他就从房上跳下来，把曾国藩前面背的那一段书给他背诵了一遍，然后就扬长而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曾国藩小的时候智商不是很高。但是他一生得益于“恭敬”、“勤俭”、“恒心”这几个字。他和我们的不同之处何在？他对古圣先贤的教诲，深信不疑，有一种至诚恭敬之心。所以他读了“四书”、读了《易经》等等，我相信他对这上面的教诲也深信不疑。

《大学》上就有这样一句话：“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很多人本来可以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读这一句话，不相信这一句话，最后却银铛入狱了。这句话就是说，你的财富是以不正当的、不好的方式赚得的，结果怎么样？结果一定会以不好的方式给败散掉。这是一定的规律。所以中国古人说，这个财富并不是赚到你手、贪到你手就是你的了，它为五家所共有。

哪五家？古人给我们总结出来了。首先就是官府。譬如说，我们这个钱是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赚得的，最后东窗事发，自己锒铛入狱，所有的家产被没收、被充公。虽然赚到你手了，还没等你享受，又昙花一现地给收回去了，所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看，《群书治要·史记》上记载着，鲁国有一个宰相叫公仪休，他为官清廉，不与民争利，对属下要求也很严格。公仪休有一个嗜好，很喜欢吃鱼。于是有人就投其所好，送给他很多鱼，他却派人把这些鱼又送了回去。这个送鱼的人就感觉到奇怪了，他说，我知道您爱吃鱼，特地选了一些上好的鱼送给您，为什么您不接受，又给我送回来了？公仪休怎么回答的？他的回答很有味道。他说，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今天才不能接受你的鱼。为什么？如果我爱吃鱼，我是宰相我也买得起，我自己去买不就好了吗？如果我今天接受了你的鱼，改天养成了爱占便宜的侥幸心理，愈贪愈多，当我被关进监狱的时候，请问我还能吃得到鱼吗？还有谁再送给我鱼？所以，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我才不能接受你的鱼。

我们经常读一读这样的故事，就知道古代那些领导者怎样的有理智，才能把我们自己的理智也提起，而不会利令智昏、情令智迷。

第二就是水灾，第三就是火灾。这些灾害，看起来是自然的，实际上也专会把不义之财给焚烧掉、给剽夺走。

第四就是盗贼。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盗亦有道”。这个盗贼也有道义，专门劫富济贫。看你这个钱来历不明，贪污受贿而来，又没有用它做慈善事业，反而一掷千金，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个盗贼看了也会过意不去，专门偷盗、敲诈、勒索为富不仁的人。所以叫“盗亦有道”。在《庄子》上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大盗叫跖，

他所以能成为大盗，是因为他也讲仁义礼智信。譬如说，他能判断什么时候去行窃最没有危险，风险最小，这也是智的一种表现。去偷盗的时候，这个领头的人要冲锋在前，出来的时候他要断后，这也是勇的表现。分配赃物的时候，要按照每一个人的付出和风险大小来平均分配，这也是义的表现。这就是告诉我们，你想做一个盗贼，都要讲仁义礼智信，否则都成不了大盗。更何况做一个领导干部！

第五点，防不胜防，那就是不肖子孙，败家子也会把你的不义之财给败散掉。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学习传统文化，看到很多的腐败分子，贪污了很多钱，把儿女送到国外去求学，一说起来，就是一脸的羡慕。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土地局工作，说起他们局长，他就是一脸的羡慕，说你看我们这个局长，只是一个小小的市的土地局长，但是豪华别墅有很多，豪华轿车有很多辆，把女儿送到澳大利亚去求学，一路都是豪华轿车开到机场，说起来就很羡慕。但是我们告诉他，“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样的事情不能够羡慕，还要劝告你的局长，赶紧悬崖勒马，否则灾难就不远了。他听了之后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局长是老江湖，他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他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他怎么会相信这些道理？你看没有办法，我们想去帮助别人都帮不上忙。结果过了几年，这个市的市委书记因为贪污腐败被抓了起来，波及了好几个局长，其中有一位就是这位土地局的局长。当他被抓起来之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对他敬而远之。以前要去给人家送礼都要排着队的，还要走后门，现在这些亲朋好友看到他的家属都敬而远之，都不敢跟他打招呼，生怕牵连到自己，把自己也给牵扯到其中。他东窗事发之后，自己锒铛入狱，不义之财被没收、被

充公，连在澳大利亚求学的女儿也受到了盘查。所以我们看“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这个例子，就在我们的身边。

当我到英国去求学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有钱人、有权人的子孙，他们被送到国外去求学，并没有拿着父母给注册缴学费的钱去注册缴学费，反而拿着这些钱来到了卡西欧（著名品牌）。卡西欧中国留学生是最多的。结果怎么样？一掷千金，哗啦哗啦，把父母给的钱又给败散掉了。所以我们深入去观察，这个“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例子，就在我们的身边。

当然我们要知道，中国古人是抛砖引玉，为的是引导我们学会去观察。在我们现代社会，又多了一种败散钱财的方式，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得病，那就是医院。为什么古人没有总结这一点？因为在中国古代有两种人最受尊重，一种人就是医生，另一种人就是老师，这两种人对社会的付出是无私无求、不讲条件的。你看古代的医生，半夜有人来敲门，他也不问这个人是否富贵贱、付不付得起药费，背上药箱直接就走了。把人家的病医好，人家缴不起医药费，他就免费把这个医药赠送给他。所以古代医生最受尊重，也没有出现在医生那儿败散钱财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不同了，医生很多也没有学传统文化，结果怎么样？看这个人是领导干部、那个人很有钱，他们得病了，就让他们去做很多不必要的检查，花很高的费用来买那些所谓的特效药，其实都是有副作用的。所以赚了很多的钱，但是自己得了一身病，还要在医院把这个钱财给败散出去，这个得不偿失。

所以我们看古圣先贤的教诲，就非常的有感触。譬如说，道家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被誉为古代状元、宰相的必读之书。这里边就有这样一句话：“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取不义之财的人，就像吃了那个

有毒的肉，喝了那个有毒的酒，想止息自己的饥渴，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你看它比喻得多么形象！但是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却没有机缘来读一读这样的书。

现代人非常喜欢学《易经》，但是很多人都是在枝节上做文章。为什么要学《易经》？请一个人来给我算一卦，看看我这件事可不可以做，这件事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个朋友、合作伙伴可不可以交。这些都是枝末。《易经》中有两句话大家只要掌握了，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兴衰成败。

第一句话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一定的规律。在2009年，当时的中央组织部李部长（李源潮同志），在延安干部学院秋季开学典礼上就这样告诫：“贪官敛财，从来都祸及子孙；廉官清白，多数能荫泽后代。”我们看了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李部长现在可以当国家副主席了！这也是一个熟读历史的人，得出的一个必然的结论。所以一部《二十四史》讲的是什么道理？讲的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

另一句话也很重要，就是“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譬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省部级以上的干部突然锒铛入狱了，大家都议论纷纷，说怎么回事、什么原因等等，其说不一。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易经》上早都给我们指出来了，“恶不积，不足以灭身”，那不就是积恶所导致的吗？是恶贯满盈的结果。所以中国人看问题是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是看他现在有权有势，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就对他很羡慕。他知道，再过十年、二十年，甚至你看一看他的子孙后代，你就对他不羡慕了。另一家，也许现在家境贫寒，但是兄弟姐妹勤奋好学、团结互助。你不要瞧不起人家，再过十年、二十年，这个家的家道就兴盛起

来了。这个都是不论一时而论久远所得出的发展趋势。

现在也有很多人很用心，为那些腐败分子算了一笔帐，觉得确实是很不划算：第一是政治帐，自毁前程；第二是经济帐，倾家荡产；第三是名誉帐，身败名裂；第四是家庭帐，妻离子散；第五是亲情帐，众叛亲离；第六是自由帐，身陷囹圄；第七是健康帐，身心交瘁；第八是历史帐，遗臭N年。在若干年之后，人们一谈起他还恨得咬牙切齿，确实是非常的不划算。正如唐太宗所说的，是拿着珍珠弹射鸟雀，分不清哪一个重、哪一个轻。

如果我们很贪财的话，我们读《群书治要》，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杨震，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的路上，路过了昌邑县，以前他所举荐的秀才王密当时正任昌邑县令。王密听说杨震路过此地，就乘着夜色，带了十斤黄金，要送给杨震。但是杨震拒不接受。王密以为杨震怕这件事有人知道才不愿意接受的，所以他就说：“恩公，这一件事没有人知道，我只不过是为了表达一下对您知遇之恩的感激而已，您就放心地接受吧。”杨震听了怎么回答的？杨震回答说：“这件事有天知、有神知、有你知、有我知，这叫‘四知财’，怎么说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拒不接受这“四知财”。后来，杨震的儿子、孙子和曾孙，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非常的显达。而他的后代子孙非常的廉洁，守住了他这种廉洁的家风。为了纪念他的这种品格，子孙就把他家的一个房屋取名为“四知堂”。凡是杨家的后代子孙，从这个匾额下走过的时候，都能够知道他们的祖先不收“四知财”。

2. 贪色

有的人对财看得很开，觉得我官位也不小，财富也不少，维持一个有体面的生活已经足够了，何必为这些身外之物铤而走险？所以他不贪财了。不贪财就开始贪色。中国古人说，“色”

字头上一把刀。这一把刀会把所有的功名利禄削得平平的，让你一无所有。所以古代读书的人、做官的人对这个字也非常的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们都知道，唐朝有一个著名的宰相，叫狄仁杰。他在进京赶考的时候，留宿在一家旅店。因为狄仁杰少年英俊，非常的潇洒，一表人才，而这个店主是一个少妇，白天看到他玉树临风，就不免动了爱慕之心。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狄仁杰还在刻苦攻读，这个少妇就主动地来敲狄仁杰的房门了。

诸位朋友，我们现在经常出差，到一个宾馆刚刚登记入住，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问你需要什么什么服务吗？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狄仁杰把门打开，看到了一个盛装的女子，打扮得非常的妩媚，而这个女子还非常的坦率，说明了来意。这个时候狄仁杰心里不免一动，但是他很快就镇静下来，想起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老人家，老人家提醒他，你一生主贵，一定是能够做到达官贵人的，但是你千万要小心，不可以败在女色的手上，因为这个“色”字头上一把刀，会把所有的功名利禄削得平平的，让你一无所有。狄仁杰听了之后，他也很坦率，他说，一个人年纪轻轻，又遇到女子主动来投怀送抱，让我不动心，确实也有点难，有没有一个办法，让我面对女色而不心动？当时这个老人家就教了他一个办法，那我们今天也把这个办法教给大家。老人家说，其实一个人面对女色而心动的时候，不过是被表面所迷惑。为什么？其实一个人好看，就好看在外边的一张皮而已。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在这个皮的底下都是些什么东西？都是血肉相连，还有一些肮脏的管道，流淌着肮脏的东西。所以中国古人把人体比作一个臭皮囊。就譬如有人送给你一个皮囊，外面雕着花又绣着朵，

让你一看就非常的欢喜。但是你把这个皮囊接过来，把封口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什么？装的是血、肉、屎、尿等等非常肮脏的东西。这个时候你还愿意把她抱在怀里吗？我相信这个时候你是迫不及待地一把推开，避之唯恐不及。古人把这称为“不净观”。实际上我们人体就是一个臭皮囊而已，没有丝毫可取之处。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狄仁杰想起了老人家的提醒，他就把这个办法也教给了这个女子，他说你这样来观察我，你会发现我也没有什么可爱之处了。

正是因为狄仁杰他有这样的德行，他能够忍人之所不能忍，所以他才能够成人之所不能成，他去进京赶考，一举成名，后来成为一代贤相，名垂青史。

所以我们从狄仁杰的身上，确实学到了“不净观”。有人说，你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作用？有没有作用，根本上看你到底想不想去用。我记得，我以前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就讲过这个“不净观”，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他真的就按照这个方法，和自己的情人断了关系，最后还走上了弘扬传统文化的讲台，把自己的经历说给大家听。这说明什么？说明古圣先贤的教诲能否起作用，关键看你对它是否有信心，是否会把它用在自己的生活之中。所以在难忍处能忍，这个才叫大英雄。

你看我们的寺院里都有大雄宝殿。什么叫“大雄宝殿”？在中国古人看来，战胜千军万马的人不叫大英雄，能够战胜自己的才是大英雄。譬如说，你原来很懒惰，现在变得很勤奋；你以前好色，现在不好色；你以前喜欢赌博，现在不赌博；你以前喜欢吸毒，现在不吸毒。你以前有种种不好的过失，现在全都能够改正过来，能够克制自己的习气、战胜自己，这才叫大英雄。我们今天也期许，在座的各位学了《群书治要》、学了传统文化之后，

都能够成为战胜自己习气的大英雄。

3. 贪名

上面我们讲了贪财、贪色，下面我们接着讲贪名。在《了凡四训》上有一句话说：“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在世间享有很盛大的名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但是却名不副实，这样的人多有意想不到的、突如其来的灾祸。

每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战战兢兢。为什么？因为现在全国各地传统文化的论坛很多，我们经常去分享自己学习的体会，也是小有名气。现在是愈讲愈不敢讲了。为什么？因为讲来讲去，发现自己连《弟子规》还没有完全落实，所以讲得愈来愈没有底气了。所以大家邀请我，我不敢去参加，还请大家体谅。我们希望那些在生活中、工作中落实得好的企业家，还有各个单位的领导者，能够现身说法，他们讲出的故事才能够感染人。比如，我们这次论坛就请到了吴念博董事长，他把《群书治要》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创建了幸福企业。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论坛，应该多请这样的企业家去分享，才更有说服力。

我们也看到，在社会上有很多影星、歌星，确实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你问一个孩子，今年评了“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今年评了多少位道德模范，你知道他们有什么事迹吗？他们叫什么名字？很多年轻人都摇摇头，说这个谁关心！但是你问问他，现在流行什么歌曲？哪个电视剧，那个主角叫什么名字？他的成名作是什么？他给你如数家珍，讲得头头是道。说明什么？说明在我们现在社会，影星、歌星的影响力是最大的，他们的名声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但是遗憾的是，很多的歌星、影星没有机缘了解传统文化，结果拍了很多暴力、色情、引发人欲望的镜头。譬如说，这个电影、电视剧，没有一个第三者插足，没有一个情人、

小秘，这个电影、电视剧都演不下去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本来一个人是纯净纯善的心，但是看了这样不好的电影、电视剧，把人的欲望、暴力倾向都给引发出来了。所以现在的校园枪击案不断地发生，还有青少年的两性关系也愈来愈混乱，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新闻经常有这样的报导，说某某歌星、影星突然自杀身亡，某某歌星突然出了车祸，还有的得了绝症，更多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没有用自己好的名声去做有利于社会的引导所导致的。当然我们讲这些并不是幸灾乐祸，我们也是希望这些歌星、影星有机会来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避免这些过失，让人生更加幸福、更加成功。

4. 贪利

最后就是贪利。中国古人说，“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看到利益现前，马上就想它符不符合道义。我们看一看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他们都有这种态度。譬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刘庭式的故事，讲的就是刘庭式怎么样见得思义，我给大家放一下（放影片）。

这一位刘庭式，他是和苏轼同朝为官的一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和邻居家的一个女子口头订了婚。后来他就去上太学，五年之后考中进士回乡，这个时候才知道，和他订婚的这个女子双目失明了。女子家的人就说，我这个孩子已经双目失明，就不配再做你的妻子了，这桩婚事就这样算了吧。但是刘庭式信守良心、信守承诺，坚持要娶这个女子过门。结果这个女子过门之后，也是非常的感恩，对刘庭式照顾得很好，也给他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教育得也都很好。后来刘庭式到高密去做通守，也就

是太守的助手。当时的太守就是苏轼。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妻子得病过世了，刘庭式哭得很伤心。苏轼为了劝慰他，就说：“我听说人是因为美色才会生起情爱，因为情爱才会有悲伤的感受。而你的妻子她又不是个美人，还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有什么哀伤可言？”刘庭式听了之后就说：“我所哀痛的只是因为我丧失了一个曾经和我同甘共苦、筚路蓝缕的妻子，我并没有想到她的双目是失明的。如果如你所言，一个人因为美色才会生起情爱，因为情爱才会有伤痛的感受，那你看一看在大街上，每一天挥着袖子、挥着手绢，挑逗你、诱惑你的那些风尘女子，她们每一个人都长得很美，但是她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你的妻子吗？”苏轼听完，非常的惭愧，他也更加佩服刘庭式的德行。

像这样的读书人，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很少把这样感人的故事搬上银幕。我们搬上银幕的都是什么？都是宫廷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其实这些都是现代人以现在人的心理来编写、演绎古人的故事。这些让青少年看了，以为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钩心斗角的历史，怎么能够对我们的文化生起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字，“财色名利”，如果有一个字放不下，过分地贪着，都会给自己的人生招致灾祸。所以古人把这些东西称为“身外之物”。为什么称为“身外之物”？这也体现了我们古圣先贤的智慧，他提醒你，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够控制，譬如说，你想年年十八岁、青春永驻、不得病，你能做得到吗？你想自己记忆力很好、很有智慧、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你能做得到吗？我们连自己的身体都无能为力，不能控制，请问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能够控制的？我们想来想去，没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而对于那些我们不可控制的东西，你非得要去占有、要去获取、要去控制，非常的执着，

你这不是和自己为难吗？所以中国人说“理得心安”。现在，全国上上下下、贫富贵贱的人，都是身心不安，都忙忙碌碌地在那里妄求。原因在哪里？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不明理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学了传统文化之后，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今天反腐倡廉的工作之所以取得的成效不够明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学习《群书治要》，没有弘扬传统文化。如果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够认真地读一读《群书治要》，那我们相信，人人都能明理，人人都能够做到“理得心安”、“君子坦荡荡”。

古人这样提醒我们，说：“立名于一世，失之仅顷刻。”你看，一个人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再到工作岗位，这一路走来，付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个好的位置，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让父母骄傲，让家人为我们自豪了。但是在一个诱惑面前把持不住自己，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结果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那可是在顷刻之间！所以，中国古人又提醒我们，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别人拿着金钱美色来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领导者，你看别人都给我送礼、都贿赂我，很得意。其实人家是拿着诱饵，来诱惑你跳下这个悬崖。结果你把持不住自己，把这个脚踏进了悬崖，你想后悔，还来得及吗？悔之晚矣！所谓“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学》上说，你要想去治国平天下，你要想去构建和谐和和谐社会，你要想去弘扬传统文化，从哪里做起？首先从“格物”来做起。“格物”就是格除物欲，使你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如如不动，能够把持住自己，这样才能“致知”。你的智慧明了，没有被利益和欲望所迷惑，没有利令智昏、情令智迷，这个才是

我们修身的基础。

习总书记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看，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给习总书记这一句话鼓掌。他说：“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伸手必被捉。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想都不要想，一触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线。”你看说得多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念“阿弥陀佛”一样，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面对财色名利就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就不会利令智昏。

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戒贪。

（二）惩忿

第二就是惩忿。惩忿，用我们现代话来说，就是转“怒”为“恕”。我们看“怒”这个字，上面是个奴隶的“奴”，下面是个“心”字。看到这个字，告诉我们，什么叫“怒”？就是把自己的心变成了奴隶。你已经不能把持自己的情绪，所以才会发火。如果你把“怒”的“又”字边这个棱棱角角变得圆滑起来，就变成了“恕”这个字。而“恕”上面是一个“如”，下面是一个“心”。什么叫“如心”？就是如其心。如其心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那你就能够转“怒”为“恕”了。

譬如说，你看人不顺眼、不满意的时候，你就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圣贤人了？是不是一个错误都不犯了？我们自己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过失和习气，怎么能够要求别人一个错误都不犯？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我们就想我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理解

我们的苦衷，给我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宽容我、原谅我。那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颗包容的心，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在孔老夫子那里，有一个弟子来向他请教，说：“夫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让我终身奉行的？”孔老夫子说：“有，这个字就是‘恕’，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就是我们《弟子规》上所说的，“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己”。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扪心自问：我希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行为方式来对待我？如果我不希望以这样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被对待，那我们就不能够这样去对待别人。你看，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是如果你时时、处处、事事都以这一句话为标准，你就发现你的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提升，你为人处世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取舍。所以我们学会了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才能够真正做到转“怒”为“恕”。

在《孔子家语》上有这样一句话，“君子有三恕”。哪“三恕”？“有君弗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就是你有领导，不能好好地事奉，不能好好地恭敬，不能够负责、尽职地完成你的工作，有臣子，有属下，你希望他能够恭敬你、尊敬你，尽心尽力地为你服务，这就不是恕道了。“有亲弗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父母亲都不能够孝敬，有儿子却希望他们能够回报你，那也不是恕道了。“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有兄长自己不能够恭敬对待。为什么？因为自己有权有势，或者有财力，但是兄长可能是个农民，你可能就对他说话不客气，还带着训斥的口吻，瞧不起他。那么，有弟弟妹妹，你希望他们恭敬你，对你很顺从，这也就不是恕道了。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都背着两个包袱，一个包袱上写着他

人的过失，另一个包袱上写着自己的过失。但是我们往往在走人生之路的时候，把写着他人的过失的这个包袱放在了胸前，所以一低头很容易看到他人的过失，很容易就挑剔别人、指责别人，但是怎么也看不到自己的过失。那怎么办？我们就要把这两个包袱换一个个儿，这样才能更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

“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对他人的过失，要能够宽容，还能够反省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过失。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上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有帮助，就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你看到贤德的人、做得比我们好的人，就要想着向他学习、向他看齐，而不是嫉妒他、障碍他。看到不贤的人、做得不够好的人，不是嘲笑他、讥讽他、挑剔他，而是马上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有类似的过失。你看，你从早到晚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都是我们学习的老师。假如一个人这么善学，他每一天的提升多快！

所以我们学了这些话，要在生活中去落实。我们很多人都说，是谁谁谁让我很生气、某某事让我很生气。其实这都是不明理所导致的。从逻辑上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你的内心。所以那个让你生气的人是谁？是我们自己修养不够。有一篇文章，我经常引用，也经常提醒自己，那就是《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一个成熟的人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但我们却常在不知不觉中把它交给别人来掌管。譬如一位女士抱怨说：“我活得很不快乐，因为先生常出差不在家。”她把快乐的钥匙放在了先生的手里。一位妈妈说：“我的孩子不听话，叫我很生气。”她把钥匙交在了孩子的手中。还有一个年轻人从文具店里走出来说：“那位

老板服务态度恶劣，把我给气炸了！”他把钥匙交在了老板的手里。这些人都做了一个相同的决定，就是让别人来控制他自己的心情。而当我们允许别人掌控我们的情绪时，我们便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对现状无能为力，抱怨与愤怒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开始怪罪他人，并且传达着这样一个讯息：“我这样痛苦，都是你造成的，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一个成熟的人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他的情绪稳定，为自己负责，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压力。诸位朋友，你们快乐的钥匙在哪里？是在别人的手中吗？那就赶快把它拿回来！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提醒我们自己要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当然，能够真正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是真正做到了“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人。我们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用发怒来解决问题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还要认识到，这个发怒会对人产生一连串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转“怒”为“恕”。譬如说，我们看一个“狗拿耗子”的幻灯片（放影片）。这个幻灯片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怒气会导致很多人的不愉快，产生连锁反应。所以，我们一定要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做到转“怒”为“恕”。

（三）改过

第三个修养就是改过。在《群书治要·鬻子》上有这样一句话：“大忌知身之恶而不改也，以贼其身，乃丧其躯，有行如此，之谓大忌也。”就是说，人最大的忌讳，就是明明知道身上有过恶，

但是却不能够更改，这样就会贼害了自己的身心，乃至丧失了生命，一个人有行为像这样，确实是人生的大忌了。这告诉我们什么？“知耻近乎勇”，人要懂得知耻。

当然说到“改过”这两个字，我们就会想到《了凡四训》中袁了凡先生改过的经历。在《了凡四训》上就记载着，袁了凡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仕途不是很顺利。他在后来求学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位云谷禅师，教导他改过自新的方法，让他反省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过失导致了仕途的不顺利。了凡先生很难得，他一听到这样的劝告，马上就认认真真地反省自己，看看自己究竟有哪些过失。他在反省的时候这样说：我福分很浅薄，又不能多做好事、积功累德，为我享受那个大的福报奠定一个基础；我做人没有耐心，又不能够宽容别人（因为他自己很有才华，自己的才华往往掩盖了别人的才华，让别人的才华不得发挥）；说话不经大脑，直心直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不知道这句话对别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和伤害；还轻易地来谈论别人的过失、施政的得失等等（《弟子规》上说：“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经常谈论别人的过失，不小心被别人听到了，人家知道你在背后说他的过失，就对你非常的痛恨，无形之中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我当时看《了凡四训》的时候，我发现这些问题自己身上都有，特别喜欢以才智盖人。我到新加坡学习之后，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大学的一位老师看了我，他说：“你留学回来之后，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以前什么样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和同宿舍的人相处得很不好。有一次，同宿舍的人说了一句不太好听的话，我听了之后非常生气，我就说你再说一遍，她果然又说了一遍。结果我怎么样？我上去就打了她一拳，把她打得很痛，还去告诉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我们

班主任老师觉得很奇怪，他说，都大学生了，男孩子都不动手打人了，这个女孩子还动手打人。这是大学发生的事。即使我在上博士后的时候，和人家相处在一起，还经常和人吵得不可开交。那个时候的脾气就是一点火就会着的那种，而且不懂得推让，有什么事特别好表现，说的话都是咄咄逼人的。

到了新加坡学习了传统文化之后，再回到中国的时候，我这位导师就说，他说“你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所以我们学了《了凡四训》发现，这些问题我们身上一一都有。了凡先生能够改正，我们和他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就改正不了？《了凡四训》上说，“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想一想古代的圣贤人，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们和我同样是人，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百世的师表，到今天，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的人，一提起他们，还非常的尊敬，愿意向他们学习，而我自己却是“一身瓦裂”？什么叫“瓦裂”？这个“瓦”就是指陶制的器皿，譬如说陶制的杯子、陶制的碗等。但是这个陶制的器皿却破碎了。结果怎么样？一文不值。“耽染尘情”，过分地放纵于感官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私行不义”，偷偷做着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谓人不知”，还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将要沦落为禽兽，而不知不觉，相反还妄自尊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当时我看了《了凡四训》上面这一段话的时候，真的是看得冷汗直流：我不就是这样的人吗？所以如果没有接触圣贤教诲，我们确实可能堕落为禽兽都不知不觉。

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耻”这个字对人来说太重要太重要了。为什么？一个人知耻，他知道自己有过失，做了错事会惭愧，会不好意思，他就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知耻近乎勇”，勇于改过，他就能够成为贤人、成为圣人。但是如果不知耻，做

了错事没有不好意思的感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就会一天一天地沦落为禽兽而不知不觉。

圣贤人和普通人的差别在哪里？并不是说圣贤人从来不犯错误。中国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后面一句话是重点，“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就是说，你犯了过失，但是你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善了。所以《了凡四训》上说，“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以前的过失，既然已经犯下了，就不要再纠缠它了，就像过去一样，都过去了。从今以后，我们接触到了传统文化，学习了《群书治要》，要从现在开始改正自己的过失，仍然能够成圣成贤。

在《了凡四训》上也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过失，就像刺猬身上的刺那么多。但是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常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什么原因？那就是“心粗而眼翳也”。我们反省，自己的心太粗疏了，眼睛都被蒙蔽了，所以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我们现在人有一个最大的过失，是什么？那就是傲慢、奢侈。我们现在人说起别人，都是不屑一顾，甚至都胆敢批判圣贤人，对圣贤人的教诲都不屑一顾，所以是傲慢到了极点。在《易经》上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学了这个规律，就不敢再傲慢了。为什么？因为你观察天地自然的规律，是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潮涨就有潮落，有春夏就有秋冬。从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所以古人常用太极图来表示阴阳变化的规律。这个太极图，半边是阴的，半边是阳的，中间还有一个界限。如果过了这个界限，做得太过分了，那就会引起变化，这就叫“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也就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所以，在曾国藩的《家书》上，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家

败离不开一个‘奢’字，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

一个家庭、家族企业、单位、政党的破败，都是因为这里边的每一个人过上了过分奢侈、过分浪费的生活，以至于入不敷出。而一个人以前都在走上坡路，突然转折，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转折点何在？什么时候他认为自己的奋斗已经差不多了，该享受一下人生了，从此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出现了。有的人是在大学，有的人是在走上工作岗位，有的人是获得了一官半职、有了一些财富，开始过上了玩物丧志、不思进取的生活，他人生的转折点也就出现了。

一个人讨人厌，不讨人喜欢，就是因为过分的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我自己从小到大，学习成绩都挺好的。结果因为成绩很好，往往就瞧不起别人。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是需要求别人的，全都是别人有事来求我。所以走在路上，这个头都是往天上瞅的，两眼朝天看。就像现在的名牌高校的学生一样，走在路上旁若无人，这个眼神里都带着傲慢。所以每到评“三好学生”的时候，虽然我的成绩特别好，但是一投票我就落选了。那个时候没有学传统文化，也不知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凡事要反省自己。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想都是因为我的成绩太好了，别人都嫉妒我，所以才不投我的票。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直到我到汤池去学习，听蔡老师在讲课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什么我们走到哪里，和人相处了几天，就起了矛盾、起了对立、起了不满？因为我们没有学《弟子规》，不懂得最起码的为人处世的道理，没有做到“敬而无失”、“恭而有礼”，所以走到哪里才不招人喜欢。我看了蔡老师的讲座，非常的受启

发，多年之后才突然明白，自己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每次评“三好学生”都评不上。

所以我们学传统文化，确实能够发现自己的很多过失。当你能够明白自己的过失，进而改正自己的过失时，这个欢喜才是不可言喻的。

《易经》有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六爻，六爻的爻辞一般都有凶有吉。但是在所有的六十四卦之中，有一卦是六爻皆吉的，这一卦就是谦卦。而这个谦卦的卦象是“地山谦”。平时高山都是在平地之上的，但是在谦卦之中，这个高山宁愿居于平地之下。我们想一想，一个人像曾国藩那样才华横溢又有权有势，这个时候皇帝可能就有戒心了，群臣对他也会有嫉妒之心。这个时候，他怎么做的？他是“推功于上，让利于下”，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功劳推给了领导、推给了长上，利益分给属下，自己不去沾。当然，一个像他这样真正能去做的人，不居功，不求利，那也是有很高修养的人，他是真正明白了天地之道的规律。因为任何一件事的成就，都不是某一个人付出的结果、某一个人聪明智慧的结果，它需要有很多人的付出才能够成就。

《尚书》上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骄满的人会给自己招来损失。为什么？一旦一个人骄满了，认为自己比别人都强，他就不再会好学了，他的人生就很难前进了。谦虚让自己受益，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道理。《尚书》上又说：“天道福善祸淫。”天道自然的规律，是给善良的人带来福分，而给过分的人招致灾祸。这都是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推导出来的。

所以在《群书治要·孝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虽然你身处高位，但是没有骄慢的表现，那么即使你身处高位，也没有被颠覆的危险。虽然

你很有财富，但是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礼的规范，做事很谨慎、很符合法度，那么即使你很有钱，但是也不会有入不敷出的危险。“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我们看了这段话，就知道现在的富二代、官二代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哪里？就是因为缺少教育，不知道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第一代创业的人都是白手起家，兢兢业业，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下了事业。第二代条件好了，但是有的还能耳闻目睹父辈创业的艰难，知道克勤克俭，使事业发展壮大。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出生就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没有体会到祖辈、父辈创业的艰难，不知道什么是克勤克俭，还学会了骄奢淫逸、铺张浪费，久而久之，就把祖辈、父辈辛辛苦苦所打下的基业给败光了。

所以我们学《群书治要》，确实可以让我们的人生避免很多的错误，少走很多的弯路。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讲的是“修身”。

四、领导者道德修养的内容（二）：爱民

第二点，就是“爱民”。作为领导者，能够做好两件事，这个领导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两件事就是《群书治要·孙卿子》上所说的，“爱民而安，好士而荣”。我们首先看一看“爱民”。

在《群书治要·六韬》上记载，姜太公回答周文王怎么样治理国家，他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对待人民百姓

是什么态度？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像兄长慈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我们想一想，父母是怎么对待儿女的？如果一个家的家境很贫寒，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父母宁愿自己挨饿也要让儿女吃饱，宁愿自己挨冻也要让儿女穿暖。一个好的领导者对待属下、对待人民就应该是这样一种态度，见到百姓饥寒交迫就为他们感觉到哀伤，见到百姓劳苦奔波也会为他们感觉到悲愁，想方设法地要解决他们的困难。

在《春秋左氏传》上，也是总结了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说了这样一句话：“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盛，什么原因？因为他把百姓视为受伤的病人一样加以体恤、加以关爱。很多人说，把他视为病人还不够，应该是把他视为自己的伤病一样加以关爱、加以重视。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是最担心的，想方设法地四处求医。你对待百姓是什么样的态度？就像自己的伤痛一样，那样的关爱，那样的体恤，这是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而一个国家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把人民视为像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可以随意地践踏，这也是一个国家灾祸所产生的原因。

所以在《史记》上就记载着，历史上曾经出现有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西门豹在治邺县的时候，他做邺县的地方官，他把法律设计得很严苛，他达到的是“不敢欺”的境界，老百姓被吓得战战兢兢，没有人敢欺骗他。子产在治理郑国的时候，他做郑国的宰相，把法律、监督机制设计得很严密，他达到的是“不能欺”的境界，老百姓想欺骗他都做不到。但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在治理单父的时候，他把孔老夫子的仁爱、忠恕思想落实在管理之中，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他达到的是“不忍欺”

的境界，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们的长官。究竟哪一个层次的管理是最高层次的管理？而我们现在的很多企业，又在追求哪一个层次？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现在很多企业的管理，包括政府的管理，都在追求“不能欺”、“不敢欺”的境界，而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不忍欺”的境界。

子贱治理单父究竟有多好？他的一个同学，也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叫巫马期，他就很想知道子贱治理单父到底有多好。于是他就乘着夜色来到了单父，微服私访。他看到一个人正在捕鱼，结果那个人捕了很多鱼，看了一眼，又把这些鱼给放回到河里去了。巫马期觉得很奇怪，他就走上前来问。他说：“我看你捕鱼，捕到了很多鱼，但是你为什么又把这些鱼给放回到河里去了？”这个人怎么回答的？这个人回答说：“因为我们的长官子贱告诉我们，不要去捕捞那些还在成长中的小鱼，而我刚才所捕上来的，正是那些还在成长中的小鱼，所以我又把它们放回到河里去了。”巫马期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叹，回来就向孔老夫子禀报。他说：“不知道子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孔老夫子就说：“子贱曾经说过，一个人对身边的人、事、物有至诚之心，就会影响到远方的人。也就是说，你对身边的人和事至诚恭敬，你的这种至诚恭敬心、爱心，老百姓都能够体会到，所以他们不忍心欺骗他们的长官。他可能就是把这种方法运用到管理之中了。”巫马期就说：“子贱治理单父，能够达到即使是没有有人看管，也像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爱民如子，他起到了君亲师的责任。

很多人说，这种理念用来治理古代的小县、小的地方还可以，现在我们这个企业都是跨国公司，你再用这种理念，还能行得通吗？我们看，松下幸之助为什么能够成为“经营之神”？稻盛和

夫为什么能够创下两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并在短短的时间内拯救了濒临破产的日航？他们都是把这种“君仁臣忠”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所以获得了成功。稻盛和夫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他就这样很谦虚地说：“其实我不过是把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运用到企业管理中而已，我所用的都是你们古圣先贤的智慧。”他的这一句话，也让我们非常的感慨。为什么？因为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反而要去向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国家（美国）学管理。

在《和谐拯救危机》上，我们看到尊敬的上净下空老教授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没有长期统一的历史，他们是一个移民国家，就像一些小摊贩一样。那怎么样把诸多的小摊贩管理起来？他们想到了民主，通过民主推选，选出一个领导人来管理这些小摊贩。这个管理方式适合于美国，但是不适合于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长期统一的历史，它已经形成了像超级市场的管理方式。而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要做什么？放弃超级市场的管理方式，去学习那些小摊贩的管理方式。这是多么的可悲和可叹！

当然，我们现在也欣喜地看到了希望，像我们的吴念博董事长、胡小林董事长，还有很多的企业家，都把传统文化落实在自己的企业管理中，最后创下了和谐企业、幸福企业。他们这些活生生的例证，也让我们生起了对“中国式管理”的信心。

说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我们就想到很多的领导者，根本就没有这种鱼水情深的意识，对老百姓是漠不关心，哪里还会“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这个爱心生不起来，原因何在？在《论语》上，孔老夫子就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我们之所以做不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

我们对老百姓没有感情，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孝心。对于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伤痛，他们处于贫困的境地，我们都生不起回报、帮助的心，看到这些陌生人处于贫困的境地，又怎么会生起要帮助他、扶持他的心？所以爱心的原点在于孝悌。我们看，在《孝经》上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而去爱别的人，这个是和德行相背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亲而去尊敬别的人，也是和礼的要求相背离的。

在历史上，有一个叫杨甫的人，他要去四川拜见无际大师，因为他听说无际大师修学佛法功夫非常的深，而且很有智慧，所以他就离家不远万里到那里去拜见无际大师。在路上，他就遇到了一位出家人，告诉他：“你求无际大师，不如求佛。”他就问：“那佛在哪里？”出家人说：“你从这里往回走，一路上你如果见到一个倒趺拉鞋、披着被子的人，这个人就是佛。”他就一路往回走，留宿了很多的旅店，敲一敲门，也没有见到有哪一个倒趺拉鞋、披着被子的人。所以他很失望，回到了家里，深更半夜就敲门。他的母亲一听儿子回来了，非常的欣喜，顾不上穿鞋，结果倒趺拉鞋、披着被子就赶快来给他开门了。等他打开门一看，看到母亲倒趺拉鞋、披着被子，他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母亲就是佛。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在家敬父母，强胜远烧香。”为什么？这句话说得很有味道！如果你去远烧香、去拜佛的目的是求升官发财，那还是一个为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但是你在家能够孝敬父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需要，你那个是爱心，那是为别人的心，是一种感恩的心，这个心才是和你的心性本善相应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学佛，到寺院里去烧香、磕头。但是怎么样？对父母都不知道孝敬，这个佛法怎么能够学得深入？因为你没有爱心，没有一种感恩的心，你孝心没有，爱心的原点就

找不到。所以老教授就提倡让人们学习《弟子规》。为什么要学习《弟子规》？因为做人都不及格，还怎么样去成佛？

我们看父母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看一个幻灯片，题目叫《母亲》。

妈妈，虽然孩子已经成年，但是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你哺育我时，那乳汁里饱含着的温暖。当我毕业的喜讯，充满着您的骄傲笑脸，您知道您期盼的世界，已经开始将五彩渲染。母爱无边，在生命中承袭绵绵，无穷的力量，支撑着不朽的关怀，让爱走向生生不息的永远。妈妈，虽然鱼白早现天边，我的耳旁依然回响着，在雷鸣的轰响中，您深夜轻轻脚步点点。好想为您递上一支拐杖，支撑起您，曾经硬朗似铁的腰杆，所有的豪情岁月，航行在您承诺的永远。好想摘一朵鲜花，插在您白发苍苍的鬓边，在满是岁月的沟壑里，为您种下永远的春天。您依旧温柔的声音，哪怕是喋喋不休的叮嘱，也是在我神情未定的时刻，延续着千年不绝的训言。当我很久没有听到您的唠叨，偶尔有一天我发现，我在重复您的教诲，我才知道，我在将爱的信息承传。好想为您点上一盏明灯，照亮您曾经秋水的眼帘，让所有记忆的诗集，在您的眼眸里历历再现。

下边是有人总结的，“母亲一生的八大谎言”，看了之后，确实是感人肺腑。

儿时家里很穷，饭常常不够吃，母亲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吃。母亲说：“孩子们，快吃吧，我不饿。”孩子们吃鱼的时候，母亲不吃，母亲又用筷子把鱼夹回孩子的碗里。母亲说：“孩子，快吃吧，我不爱吃鱼。”有一个冬天，孩子半夜醒来，看到母亲还躬着身子在油灯

下糊火柴盒。孩子说：“母亲，睡吧，您明早还要上班。”母亲笑了笑，说：“孩子，快睡吧，我不困。”高考结束的铃声响了，母亲迎上去递过一杯用罐头瓶泡好的浓茶，叮嘱孩子喝了。望着母亲干裂的嘴唇和满头的汗珠，男孩将手中的罐头瓶反递过去请母亲喝。母亲说：“孩子，快喝吧，我不渴。”父亲病逝之后，母亲又当爹又当娘，苦不堪言。然而母亲多年来却始终不嫁，别人再劝，母亲也断然不听。母亲说：“我不爱。”身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常常寄钱回来补贴母亲，母亲坚决不要，并将钱退了回去。母亲说：“我有钱。”孩子长大了，有了一份好工作，孩子想把母亲接来享享清福，却被老人回绝了。母亲说：“我不习惯。”晚年，母亲患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孩子千里迢迢赶回来时，术后的母亲已是奄奄一息了。望着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母亲，孩子悲痛欲绝，潸然泪下。母亲却说：“孩子，别哭，我不疼。”

我们看了这个“母亲的八大谎言”，都觉得很熟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母亲确实经常说这样的谎言。而我们做儿女的还很粗心，以为母亲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想一想，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和儿女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是为什么她觉得不习惯？因为她到了你们家里，你看她一会儿这个做得不对了，一会儿那个东西放错了，她觉得很不自在，确实是很不习惯。孩子小的时候，母亲对他的照顾是无微不至，有求必应，非常的耐心。但是自己老的时候，到了孩子的家里，却被孩子挑三拣四，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哪一个父母能习惯？

父母对待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馈父母？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孝敬父母？这个礼也有具体的规定。像我们在读《礼记》，讲到“内则”，看到古人怎么样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突然恍然大悟。老教授经常说，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没有恭敬心。为

什么没有恭敬心？因为我们对父母就没有恭敬心。

《礼记》上记载，一个儿子侍奉父母，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儿子侍奉父母，应该是鸡刚刚啼叫，就起来洗脸漱口、梳头戴帽、理好饰物、系好帽缨、穿上端服、套好蔽膝、系上大带、插上笏板。这是古代当官的人去面见皇上时的装扮，非常的正规。左右两边佩戴好用具。为什么佩戴用具？怕是父母、公婆有所需要。然后去父母、公婆所居之处。到了那里，静气平声，询问父母，需要什么就恭敬地送上什么；和颜悦色，问寒问暖。父母如有过错，要心平气和，低声劝说。如果劝说不进去，就要更加恭敬孝顺，待父母高兴时再次劝说。如果父母发怒不高兴，甚至打得自己头破血流，也不能够厌恶埋怨，还要更加恭敬孝顺。父母去世以后，将要做善事的时候，想到要让父母留下好的名声，就一定要实现它。这是一个儿女对待父母的正确态度。

我们看了这段话，才体会到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没有恭敬心了，因为我们从父母那里就没有培养出恭敬心。而我们从侍奉父母的态度上培养了一个重要的态度，那就是不和任何人起对立的念头。因为你看父母打得你头破血流，你都没有怨言，你不会和父母有逆反、有对立，这种处世态度一旦养成，你和任何人相处的时候都没有对立、没有矛盾、没有逆反。所以，我们没有恭敬心，根源何在？根源就是对父母没有了恭敬心。所以你对父母不恭敬，你对师长很恭敬，毕恭毕敬，那个恭敬是假的，是装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恭敬心，是对待所有的人都同样的恭敬。你对父母能够恭敬，你对别人的恭敬才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心性的流露。所以，为什么说“孝是中华文化的根”？就是因为从孝开启了一个人的爱心，开发了一个人的心性，而这个心性不是伪装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流露。

我们现代人看到了这一段话，可能在想，什么年代了，我们现在都讲“深圳速度”，做什么事都非常的快，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恭敬父母？我们现在人觉得这是繁文缛节。但是有一个朋友，他到日本留学，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回来。他第一次带着这个日本太太去见父母，结果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他的父母打开房门，突然发现，这个日本的儿媳妇穿着很好的和服，脸上化着妆，就好像去参加宴会一样，恭恭敬敬地跪在门外。看到公公婆婆出来了，她马上就鞠了一个躬，说：“请问爸爸妈妈，昨天晚上睡得好吗？”结果把这老两口吓了一跳，还不知道这儿媳妇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跪在门外。实际上，这些礼都是从中国人这里学来的。

我们现在鞠躬，中国人之间鞠躬，你觉得很奇怪。但是你到日本，人与人之间见面全都是鞠躬礼，你觉得很自然。所以现在，日本民族被誉为“世界上形象最好的民族”。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学习并且保留了中国的礼，所以他们成为了最受尊重的民族。

在《礼记》上还有一段，告诉我们怎么样孝敬父母、孝敬父母的儿女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它说，“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就是说，真正的孝子每走一步路都不敢忘记父母，所以有大道就不会走那些羊肠小路，有舟可乘就不会冒险涉水过河。为什么？不敢以父母给的身体去做危险的事情。一个孝子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他就不会口出恶言。为什么？因为你口出恶言，你骂别人，别人也会回骂你。“忿言不及于身”，愤怒的这种话，也不会返回到你自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不辱没自己的身心，不让你的父母亲蒙羞，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

一个真正的孝子，每走一步路不敢忘记父母，每说一句话不敢忘记父母，他还会想到去自杀吗？现在有的大学，突然一天出

现了两个自杀的学生。结果有新闻就说，我们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生命教育，让他们懂得尊重生命。这个就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问题出来了，就说应该怎么做。实际上，只要给这个孩子孝道的教育，他怎么敢去轻生？他只要一念想到父母，他就不敢做出这样让父母伤心的事。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抓到了根本。根本抓到了，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这个就是讲“爱民”。爱民从哪里爱起？从爱父母来做起。

五、领导者道德修养的内容（三）：用人

最后一点，我们讲一讲“用人”。“爱民而安，好士而荣”。领导者除了爱民之外，就是要任用贤才。

（一）亲君子，远小人

用人，第一个就是要亲君子、远小人。

中国古人说，如果你作为领导者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你的事业就会发达。如果相反，你亲近的是小人，而远离君子，你的事业就会衰败。有人问了，怎么样才能判定我身边的人是小人？在《群书治要·韩子》上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小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凡奸臣者，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凡是奸臣、小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都会顺着君主的心思去说、去做，以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宠幸。“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领导者认为什么好，他一

定跟着赞叹什么；领导者憎恶什么，他一定跟着毁谤什么、批评什么。这就是小人最大的特点。诸位朋友，我们看了这一个观点，我们想一想，现在的领导者喜欢用君子还是喜欢用小人？

在《群书治要·吴志（下）》上面，也是总结了历史经验，说了这样一段话：“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听别人说他的过失。而使国家混乱的君主，特别喜欢听别人对他的赞叹。喜欢听自己过失的人，他的过失会一天一天地减少，福分也就来到了。喜欢听对他赞誉的人，他的声誉一天一天地减损，这个灾祸也就来到了。中国古代的领导者，他们都明白这一个道理，所以他们选用人才的时候，选用什么样的人？选用那些可以指正他过失的人。

譬如说，在《韩诗外传》上，记载着一个赵简子和周舍的故事。赵简子有个臣子叫周舍，在他的门外站了三天三夜。于是赵简子就派人去问，问他有什么所求，为什么在门外站了三天三夜。周舍就回答，他说我别无所求，只想做一个能够犯言直谏的臣子，每一天跟在你的身后，把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特别是过失，给记录下来。

诸位朋友，特别是领导者，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臣子、下属，每一天跟在你的身后，要记录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特别是你的过失，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很多领导者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敢。为什么不敢？第一，现在的领导者觉得我有很多的隐私，如果一个人跟在我的身后，每一天记录我的过失，那怎么可以？第二，现在的领导者喜欢别人对他的赞誉还来不及，结果有一个人这么自讨没趣，跑过来要记录他的过失，他能高兴接受吗？

但是赵简子却不一样，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周舍的建议。从

此以后，赵简子走到哪里，周舍就跟到哪里，很老实地把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特别是过失，都记载下来。但是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这个周舍过世了。

周舍过世后，有一次赵简子在洪波台和群臣饮酒，当大家正喝得高兴的时候，突然赵简子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诸位大夫一看，就不敢再饮酒，马上离开坐席，纷纷向前来请教，说：“我们知道自己有过失，但是不知道自己过失何在，还请您明示。”赵简子说：“诸位大夫都没有什么过失，我是突然想到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周舍，他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千张羊羔皮都不如一片狐腋有价值，众多唯唯诺诺的臣子都没有一个敢犯言直谏的臣子对我有帮助。’历史上的商纣王，他的臣子闭口不言，所以商朝灭亡了。而周武王的臣子都能够犯言直谏，当面指正他的过失，所以周朝就兴盛了起来。但是自从周舍过世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自己的过失了，我知道自己离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所以我才哀痛！”

所以，古代的领导者，都以不能够听到自己的过失而感到战战兢兢。现在的领导者怎么样？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谄媚他、恭维他，他还在那里洋洋得意、飘飘然。我们自己也经常犯这样的过失。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喜欢称赞我们？肯定是因为我们还喜欢听这样的话，还不能够真心实意地接受别人的建议和批评，所以还感召不了犯言直谏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

（二）尊贤使能

用人，第二个方面就是一定要尊贤使能。

鲁国的国君向孔老夫子请教，他说，我听说向东扩展房屋是

一件不吉祥的事，这件事可不可信？就像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看风水，说这个门朝哪边开、这个桌子往哪块摆才更吉祥。孔老夫子怎么回答？他说，我听说天下有五种不吉祥的事，而向东扩展房屋并不包括在其中。哪五种不吉祥的事？“夫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损人利己，给自身招致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放弃了老年人不管，所有的关爱放在了孩子的身上，给自己的这个家、家族招致不吉祥。“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贤德的人都放弃不去任用，任用的全都是不贤德之人，这是一个国家的不吉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老年人，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人，不愿意去教导年轻人，年轻人没有谦虚好学的心，也不愿意向老者去请教，这是社会风俗的不吉祥。“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也”，圣贤人都隐居、藏起来了，愚钝的人把持了领导的位置，这是天下的不吉祥。所以，世间有五种不吉祥的事，而向东扩展房屋并不包括在其中。

孔老夫子说的五种不吉祥，其中国之不祥、天下之不祥，都是和不能够任用贤德的人有关系。什么是贤德的人？就是能够身体力行圣贤教诲，教导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道理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像上净下空老教授这样的人，特别应该受到国家的尊重。在《群书治要》中，其实也有这样的阐述。它说，自己能够说又能够行，这是国宝级的人物。如果你能说，你说的都没错，但是你在力行中，你还做得不够好，这是国师级的人物。老教授实际上是国宝级的人物，特别应该受到尊重。

在《群书治要·尸子》上，就对任用贤德的人的重要性做了一个比喻。它说，你看你们家的房子着火了，有人帮你把火扑灭，你一定会对他感恩戴德。但是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人很早就告诉你，要把墙的缝隙涂好，把烟囱做得弯曲一点，让你终身没有

失火之患。但是你却不知道对他感恩戴德，你还觉得这样的人很麻烦、很唠叨，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现在一个人被关进了监狱，如果有人能够帮他解除牢狱之灾，他一定会对他感恩戴德，他们家族的人都会对他感恩戴德。因为他出了监狱可以赡养父母、照顾妻子、教育儿女，所以他们全家的人都对他感恩戴德。但是问题是什么？教导人仁义慈悌的道理，让你终身没有被关进监狱的祸患，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对这样的人感恩戴德。

所以我们看了这样的话，其实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教育不得力？那个真正贤德的人，能够教导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道理的人，没有被尊重。只有我们国家真正尊重这样的人了，才可以真正防患于未然，让人根本就不去犯罪。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

（三）慎用人才

最后一点就是慎用人才。因为任用人才好不好，对整个社会的风气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论语》上说，“众恶之，必察焉”。很多人都厌恶他，你也要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厌恶他？为什么有人会毁谤他？是否因为这些人的嫉妒？他们知道这个人很有德行，一旦被任用，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都厌恶他，就要讥讽他、毁谤他。“众好之，必察焉”。就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他，很多人都说他好，你也要去认真地考察，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德，是不是真正的有德行，让人喜欢。有的人喜欢特立独行，他不愿意和众人同流合污，这样的人往往会被那些不能够很公正的人所厌恶。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人才的任用要非常的谨慎。

在《群书治要·六韬》上，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君以世俗

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国君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为贤智之人，以社会大众所毁谤的人为不肖之人，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就被举荐出来了，不愿意结党营私的人就被罢黜了。邪曲不正的人结党营私，把真正贤德的人给蒙蔽了，忠臣还因为“莫须有”的罪名死于无罪，邪曲不正的人以虚有的声誉获得了领导的位置。于是，这个世间的乱象会愈来愈严重，这个国家也就免不了危亡了。

这一句话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民主制是有弊端的？它的弊端何在？就是采取民主制的这些民众，他必须有一定的德行才行。如果没有德行，他们往往结党营私，把真正贤德的人给掩蔽了。所以我们对于民主制的弊端要看得清楚一点，不能够盲目地采取。中国人讲民主，有民主还要有集中。这个集中的人就是领导者，领导者必须是非常的有智慧。

在《六韬》上，对于慎用人才也做了这样一段论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就是你要对他提出问题，看他的回答是不是有理有据；你还要对他追根寻底地提问，看他有没有应变的能力。“与之间谍，以观其诚”，你还要暗地里考察，他是不是够忠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这件事你明明知道结果如何，但是你明知故问，看看他的德行如何，是不是有隐瞒。“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让他有得财的机会，或者是支配财务的机会，看看他有没有贪心、够不够廉洁。“试之以色，以观其贞”，还要用女色来考验他，看看他面对女色的诱惑是不是能够如如不动。

“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告诉他这件事很困难，看看他有没有勇气去承担。最后，“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还要把他灌醉酒，

看看他酒后是否失言、是否失态。我们现在很多的领导者，平时都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说话慢声细语的，但是喝醉酒之后就丑态百出，让人一看就失去了恭敬心。所以你经过这层层考察之后，这个人没有问题，才可以把他用到重要的领导位置上。

上面就是我们今天抛砖引玉，把《群书治要》中的修身、用人、爱民的思想，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相信接下来三天的论坛讲座会更加精彩，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聆听古圣先贤的教诲。谢谢大家！